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大将风云录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 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华诞。为隆重庆祝这个盛大节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批推出《将帅风云录》系列丛书六集，即：《十元帅风云录》、《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一、二集）和《中将风云录》（一、二集）。

这部丛书，所收录的人物，除极个别走向反面之外，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过的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有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战将，也有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后勤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肩负起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又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本丛书并不是着重反映他们戎马一生的历史传记，而是针对人物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撷取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最为闪光的、富有传奇特色的轶事和风采。

俗话说，“一叶知秋”、“滴水映海”。轶事和风采同样能让人们感悟到，革命前辈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感人肺腑的绚丽乐章。

革命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走过了70个春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里程，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辉煌。70年如一日昭昭于世。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们，为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概括起来，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人生情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严谨求实的作风，认真科学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不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今天一代一代革命继承者永志不忘，躬亲实践的精神准则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建军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把这部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若诚能如此，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编 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大将风云录

解放战争中的粟裕

杜魁元

粟裕（1907～198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湖南省会同县人。侗族。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2军连长、营长、支队（团）长、师长、师政治委员，红4军参谋长，红7军团参谋长，红10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挺进师师长，闽浙军区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先遣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苏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中区党委书记、苏浙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粟裕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粟裕戎马一生，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粟裕独挡一面，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坚定地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充分显示了卓越的战略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三年解放战争，是粟裕战斗历程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从苏中民谣“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役指挥交粟负责”，粟裕的名字是和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联系在一起。本文扼要记述粟裕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所创造的光辉业绩。

七战七捷

1946年1月，国共双方停战协议签订，政协决议通过。

然而，这些并不标志着真正和平民主的到来，只不过是蒋介石的缓兵之计罢了。4月1日蒋介石发表武力“接收”东北的演讲，中旬便大举进犯我四平，月底悍然拒绝了我党和民盟协商提出并得到美方停战调停代表马歇尔同意的东北停战方案。5月，国民党军队将我之退让视为软弱可欺，在华中，又攻占我津浦路西的肖县、夏邑、定远等城，真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内战全面爆发的阴影笼罩着华夏大地。华中解放区是我解放区东南前哨，与国民党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是蒋介石欲“优先解决”的心腹大患。作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的粟裕，对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革命伎俩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针对部队由于种种原因所产生的不同程度的和平麻痹思想，粟裕反复对指战员讲，和不得成，是中央的事，我们作为军人，应该立足于打，不但要打，而且要准备长期打。华中地当要冲，势必为敌进攻主要方向，因而更应早做准备。

5月5日，华中军区向中央建议：我们为确保沿江财源区域，并扩大政治影响，震撼京沪，已集中第6、7、8纵队于苏中地区，并拟于新四军第5

师战斗大爆发时，不待苏中顽军动作，而先行发动攻势。次日中央复电：如果国方进攻第5师，全国内战爆发，你们先下手的计划是可行的。但必须得到中央的命令之后才能行动。当时，华中分局正在淮安讨论贯彻五四土改指示，粟裕在苏中前线作战前准备，人们称之为“蒋不攻李（先念），粟不攻蒋；蒋若攻李，粟必攻蒋。”

大战一触即发。针对敌强我弱的实际，我在战争初期应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呢？

长期独挡一面的作战生涯使粟裕长于思考，并使他深深懂得：作为军事指挥员，应该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个指挥员对战略问题有了较深刻的了解，有了清醒的头脑，才能运筹自如地指挥作战。因此，粟裕对探寻战争规律和特点问题格外重视。

那么，内战一旦全面爆发，战争初期到底又有哪些规律和特点呢？这个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萦绕在粟裕心间。

战争也象其他事物一样，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高明者总是能够因势利导，努力探寻这一客观发展规律，并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客观存在的规律，以争取胜利。

粟裕认为，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和我们都有了重要变化，我们必须着眼于战争的新的特点及其发展。蒋介石接收了日军的武器、装备和仓库物资，美国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大批飞机、大炮、坦克和各种武器交给了他，他的兵力发展到了他统治中国时期的最高峰——430万人。同时，蒋介石掌握着全国性政权，中国的地方派系中，再没有人敢于动用武力来打蒋介石了。因此，蒋介石必用全力来进攻我们。

但与此同时，我方的情况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停战协定生效时，解放区城市已有506个，超过过去中央苏区的24倍（中央苏区曾有过21个县城），解放区人口达1.3亿，超过过去中央苏区人口52倍（中央苏区最多时有人口250万），并且建立了东北和热河、察哈尔根据地，从此打破了敌人对我根据地长期四面包围的态势。除新四军第5师地区外，各解放区已联成一片。我们在战争的初期，就有一个历史上空前广阔的内线作战战场。我军已发展到127万人，其中野战军、地方军各半。尽管仍然是敌强我弱，但是，敌我力量的重大变化，已使国内战争的主要形式——“围剿与反围剿”的反复永远结束了，出现着新的情况。在内线同敌人作战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要充分利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以运动战为主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在敌我力量对比起了有利于我的重大变化后，转入战略进攻。

但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6月22日设想的南线战略方针是打到外线去，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6月24日，中央军委决定扩大南线作战计划的规模。由太行、山东两区主力外线出击，扩大为华中野战军参加的三军主力外线出击。6月26日又电告华中分局：“你区应以一部在苏中吸引并牵制（南）通扬（州）线上之敌，粟、谭率主力（不少于15个团）位于三分区（淮南津浦路东）与陈、舒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津浦路西地区），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

粟裕是于27日在苏中前线接到中央要华中主力西出淮南津浦线的命令的。他的内线歼敌的想法显然与中央外线出击的计划是不一致的。当时，毛

泽东采取外线出击的方针，各有关战区领导都是拥护的。粟裕接电后郑重思考，认为如果把自己上述在内线歼敌的设想提出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他自己的设想并未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他建议先在内线打一仗再打到外线去，用实践验证在内线作战与立即打到外线去的利弊。于是，粟裕在当天（27日）即向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华中军区建议：华中主力仍留苏中作战，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理由是：在淮南津浦线地区集中大兵团作战，粮食、民夫和交通运输均极困难。如集中兵力过多，则所需粮、夫必超过当地负担，不仅影响当地群众，且影响战斗更大；另外，目前华中主力都集中于苏中，民夫及作战用具都已准备完毕，如不在苏中打仗即西移，不仅对群众很难说服，既使对部队亦难说服。

粟裕发出此电后，立即赶回淮安，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一起商量，他们赞同粟裕的建议。于是，以邓子恢为书记的华中分局4位常委于6月29日联名向军委、陈毅建议：华中主力第1、6师仍留在苏中作战。

陈毅在接到粟裕27日电和邓、张、粟、谭29日电后复电指出，华中主力留苏中打一二仗无法改变该地严重局势，胶滞于该地于全局不利，故应立即西开，执行外线出击的方针。

华中分局在接到陈毅电报仅几个钟头后，又接到毛泽东为中央军委写的复电：“部队暂缓调动”。于是，华中主力立即停止西开淮南。同时，陈毅也收到军委认为华中29日酉（时）电“此意见似有理由”的电报。7月4日军委发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的电报一到华中，粟裕在苏中前线立即照办。

确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这是战争初期中央军委对原定战略计划的一次重要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时，蒋军12万云集苏中，狂言“三个星期消灭苏北共军”。

首战必胜，粟裕决心选择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作为初战的作战地域。尽管这不符合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通常实行的诱敌深入的传统战法，但粟裕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诱敌深入并不是目的，也不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唯一打法，而是歼灭敌人的一种手段。传统战法的运用，须在总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从当面的实际情况出发，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在苏中解放区前部打，最主要的一是可收到“强敌尚未展开，虽强犹弱”的效果，并迫使蒋军提早实行战略展开，从而便于我进行战略侦察；二是前部地区战场条件良好，该地区的广大群众经过长期战争环境的锻炼，具有顽强战斗的传统和丰富的作战经验；三是华中主力部队第1、6师在这一带作战时间较长，对民情风俗、地形道路十分熟悉，在长期坚持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均对我有利。先在苏中解放区前部地区打几个胜仗，是必要的，也是具备条件的。

但是，敌为12万，我军仅3万余人，敌我兵力对比悬殊，且我装备远逊于敌，再加上这是自卫反击第一仗，是内线歼敌的第一仗，是对付美械装备的蒋军的第一仗，这些赋予了该仗特殊的战略意义。7月10日，粟裕在得悉敌军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时，决定打四路之敌中的宣泰一路。该路是四路当中的中间一路，打掉这一纽带，西路泰州之敌和东路南通之敌的间隔就扩大了，我军可以转用兵力，连续作战，打开局面。

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这是粟裕用兵最为看重的战术。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突然性往往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选择苏中解放区前

部地区作为初战地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着的话，那么，打到敌进攻出发地域去，将尚未展开且孤立突出的美械装备之强敌整编第 83 师的两个团作为首歼对象则是奇中见奇了。敌人跟我军作战多年，熟悉我们的传统战法，在判断情况时有他们的思维定势。因此，从其绥区指挥官到第 83 师师长，都没有想到我军会敢于主动向他们攻击，并且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军不等第 83 师出动，而敢于到他们的进攻出发地找上门去打他。

粟裕的奇着收到了奇效。7 月 13 日，粟裕率华野主力先机制敌，以 6 倍于敌的兵力攻打宣家堡、泰兴守敌各一个团。敌人事先毫无所知，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慌乱失措，乱成一团。敌指挥部也莫测我军虚实，急令东路准备由南通北犯的第 49 师主力于 14 日回缩，以保南通。至 15 日，敌指挥部才判明我军主力确在宣、泰，又急令第 49 师再次北进。这一缩一伸，白送给我军两天时间。而 15 日晨，我第 1 师经一夜激战，已全歼宣家堡之敌 1 个团及山炮营，第 6 师也已基本上歼灭了泰兴之敌，敌人只剩下 1 个营部率少量残部负隅顽抗。鉴于我军已获得转移兵力的主动权，宣泰战斗遂告结束。我只留下少数地方武装继续围攻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为我军主力仍在泰兴的假象，作为钓饵，以引诱东路南通之敌北上。

宣泰之战，我军仅用一天多的时间歼敌整编第 83 师第 19 旅的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 63 旅 1 个营，共 3000 余人。实践证明，整编的美械化蒋军是完全可以战而胜之、攻而歼之的。初战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我军战胜美械化蒋军的勇气和信心。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此也极为关切，战斗结束后，毛泽东便亲拟电文询问：打的是否即整编第 83 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粟裕就此一一作了汇报。

然而，骄狂自恃的敌人竟估计我军经宣泰一仗伤亡必大，因此急调江南的整编第 65 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第 99 旅增援泰兴，并进犯黄桥，以拖住我军的主力；同时又令东路第 49 师星夜疾进，企图乘虚夺我如皋城；然后，第 49 师从如皋，第 65 师从黄桥，第 83 师从泰州，三面夹击我军。

针对敌人的部署，有两个作战方案要粟裕尽快做出抉择：一是就近打前来增援宣泰敌军；二是转移兵力，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 49 师侧后攻击之。粟裕认为：打援敌虽可就近转用兵力，部队不会疲劳，时间也较充裕，但援敌有备而来，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第 49 师得以乘机攻占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相比之下，打进犯如皋之第 49 师虽需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且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将减弱战斗力，但它的优点又是非常明显的，主要是敌人以为我主力在西边，第 49 师将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我军来一个长途奔袭，必然大出敌人的意料，将陷敌于被动混乱的境地。

舍近就远，声西击东，弃援敌于不顾，远距离奔袭进犯如皋的第 49 师。粟裕果断下达了进军如南，歼敌于运动中的命令。

7 月 15 日晚，粟裕令第 1 师全部和第 6 师大部转兵东进；并用汽艇急运第 7 纵队 1 个团先期赶回如皋，协同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残敌，给敌人以我主力还在西边的错觉，引诱如东之敌放胆向如皋进犯。

部队向东疾进。两昼夜的激战后，马不停蹄，又急行军一百几十里，也只有人民的军队能有这样的打得、饿得、跑得的英雄气概。夜过黄桥，群众以烧饼和西瓜争相慰劳。这使粟裕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当年黄桥决战时群众

支前拥军的场面；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首激动人心的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暖，
黄黄烧饼慰劳忙暖。
烧饼要用热火烤暖，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

粟裕嘴角泛出一丝微笑，满怀深情地想：有了这样的军队，有了这样的人民，我们能不打胜仗吗？正义之师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7月18日晚，如南战斗打响，敌人还在做着兵不血刃，乘虚而入如皋的美梦。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百几十里之遥的我军突然神兵天降，故而仓皇失措，部队大乱。

粟裕的奇着又奏效了！

如南一战我共歼灭敌整编第49师一个半旅，连同在阻击中消灭的敌人，共歼敌1万余人，达到了预期歼敌的目的。此时我军已连续行军作战10天，相当疲劳，加之敌援军趁机向我如皋和海安进攻。如继续与当面之敌纠缠，对我不利。为保持主动，粟裕决定我军23日主动撤离如皋城，准备再战。7月21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贺华中野战军：“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经过宣泰、如南两仗，敌人被我歼灭了两个半旅。但他还有第2梯队，立即又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合击我苏中重镇海安。

海安是苏中的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敌人判断，海安是我军势在必争之地，企图依仗其优势兵力，在海安寻我决战，一举消灭我主力。

敌人的诡计岂能在粟裕面前得逞？粟裕考虑：中央要求我们不轻易放弃要地，但中央更要求我们保存有生力量，以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我兵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我固守海安，在海安与敌人决战，势将付出很大代价，战胜了，敌人仍可继续调集兵力，保持其进攻的态势；战斗如不顺利，势必仍要撤出来，那就被动了。如我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然后撤出海安，给予敌人以我军被迫放弃战略要地的错觉，使敌人重新骄傲起来，就将造成有利于我歼敌的战机。

然而，对于放弃海安这样的战略要地，粟裕也不敢单独做出决定。更何况当时中央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的战略方针，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所理解和掌握。放弃海安确需慎之又慎。为此，粟裕日夜兼程从海安赶赴华中军区所在地——淮安。途中150余公里的路程，须经水网地区，粟裕开始骑摩托车，以后乘了一段黄包车（人力车），接着又骑自行车、乘船，当时能够搞到的交通工具全部用上了，一天一夜赶到淮安。华中分局召开了常委会，经郑重地讨论后，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创造新的战机。最后以华中分局名义上报中央、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并得到了同意。

粟裕对海安运动防御战采取的部署是：第7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第1师、第6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

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第7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7纵队主动

撤出海安。

实施运动防御，再主动撤离海安，实在是粟裕的一着妙棋，尤其是在我连打两个胜仗之后，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果断放弃海安。在敌优我劣的形势下，这样做不仅保存了自己，打击了敌人，为主力部队休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放下了坚守海安这个包袱并将之甩给敌人，并造成敌人以为我不堪一击的错觉，为我以后歼敌创造了条件，埋下了伏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战局的发展，苏中地区已由粟裕初始建议的“打一仗再走”发展为三次作战，且三战三捷，给敌以沉重的打击。三战的胜利初步证明了粟裕内线歼敌的正确性，并使他认为，内线作战还大有文章可作，他对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的态势下实行内线歼敌的方针比外线出击更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思想也由此得以升华。为此，在如南战斗结束不久，粟裕便于7月25日向中央、陈毅、华中军区建议：“当面尚有顽十个师（旅）之众，而我们仅能集中三万五千人（官兵在内）之野战军于一个突击方向，于短期内恐难使战局打开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队很难保住天长与盱眙，果如此，则淮南仅以少数坚持即可，故建议淮北战役尚未大打时，仍将第5旅调至苏中参战，比留淮南更有效。”

粟裕的这个提议，从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一个旅的调动问题。可是，从实质上看，是华中野战军作战的主要方向是在苏中还是在淮南的问题，涉及到华中野战军是仍在苏中内线歼敌还是立即西出淮南津浦线进行外线出击的方针问题。

此时，陈毅已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线到达淮北。在接到粟裕25日要求第5旅东调的电报后，陈毅决定遵循中央三路大军外线出击的计划不变。

粟裕从他对解放战争初期作战特殊规律的探索考虑，于8月1日向中央、陈毅及华中军区直陈己见：“我各战略区除在战略上应互相配合外，在战役上似不应要求一定配合（事实上也很难做到），而在单独作战中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敌人，否则会影响到另一个战略区之机动。依目前华中兵力，实无法组成两个野战军。现天长、盱眙既失，第5旅等部留淮南已无大作用，因此建议将淮南主力大部东移苏中参战。”很显然，粟裕提出的各战略区“单独作战，以自己力量解决当面之敌”，与中央提出的集中三个战略区主力外线出击的计划是不同的。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华中野战军的作战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采取了非常冷静的做法，继在7月4日做出“我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的指示后，又于7月13日，即宣泰战斗发起的那一天，指出：“我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注：指陈毅部）、豫北（注：指刘邓部）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暂时推迟了三支野战军同时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而采取刘邓、陈毅两军暂时不动，由华中野战军先在内线打，查明敌人弱点以后，再一起动作，这实际上赋予了华中野战军以战略侦察任务。在接到陈毅14日“应即按原定南进计划（按：指三路大军外线出击计划）行动”电报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让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作战的实践中先摸清敌人的底细，于15日复电陈毅：最近几天，可看一看泰兴战斗结果如何？”8月2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给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陈毅、宋时轮的

电报中也并未正面回答第5旅是否东调问题，而是询问粟裕“一个月内在苏中再歼敌两个旅有可能否？如你们能在八月内歼敌两个旅，南线情况即将改观，那时粟可率主力转至淮南作战”。当接到粟裕8月5日“第5旅增到苏中条件下，于八月内再歼敌人两个旅是有把握”的电报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于8月6日指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调为有利”。

此时，自我主动撤出海安，采取隐真示假手段后，果然如粟裕所料，造成敌人产生错觉，得出我伤亡数字竟达“二三万人”，因而宣告“苏北共军大势已去”。敌人自以为他们的第一步作战目标已经达到，因而调整部署，把原来驻在如皋城的陆空联络组撤回常州。

粟裕估计敌人必将分兵东进，占领李堡、角斜，完成其东西封锁线，然后守备部队准备分散“清剿”后方。骄兵轻进，必然会暴露出许多弱点，使我有隙可乘。8月6日，敌果然由海安东进。粟裕遂于8月7日报告中央：“歼敌良机已至”，“如以第5旅加入苏中作战，则苏中战局很可能最近有新的开展。”毛泽东8日为军委拟电复示：“望张、邓、谭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显然，毛泽东所指的主要方向是苏中，而不是淮南。

敌人果然进一步暴露了“骄兵”的弱点，7日占李堡，8日占角斜。在得悉敌指挥部决定调整编第65师于9日经海安去泰州、黄桥接替第25师和第99旅的防务，10日又令新第7旅从海安东开接替第105旅在李堡一线的防务后，粟裕认为：敌军频繁调动，给了我军以趁其运动或立足未稳加以歼灭的大好时机。于是，粟裕当机立断，决心集中兵力，首先寻歼李堡之敌于运动中。

李堡之战于8月10日20时发起。我军挟三战胜利之威，士气高昂。我第1师乘敌人混乱之际，猛扑李堡，奋勇攻击。此时的李堡，正有敌人的两个旅部各率1个团在交接防务，兵力虽多，但队伍混杂，工事也未筑好，我军一击，建制大乱。至11日晨，我军完全攻占李堡。由于我掌握战机得当，攻势突然迅猛，敌人正在交接的两支部队都很混乱，交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刚才拆除，接防之敌的电台、电话尚未架好，双方都无法向海安告急。11日晨，敌新7旅旅长仍按原计划带领1个团由海安东行，我军部署在海安以东打援的第6师与第7纵队，立即利用高粱、玉米地作好伏击部署，在运动中将该敌全部歼灭，其中一个营缴械投降。

李堡之战，干净利落，前后20个小时，歼敌一个半旅共9000余人，赢得了苏中战役的第四个胜仗。

毛泽东是最注重实践的。而粟裕也是最善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也即打胜仗来解决意见争端的。当毛泽东得知李堡又获全胜后，12日再给陈毅的电报中指出：“粟裕军前日在苏中第二个胜仗（指李堡战斗——作者）不但使苏中蒋军陷入极大困难，亦将使淮南第五军无法北调。”“不如令粟部再在苏中作战一时期，再打一二个胜仗，使苏中蒋军完全转入守势，保全苏中解放区，对全局有极大利益。这样配合淮北作战，更为有利。”13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欣然电示粟裕、谭震林（华中野战军政委，李堡战斗进行中来到苏中前线）：望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

四战四捷的实践也使粟裕更加坚定了在内线歼敌的思想，进一步证明了在战争初期实行内线歼敌方针的正确性。8月14日，粟裕、谭震林上报中央：认为再在苏中作战较为有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时，中央军委和毛

泽东完全赞同粟裕的意见，指出：“所见很对，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那里作战。如你们能在今后一个月再打二三个胜仗，继续歼敌二三个旅，则对整个局势助益极大。”陈毅也于13日、15日迭发两电指出：“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

作战实践终于统一了不同认识。

内线歼敌思想得以更加贯彻深入。

可以说，李堡之战意义重大。它打破了敌人迅速解决苏中问题的美梦，是苏中战役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仗，更为主要的是以该战为转折点，在解放战争初期作战方针问题上从中央到战区指挥员之间形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时，也标志着粟裕初始委婉建议的“打一仗再走”在演变为四战四捷后，依然没有划上休止符，这篇光辉的乐章还要在苏中这块大地上继续高奏下去。

国民党军经过我连续四次打击，已被歼灭3万余人，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除非从别的战区抽调部队来增援，再难向我全面进攻。而我军经过连续作战，抓紧休整和补充解放战士，加上连打胜仗的鼓舞，士气高昂，越战越强。华中军区增调来的生力军第5旅和军区特务团也已于李堡战斗时到达，我军兵力增强。

两厢对比，此起彼伏，敌我态势已出现了有利于我的明显变化。

粟裕那深邃的眼光又凝眸在地图前，运筹下一个作战方案了。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在苏中“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如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的指示精神，结合苏中实际情况，粟裕设想了一个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严重威胁敌人的后方基地，打乱敌人的部署，造成歼敌之良机的方案。

不过，敌人的这个“肚子”，东西百余里，南北仅数十里，东面是海安经如皋至南通公路沿线之敌；西面是泰州至靖江公路沿线之敌；南为长江；北为泰州至海安公路沿线之敌。在敌人肚子里面还有一条如皋至黄桥的公路，这条公路上的敌人是我们歼击的目标。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敢于钻到这样的肚子里去打，非有过人的胆识和气魄不可，也需对作战计划进行缜密部署，不能差之毫厘，对战局的可能发展的估计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西游记》当中曾有孙行者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索取宝扇的故事。但那是神话。

而粟裕在解放战争初期苏中这块土地上创造的钻到敌人肚子里去打的奇迹却是实实在在的事。

8月20日，驻扬州的敌整编第25师拟进攻我运河线上的邵伯镇，得手后将向高邮、宝应进攻，威胁我两淮。邵伯地区仅有我第10纵队和第2军分区两个团守卫。于是，粟裕、谭震林决定采取“攻黄（如黄路）救邵（伯）”的方针，当晚，率华中主力第1师、第6师、第5旅、特务团共3万余人向南开进，目的是攻占如皋城以南的丁堰、林梓两镇，切断如皋至南通的公路，在敌人肚皮上切开一个口子，以便主力钻进敌人的肚子里去。

21日夜11时，丁堰、林梓战斗打响。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来个釜底抽薪，到他的肚子里去打。

又是一次出敌不意的攻击。

战斗进展甚快。22日上午，丁堰敌交警第11总队被我第1师围歼大部。我第6师围攻林梓，全歼守敌。东陈之敌在我第5旅围攻下，大部逃入

如皋，东陈被我攻占。

丁、林战斗歼敌交通警察 5 个大队及第 26 旅 1 个营，共 3000 余人，缴获甚多，打开了西进的门户。

此时，淮北方向由宿县东进的敌人正准备向我淮阴进犯。扬州之敌第 25 师为了配合这一行动，于 8 月 23 日全部开始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的邵伯镇。

粟裕决定按原定“攻黄救邵”计划，用攻其必救的办法来调动敌人，寻歼敌人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

粟裕的部署是：以刚从地方武装升级组成的第 10 纵队（3 个团）及第 2 军分区两个团在邵伯防御；第 7 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钳制性进攻，拖住敌人；第 1 师、第 6 师、第 5 旅、特务团继续大踏步机动作战，于 8 月 23 日夜向敌人的“肚子”中心部位黄桥挺进，以寻机歼敌。

由于在我内线作战，加之我老区组织严密，敌人得不到情报，故反应迟钝多误。我军由丁堰、林梓西进，敌指挥部并未意识到我军将挺进黄桥，却根据我丁、林战斗的态势判断我将攻击如皋，急令黄桥守敌第 99 旅沿如黄公路增援如皋。8 月 24 日，我军截获敌人这一行动的情报，粟裕即令部队在行进中严密注意敌情，准备在如黄路与敌第 99 旅打一场预期遭遇战。25 日，敌第 99 旅进至黄桥东北之分界，与我第 6 师遭遇，当即被第 6 师包围，展开激战。

至此时敌人才发觉我主力已西进，乃令已南下到如皋的第 187 旅，加上第 79 旅一个团和第 99 旅的一个营，急向西南增援第 99 旅，该敌又被我第 1 师在分界、如皋之间的加力、谢家甸截住，将其包围。

25 日夜，分界、加力两地之敌均集团固守，因为敌人实有的兵力远比我原先侦察的要多，经一夜激战，都未能解决战斗。

战局骤紧。西面运河线上邵伯、乔墅一线战斗十分激烈。我主力若在如黄路拖延时日，邵伯一旦失守，战局将起剧变，不利于我军。

“功亏一篑，这种教训不乏其例”，粟裕想，“就整个苏中战场来说，敌我兵力对比是三点五比一，由于我们灵活用兵，在第一、二、四、五各次战斗中，我们都集中了 3 倍以上的兵力对付待歼之敌。但是我们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只能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靠灵活用兵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想到此，粟裕果断调整部署，采取断敌后路、隔断敌人东西两部联系的办法，使之无法靠拢和脱逃，然后选取较弱的第 99 旅两个团先行歼灭。8 月 26 日，粟裕令第 1 师的第 1 旅由加力方向西调，转用于分界，配合第 6 师等部以 10 个团的兵力，以五比一的绝对优势，迅速围歼了第 99 旅的两个团。随即又将第 6 师全部和第 1 旅东调，会同第 3 旅、第 5 旅以 15 个团的兵力围歼加力、谢家甸之敌 3 个团。26 日晚，东调各部迅速开进。

此时，邵伯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从 8 月 23 日起，敌军在炮艇、飞机配合下向我邵伯、乔墅一线阵地猛攻。我第 10 纵队和第 2 军分区的部队根据水网湖泊地区正面狭窄的特点，采取轮番守备的战法，以连续的反冲击和白刃格斗消灭敌人。敌第 25 师猛攻了 4 天，我军工事大部坍塌，许多部队的指战员坚持在齐腰的积水中作战，时常送不上饭，但战斗意志始终压倒敌人。这时，第 99 旅已在如黄路上就歼，第 187 旅等部也将不保。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深受威胁，且伤亡已达 2000 多人，再打下去，凶多吉少，终于在 26 日黄昏时候狼狈撤回扬州。

进行了四昼夜的邵伯战斗即苏中第六次作战又以我获捷而告终。

“救邵（伯）”目标已达到，剩下的仅是“攻黄”这一块了。27日上午，我国攻加力、谢家甸之敌的15个团全部到达了预定位置并投入了战斗。敌人又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多团的兵力，在飞机的掩护下西出接应。加力、谢家甸之敌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粟裕指挥各部全线出击，将突围之敌一一歼灭，仅数百人逃回如皋。如皋出援的一个多团，也被我歼灭一半。第5旅及时插到如皋西南，正好截断敌人逃路，俘获甚多。因我第5旅衣服为黄色，和苏中部队的灰蓝色不同，而与当时国民党军的黄绿色近似。该旅向敌迅猛出击时，敌军误以为援兵赶到，欢呼跳跃，没想到随即成了俘虏。继而第5旅乘胜利余威于31日攻克黄桥，黄桥守敌第160旅5个连缴械投降。

如黄路之战，我军共歼敌两个半旅，1.7万余人。在解放战争初期对付美械装备之敌人，如此战绩，真可谓是大获全胜了。

至此，苏中战役历时一个半月，我军以3万余人迎战蒋军12万人，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同时，该战役还证明了依托解放区进行内线作战，具有许多有利条件，从而为我军进一步明确和完善战争初期的内线歼敌方针提供了经验。对此，毛泽东亲自为军委起草电文向各战略区介绍了苏中作战经验：“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八月二十六日集中十一个团打敌两个团，八月二十七日集中十五个团打敌三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精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仿照办理，并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在苏中七战七捷的一个半月内，挺进淮北之山东野战军亦于7月底初胜朝阳集，歼敌5000余人，但紧接着在8月7日至9日攻打泗县的战斗中却失利了。蒋军乘势占领淮北。华中首府两淮（淮阴、淮安）沦入敌手。

我军撤出两淮后，一方面是南北两线敌军，对我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另一方面则是我山野、华野两支大军靠拢，兵力相对集中。

9月20日，粟裕和华中分局其他领导同志致电中央和陈毅：“为了改变华中局势，我们建议，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得手后再向西扩大战果。”次日陈毅复电赞同，并向军委建议，两军的指挥部合成一个。22日，中央电示：“同意集中两个野战军统一指挥，向淮海行动打开战局，望即按此方针坚决执行”。次日，又电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亦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如同意请即公布（对内）执行”。

9月底，陈毅到华中分局共同拟定了一个以山东野战军一部配合华中野战军主力，歼灭宿迁方向之敌，尔后西渡运河，收复淮北的作战方案。陈毅于10月1日将这一方案上报中央军委。在该电中陈毅还向军委建议：两军合一后，在军事上多由粟裕下决心。

但是，敌情又起变化，鲁南之敌进占峄县、枣庄，威胁临沂。陈毅提出山野回鲁南，华野留淮海区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的主张。10月14日，中央军委致电询问粟裕和华中分局其他领导：你们觉得全军去鲁南歼敌把握如何？粟裕考虑：第一，当前蒋介石的进攻重点在华中，如我即刻全军入鲁，敌之进攻重点也将立即由华中进至山东，而华中将过早地丧失，对于长期作战不利。第二，两淮失守后，敌已对我形成半包围的态势，如果我不能在淮

海打一个规模较大的歼灭战，则下一步转移作战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困境。第三，我军撤出两淮，群众中已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波动，如不能再打一个胜仗就全军入鲁，对民心、军心不利。第四，为开展苏北地区的敌后游击战争，也需要再打一仗。几个月的战争经验表明，主力仗打得好，土地改革进行得彻底，干部下决心坚持是坚持敌后原地游击战争的三个必要条件。前一段的仗是在苏中地区打的，苏北地区还没有打过胜仗。所以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很好的。但似宜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于是，陈毅去华中分局当面商讨，双方意见又恢复一致。10月15日子时，陈毅等致电中央军委，建议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同日12时，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张鼎丞、邓子恢、曾山并告粟裕、谭震林复电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蒋方计划引我去山东，我久不去乃决心与我在淮北决战。此种情况于我有利。望你们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决不可分散）歼灭东进之敌，然后全军西渡收复运西。”

毛泽东在此电中又说：“为执行此神圣任务，陈、张、邓、曾、粟、谭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六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返电商贻误戎机），战役指挥交粟负责”。

从陈毅的“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再到毛泽东的“战役指挥交粟负责”，说明毛泽东和陈毅对粟裕是高度信任的。从此，粟裕开始负华东战区战役指挥之责，他深感重任在肩，暗下决心：要竭尽全力挑起战役指挥这一重担，不辜负陈毅的重托，不辜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厚望。

敌人加快了向我进攻的步伐。自10月中旬起至12月上旬，粟裕为了开拓淮海作战战场，又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四次作战，即东台防御战、涟水保卫战、淮沐路反击战、盐南反击战。12月9日，盐城保卫战告捷，我军转入追击战。当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盐城前线之捷》的评论，指出：“新四军在盐城前线痛击进犯蒋军，毙伤俘六千人，这是五个月来粟裕将军所部的第十一次大胜仗。这十一次大胜仗歼灭蒋军足足有九万人。苏皖军民光荣的自卫战绩，最生动的证明了蒋军的必败。”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12月初，蒋介石为了配合“国大”的召开，指使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拟定了《迅速结束苏北战事》的作战计划，从冀鲁豫地区抽调“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到苏北战场，集中25个半旅的兵力，分四路进犯。

淮海地区战场突然沸腾起来了。

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陈毅设想了四个对策，于12月6日上报中共中央，并告张、邓、粟、谭：“以集中力量确保沐阳，歼击十一师之一路为最好”。

接到陈毅的电报时，粟裕正在指挥盐城保卫战。他在盐城前线分析敌我态势，也认为四路敌军中以进攻沐阳的一路对我威胁最大，只有集中我军主力歼灭这一路敌人，才能取得主动（后来陈粟会合后商定钳制整编第11师，集中兵力歼灭整编第69师）。但是，华野第1师当时正在盐城作战，在沐阳方向阻击敌人的兵力单薄。为此，他和谭震林12月8日联名发电报给陈毅：“建议山野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路边，以便能在两日内赶到参战。”

陈毅12月9日复电，“同意所部署”，并说：“我率一纵、八师今夜移马头、沂河北岸机动位置，并兼顾打击鲁南之敌。如需要南下，二夜即可到宿沐路作战。”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宿沐方向极为关注，12月9日电示指出：“应待盐

城作战结束，粟率一师北返，并待敌情完全明了后，再考虑部署。届时请粟提出计划电告。”11日，中央军委在发出“庆祝盐城大胜，望对指战员传令嘉奖”电报的同时，又提出“望粟即日北返，部署沐阳作战”。

沙场点将，足见中央军委对粟裕的重视程度。

接到中央军委12月9日的电报，粟裕当即于12月10日晚驱车北返，奔驰150公里，赶到位于涟水、沐阳交界处的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驻地张集。

12月15日，宿北战役打响。

我军的部署是：以24个团的兵力，除以一部割裂敌整编第69师与整编第11师的联系，并阻击整编第11师外，集中三倍于敌的兵力，首先围歼立足未稳之整编第69师于宿迁、沐阳、新安镇三角地区。战至19日，在宿迁以北全歼整编第69师师部及3个旅，共2.1万余人。

军委、毛泽东18日来电，“庆祝宿沐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20日又来电指出：“歼敌二万以上，于大局有利，甚好甚慰。”

“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初战旗开得胜，粟裕果然不负众望。

以此战为标志，华东战区终于摆脱被动，迎来了第一个转折。

宿北战役的胜利，给敌人的一路以歼灭性打击，迟滞了另外三路敌人的进攻。但就总的态势看，还只是把敌人的半包围圈打开了一个缺口，必须取得新的作战胜利，才能实现我军战略意图，取得完全主动。

战场态势决定我必须马不停蹄，转入新的作战。

事实上粟裕在宿北战役即将结束之时，就已着手筹划下一个战役了。

粟裕一边看着地图，一边思索着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宿北战役结束以后的第二步作战，宜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的指示精神。

“军委指示在鲁南作战，使鲁南获得巩固，实际上是指出了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山东将是华东的主要战场”，粟裕想，“如果继宿北战役之后再在鲁南打一个大歼灭战，不仅能打破敌人的包围圈，使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完全会合，而且能为今后在山东作战创造良好的战场条件。鲁南巩固了，以后南下、北上或西进，我军都会取得行动的自由。”

陈、粟研究决定：主力北进鲁南，寻歼鲁南之敌，并于12月24日联名上报军委。军委当日迅即回电同意。

针对鲁南的地形、民情以及敌我双方兵力兵器对比和战斗力等情况，并结合军委关于“整编第二十六师系敌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弱敌，则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的指示精神，陈、粟等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先打强敌我军虽有不利因素，但有利条件更多。特别是战役一开始即可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第26师和快速纵队6个团，兵力四倍半于敌，是绝对优势，可以实现战役上的以多胜少。同时，敌整编第26师和快速纵队虽是强敌，但它孤军突出，态势不利，而且与冯治安部有矛盾，在它受攻击时，冯部有很大可能不会来援。因此，我军有把握取胜。

先打强敌第26师和快速纵队的决心定下后，陈毅、粟裕随即下达作战命令：第1师、第1纵队、第8师秘密兼程北上，会同已由鲁中到达鲁南之第9师、第4师一个团，及原在鲁南方向作战之第10师、滨海警备旅和鲁南军区特务团，准备首先歼灭敌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尔后再乘胜扩大战果，直下峄县、台儿庄，歼敌整编第33军一部或全部。

各参战部队夜行晓宿，迅速隐蔽北上。

1947年1月2日22时，我军参战的27个团分左右两纵队提前两小时发起攻击。敌人在我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封锁监视下，犹如瞎子，对我军的这一重大作战行动居然毫无觉察，其第26师的师长马励武还在峰县过元旦未归，失去指挥的敌军晕头转向，仓皇应战。激战至3日，整编第26师大部被歼。

4日，就在我军即将对敌快速纵队发起进攻时，天气由阴转雨，雨中夹雪。

参谋人员向粟裕请示：“计划要不要改变？”

“不变！”粟裕果断地回答，“雨雪交加，道路难行，会把重型装备陷在那里，敌人就更难逃了。这是天老爷在帮我们的忙啊！”

然而，快速纵队毕竟是“国军精华”，且又是蒋纬国苦心经营的，因此，虽然云层很低，但敌人还是设法派飞机来支援它的地面部队。不料，敌军规定的空投联络标志被我侦听到了。粟裕立即传令部队选定地点，布置起假的地空联络标志，敌人的一部分援救物资果然投送到了我们的手上。

4日上午10时左右，敌见空中和地面增援无望，开始脱离阵地落荒突围。

粟裕见敌阵势已乱，命令各部队迅速出击。

按照粟裕的命令，我军左、右两纵队以追击、侧击、堵击等手段，用炸药、集束手榴弹爆炸等办法，打炸坦克及装甲车辆。激战至15时，将整编第26师余部及第1快速纵队全歼。

按预定方案，下一阶段作战任务是寻歼敌整编第33军，并相机收复台儿庄、峰县。但此时敌整编第33军见整编第26师及第1快速纵队被歼，已于5日全部退缩到运河以南，背靠徐州，依托原有工事防御，寻歼该敌战机已失。战场敌情的变化，要求我军的作战计划也必须立即变更。

敌变我变。粟裕经过冷静分析后认为：如果攻打峰县，在我攻击方向的侧翼，会遭到鲁南重镇枣庄之敌的攻击。为了更好地实现中央关于巩固鲁南的指示，创造较好的战场的条件，只打下峰县不行，还须攻克枣庄。尽管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些，但对打开鲁南局面极为重要。因此，粟裕提出下一阶段同时攻取峰县和枣庄的建议，取得了陈毅的赞同，并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9日拂晓，粟裕率部分人员组成的轻便指挥所到达峰县、枣庄前线。指挥所尽量靠前设置，这是粟裕指挥作战的一个特点，因为这样做能够及时了解并处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

当天晚上，鲁南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即攻峰县、枣庄战斗发起。攻峰战斗进展顺利，11日晨1时全歼守敌。攻枣战斗则一度受到挫折。因枣庄系工矿市镇，建筑物比较坚固，敌人的工事较强。

此时，敌援军欧震集团的3个整编师已推进到新安镇两侧，其中两个师距枣庄仅15~20公里。必须在敌援兵到达前迅速拿下枣庄。

粟裕果断调整攻城部署，令第1纵队派两个团，第8师派一个团协助第1师攻打枣庄。各部经充分准备后，于19日下午对枣庄守敌发起总攻。20日13时，枣庄终被攻克。

鲁南战役经过两个阶段连续作战，全歼国民党军美械装备的整编第26师、整编第51师和曾在缅甸作战被称为“国军精华”的第1快速纵队，共5.3万余人，创造了空前大胜纪录。特别是干脆、彻底、迅速歼灭了全副美械装备的敌主力师和机械化部队，对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是个极其沉重的

打击，对华东以至全国人民是个很大鼓舞。1月21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给陈、粟、谭的电报指出：“三十五天内你们歼灭第69、第26、第51等3个整师，取得空前大捷。”

1月下旬，山野、华野正式合编，下辖第1至第12纵队（缺第5纵队），此外，还有一个特种兵纵队。与此同时，撤销新四军和山东、华中野战军的番号，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陈毅任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两大野战军在胜利声中实现了统一。

这时，蒋介石侦悉陈、粟主力集结于临沂附近，决定组织“鲁南会战”，调集11个整编师（军）共29个旅（师）的兵力，组成两个突击集团，以临沂、蒙阴为目标，作出南北对进夹击的部署。南线由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8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由陇海路自台儿庄一线北攻临沂，于1月31日出动；北线由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尚未整编，军同整编师，师同整编旅）为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明水、博山一线南下莱芜策应，于2月2日出动。

依据当面敌情，并结合军委“似宜诱敌深入，不宜行动过早”的指示精神，陈、粟拟定了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敌右路之敌即整编第25师及整编第65师一部于郯城以东、东海（今海州）以西地区方案。在制定作战方案的当天（2月3日），陈、粟即令第3纵队从正面坚决抗击中路之敌，目的是要诱使敌之左右两路突出，以利我寻歼其中的一路。但敌不中我计，反而就地构筑工事，且有向中路靠拢之势。而北线之敌李仙洲集团已于当天由明水、博山南犯。看来，敌人估计我必固守临沂，决定按照其会战计划规定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等北线李仙洲集团逼近后，再同我主力决战。

鉴于敌稳扎稳打，齐头并进，如何创造战机的问题摆在了陈、粟面前。

作战室里，宁静无比。

陈毅来回踱步，冥思苦想。

粟裕全神贯注地看着地图。

“既然南线战机难寻，那么，我们能否舍南就北，歼灭北线之敌呢？”陈毅打破宁静，对佇立在地图旁深思的粟裕说，“五二（注：粟裕的代号），你以为如何？”

“我也正是这个想法”，显然，粟裕对此问题已成竹在胸，故接过陈毅的话侃侃而谈：“第一，南线敌军麇集成堆，平推北上，不易各个击破；第二，从兵力对比看，整个南线敌共有63个团，我虽也集中约60个团，敌占优势，我不宜过早地与其决战；第三，北线之敌乘虚南下，拊击我侧背，威胁我后方，不能忽视。同时，与南线敌军比较，北线敌军兵力少，战斗力也相对不强，内部派系矛盾多，且孤军深入。李仙洲本人军事上是外行，没有什么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我如将主力隐蔽北上，可对其形成绝对优势，有把握予以歼灭。敌既认定我必固守华东首府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就可以置敌南线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既可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敌一大坨，粉碎敌之南北夹击意图。”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陈、粟不谋而合。

当然，粟裕也充分考虑到打北线之敌时，如果敌发现我主力北上，有可能回缩，使我军扑空。但即使如此，我还可乘势进击胶济路，打通鲁中、胶东、渤海三区的联系，然后休整部队，以逸待劳，从容迎击南线之敌，仍属

有利。

听了粟裕的具体分析，陈毅非常高兴。2月5日，陈、粟将北上歼敌的作战预案急电请示军委。军委次日复电批准。陈、粟于2月10日定下最后决心：留第2、第3纵队在临沂以南，采取宽正面部署，佯作与欧震集团决战的态势，迷惑敌人；我则集中第1、4、6、7、8、9、10等7个纵队，围歼李仙洲集团。

此时，我军能否“示形于鲁南”，做到不露破绽，使敌始终认为我在鲁南与其决战，成为我抓住李仙洲集团而“决胜于鲁中”的最关键的一着棋。

然而，南北两线相距150余公里，几夜之间，数十万大军隐真示假，变“南征”为“北战”，绝非易事。

古人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曾被认为兵家“示形”作战的范例，而今之粟裕所导演的“示形于鲁南，决胜于鲁中”的精彩程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粟裕大力从以下几个方面“示形”：一示连续作战疲惫之形，使敌认为我“大势已去”，产生麻痹骄狂心理；二示必保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将决战于鲁南之形，为此，第2、3纵队伪装成华野全军，实施宽正面防御，摆出与敌决战的架势；三示我主力“失利”于临沂外围之形，通过节节阻击，最后不得不放弃临沂；四示我军准备西渡黄河，撤出山东解放区与刘邓大军会合之形，采取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渡船，以此来迷惑敌人，使敌一时难以判明我军北上作战的真实意图。

战争确实是最变化不定的一种运动形态。在陈、粟挥军北上之时，敌情先后有四次变化。其中第一次变化也是最大的一次变化，是在南线之敌占领临沂后，济南敌第二绥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有我部队经费县向西北运动，同时，又得知南线敌军未经激烈战斗迅速进入临沂，他即判断我军主力有改变作战方向的可能。次日便令北线敌军全线后撤。

北线敌军这一突然行动曾使有的人担心抓不住敌人，因而要求提前出击，截敌退路。这样即使打不掉敌人全部，也可切敌后尾。但粟裕认为：我主力尚未全部到达预定集结位置，不能达成合围，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并且可能将敌人赶跑。相反，如我不过早惊动敌人，继续隐蔽集结主力，就可能使敌人一时还难以判断我之企图，既使敌不再南来，我待主力到齐后再突然发起攻击，至少还可以在胶济路抓住敌人。

经过审慎分析研究后，粟裕果断坚持原定决心不变，同时督促各部加速隐蔽开进，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这时，蒋介石、陈诚既被粟裕制造的“空中侦察发现共军向西北运动并在运河架桥”、“在黄河筹集渡船”等一系列“示形”假象所迷惑，又轻信了南线部队所谓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十六个旅”的虚构“战绩”，因而，在得悉王耀武将李仙洲集团北撤后，大为光火，斥令王必须令北线之敌南下，确保新泰、莱芜。

敌之重新南下，亦即敌情第二次变化，证明我之作战企图尚未暴露。粟裕针对敌人南下的新态势，于18日对原定作战部署作了新的调整。

此后，敌情又有两次变化，敌变我变，粟裕又两次相应调整部署。

2月20日13时，莱芜战役发起。

针对退缩于莱芜城内的敌军主力，粟裕认为：诱敌出城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远比消灭据城固守之敌容易得多。为此，粟裕采取了“围三阙一、网开一

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法，指挥正面阻击部队略向后缩，以诱敌主力出城。

23日晨，被围于莱芜城内的敌军果然中计，分两路向北猛突。粟裕令攻城部队不要截击敌后尾部队，一定要等待敌后尾部队完全脱离阵地后再去占城，防敌见势不妙又缩回城里。当日中午12时许，敌后尾部队全部脱离莱芜城。

敌以为突围得逞，岂料完全钻进了粟裕为其布置好的口袋里。

五六万敌军被围于东西仅三四公里、南北仅一二公里的口袋里，在我多路勇猛穿插、快速分割下，混乱不堪，溃不成军，陷入绝境。仅五六个小时就被全歼了。

莱芜战役，歼灭国民党李仙洲集团两个军部、7个师共5.6万余人，连同南线及胶济路东段的作战，共歼敌7万余人，活捉第二绥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陈毅在战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指莱芜战役）三次战役中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的胜利打破了纪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得知莱芜取得空前大捷，毛泽东欣然命笔，称赞道：“极为欣慰。全体将士应予嘉奖。”并将此一胜利喜讯通报全军全党。

莱芜大捷，粉碎了蒋介石“鲁南决战”计划，加之其他各战场上我军的胜利，迫使蒋介石停止了全面进攻的战略方针，从3月起，改为重点进攻山东、陕北两区。为此，在山东，蒋介石调集45万人，集中了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组成三个机动兵团，向鲁中山区推进，企图迫使华野主力与其决战，置华野主力于死地，一举解决山东问题。

一时间，山东战场成为全国关注的中心。

鉴于屡遭我军各个歼灭之惨痛教训，在此次作战方针上，蒋军作了新的研究、改变，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妄图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而陷我于战略、战役布势上被动不利之地位。

针对敌人此次大军压境，陈、粟深知：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故制定了持重待机的方针，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的细微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应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定计划，绝不轻躁决战。

4月上旬，我军自胶济路南下求歼敌第1兵团大部于临沂、郯城地区。该敌察觉后，转入防御，不便分割。陈、粟旋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4月中旬，敌军进攻主力指向新泰、蒙阴。我定下围泰打援战役决心，我以3个纵队包围泰安，但邻近泰安各路敌军恐惧我军打援，始终按兵不动。我军遂于26日打下泰安，歼灭了川军第72师，活捉师长杨文泉。我围泰（安）打援目的虽未实现，但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行动。29日夜我以4个纵队突击临（沂）蒙（阴）路上的敌军3个师，但一经接触，敌即退守蒙阴至临沂公路以西山区，我在歼敌整编第83师一个半团3000余人后，主动放弃继续打击该敌之计划。5月2日，我军决心围歼刚占领新泰之第11师，但因敌第2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

即主动撤围。

一年挨蛇咬，十年怕井绳。更何况内战爆发以来敌人屡遭我歼灭性打击，因而，敌虽集 45 万大军对山东进行重点进攻，但其行动的谨小慎微，甚至对非嫡系的见死不救，说明敌人在心理和气势上已输我一筹。同时，敌在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的迟疑、犹豫的矛盾暴露无遗，并势必被我所用。

而我在一个多月连续四次的作战行动中，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以“耍龙灯”式的高度回旋调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达 1000 公里以上，极大地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

战机是歼敌的前提，它要靠能动地去创造而不能靠等待。有利战机决不是能够轻易得到的。粟裕为此已付诸一个多月的努力。此时，他继续在为创造战机而筹谋着。

第 6 纵队按陈、粟令于新泰以西就近南下，不再以牵制敌人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我主力则与敌脱离接触，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摆开阵势，待机歼敌。

俗语云：再狡猾的狐狸也会败在猎人的手下。我放弃出击郊城、马头、新安镇；放弃打击进犯临蒙公路之敌；撤了对进占新泰之敌的包围；以及回师鲁中等一系列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敌人，而且大大迷惑了敌人，最终促成敌人产生错觉，作出错误的判断。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长陈诚误认为我军攻势疲惫，被迫全线退却。

5 月 10 日，汤恩伯兵团的第 7 军和整编第 48 师从河阳出动，有续犯沂水模样。该敌位于敌之右翼，比较暴露，陈、粟决定首先歼灭该敌并视机打援。

尽管打击第 7 军、第 48 师的作战命令已下达，但粟裕仍在继续密切注视着敌情的细微变化，以寻找更合适的战机。因为第 7 军和第 48 师是桂系部队，打仗很狡猾，又较顽强，和他们作战要拼消耗，较难有俘获，所以，并不是粟裕理想的打击对象。

5 月 11 日，敌整编第 74 师向我华野指挥部驻地坦埠以南的第 9 纵队发动进攻。针对敌人这一行动，粟裕脑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敌之进攻究竟是局部进攻，还是全线进攻？是否出现了新的战机呢？粟裕对此高度重视，特别通知各有关情报单位，日夜密切注意搜集研究敌人的行动部署。当日晚，通过技术侦察获悉汤恩伯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是：以整编第 74 师为中心，第 25 师、第 83 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 65 师保障第 25 师翼侧；第 7 军和第 48 师保障第 83 师翼侧，限于 12 日攻占坦埠。同时，我又查明敌王敬久兵团之第 5 军，欧震兵团之第 11 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

经过冷静的思索、分析，粟裕认为：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但据现掌握的情况已可判断敌人决定向我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呈一线式密集推进，整编第 74 师稍形前出，显然是以整编第 74 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我实施中央突破。

敌人到底还是按捺不住了。

战机到底还是被陈、粟能动地创造出来了。

粟裕认为这一形势恰恰为我带来有利战机的主要考虑是：一是我军历来多采用先打较弱之敌、侧翼之敌、孤立之敌等传统战法，这次敌挟重兵采取中央突破，估计我不是后撤就是被突破，我军如针锋相对打最强之师，必出

其不意，大奏奇效；二是歼灭蒋军“王牌”第74师，可立即挫败敌人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三是我军经过几个月作战，已经具备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并且，所属各纵队正处在便于机动之位置，部署不需作大的调整，即可对该师形成五比一之绝对优势；四是敌人骄横狂妄，处境孤立，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救援，加之孟良崮山区交通地形不利重装备行动，使敌强而变弱。

出现战机和把握、利用战机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行百里者半九十。如果创造出战机而不果断抉择或充分利用，则必将坐视战机丧失。而大兵团作战，这种战机又往往是稍纵即逝，最不容易把握的。

粟裕当机立断，改变原打敌右翼第7军、第48师计划，决心集中我军主力，以反突破、反包围挖歼第74师。

当粟裕将此想法告诉陈毅之时，陈毅十分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然而，敌人一线进攻我之队形密密麻麻，第74师只是略显凸出，位于敌左翼的第7军、第11师、第65师和右翼的第7军、第48师多数与第74师相距仅一至二日行程，紧临两翼之第25师、第83师则相距更近。在这种态势下，挖歼第74师，无异于虎口拔牙，是左右两只脚各推开一张硬弓，两手从中间插进去把它拔掉，其难度可想而知。

“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那是《三国演义》之中对猛将张飞的夸张描写。

而粟裕之从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阵线中，将敌“王牌”师割裂出来予以全歼，则是名副其实的“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此时，各纵队正按原计划向沂水方向开进。粟裕立即通知纵队首长前来野司受领新的任务，同时命令正在向东、向南行动的各部就地停止待命。

当各纵队首长得知他们所接受的新的任务是打破先例，在敌人重兵集结又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以中央突破对中央突破，同敌进行正面较量，挖歼74师时，有的纵队首长惊异和担心之情溢于言表。但很快大家认识就一致了。

陈、粟临机改变决心如下：以5个纵队即第1、4、6、8、9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2、3、7、10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参加突击的5个纵队：第4和第9纵队负责正面突击，并确保坦埠，以吸引和抓住第74师，并保障第1纵队从右翼，第8纵队从左翼迂回并分割其与友邻联系，隐伏于鲁南敌后的第6纵队兼程赶赴战场并占领垛庄，堵住第74师退路，完成合围。

从11日获悉并推断敌开始向我发动全线进攻起，到毅然改变打桂系，最终定下决心部署挖歼第74师止，仅短短一天的时间。敌情的严重性、改变部署的突然性、时间的紧迫性，将战役指挥的紧张、复杂程度推到了极点。粟裕集胆量、气魄、智慧、谋略于一身，体现了杰出军事家的优秀素质。

5月13日，“猛虎掏心，挖歼强敌”的孟良崮战役打响了。我第9纵队、第4纵队全力由正面抗击敌第74师。第1纵队则利用敌军各求自保的心理，于13日晚，以小部对敌第25师发起进攻，使该敌误以为自己受攻击而无暇他顾，主力则从该师与第74师的结合部利用山区地形隐蔽迂回，向纵深猛插，并抢占制高点。第8纵队以相同的战术从第74师与第83师之结合部插入，把第83师一个团也切进包围圈，并夺取了制高点。此时，战役的关键就看位于鲁南之6纵能否及时赶到，堵住敌之退路，以封闭合围口。按粟裕令

隐伏于鲁南的第6纵队在此最关键的时刻派上了最关键的用场。它是粟裕预伏的一支奇兵。这支奇兵是12日接获北上挖歼第74师的命令的。当这支与第74师有过两次较量、一提起第74师便“怒从心头起”的纵队，得知“打第74师果然没有少了他们”，立即按华野首长令急速向北开进。一百公里之遥，一路山区，第6纵队“飞兵激渡”，14日晨即抵达预定位置投入作战。15日拂晓，第6纵队在第1纵队协同下攻占了垛庄，并与第8纵队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合围口。

15日下午1时，我发起总攻。我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向敌突击。敌则垂死挣扎，不断对我发起反冲击。战斗至为激烈，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16日上午，这个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军之中流砥柱”的第74师终被歼灭了。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准备撤出战场时，我电台发现孟良崮地区仍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部隐匿。粟裕根据各部报告，敏锐地发现所报歼敌数与第74师编制数相差甚大，当即令各部继续进行战场搜索。果然，在一个山谷中，有残敌7000余人正在集结。粟裕速令第4、8、9纵队出动兜剿。当日下午5时许，第74师悉数就歼。

孟良崮战役，歼敌3.2万余人，创造了从敌重兵集团密集进攻战役布势的中央割歼敌进攻主力的范例，挫败了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再次粉碎了蒋介石以决战方式消灭我华野的企图，给蒋军最强大的战略进攻方向以沉痛打击，极大地震动了蒋军内部，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

对于整编第74师被歼，蒋介石多次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对于整编第74师被歼，粟裕却不无自豪地想：既然我们能够彻底消灭蒋军这支“王牌”部队，那么，还有什么敌军不能被我们歼灭呢？

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江北打大仗

从1946年7月的苏中战役开始，到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胜利结束，粟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指挥华中、华东野战军采取内线歼敌方针，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褒奖华东野战军“在第一年作战中，已表现自己为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军队”。

此时，敌虽没有放弃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但进攻势头被彻底打掉了，同时也被我们打怕了。战场形势、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

孟良崮战役结束后的第7天，即1947年5月2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继续在内线“准备用六、七个月时间，六、七万人伤亡，各个歼灭该线之敌。”但是，6月29日，在刘邓大军渡黄河前夕，军委指示华野三路分兵：一部出鲁南，一部出鲁西，一部留山东正面。指出：“敌正面既然绝对集中兵力，我军便不应再继续采取集中兵力的方针，而应改取分路出击其远后方的方针。”当时，山东还有50多个县在我手中，而且连成一片，胶东、渤海、滨海三个地区还可以回旋，从山东局部考虑，在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但陈、粟从全局考虑，刘邓大军南渡黄河外线出击，战局必有重大发展，华野必须以战斗行动来策应刘邓大军的战略行动，加之当时山东战场又一时无战机可寻，因此果断地决定立即执行三路分兵的方针。

7月2日，军委电令陈士榘、唐亮所率3个纵队打泰安得手后，准备出鲁西，直接协同刘邓作战。此后，出鲁南的叶飞、陶勇两纵队也奉命向鲁西南挺进。陈、粟则直接指挥第2、6、7、9共4个纵队，在山东正面集结，伺

机求歼鲁中之敌。

7月分兵，标志着陈、粟在敌人对山东重点进攻未被完全粉碎的情况下，由防御转入反攻。华野外线出击的五个纵队，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攻势，完成了从战略上调动分散敌人、打乱其战略部署的任务，但由于雨季骤临，大雨滂沱，山洪暴发，河水陡涨，使我军机动、运输、作战遇到很大的困难，敌人尾追堵截，部队减员很大。

8月4日，即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前三天，军委为保证刘邓大军南下成功，指示：“山东主力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积极策应刘邓作战。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陈唐叶陶五个纵队能否起大作用。”

“战役指挥交粟负责”，哪里局势最为关键，哪里局势最为需要，粟裕便被派往哪里。

接到军委指示，并结合外线出击一个月来的战场形势，粟裕认为：全国主战场已由山东转移到了中原，战略重心已由内线转到了外线，华野今后主要作战方向和指挥重心也必将随之转到外线。为加强西线领导和力量，陈毅应西去，增调第6纵队到西线。建议组成东兵团，由谭震林、许世友二同志指挥。陈毅同意粟裕的意见，二人联名将此意见上报军委。

6日，军委批准陈、粟建议，决定由陈、粟率华野机关、第6纵队、特种兵纵队赴鲁西南，统一指挥第1、3、4、6、8、10、特种兵纵队及配合华野作战的晋冀鲁豫第11纵队，统称西兵团。并批准组成东兵团。

关于陈粟到达鲁西南后的作战方向问题，中央军委于7日致刘邓、并告陈粟电指出：“陈粟六纵全部必须从内线，即从你们的相反方向钳制敌人，才是最有力的钳制，你们不要希望他们出陇海路直接掩护。”但是，粟裕认为若更有力地支援刘邓，西兵团的作战地域必须向南扩展，跨越陇海线。为此，于8月18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依近日情况判断，敌有大部随刘邓南去可能。果如是，则刘邓很吃力，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多拖住一些敌人。因此，西兵团目前应位鲁西南及陇海线上行动，必要时以一部挺入路南，破袭津浦，威胁徐州，才能有效拖住敌人，并寻机歼灭薄弱之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粟裕这一从全局出发，为本战区任务主动加码、力挑重担的作法大为赞赏，8月24日，在致陈粟并告刘邓及华东局的电文中指出：“粟裕同志巧西（十八日）电意见极为正确。西兵团作战范围，规定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望转示陈、唐、叶、陶及六、十两纵及炮纵坚决执行。”“你们必须在九、十两月内歼灭几部敌人，攻占多数薄弱城镇，逐步将此两区创造成有利战场及支援刘邓之后方。”

然而，外线出击近两个月，部队十分疲惫，战斗力受到很大削弱，部队思想比较混乱，甚至相当一部分干部对中央的决策心存疑虑，有的人说：“反攻反攻，丢掉山东”，部分指挥员对于无后方条件下作战，缺乏信心。

严峻的现实摆在粟裕的面前。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使他养成了排除万难和扭转局势的能力。虽然他也以自己顾全大局的见解在耐心说服下级，但这毕竟是讲道理。此时，他牢牢掌握着这样一个信条：只有打胜仗才更有说服力，振作部队士气，只有打胜仗才是调动敌人，减轻刘邓压力的最有效办法。

粟裕密切关注着刘邓的行动和敌军的调动，把着眼点放在如何寻求战机上。他深知：必须打好进入鲁西南后的第一仗，因为当前形势赋予了该仗具

有和华东战区第一个转折即宿北战役一样的重要意义，它关乎能否完成华东战区第二个转折。9月3日，陈、粟率部南渡黄河。此时，针对敌人骄狂至极，认为“山东共军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的心理，粟裕已精心设想了一个作战方案：以第1、3纵队诱引敌整编第5、57、84师等部北犯；以第4、8纵队及晋冀鲁豫第11纵队尾敌向北，拊敌之后。同时于4日晚以一个纵队进至巨野、郓城之间，以保障第10纵队攻郓城之安全。兵团主力于4日晚进至龙固集、沙土集之线以北地区集结。

骄兵失慎。敌人果然中了粟裕的诱敌之计。粟裕决心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首先歼灭较弱之整编第57师。9月7日，陈、粟指挥华野西兵团将敌整编第57师包围于郓城以南的沙土集地区，经两日激战，将该敌9000余人全部歼灭，俘敌中将师长段霖茂。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不仅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为恢复和建设鲁西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为向豫皖苏进军打开了道路，而且迫使敌人从大别山和山东内线战场抽调4个师驰援鲁西南，有力地支援了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的行动。同时，该战的胜利，标志着华东战区实现了由内线到外线、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折。9月11日，中央来电鼓励全军：“郓城沙土集歼灭五十七师全部之大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

9月26日，陈粟大军南下陇海铁路，进入豫皖苏。中原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已形成“品”字形。10月8日，毛泽东对当时中原形势的判断是：“我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共四十八个旅约四十万人，业已在长江、黄河间立住脚跟。”

陈、粟进入豫皖苏地区后，陈毅于11月初去晋冀鲁豫中央局、中央工委、陕北杨家沟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直至1948年4月2日才回到华野总部，这5个月期间主持全局工作的重任便落在了粟裕一个人的肩上。

豫皖苏处在黄淮平原，西有平汉路，东有津浦路，两路之间有陇海路连结，有利于敌人兵力机动。平原上有黄泛区、涡河、沙河、洪河、汝河，有利于敌人运用河流堵截。刘邓直出大别山，不能在这个地区停留，不能一城一地地夺取，必须采取跃进的形式，其原因在此。此时，粟裕面临的难题也在此。

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我军主要依托山地作战，称之为“上山主义”。抗战时期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当然，也有平原和水网地区的游击战。例如冀东创造了地道战，粟裕领导的苏中军区开展了水网地区的游击战。在苏中作战之初，由于敌人使用汽轮速度快，我军使用木船速度慢，“敌进我退”时，难以摆脱敌人。在“敌退我追”时，又追不上敌人。粟裕领导苏中军民以打坝方法改造水网地区地形。即在各道河流上打几层明坝、暗坝以后，木船吃水浅，容易从坝上拖过去，敌人汽船吃水深，被坝挡住，弃轮登岸，又为河道所阻，我军可以选择一路予以歼灭，其他各路之敌难以来援。由于改造了地形，终于取得苏中水网地区游击战争的胜利。但是，在豫皖苏大平原能不能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地形条件呢？

粟裕首先从破坏3条铁路线做起，叫敌人运兵的火车轮子转不动。从11月8日起，至17日，以7个纵队组成3个集团，向津浦线徐州南段和陇海路兰封至郝寨段发起破击战，破坏铁路150余公里，歼敌1万余人，攻克萧县等城9座。敌匆忙以15个旅应援，其中包括准备用于大别山的8个旅，推迟

了敌人围攻大别山的时间。12月13日起，至27日止，粟裕和陈赓两军发起平汉、陇海路破击战，破坏铁路400余公里，攻克西平等县城23座，歼敌第5兵团部和整编第3师，从新郑、漯河、驻马店打到确山城下，严重威胁敌人重要补给基地信阳，迫使敌人从大别山抽调“王牌军”整编第11师，以及整编第9师、第10师等部共13个旅回援平汉线。敌人对大别山的围攻，在中原三军协同下终于遭到失败。

正确的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从半年前的孟良崮战役开始，尽管那时我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但战机已非常难寻，通过一个多月的能动创造战机，最后才挖歼74师。孟良崮战役战机难寻的事实给粟裕以深刻启迪：随着战争进程不断发展，必然出现新的战争规律和特点，而驾驭战争，就必须对这些新的规律和特点予以清醒的认识和很好的把握。在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即曾设想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我军歼灭战规模将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外线出击经略中原这一段的战争实践，使粟裕对解放战争战略进攻阶段的规律和特点问题的认识上升到较高层次。粟裕认为：到了1947年第4季度，我三支大军已经在中原成品字形，完成了战略展开。但蒋介石在中原还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敌人利用优越的运输条件，又常临机变动建制，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集中进犯，我兵力集中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当时则与我纠缠。一段时间里敌我形成拉锯状态。为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粟裕反复考虑了我军的作战方针，认为面对敌人的新情况，我军必须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规模，这是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反之，如果我军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歼灭战，战机就很难寻找。

根据这一思想，粟裕于1948年1月22日（子养）发电中央军委和刘邓：“建议三军（邓刘、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的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如认为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粟裕在该电中不仅就战法问题提出真知的见，还就“攻坚”、“攻略中小城市”、“统一建军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一个系统的、极具战略远见的建议。显然，这些建议是他长期以来特别是孟良崮战役之后一直思考的结晶。

但是，粟裕知道他的“中原三支大军集中兵力作战，在黄淮平原有大仗可打”的论断与毛泽东1947年10月13日的“在现时敌已被迫分散于黄河、长江间六、七个战场上，采取战备守势时期，我集中大军更难求得运动战”的判断大相径庭。也跟毛泽东“明年八月以后，为着进一步分散敌力、便于歼灭之目的，依当时长江以北任务完成之程度，决定派主力或派一部渡江”不一致的。所以，他在电报中说“斗胆直陈”，但他又很讲究提建议的方式。电报中没有用反对分兵渡江的词句，实际上集中三军兵力就包含了取消分兵渡江的意思。电报中也没有用在中原打大仗的词句，实际上三军集中兵力打仗就包含了打大仗的意思。

1月27日，即在粟裕建议的5天之后，中央军委电示粟裕：为迫使敌人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由粟裕率领第1、4、6纵队渡江南进，从鄂西地区渡江到闽浙赣。中央军委的电报没有提到粟裕

的“子养电”。

毛泽东在这个电报中虽也要粟裕就这一重大战略方针和行动问题而“熟筹见复”，但不是征询粟裕是否分兵渡江问题。分兵渡江此电已经确定，此电要粟裕“熟筹见复”的是何时何地渡江，粟裕只可以在这个范围内熟筹答复问题。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粟裕于1月31日（子世）以1700字电文分三部分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其中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就渡江时间、部队状况、渡江地点等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而第二部分则以300字电文再次陈述了“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观点。

第二部分的三百字电文足以体现粟裕坚持真理和对革命事业有着高度负责的精神，他渴望能及早改变中原战局，并相信自己的看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能够改善南线战局的。然而，他又深知这三百字电文是“熟筹见复”军委27日电示内容以外的问题，所以用心良苦，将此三百字电文夹在第一、三部分当中，以期引起中央对子养电的再考虑。

中央军委于2月1日复电粟裕：叶、王、陶三纵队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

2月19日粟裕根据中央指示，率3个纵队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随后中央又决定5月15日以后执行渡江行动。

粟裕于3月初率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及第1、4、6纵队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整训，以多种手段对敌人进行侦察，向长江沿岸地区派出先遣小分队，积极作好渡江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粟裕集中精力，结合部队演练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反复比较分兵渡江与集中兵力在长江以北打大仗两者之利弊得失。

司令部的同志们看到，这段时间里，粟裕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仔细琢磨，陷入沉思，又常常一个人站在地图前，用铅笔和手指在图上比比划划，一看就是半天。

4月2日，陈毅回到华野总部——濮阳，宣布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东南野战军和东南分局负责人名单。东南野战军领导组成是：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1、4、6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1兵团，粟裕兼司令员及政委，叶飞任副司令员，张震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主任。并准备于1949年初由华东野战军第3、8、10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2兵团，人选出发时决定。党的东南分局由粟裕任书记，叶飞、金明任副书记。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战略决策。陈粟大军将改为“东南野战军”。先头过江的是粟裕的第1兵团的3个纵队，后续的还有第2兵团3个纵队。我党将象进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一样再创建一个新的东南大区，通过这种跃进将战争进一步引向长江以南蒋管区。

然而，此时，粟裕的思考在子养电、子世电的基础上也已更加深入。他在通过几个月来对中原敌我兵力状况，根据地的开辟和建立，以及敌我战略、战术等方面问题多次进行运筹思维后认为：敌军在遭我多次打击后，兵力大为集中，除以相当兵力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外，尚能集中较大的机动兵力，在各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因此，我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把歼灭战发展到更大

规模，才能歼灭敌人。而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大兵团运动及现代技术装备，又离不开强大的后勤支援，那就必须依托或半依托后方，以取得支援和供应。华野第1、4、6纵队渡江南下，在敌人统治区，作千里之跃进，既丧失了集中更大兵力和依托后方之利，又无法避免“缺乏群众支持”、“缺乏友邻支援配合”、“缺乏休整地区”之不利。如以兜圈子中付出的巨大减员，作为有后方依托打歼灭战的伤亡，则每1万人的减员，至少可歼灭敌人1个主力师。3个纵队渡江南进后，虽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估计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的4个主力军（师）。敌整编第5军和整编第11师是蒋介石嫡系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敌人不会把它们调到江南同我们打游击的。桂系的第7军和整编第48师，蒋介石担心放虎归山，当然不会把他们调到江南。如果我军不能把敌人在中原战场的这几个主力军（师）调到江南，就达不到预期的行动目的。

几番思索、比较、判断之后，粟裕思想上对“分兵渡江”与“集中兵力，在江北打大仗”这两种战略方针的孰优孰劣，已经趋于成熟了。

然而，对中央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粟裕最大的顾虑是担心干扰统帅部的决心。更何况当时情形，“万事俱备，只待渡江”。而这种不同看法归根结蒂又是对中央南线战略方针存有截然不同认识上的大问题。报告这种不同看法必须富有极大的勇气及敢于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

“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粟裕养成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刚毅性格。他认为：作为战区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任务时，应当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从全局上考虑得失利弊，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会对中央观察全局，作出决策有参考价值。

4月18日，粟裕以近3000字长电再次“斗胆直呈”中央军委：“建议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在江北打大仗。”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粟裕继子养电、子世电后的又一次“斗胆直呈”予以高度重视，因为从粟裕三电的严密逻辑性当中可以看出，粟裕对南线战略方针有其自己的独到的见解。遂于4月21日通知陈毅、粟裕立即到中央去当面谈。

5月初，中共中央在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召开了书记处会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位书记听取了粟裕的汇报。会议经过认真研究，最后决定采纳粟裕暂不渡江的建议，同时又重申了分兵渡江的既定方针不变，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沛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

就在中央军委召开的这次汇报研究会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叫住了粟裕，对他说，陈毅同志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一职，就由你来接任。

对于中央这个决定，粟裕大感意外。但中央已经决定陈毅和邓子恢到中

原军区、中原局工作。对此，粟裕恳切地提出，华野离不开陈军长，陈毅在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要继续保留。

望着粟裕诚恳而率直的神态，毛泽东沉思了一下，然后说，那好吧，陈毅同志仍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但是那边工作很需要他，现在必须马上去。你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

“斗胆直呈”，既体现了粟裕高瞻远瞩的战略卓识，更说明了粟裕坚持真理，无私无畏，为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

“两让司令”，粟裕是共产党人的楷模，他的高尚品格和革命风范为后人树立了一座丰碑。

作战方针及任务明确之后，粟裕于5月中旬便赶回濮阳，着手制定作战计划。从中央受领的“军令状”使他在筹谋作战规划时必须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必须打胜；二是必须打大。因为他必须用战争的胜利并且是大胜来证实江北打大仗的科学性、正确性，也只有如此才能完成中央授给他的“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的任务。

歼灭邱清泉整编第5军，自然是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该敌自内战以来，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中原战场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在当时情况下，如果能把敌人的这个“王牌”军消灭了，就等于砍掉了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对我军无疑将更加有利。

然而，第5军并不是粟裕的理想歼击对象。只是中央已同意他的“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他不便再在具体歼敌对象上向中央提出更多的建议。粟裕认为，寻歼第5军虽具有一定的条件，但不利因素较多，主要是我军主力尚未集中，打援兵力不足，地形对我军不利。加之第5军是蒋介石在关内剩下的两大主力之一，辖两个整编师4个旅，并指挥1个快速纵队和1个骑兵旅，其炮兵火力的运用和步炮协同动作较好，又经常狠集一团，不贸然行动。我如打它，蒋介石必极力救援。如果我突击集团三五天内解决不了战斗，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就可能陷于被动。

基于此，粟裕虽也在不时考虑如何完成中央授给他的消灭第5军这一硬性歼敌任务，但还是着力设想其他更有把握取胜的作战方案。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并充分考虑必须“打胜”和“打大”这两个前提，粟裕设想了一个“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腹案”。开封是国民党的河南省会，是中原重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我如攻克开封，对中原和全国都将产生影响，蒋介石绝不会置开封于不顾，势必调兵增援，这样，就为我军在运动中歼灭援敌创造战机。另外，开封守敌处境孤立，战斗力不强，敌可能用于增援开封的主力集团都在100公里以外，而我外线部队与中野一部相对靠拢，有强大的兵力和充裕的时间阻击援敌。

当时，粟裕虽未将这个作战“腹案”上报下达，但在部署上作了充分准备，即力求能适用于歼灭第5军和攻打开封两个作战方案，而更主要的则是侧重于实现后一个方案。

5月24日，华野第3、8纵队按粟裕令由许昌向淮阳方向前进。位于鲁西南的邱兵团整编第5军果然被我吸引南下。5月30日、31日，黄河以北我各纵乘机南渡黄河。我军这一突然行动，使敌人大为震惊。敌急令邱兵团主力和整编第75师北返，迎击我渡河部队。同时，又向鲁西南增调整编第83师、25师、72师和63师1个旅，企图与我渡河部队决战。敌

我双方部队在交错调动，排兵布阵。鲁西南战场敌兵力骤增，且队形密集。这恰恰为粟裕实现作战“腹案”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战机。此时，我第3、8纵队已到达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就势转用于突然攻取开封，必将打敌措手不及。谋定而动，粟裕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定下了豫东作战的决心：首先以主力一部从敌侧后开刀，夺取敌守备兵力比较薄弱而又处于敌人防御要害部位的开封，待围歼开封守敌后，再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寻歼来援之敌的一路。

“凡事预则立”。由于粟裕对这一作战方案预有准备，故在定下决心的当天就能上报中央军委并报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同时给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

为了在战略上配合这次作战，粟裕令华野山东兵团继续在津浦路徐、济段扩张攻势，包围亮州，调动敌整编第25师或整编第83师北援；令华野苏北兵团在陇海路新安镇至海州段发动攻势，以牵制敌人。

6月17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并授权粟裕：“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按粟裕令我第3、8两纵队从15日开始向开封急进，17日晨突然兵临城下，对开封四关守敌发起猛烈攻击。开封守敌原以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主力至鲁西南与其决战，认为“在开封无真正的战斗”。因此，我突然而强大的攻势打得敌人惊慌失措。敌一面仓促应战，一面向蒋介石和徐州“剿总”紧急呼救。至18日黄昏，我攻占城关。为不使敌人有喘息机会，我立即开始攻城的火力准备，并在对敌防御设施进行连续爆破后发起冲击。

开封战役发起后，蒋介石焦急万分，慌忙调兵遣将，组织多路增援。

敌人看似气势汹汹，实则整个部署被打乱了。战局果然向粟裕设想的方向发展。因为粟裕设想的此次作战非同以往攻城主要是为了打援，或打援主要为了攻城，而是先攻城后打援，攻城与打援为一个整体，鱼与熊掌俱得。敌人部署被打乱，纷纷来援开封，这恰为粟裕先攻开封，再歼援敌提供了良好的战机。

作为最优秀的战役指挥员，此时的粟裕牢牢把握着战役重心，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实现全战役的转折上，那就是尽快夺取开封和及时掌握用于打援的足够兵力。

“转折要力争在全战役预计时间的二分之一以前，最好在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时候到来，这样作战就主动了。”粟裕最爱用数字量化战役转折进程，他的战役转折理论由此略见一斑。

此次豫东之战，倘若转折点出现晚了，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攻占开封的作战就会陷入被动甚至还会出现不得不撤出战斗的情况。对此，粟裕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更何况就双方参战总兵力而言，敌还占有一定优势。力促全战役转折点尽早到来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迅速攻占开封，掌握用于第2阶段打援的兵力，当6月20日夜开封敌人的核心阵地龙亭尚未攻下，但敌城垣主阵地已被突破，城区之敌亦已基本肃清，战役第1阶段作战已胜利在握之时，粟裕与张震、钟期光亲赴开封城郊。粟裕令我攻城部队除留足够兵力攻击龙亭外，把其余部队迅速撤出城外，集结休整，准备再歼援敌。他对部队讲：龙亭是要打下来的，但不要急，迟一点不要紧，有点残敌可以作鱼饵钓“大鱼”，马上打下龙亭，敌来援就不积极了。

21日，即开封战役发起的第5天，我攻城部队主动撤出开封城，粟裕期望的全战役转折点仅5天时间就实现了（后来事实说明，战役开始后的第5天即实现全战役的转折，正是历时20天的豫东战役全过程的四分之一的的时间）。此时，粟裕手中有了足够的机动兵力，为下一步歼击援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可以随时投入第2阶段的作战了。

22日晨，龙亭之敌最后被我消灭。

开封战役，歼灭开封守敌3万余人，加上阻击援敌的战绩，共歼敌约4万人，敌守城指挥官整编第66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伪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化装潜逃。曾几何时，蒋介石还在伪国大上吹嘘开封“绝可确保无虞”，而我军仅用5昼夜就攻占了。

蒋介石为挽回败局，除命已进至徐州之整编第25师改援兖州外，命邱清泉兵团（调出整编第75师，调进整编第83师）及第4绥靖区刘汝明部向开封攻击前进，同时以整编第75师、72师和新编第21旅（该旅归第75师指挥）组成一个兵团，以区寿年为司令，由民权地区经睢县、杞县迂回开封，企图在开封地区与我决战。

敌军分两路向开封扑来，正好中了粟裕“动敌”之计。粟裕将计就计，在攻占开封后的第三天便毅然决定主动放弃该城，决心围歼两路援敌中之较弱的一路即区寿年兵团。但这时两路援敌相距较近，我必须先引诱其拉开距离，将两路援敌隔开，以创造攻歼区兵团的战机。为实现这一决心，粟裕以第1、4、6纵队和中野第11纵队组成突击集团，隐蔽集结于睢县、杞县、太康之间和民权地区，实施南北夹击，围歼区兵团。以5个纵队担任阻援，即第3、8纵队先由开封向通许方向行动，待邱兵团进攻开封，与区兵团拉开距离后，立即掉头向东，会同由上蔡地区北上的第10纵队和位于杞县的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在杞县以西构筑阻援阵地，隔离邱区两兵团，阻止邱兵团东援；中野第9纵队进至郑州东南地区，阻击郑州东援之敌，并从侧后牵制邱兵团。

6月26日，粟裕下达命令，区分了各纵的任务，并规定了待机的位置和进入的时间。为配合这次作战，中野继续牵制平汉路南段胡璉兵团和张轸兵团；华野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敌整编第25师北上；苏北兵团以主力向淮海地区展开攻势。

由于粟裕一系列的精心运筹，尤其是我攻占开封而又主动将之放弃，使敌人误认为我军经开封战役后“似无积极企图”、“必向津浦路前进”。加之敌人仍按传统思维定式判断我会象以往一样，结束一个战役后，必进行休整，从而低估了我军连续作战的能力。遂令邱区两兵团全力追堵我军。

此时在我引诱和迷惑下，骄狂的邱清泉除以先头部队1个旅配合刘汝明部占领开封外，主力直扑通许，妄图尾击我第5、8纵队。多疑的区寿年却认为我军有向平汉路进攻模样，但也摸不清我军行动企图，因而在进抵睢杞地区后举棋不定。

邱兵团向西向南疾进；区兵团踌躇不前。

粟裕即巧妙地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神奇般地造成了区寿年的错误和犹豫。两路之敌很快拉开了距离，仅一天就形成了40公里的间隙。

粟裕以军事指挥员洞察秋毫的特有敏锐，迅速抓住并巧妙利用这一战机，当机立断，不待查明区兵团的具体部署情况，即于27日下达了围歼区兵

团的作战命令。当晚，我突击集团各纵队按预定方案，从四面八方敌发起猛烈进攻，边打边查明敌情。在我围歼区兵团的过程中，西线敌邱兵团于7月1日下午在我节节抗击下攻击前进，进至距区兵团十多公里的地域；东线敌将北援兖州的整编第25师调回，与第3快速纵队和交警第2总队组成1个兵团，以黄百韬为司令，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并已抵达被包围的区兵团以东约十公里的帝丘店地区。

战情险恶。粟裕果断调整部署，增强阻击力量，同时加速攻歼被围之敌。

7月的豫东大地，骄阳似火，井河干涸。敌我双方，鏖兵厮杀，战况惨烈。

激战至2日凌晨，我将区兵团绝大部分歼灭，活捉了敌兵团司令区寿年。

我军先克开封，后在睢杞地区又歼灭大量援敌，基本上达到了

战役的预期目的。但敌黄百韬、邱清泉两兵团，仍不甘心失败，继续

东西对进向我进攻；配置在平汉铁路南段的敌胡涟兵团也由南向北攻击前进。此时，从全局出发，指挥各部队巧妙转移，及时撤出战斗，成为很突出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战役本身的成果。

高明的指挥员，总能始终把握战役的主动权。针对黄百韬兵团增援积极，

已进抵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战场东部撤出威胁较大的

实际，粟裕决心乘黄兵团长途跋涉，尚未全部展开，战斗力相对减弱之机，先声夺人，给运动中的黄兵团以歼灭性打击，为我军顺利撤出战斗和进行休整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迅速歼灭区兵团残部。这样，既能歼灭更多的敌人，又可对邱兵团起威慑作用，使其在我军撤出战斗时，不敢紧跟尾击。

在粟裕“咬紧牙关，争取全胜”的号召下，我各纵队以惊人的毅力投入了新的战斗。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迅速全歼区兵团残部，主力则在黄兵团正向我进攻时全线出击，对黄兵团实施合围。战至4

日拂晓，黄兵团被我歼灭近两个团的兵力，并被压缩在帝丘店及其外围十余个村庄内。敌疯狂向我反扑，我予敌大量杀伤，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这时，黄百韬被我打得焦头烂额，感到自身难保，惊恐地把余部收拢至以帝丘店为中心的狭小地区。西线邱兵团在得悉黄兵团遭我歼灭性打击后，不寒而栗，裹足不前。

此时撤出战斗条件已经成熟，我在第2阶段又已歼敌5万余人，为保主动，粟裕于7月6日令部队当晚撤出战斗，分别向睢杞以北及鲁西南转移。

在我军与敌脱离接触时，黄百韬仍惊魂未定，一动也不敢动。邱兵团遭我回击后，也未敢再进。而我军却在多路援敌逼近的情况下，一下子跳了出来，进入预定地区休整。当敌人查明我军位置时，我军已休整一周了。

既要“打大”，又要打“胜”，头绪纷坛复杂，战况紧张激烈的豫东大战是粟裕“指挥上最紧张的战役之一”。该役共两个阶段，历时20天，我军全歼敌人1个兵团部、两个整编师部、4个正规旅、两个保安旅、1个正规团和3个保安团，并歼灭其他援敌一部，共9万余人。

牵一发而动全身。豫东之战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战役意义，它可谓是一次战略之战。因为豫东之战使南线战略形势极大改观。除豫东战役本身外，中原、华东其他各兵团为配合豫东战役，乘机发动了几次重大歼敌作战。刘邓乘敌平汉路南段之敌北援，敌第15绥区部队陷于孤立的有利时机，于7月2日发起襄樊战役，攻克襄阳、樊城等城，歼敌2万余人。华野苏北兵团攻克房街、阿湖、城头等据点及涟水、众兴、宿迁等重要城镇，歼敌万余。

华野山东兵团乘敌整编第 25 师驰援豫东战场之际，解放了兖州，连同追歼济南援敌一部共歼敌 3.8 万余人。

粟裕仅在两个月之内一个大胜仗就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他的“四至八个月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的任务。以实际行动证明了“在江北打大仗”的正确性。7 月 13 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南线战略方针行动问题指示：“粟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五军、十八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五军、十八军不走）。”军委这一指示无疑是对粟裕“三个纵队暂不过江——在江北打大仗”建议之正确性的充分肯定。

1948 年 8 月，即豫东战役结束以后不久，毛泽东主席说：“解放战争好象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的确，豫东战役以后，蒋军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发动战役性进攻的能力了。随着兖州被我攻克，徐（州）济（南）段被我拦腰切断，济南也已成为孤城而悬于山东境内，绝难逃脱被攻克之命运。只是它有十万重兵驻守，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战法，才能收到最佳的战役效果。

7 月 14 日，即兖州攻克的第二天，中央军委电示粟裕：拟令许谭山东兵团攻击济南，调动徐州敌军增援，你部可寻机歼其一部，迫敌首尾不能兼顾。

粟裕于 16 日向军委建议：“以许谭现有主力攻济南与打援，势难兼顾”，“建议许谭与我们争取时间休整一个月，尔后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

此时，雨季已到。大兵团不便行动。中央军委于 23 日批准了粟裕的建议，并要粟裕待休整完毕后，或转外线打几仗然后攻济南，或先攻济南并打援，提出作战计划并统一指挥。后来，中央军委考虑到粟裕的指挥环境，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8 月 10 日，根据军委指示，粟裕经与华野其他领导讨论后，向军委提出了“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的作战方案。

军委 8 月 12 日复电，同意攻济打援。此后，几经磋商，攻济方针渐趋完善。

根据战场的实际情况，粟裕决定将参战兵力 44% 即 6 个半纵队及特种兵纵队大部分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 56% 即 8 个纵队组成打援集团。其中攻城集团分为东西两个兵团，粟裕将攻城重点置于西兵团。西线守敌第 69 军军长吴化文，在战役前曾有弃暗投明的表示，可能在战场起义，这就可使敌防线出现缺口。同时，敌人的机场在城西，迅速攻下机场，可切断敌人的空中补给线，不但断绝敌人兵力和物资的来源，而且可给敌人精神上以严重打击。战役从 9 月 16 日发起。我攻城东兵团攻势迅猛，敌绥区司令王耀武坚信可守半个月的济南东部屏障竟被我军一夜之间攻占，使他大为惊慌，急忙从西线调预备队增援东线。这无疑给我重点在西线的攻击造成有利的条件。在我强大攻势下，西线守敌吴化文于 19 日晚率 3 个旅约 2 万余人起义，将飞机场及周围防区移交我军，使济南西部防区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经 4 天激战，济南外围防御地带全部被我占领。为不给敌调整部署和加修工事的时间，粟裕及时指示攻城集团乘机向城区猛攻。我攻城集团东西对进。激战至 24 日，济南全城解放。

重兵守备、设防坚固的济南府仅 8 天就被我攻克了，我全歼守敌 10 万余人（包括起义 2 万人），王耀武被活捉。

敌徐州北援之敌，虽经蒋介石一再严令督促，但他们察知我强大打援兵团严阵以待，又惧于豫东之战区寿年兵团被歼之命运，迟迟不敢推进与我打

援集团交战。我担任打援的8个纵队便成为打下一个战役的生力军。

济南解放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敌军便仓皇弃城而逃。山东境内除青岛及南部边沿少数据点尚为敌占领外，其余全获解放。

济南战役的胜利进一步印证了粟裕在“江北打大仗”更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战略构想。

此时，粟裕那深邃的眼光瞄向了淮海大地。因为更大的胜利正在等待他去争取。

消灭南线敌人主力于徐州附近

豫东、济南两个大战役的胜利，使南线战局发展对我极为有利。此时，华野全军均可南下作战，担负更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任务。

战争进程在不断向前发展，粟裕对战争规律的探索也随之更加深入。他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歼灭战不断向更大规模发展；这种大歼灭战发展下去，势将成为同敌人的战略决战，这是个客观规律。豫东战役证明了在江北打大仗的正确性，而济南战役敌援兵不敢北上交手，说明敌人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我打大规模之仗，同时，也说明我同敌人决战的时机正日趋成熟。

此时，从豫东战役后开始构想并于济南战役前后开始着手勾画着的南线决战宏伟蓝图，随着战局的顺利发展已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摆在粟裕的面前。粟裕在密切注视着南线形势的发展，并以他的最大努力促使绘制这幅蓝图的时机最后成熟。

粟裕首先把选择作战方向同未来的战略决战联系起来考虑。济南战役后华野30多万大军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出击呢？是回师中原还是兵出华中？使用于哪一个方向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加快战争进程呢？

事实上早在济南战役发起前，粟裕就对这个关乎南线战略进攻方向的大问题进行反复思考了：回师中原，最大的问题是战略态势对我不利。这里处在武汉白崇禧集团和徐州刘峙集团的中间，我如打徐州集团，桂系可能全力参战，那就使我军处在敌夹击阵势之中。加之该地区经过敌我两军在此进行过拉锯作战，经济破坏较严重，无法提供数十万大军的军需供应。而兵出华中，入淮海，苏鲁联结，我如打开苏北、苏中粮仓，可保证我数十万大军的粮食供应。在战略态势上我可利用蒋桂之间的矛盾，集中兵力专打徐州集团。

粟裕经过分析、比较后认为，兵出华中比回师中原更为有利。8月23日，粟裕在报军委的电文中提出：“两个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及高、宝，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9月24日，当济南战役接近尾声之时，粟裕将自己兵出华中的设想进一步具体化，适时提出举行淮海战役：“为更好地改善中原战局，暴露津浦线，并迫使敌人退守江边及津浦沿线，以减少其机动兵力，与便于我恢复江边工作，为将来渡江创造有利条件，以及便于尔后华野全军进入陇海路以南作战，能得到交通运输供应的方便，和争取华中人力、物力对战争的支持，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粟裕在此电中进一步提出：“该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需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而以全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援之敌。如敌不援或被阻，而改经浦口、长江，至扬州北援，则我于两淮作战结束前后，即进行战役第二步，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而后全军转入休整。”

25日，中央军委复电指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出：“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百韬）兵团将回到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你们第一个作战，应以歼灭黄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为第二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为第三个作战。”

中央军委批准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后，又决定中原野战军主力在战役发起之前攻克郑州，然后攻开封或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

这时，刘伯承率中野两个纵队在豫西作战，把敌人引向桐柏山区；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于10月22日打下郑州后，向东开进，24日收复开封。25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军委建议所部下一步不去淮南，而是“第一步集结地点建议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无论出宿蚌线或打孙元良均更方便”。次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陈、邓之建议，并于10月30日指示陈、邓进至肖县地区，对徐宿（县）、徐砀（山）两线相机行动。

对于陈、邓东进而不是渡淮南进，尤其是将进至离徐州仅20余公里的肖县地区附近作战，粟裕极为敏感。他深知：中野这一行动，使华野在中野的战略配合下进行的淮海战役势将演变为华野、中野两支大军由战略配合转为战役协同、共同进行的淮海大战了。可以肯定，这个大战定将超出原定作战范围。以此为契机进而发展为南线决战是很有可能的。如此一来，建立战役的统一指挥机构，以便协同全局作战即是当务之急。粟裕遂于10月31日向中央军委

建议：“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粟裕这一考虑周到而又深远的意见，立即予以肯定。次日即批准了粟裕的建议。从而，进一步从组织上明确了两大野战军在一个战场进行战役协同。

11月4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副政委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共同署名，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淮海战役攻击命令：“我为贯彻淮海战役决心，定于本月8日晚统一发起战斗。”

大战爆发在即，敌预感不妙，于11月5日确定“守江必守淮”的方针，作出了“放弃次要城市，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间津浦路两侧地区，作攻势防御，以巩固长江而保京沪”的决定。并于8日开始行动。

战争的变化不定性对指挥员的应变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粟裕认为，此时，我再按原定时间原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必将贻误战机。因此，他机断专行，立即决定于6日晚提前发起淮海战役。

黄百韬兵团5个军（该兵团原为3个军，第100军、44军此时已均归黄百韬指挥）由运河东向运河西溃退。

粟裕指挥华野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其发动勇猛的追击。

敌未料我会如此神速发动声势浩大的攻击，故慌乱不堪，边打边撤。由于粟裕决定提前发起战役，捕捉战机及时，敌整个撤退计划被打乱，敌第63军在运河东窑湾镇被我抓住歼灭，第100军的1个师的大部和第25军的1个团也在渡河前被我抓住歼灭。因这一个多军的兵力是在运动中被消灭的，我花代价很小。

“海州、连云港之敌六日撤离。我已于七日进占该两地。”

“第三绥靖区张克侠、何基沣（均系中共地下党员）两位副司令，定于

八日率部二万三千多名官兵举行战场起义。”

听着参谋人员报告的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粟裕心潮涌动，思绪万千：几天前结束的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一个多月歼敌 45 万人，全国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军已在全国范围内，在数量上、质量上、技术上都占优势了。这无疑增强了我们打大歼灭战的勇气和信心。而敌撤离海州、连云港，我原定攻打海州已不需进行。当时东北之敌只剩下锦西葫芦岛一处。锦、葫之敌在我进占海州、连云港后，增援华中须经海运绕道而来，亦将不能弥补淮海战场已受的损失。何、张起义，更使徐州东北门户洞开。我可以通过其防区迅速切断黄百韬的退路，全歼黄百韬兵团已更有把握。此时，不正是到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了吗？

一幅决战蓝图已清晰地展现在粟裕面前。

这幅蓝图的前景是那样的宏伟、壮观。

11 月 8 日辰时，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发出建议“抑留敌人于徐州周围歼灭之”的齐辰电：

如果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蚌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或歼孙元良兵团，或歼黄维兵团），同时以主力一部进入淮南，截断浦蚌铁道，错乱敌人部署与孤立徐、蚌各点敌人。为此，在战役第一阶段之同时，应即以一部破坏徐蚌段铁路，以阻延敌人南撤。

9 日，毛泽东亲拟电稿复示：“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北、华东、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给”。紧接着又于次日电令陈邓：“你们应集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军委复电表明中央已下定决心将徐州之敌就地歼灭，将淮海战役发展成为南线决战。粟裕对此兴奋不已。子养电（1 月 22 日）的斗胆直呈，子世电（1 月 31 日）的用心良苦，卯巧电（4 月 18 日）最后提出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在江北打大仗，并终被中央所采纳，紧接着的豫东、济南大胜，举行淮海战役的提出，齐辰电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等等，所有这些为最终构成南线决战蓝图起了根本性作用。粟裕是当之无愧的创作这幅蓝图的一位伟大的丹青妙手。

此时，望着莽莽苍苍的淮海大地，粟裕眼前仿佛浮现出两千多年前刘邦与项羽争霸的场景，决定楚汉最后命运的该下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而如今，公元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国共两党也将在这里进行继辽沈战役之后的又一次决定双方命运的大决战。

黄百韬兵团于 9 日才全部通过运河。就在敌关于下一步行动是继续西撤徐州还是就地固守游移不定之时，我徐（州）东阻击集团 3 个纵队按粟裕令从何、张让出的防区，并肩迅速南下，抢渡运河和不老河，直插陇海线，10 日上午均到达指定位置，阻断了黄百韬兵团去徐州的退路，并准备了对西的阻援阵地。黄百韬见退路已断，遂下决心在碾庄及其周围地区利用李弥兵团驻防该地时构筑的工事，并进行加强与改造，企图固守待援。

围歼黄百韬兵团是由运动战转为村落阵地攻坚战的，它是一场大仗、硬

仗。 14 日晚，粟裕在前线指挥所召开了有攻黄各纵队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听取了各纵队的汇报，总结了攻黄前期的作战经验。由于他在会前已亲自在碾庄前线作了充分的调查研究，故成竹在胸。粟裕说，这次战役的第 1 个阶段就要歼灭敌人 5 个军，这样规模的仗我们过去没有打过。这一数量的增长，必然带来兵力使用和战术、技术等一系列的新问题，增加指挥与作战过程中的难度。敌人积 20 年作战经验，构筑工事的效率和守备技术已有大的提高。他在被包围后，迅速构筑工事顽强抵抗，作战方式就转换为阵地战了。碾庄周围共有十几个村庄，每个村庄都有二三尺高的土围子，土围子周围为洼地、水塘，地形开阔。黄百韬退守这里，利用这里的地形和原有阵地，构筑堑壕、交通壕，形成环形阵地，每个村庄都可以独立防守，村与村之间又可以火力互相支援。针对打黄百韬兵团战术的新特点，我应将运动之敌与驻止之敌的打法严格分开，采取近迫作业的战法，利用夜暗把交通壕挖到敌占村庄附近，距敌前沿阵地 50 至 30 米处，要逐个争夺敌人的火力点及所占村庄。在逐点争夺中，要集中炮火。在选择攻击村落时，要采取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的方法。

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粟裕在战役指挥上注重和掌握作战方式的转换以及由之引起的战术、技术上的变化，为加快全歼黄百韬兵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华野围歼黄百韬兵团的过程中，中野以一部阻击由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另一部阻击黄维兵团。11 月 10 日刘伯承从豫西赶到淮海前线，与陈毅、邓小平会合。 11 月 16 日凌晨，中野攻克宿县，切断了徐蚌线。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指出：“此战（指淮海战役）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19 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在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后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的第 2 阶段作战，华野以主力一部钳制徐州之敌，争取休整；以主力另一部协同中野歼击黄维兵团并担负阻击李、刘兵团任务。

粟裕完全赞同刘、陈、邓意见，20 日在报刘、陈、邓及军委的电文中提出：华野可抽出 4 至 5 个纵队，必要时还可增加 3 个纵队，协同中野歼击黄维、李延年，建议首先求得彻底歼灭黄维兵团。同时建议对华野部署进行调整，以原负责歼灭邱、李的华野北线部队，大弧形包围徐州，继续监视钳制徐州之敌，阻其南援。如果徐州、蚌埠、蒙城的敌人，以宿县为中点对进，打通南北联系，华野负责阻击，以全力保证歼灭黄维的胜利。并且决定当晚派两个纵队南下。

22 日粟裕指挥华野全歼黄百韬兵团。南线决战第一回合仅 17 天敌便损失 18 个师（包括何、张起义在内），决战前原本敌占优势的兵力对比也由此转换为我对敌占有优势。为尔后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态势。同时，打掉黄百韬兵团，使我全军上下充满了决战必胜的信心。

23 日，蒋介石为挽救危局，改变其不利态势，决定以缩回徐州的邱清泉、孙元良两个兵团沿徐蚌路向符离集攻击；以蚌埠、固镇的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和赵集地区的黄维兵团向宿县进攻，企图南北夹击、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

敌人这一狡计，粟裕在前三天就已充分估计到了，并作好了阻敌各项准备。

24日，中央军委根据情况变化，最后决定第2阶段打黄维兵团。

据此，华野第2阶段的作战任务变换为钳制、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和南线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同时以必要兵力协助中野直接参加打黄维。

三处鏖战，刀光剑影，决战由此进入更为紧张激烈阶段。

此时，南阻李、刘2个兵团，北挡邱、李、孙3个兵团，华野钳制、阻击敌人1个剿总指挥部、5个兵团约40万人。同时，华野还派部分兵力加入主攻战场，即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深深懂得：大兵团作战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钳制、阻击方向集中相当大的兵力，有时大于主攻战场。豫东战役即如此。正是有了豫东战役这一实践基础，使得粟裕能够提出攻济打援这一崭新战法。淮海战役第2阶段同样如此。此阶段作战华野虽主要担负钳制、阻击任务，但在钳制、阻击方向集中的兵力远远大于主攻战场，距主攻战场最近只有五六十公里，它不仅保障主攻战场，且关系到战役下一阶段的发展。为此，粟裕运筹帷幄，调兵遣将，指挥华野全力支援中野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深深懂得：此阶段作战是承前启后作战阶段，也是最困难的作战阶段。华野几个方向上的同时作战，兵力的频繁调动，情况的急剧变化，给他的指挥增加了极大的难度。这使他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即使得知黄维兵团于25日被围，邱、孙两兵团南下被阻，不能前进的消息时，他的心情并未因此而放松。他认为，南线决战的转折点尚未到来，战场形势还有很大不确定因素。因为敌人有生力量除徐州尚有邱、李、孙三个兵团外，南线还有李、刘两兵团，黄维兵团虽被包围，但从包围到全歼尚需时日。

粟裕从抓主要矛盾入手，把徐州邱、李、孙三个兵团的动向作为关注的重点。他分析敌三路会师打通徐蚌线的企图失败后，徐州守敌杜聿明集团下一步的动向有两个可能，一是固守徐州；二是突围。突围的可能性较大。因为敌人不可能不会想到，济南那样重兵设防坚固的大城市，我仅8天即攻克。固守徐州，无异于坐以待毙，重蹈济南被攻克的覆辙。

那么，敌人又将向哪个方向突围呢？我又将如何对付突围之敌呢？

经过多方分析、研究，粟裕认为杜聿明集团突围的方向有三个可能：一是沿陇海路向东，经连云港海运南逃，但要迅速解决装载三个兵团的船只、码头是困难的；二是直奔东南走两淮，经苏中转向京沪，但这一路河川纵横，要经过水网地区，不便于大兵团、重装备行动；三是沿津浦路西侧绕过山区南下，这一带地形开阔，道路平坦，距黄维兵团又近，可以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呼应，南北对进，既解黄维之围，又可集中兵力防守淮河。敌人极大可能走这一路。一旦杜聿明与黄维会合，战场形势将发生不利于我的大变化，所以这也是对我威胁最大的一着。

正在此时，粟裕收到军委发来的军情通报，得悉杜聿明将从两淮方向撤退。这使粟裕左右为难。他虽认为敌人不会由此方向逃窜，但又有情报，万一敌人由此方向逃窜，而我军部署失当，个人贻误军机不说，势将影响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相信这个情报，如果杜聿明不从这边走，而是向西南，与黄维会合，后果更难设想。

战争在考验着粟裕。

严峻的局势又须粟裕最快做出抉择。

粟裕再三分析，依然认为敌人走两淮可能性不大。为此，将北线7个纵队部署于徐州以南津浦路的东西两侧，注意力的重点放在西南，如果杜聿明3个兵团向两淮方向突围，要经过水网地区，速度不会快，我也可以赶得上。

战争本身就是一种变化不定的运动形态。而决定双方命运的大决战无疑又是“最变化多端”的运动形态，因而，对双方的指挥者来说更是“最不容易的时节”。

就在黄维兵团被合围后，有个估计3天可以全歼。根据这个估计，中央军委于27日电示粟裕：当黄维兵团快要歼灭但尚未能歼灭之际，对李延年正面阻击兵力后退一步，引其前进，以主力从侧后面打去，求得歼其一部。这使粟裕极度紧张，担心打上了李延年，而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并未能迅速结束，杜聿明又跑出来了，不仅不能再增调兵力打黄维，而且靠北线7个纵队，也难于完成追击合围杜聿明的任务，杜聿明集团很可能跑掉，如果杜、黄会合，战场形势将起重大变化。而事实上根据他打黄百韬的经验，黄维被合围后，我军难于以野战手段迅速达成全歼，势将转入以近迫作业为主的阵地攻坚战。因此，黄维兵团绝不是几天能够全歼的。

粟裕日夜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

华野主力一部南下后，蒋介石预感到我军要在南线求歼李延年兵团，28日急电李延年撤至蚌埠守备淮河，但李延年却早在26日即已南逃。我歼其逃敌后尾一部。敌主力逃至淮河以南。

幸好我没有打上，就在此时，蒋介石为挽救败局，决定采纳杜聿明提出的放弃徐州，邱、李、孙三个兵团从西南经萧县、永城南下，解黄维兵团之围，然后与黄维兵团会合一起南撤的建议。

果然不出粟裕所料，杜聿明集团11月30日开始撤离徐州，走的正是徐州西南这一路。

粟裕临机处置，指挥若定，及时将钳制、阻击作战方式转换为追击、合围，急令北线7个纵队，以及刚南下的渤海纵队立即展开追击，南线因未打上李延年，使得粟裕又迅速从南线抽调3个纵队，共11个纵队，一起参加对杜聿明集团的兜围。

“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得上就是胜利。”

“不让敌人逃向江南，彻底干净消灭他。”

我追击部队在这些口号的有力鼓舞下，按粟裕令采取多路多层尾追、平行追击、迂回截击、超越拦截相结合的战法，不顾敌机轰炸，不怕劳累艰难，尽全力追击。

敌为3个兵团10个军，我追击部队为华野11个纵队（纵队相当于军）及冀鲁豫军区独立第1、2旅。我兵力并不占多大优势，使用也已达极限。为此，在追击过程中粟裕对杜聿明集团采取网开三面，敌向西去也好，向北去也好，向东去也好，就是不让敌向南，其他方向都唱空城计。

正确的判断、正确的部署、正确的指挥。

杜聿明集团厄运难逃。

12月4日拂晓，我追击部队将杜聿明集团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并于12月6日全歼了向西南方向突围的孙元良兵团，仅孙元良化装逃脱。

粟裕期盼已久并为之付诸最大努力的南线决战的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从11月27日接到中央“求歼李延年兵团”电报起，粟裕整整7个昼夜没有睡觉了。他为此发作了美尼尔氏综合症。然而，决战需要他，他带病指挥，病情厉害时他便躺在担架上指挥。

粟裕继续密切注视着形势的发展。这时他得到消息称：敌宋希濂兵团已到浦口，向蚌埠前进；蒋纬国也到蚌埠指挥北犯；杜聿明曾建议从西安、台湾及甘肃抽调几个军空运蚌埠，组成一个兵团，与李延年、刘汝明、宋希濂合股北援。粟裕分析：歼灭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估计还需半月至20天，中野及华野已分成3个战场作战，兵力均感不足，尤其是南线阻击李、刘兵团兵力不足。不论杜聿明的建议是否能实现，即使宋希濂兵团赶到，我南线阻击部队也必更加吃紧，万一出乱子，势必影响对黄维兵团的作战。

早在内战刚爆发的苏中战役之攻黄救邵之战中，粟裕面对分界、加力、邵伯三个战场同时作战的严峻局面，就曾创造在战斗进行过程中及时转用兵力，先歼分界之敌，威慑邵伯之敌，最后再歼加力之敌，使战场形势顿为改观的先例。此时的淮海战场规模虽远胜苏中之战，但战局发展有异曲同工之妙。长期战争实践中的多次的大仗、恶仗、险仗使粟裕积累了丰富的大兵团指挥作战经验和处理纷坛复杂的战场局势的能力，他认为，为保主动，我必须改变三个战场同时作战的局面。

为此，粟裕于12月10日晨发电给刘、陈、邓并报军委，报告了上述分析，并建议：“再由此间（指华野包围杜聿明部队——作者）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尔后中野负责阻击李、刘、宋，敌可能不敢北进，我们再集中华野解决杜、邱、李兵团。”刘、陈、邓收到此电后当即电话复示同意。此前华野第7纵队、13纵队及特纵主力已直接参加对黄维的作战。华野再抽调第3纵队、鲁中南纵队及炮兵一部，于10日晚南下，参加歼灭黄维的作战。

杜聿明被我死死地“夹住”了，李延年、刘汝明被我“看死”了，眼见黄维被歼而无可奈何。

12月15日黄维兵团终被全歼。华野也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了1/3，南线李延年、刘汝明闻黄维被歼，仓皇逃向淮河以南。实践证明，及时转用兵力，果断调整部署，果然收到了苏中战役中攻黄救邵那样的战役效果。此时，南线决战形势已完全明朗。杜聿明集团已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绝对逃不脱被全歼的命运。为配合华北战场我军发起的平津战役，中央军委从扣留和全歼傅作义集团于华北战场出发，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对杜聿明集团围而不攻，目的是为稳住傅作义，不使其海运南撤。

根据中央军委“我包围杜幸明各部，可以十天左右时间休息调整，并集中华野全力，然后发起攻击”的指示精神，粟裕一面令华野围困杜幸明集团的各纵队转入战场休整，一面令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

时隆冬已至，淮海大地上寒风凛冽，雨雪交加。

杜聿明集团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官兵充满悲观绝望情绪。

我华野大军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士气空前高涨。

我以喊话、散发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我军包围敌人一个多月，毙伤、瓦解了敌人十来万人。

1949年1月6日，根据中央命令，粟裕指挥华野大军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

我参战部队势不可挡，从各个不同方向插向敌人纵深。9日黄昏楔入敌

中心阵地。敌土崩瓦解。10日下午，残敌被我肃清，杜聿明被我生俘。

65天的淮海大战，我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其中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敌徐州“剿总”指挥所、4个兵团部、16个军部、42个师共44万余人。

两年半前苏中战役结束以后，朱德总司令曾称赞道：粟裕是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楷模。他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

如今，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指挥36.9万的兵力消灭了敌人44万余人，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

战争造就了“战神”，“战神”从战争中脱颖而出。

渡江与战上海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主力消灭殆尽。

历史车轮如咆哮江水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求和声明，并于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和我党实行谈判，但实际上蒋介石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操纵一切，在“求和”和“下野”外衣的掩护下，编组训练部队，加强修建长江防线，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我军向江南挺进。

对于蒋介石的阴谋，毛泽东在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中指出，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渡江势在必行。和平谈判成功，我军即用和平的方式渡江；和平谈判不成功，即用战斗方式渡江。

1949年2月9日，遵照中央军委统一全军编制命令，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仍代理司令员、政治委员职务），谭震林为副政委，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野战军所属各纵队整编为第20至第35共16个军，分属第7、8、9、10共4个兵团指挥。

3月上旬，粟裕率领第三野战军65万大军先后到达渡江作战出发位置，积极展开战前准备。

饮马长江，席卷江南。望着那滔滔江水，粟裕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对于长江，他并不陌生。他曾为执行战略任务三次率部跨越长江：第一次是为了打开苏北局面，于1940年7月8日率江南指挥部及第2团、第6团约2000人渡江北上；第二次是为向苏浙敌后发展，迎接抗日战争战略反攻形势早日到来，于1944年底率部近万人跨江南下；第三次是率苏浙部队于1945年9月渡江北上，贯彻执行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但这三次渡江，因敌强我弱，只能采取趋敌所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薄弱部位进行偷渡。而这一次渡江形势已大为不同。他认为，以百万大军之雄威，加上我之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我以实击实，实施宽正面渡江，敌将防不胜防，我渡江有绝对成功的把握。

作为一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此时的粟裕思考的重点是打过长江去以后，如何从将来全国经济建设出发，尽量降低战争的破坏程度，尽量减少战争对城市和重要建筑、工业设施的直接破坏问题。基于此，在战役部署和实施过程中的着眼点应是力争保持突破江防后的锐气和实力，对江防之敌迅即采取兜歼战术，不使其逃窜或流散，设法减少或不给敌人以据城固守的可能，尽可能多地在野战中消灭敌人。在攻取大城市时，不能采取虽消灭了敌人，

却打烂了城市的战法，把上海等大城市打烂了，对全国的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4月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根据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决定，第三野战军两个集团（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指挥所设在泰州白马庙。具体部署是：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8、10两兵团为东集团，在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7、9两兵团为中集团，在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二野刘伯承司令员指挥二野部队为西集团，在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司令员在合肥附近统一指挥二野、三野，主持全局。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粟裕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23军和第20军由中集团第7、第9兵团分别调归东集团第10、第8兵团，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的第24军和第25军由东集团第8兵团分别调归中集团第7、第9兵团指挥。

4月10日军委发电报给总前委并二野、三野领导同志指出：“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四月十五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该电还就“江水情形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等问题征询总前委、二野、三野的意见。粟裕接此电报后，认为不宜推迟渡江时间。他在电报中说：“四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将发生以下困难：（一）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驶困难，因此以现有船只渡江，每次渡江人数势必减少三分之二；（二）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阔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第10兵团方面只能作为钳制佯动方向；（三）粮草困难，尤其是烧草。”同日，总前委和二野也向军委建议按原定时间渡江为宜。

军委在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的意见后，于11日复电指出：“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次日，粟裕再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二十日前后为最好”。四月十八日军委指示总前委及二、三野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同日总前委给二、三野发电提出：“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

国民党政府4月20日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们早就期望着这一天能够到来。

4月20日20时，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我中集团首先发起渡江作战，当日夜便突破长江，登陆成功。

21日夜东集团和西集团同时发起了强大的突击。敌人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总前委制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准的《京沪杭作战纲要》规定，部队渡江后先站稳脚跟，再视情扩大战果。可是，我军主力一突破江防，敌军便仓皇撤退。

此时，关键是能否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不使敌人有退入城市据城固守之可能。为此，粟裕于21日19时向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建议：“我全线渡江后，定将造成敌之混乱，尤以南京上游敌机动兵力既少又弱，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如此不仅使敌无暇调整部署，且将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中集团第9兵团的第25、27军原定25日休整一天再东进，粟裕果断决定，取消该兵团原定的休整计划，下令该兵团以急行军向东南挺进，切断南京之敌的退路，第7兵团在第9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快速前进，迅速切断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争取围歼逃敌于郎溪、广德、长兴地区。因时间紧迫，粟裕一面下达命令，一面上报总前委，请追认批准。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率领指挥机关于26日进驻常州。

“宜将胜勇追穷寇”。此时，粟裕的“追击战一定要迅猛”的思想已传达给每个指战员并化作他们前进中的动力。我广大指战员高度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怕疲劳，不怕饥饿，不为小敌所迷惑，快速攻击前进。

“快”就是战斗力。

“快”就是胜利。

粟裕牢牢把握“快”字当头这一战役指挥重心。从23日到27日，5天之内我各路追击大军终将逃敌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激战至29日，郎、广之敌悉数被歼。该役连同长江南岸及追击途中共歼敌13.9万余人。

围歼逃敌于郎广，使敌不能进入杭州，为这座闻名中外的山水秀丽的古城消除了一场浩劫。粟裕再三嘱咐部队加快前进速度，特别注意抢占钱塘江大桥。由于粟裕考虑和部署及时，当敌军正准备破坏大桥时，我先头部队赶到了桥头，消灭了敌人，保住了我国当年最长的现代化大桥，从而，也保住了我进军浙东、浙南和福建的重要通道。

既以极小代价消灭了敌人有生力量，又使杭州古城、江南大地得以免遭战火蹂躏，粟裕战前为之设想的最佳战役效果在郎、广之战中得以很好的实现。

5月3日，第7兵团进占浙江省会杭州，并以一个军跨过钱塘江大桥，解放萧山、绍兴、宁波等城市。

郎、广围歼战结束以后，粟裕把指挥重点转移到解放上海问题上，并和张震率三野指挥机关自常州移到苏州。

蒋介石在上海仍在作困兽斗。他企图以其20余万兵力固守上海，拖美国下水，挑起世界大战。为此，蒋介石亲临上海对高级将领说：“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到那时，“盟国就会直接来援助。”

面对全国最大城市，当时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市，如何解放它，粟裕是颇费心思的。事实上，早在淮海战役一结束时，他就考虑如何解放上海的问题了，渡江前考虑就更多了。上海战役虽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的一部分，但其特殊性又决定了它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战役。粟裕虽也有攻开封、克济南等大城市攻坚实战经验，但上海与济南不同，它是蒋介石企图在东南半壁孤注一掷的最大资本。上海的防御工事经历国民党、侵华日军三个时期的加修、巩固、完善，仅钢筋水泥地堡就有4000多座，加之敌有海上通路，我不易将其包死。我如强攻（尽管我已具备强攻的条件），势必将上海打烂，这对全国经济建设影响就太大了。

然而，双方数十万大军对峙于上海，刀兵相见，即使是冷兵器时代交战，这样规模的大战的破坏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作为战役指挥员，粟裕深感重任在肩，压力巨大。

既要消灭守敌，又得保全上海，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主体。粟裕对此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那么，又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争取把上海基本

完整地接管过来呢？

粟裕曾比较三种打上海的战法：一是长久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这种战法曾用于长春、太原等城市。但上海情况特殊，它有600万居民，长期围困将使人民的生活陷入绝境，何况我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追歼敌人，该战法势必拖延时日，而这却是蒋介石所希望的。另外，敌军有吴淞口海上通道，我们也不易围死。二是选择敌人防御的薄弱环节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种战法可避开敌人重点设防的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三是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为保护其唯一的海上退路而集中兵力在吴淞周围及上海外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一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

经过分析、研究、对比，粟裕毅然采用第三种方案，并于5月7日上报军委。军委8日复电同意。

5月10日，粟裕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粟裕钳击吴淞，吸引敌人主力于上海外围的战法果然奏效了。这是一场以主力对主力、战况至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也是夺取市区并保全市中心的唯一正确的打法。在我以吴淞口为目标的神速钳击攻势下，首先歼灭了蒋军第123军、51军、暂8师等部，打乱

了敌人的部署。为确保吴淞这唯一海上通道，敌人不惜使用血本，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来3个军援助吴淞，这样市区更加空虚了。

有鉴于此，粟裕和参谋长张震于5月18日发电给军委及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应乘市区空虚之机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而以第9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19日、20日，中央迭发两电，同意粟、张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之敌的建议，指出：“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准备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25日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照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

根据总前委和军委的指示，粟裕21日制定并上报总攻部署如下：第一步全歼浦东之敌；第二步夺取吴淞、宝山及其外围阵地，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全部，第三步聚歼可能溃缩在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的江湾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次日，军委复示同意。

此时，在我强大攻势之下，敌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固守上海的决心动摇了。

23日，我侦悉汤恩伯已率其一部兵力逃到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苏州河以南只剩下5个交警总队。根据这一情况，粟裕判断敌将撤离上海，迅即决定当晚发起总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26日，我各部攻占吴淞、杨行、宝山、江湾，大场及苏州河以北之市区。当日，残留在杨树浦等地之敌人，在敌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率领下向我投降。27日我肃清了在市区的残敌。

蒋介石要求上海坚守一年半载的梦想破灭了。东南半壁的最大赌本仅半个月就被他输光了。

汤恩伯要把上海变成“斯大林格勒第二”，使我“啃不动，打不垮”，然而，在与他的主要对手粟裕斗智斗勇过程中，又一次败北，其设想很快便被粟裕击得粉碎，成为泡影。汤恩伯本人则率残部逃之夭夭。

15天的上海战役，粟裕神机妙算，强攻与智取结合。战役初期，采取引蛇出洞的战法，把敌主力吸引于上海外围，消灭了敌人，错乱了敌人的部署。当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又审时度势，变换战法，适时提出先解决苏州河南之敌，避开吴淞这个强点，最终歼敌15.5万人，又一次获得了他战前设想的“既要歼灭守敌，又要保全上海”的最佳战役效果。真是军政双获丰收。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自1927年投身革命22年来，粟裕征鞍未下，驰骋沙场。而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但他却征尘未洗，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征途中的虎将军徐海东

张 麟

徐海东（1900～197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湖北省黄陂（今大悟）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入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4军第12师第34团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和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黄陂县农民自卫军队长，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黄陂县补充第6师师长，鄂东警卫第2团团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38团团团长、35团团团长、36团团团长，红四方面军独立第4师师长、第27师师长，红27军第79师师长，红28军副军长、军长，红25军副军长兼第74师师长，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代理书记，红15军团军团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南路军总指挥。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中央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军长当副军长自动降职

大别山，遭受了敌人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有些地方成了无人区。红军象一条龙漫游在即将干涸的湖底，今天游到这边，明天游到那边，吃粮、穿衣越来越困难了。

1934年冬天，党中央派人来到大别山，向红军传达中央的指示，要红25军离开大别山，开辟新的苏区。于是，红25军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路面上结着一层冰凌。不开冻，路滑，开冻了，满是泥泞。红军战士每人背两天干粮和两双草鞋，从一个叫何家冲的地方踏上征途。战士们听说要远征，内心十分留恋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有离开过大别山。现在要远走高飞，心里不免难过。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他们默默地向前走。两只脚像是量地的尺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量。身后有敌人追击，大家倒不大担心。有一件事，让许多红军战士犯疑：老军长徐海东为什么变成了副军长？队伍里有人私下悄悄议

论：“老军长犯了什么错？”

“该不是‘老三’咬了他一口！”

“听说从中央来了个新军长，……”

红军战士的议论，徐海东没有听到，代理省委书记徐宝珊倒听到了传闻。他心里有点不安，他了解军长变更的底细。出征前，部队整编，徐海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红25军由他当军长更好些。省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徐海东担任副手。按理说，一个革命者的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可是有的人就爱乱说。这天，行军路上走到一起，徐宝珊对徐海东说：“海东，有人说，你从军长变成副军长，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听说了吗？”

徐海东说：“嘿嘿，听见没听见一个样，让他们说去吧！”

徐书记说：“可不要往心里去！不是你犯了错误，也不是工作不好，是

你主动要给的嘛！”

“这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嘿嘿一笑，又说：“当军长要打仗，当副军长也要打仗，是官、是兵，都是干革命嘛！”

徐宝珊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熟悉海东，知道他是个党性很强的好同志，一心一意干革命，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的时候，因打仗负伤，曾主动放弃过团长职务，而当了副团长。像这样不在乎职位高低的同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徐海东又说：“宝珊，你尽管放心，正的变副的，我不会脸红的，更不会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哟！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匠，整天和泥巴打交道！”说着，又嘿嘿地笑。

他以前当军长，身上的担子重，每天起早贪黑，呕心沥血。如今，上有省委书记、军长和政委，下有参谋长和各师师长，他这个副军长的负担轻松些了。可是，他这个人怪，还是打仗不缩头，工作不后退。他想，程军长刚从中央过来，兵不熟，将不熟，情况也不熟悉，工作难免有困难，自己一定要多协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行军路上，徐海东总是跑前压后，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部队刚走出河南，驻朱堂店的敌人一个师，兵分两路追来。徐海东积极提出作战方案，亲自带领两个团迂回上去，打垮了敌人。越过平汉铁路时，敌人一个师在枣阳一带堵击，他又亲自指挥部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

红军从大别山出发，到陕南这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徐海东天天率领队伍先头行进，累得眼睛红肿，人消瘦了许多。政委吴焕先担心他累垮了，有一天出发前，硬是下命令似的说：“海东，今天你要随后走。我和军长说好了，我们走在前头。”

红军队伍又上了路。这一夜，先是风，后是雨，风雨交加的黑夜，路难走得没法说。走到后半夜，突然一股敌人抄近路追了上来。红军战士冒雨顶风，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敌人展开了“脚力赛”。平时行军20里一次小休息，如今顾不得了，走，走，不停地走。为了甩掉敌人，队列里不时传出“跑步前进”的口令。快步加小跑，人们喘息着和风雨抗争，和敌人赛跑。

从大别山出征以来，红25军已经长途跋涉了6000多里路。许多人脚底板上磨起了泡。有的人害了重病，走不了路，只得用担架抬着。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

徐海东催马往前赶，风雨中看不见人脸，只能看到往前挪动的人影，伴随着噼噼啪啪的脚步声，还有滑倒后的叫骂声。

“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呀！”徐海东忽然听到凄惨的哭叫。他跳下马，黑暗中只见一个人手往一根棍子，一瘸一拐，一条腿蹦着往前走。不用问，是掉队的伤病员。

“快扶他上马！”徐海东对警卫员叫着。

“不行，不行……”警卫员小黄喊起来。他的马已经让给了伤员，哪肯把首长的马也让出去。

“快！”徐海东吼了一声。

瘸腿的伤员被扶上马。徐海东拄着伤员的棍子，一步一跌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对在风雨中拼搏的战士们喊：

“同志们！加劲啊！快目的地啦！……”

“老军长上来了！”“快走！”战士们听到徐海东洪亮的声音，一个个又喊又叫。骑在马上那伤员，这时才知道骑的是老军长的马。他一欠身滚下马来，一歪一歪地往前跑，没跑几步就摔倒在泥水里。徐海东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后，又推上了马。

天快亮了，队伍行进的速度慢了。战士们走了一夜，已精疲力尽，摔倒爬起，爬起又摔倒。有的人爬不起来，只好在泥水里往前滚爬。为了使大家缓缓气、避避风雨，前边传来命令，部队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哪知这一停步，许多人住房檐下、草垛边一倒，便进入梦乡。有的人浑身上下淋着雨，也不管了，只是酣睡。没多大一会儿，“继续前进”的口令传来，可是，人们还是睡着不起。徐海东看着这情景，很想让大家多歇一阵，但身后有敌人的追兵，不快赶路，就是自取灭亡啊！他冒着雨，一声声地喊，一个个地拉。

一群干部、战士，听到老军长的喊声，从老乡的屋里跑出来。

部队继续在大雨中行进。徐海东走在队伍末尾，只见路旁有副担架，担架上的人在哭泣。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徐海东丢掉手中的木棍，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来！跟我一起抬着。”说罢，蹲下身去，等着警卫员。

小黄知道老军长的腿多次负伤，腿带残疾，哪能让他亲自抬担架呀！他愣着不动，回头望着，希望能有人走来。

“给我抬！”徐海东严厉地叫，“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下，快抬着走！”小黄只好和老军长把担架放上了肩头。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徐海东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也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徐海东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份量，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

“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那不是！”徐海东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徐海东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有人顿时领会了老军长的意思。他这“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象老虎一样，爱山林、离不开山林。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徐海东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的人，当成玩笑，了解徐海东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成哲理。徐海东常对部下

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昏睡四昼夜后，叫人架上火线

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希望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根据地。这天刚住下，徐海东遥望着伏牛山的高峰摩天岭，听一个老农说登上那摩天岭，可以西望秦岭，北望洛阳，东望平汉路。当年，诸葛亮领兵战中原，走过伏牛山；太平天国革命军驻过伏牛山……是啊，这里险山深谷，丛林茂密，物产丰富，完全可以养育一支红军！

就在这天，徐海东通过侦察证实，敌人在这周围早已设防，伏牛山区的许多寨子，也都驻扎了重兵。然而，尾追的敌人仍在步步紧逼。于是，红军只得沿着伏牛山北麓，向陕西边境移动……

12月10日中午，徐海东正在庚家河参加省委会，突然外边枪声大作，警卫员跑进会场报告说：敌人打上来了，已经占领了东山

坳口，情况万分危急。徐海东正发言，听说敌人攻上来了，说了声：

“我去前边看看”就朝枪声激烈的方向跑去。

敌第60师由鸡头关方向突然袭来。红军战士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长驱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庚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都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近前这才发现，显然已经晚了。徐海东闻得此讯，火冒三丈，亲自指挥着第223团，攻打东山坳口。这时，全军从军长到炊事员，都一齐投入了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反复冲杀二十多次，终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

当时战斗之激烈，正如战史中记载着的：一挺重机枪，接连牺牲了三名射手，仍然不停地射击；军部的号官下颚负伤不能吹号了，还利用小土地庙作掩蔽，用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300多名，我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程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也都负了重伤

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一颗子弹从脸上进，从脖子后面出，四天四夜昏迷着，第五天，才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老乡家床上，吴焕先、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和钱信忠都守在床边。郑位三因刚从寒冷的屋外来，胡须上还挂着冰茬。徐海东不能说话，只是微微点点头。又过了一天，才能讲话。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身旁，便问她：

“现在是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你可醒过来了！”小护士眼里翻滚着激动的泪花，喜形于色地说，“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认识这个女护士，她叫周东屏，便开玩笑似地说：“我可没着急，倒睡了个好觉。”

周东屏不让他讲话，搞了碗面条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吃了东西，精神更好了，又问这问那。东屏不想告诉他，最后还是说了：“这一次，营以上干部负伤的不少，程军长也负了重伤。”徐海东听了之后心里沉甸甸的。他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为了亲自掌握不断变化的敌情，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要警卫员扶着他回指挥所去。警卫员不让他去，周东屏也不准他动。他又发火了，吵着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吗？误了军情大事，开除你们的党籍！”护士和警卫员正拿这个烈性子的人没办法，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政委吴焕先又来了。

这几天，这间小茅草屋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断过人，省委的同志和干部们，

先后来探望过徐海东多次了。徐海东一见他俩，急着问军情。他们告诉他：省委几个同志最后商定了，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吴焕先说，“北边靠秦岭，南边是汉水，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群众条件也不错哩，”徐宝珊说，“反动派整年派夫、抓丁，苛捐杂税几十种，穷苦人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早就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共产党和红军了。”

徐海东点了点头，喃喃地说：“这样就好了，人没个家不成，鸟没个窝不行，我们红军是得有块根据地！”他想到自己和新来的军长都负了伤，省委书记正病着，这千斤重担全压在政委吴焕先一人肩上，不禁深情地抓住政委的手说：“焕先，你不能垮了呀！”

“我不会垮！”吴焕先拍拍他自己的胸口说，“你放心养伤！”

“宝珊，你要保重啊！”徐海东又一把抓住徐宝珊的手说。

“我是老毛病了，”徐宝珊笑了笑说，“你放心吧！”

三位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你叮嘱我，我叮嘱你，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支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徐海东听说程子华同志伤势不轻，象下命令似地向钱信忠说：“你不要管我了，要好好照看程军长！”又指指周东屏说：“还有她，都去照看军长！”

革命者最大的烦恼，莫过于不能为革命工作了。徐海东昏昏沉沉地躺着。他恨自己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为此十分苦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发现和他讲话的人声音都小了，更是疑惑不解。于是，每当和医生、护士说话，他就提高声音大声地嚷。周东屏这才发现，徐海东一只耳朵失灵了。他每次讲话，总是大声嚷着像吵架似的，原来是想给人以启示：你大点声嘛！

徐海东虽然不懂医学，多次生病、负伤，却使他认识到：伤和病也像敌人一样，你弱它就攻，你硬它就软；吃药不如吃饭，多睡不如多走。因此，他每顿饭都尽量争取多吃一些，吃饱了就起来转转。行军中，他能骑马就不睡担架，能步行就不骑马。可是，终因伤势太重，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两个月过去了，他身体还没复原，伤刚好一些，又发高烧，整夜咳嗽不止，咳得伤口都震裂了。

部队来到葛牌镇附近。鹅毛大雪飘了一天一夜，谁都以为这样的大雪天，敌人是不会来了。哪知，天刚亮，突然传来枪声，紧接着，一个警卫员跑进屋说，情况严重。政委和参谋长一听，也都立即上了后山。他们临走时，向警卫员交代说，要副军长快坐上抬子转移。

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提着手枪就往外走。

警卫员连忙拦住说：“不行，政委交代过，你应该坐抬子！”

“什么？！”徐海东眉头一皱，怒斥了一声，“快扶我上后山指挥所！”他声音严厉，眼睛瞪着，这神态说明，谁要是再拦阻他，那又非挨骂不可了。两个警卫员相互交递了一下眼色，露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只好走上前去一左一右架着他，踏着皑皑白雪，艰难地向后山走去。整个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敌人一个多团，正向我军阵地进攻。政委和参谋长顶风冒雪站在山包上，看着地形，正研究这一仗怎么打，决心还没下定。徐海东由两个警卫员搀扶着爬上了山头。

“海东！你来得正好！”政委吴焕先对徐海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向是信赖的，大概是由于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问他的伤势和病情，就紧接着把

当前的敌情和自己的打算说了说。

徐海东听了之后，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早把病伤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和吴焕先都是擅长迂回包围战术的。两个人一合计，又征求了参谋长的意见，很快就下了决心，派出一个营向敌侧后出击，成功后，再从正面组织反击。吴焕先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军政委，他向徐海东说了一声：“你在指挥所，我去组织部队……”说罢带着警卫员向山下奔去。参谋长接着也跑了去。

雪下得更大了。徐海东蹲在雪地上，完全忘记了风雪和严寒。他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亲自指挥部队。当他看见政委指挥的那支队伍在敌人侧后出现时，迅速把一个营从正面放了出去。这样，两面一夹击，把敌人一个团打得稀哩哗啦，狼狈而逃。于是，红 25 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晚上，雪不下了，风也停了。徐海东坐在火盆旁边和警卫、护士说笑，红光映照他们的脸，一闪一闪的，他们更显得精神焕发了。徐海东就是这样的人：一上战场，严肃得象个判官，脸上不挂一丝笑，还常常说出些粗鲁甚至骂人的话；下了战场，特别是打了胜仗，在下级面前又温和得像另外一个人，总是笑眯眯的。这个时候，警卫员什么话都敢向他说，甚至敢和他争论问题。

大家正说得高兴，参谋长走进来，面带笑容地说：“今天是大喜。”

徐海东把“大喜”听成“大雪”了，侧过头来，向参谋长说：

“是啊，敌人想借这大雪，咬我们一大口，它咬上骨头了。”说着嘿嘿一笑。

“今天幸亏你上山来了，”参谋长在火盆旁坐下，伸着两只手边烤边说：“要不，这仗打得怎么样就难说了。可见红 25 军离不开你呀！”

称赞的话，听起来是顺耳的，可是，对不恰当的赞扬，徐海东一向是反对的。他苦笑了一下。

“你的伤快好了，我看军长还是你当吧！”参谋长像开玩笑似的说。

徐海东虽说是个“粗人”，说话有时不大掂量轻重，但是参谋长这句话，使他警惕起来，生气他说：“这算什么话？谁当军长，谁不当军长，是你定的？”

不知是参谋长的建议，还是其他同志从工作需要出发，过了一些时候，在华阳地区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正式提出：军长伤未好，徐海东伤好了，还是由徐海东当军长。

“不成，绝对不成！”不等省委其他同志说话，徐海东抢先发了言。“军长是中央来的，他手上带了彩，不是不能指挥。我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

行动比言语更能证实一个人的品德。从鄂豫皖到陕南，这一路上，徐海东并没因为自己是副军长而少担责任。每当危急关头，都挺身而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战斗。他既把自己放在一个助手的地位，又不忘自己是这支革命军队的主人。这时，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一支红军队伍的前途和命运。

“先疲后打”出奇兵，迎接朱毛红军

革命的种子是神奇的，并不是非得撒在肥沃的平原地区不可，只要有劳苦群众的地方，不论是高山，不管是丘陵，它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进入陕南只半年光景，一大片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游击区也迅速发展。红 25 军经过战斗的不断洗礼，扩大到 3700 多人。1935 年

5月，华阳一带传出这样的歌：

二月初六炮声响，
警备三旅垮个光；
华阳有了苏维埃，
土豪恶霸一扫光；
又分田地又分粮，
穷人翻身把家当；
吃饭莫忘红二五，
翻身莫忘共产党。

在这段日子里，徐海东连病带伤全不顾，协同军长、政委指挥，打了许多胜仗。3月10日，在华阳镇附近的石塔寺伏击，把陕西省警第2旅第6团大部歼灭，活捉敌团长以下官兵400多人，旅长张飞生负伤逃回西安。4月7日，九间房一仗，又把敌警第3旅全部歼灭。每一个胜利，徐海东都付出了心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4月2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令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第95师入陕，会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25军发动大“围剿”。敌人气焰嚣张，扬言要在5、6、7三个月内，把红25军全部消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痛哭了一场。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带微笑地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却不愧是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虽然伤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难为政委一个人唱独脚戏。

敌人十倍于我，大规模的“围剿”步步紧逼，怎么作战，如何行动，是摆在眼前一个关系到红25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路走来，徐海东几次听程子华讲，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漂亮，毛泽东和朱德运用的主要战法，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程子华讲的一些战例，深深印在徐海东心中。但是，他又知道，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无风无雨，就可以低着头走到底。兵书人人会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必打胜仗。他每天苦苦思索着，不断找程子华、吴焕先交谈新的敌情、新的地形，使他对于打法产生了新念头。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研究反“围剿”的作战会议，徐海东毅然提出“先疲后打”四个字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决定：乘东北军新到，我军首先北上，争取吃掉它一部，然后拖着敌人长途运行，一旦抓到有利战机，就力争歼灭其一两个师（旅）

6月初，红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了。徐海东扔掉了伤口上缠着的绷带，跨上匹大白马，带着手枪排，行进在全军前头。按照预定路线，队伍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走。今天70里，明天80里，天天走，夜夜行。战士们不了解徐海东的这个“先疲后打”究竟“打”在了什么地方，就讲起怪话来了。有人背后骂道：

“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龙灯！”

可是背后的牢骚、怪话，都传不进徐海东的耳朵。这是由于干部战士都晓得徐海东厉害，晓得他最讨厌怕苦、怕死的思想。当着他的面，谁都不敢说怪话。徐海东呢，一心想实现省委决定的调动敌人的计划，便于6月15日晚亲自指挥手枪团走出130里，冒充敌第44师的部队，一举攻占了鄂豫陕边界的要地——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此地是敌第44师的一个补给站，红军战士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一个个眉开眼笑。

正当徐海东等军部指挥员担心敌人不会上钩的时候，突然传来情报：敌第67军3个师和第44师、警第1旅等部，像蜗牛似的朝荆紫关爬了过来。我们打了个小的胜仗，果真就把敌人“调”来了。徐海东从心里高兴，病几乎好了一半。休息了几天，红25军就按照预定路线开始行动了。徐海东在这次行动中，连马都很少骑。每天几十里路的急行军，他和战士们一样靠两条腿。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情绪这么高，又说又笑，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

队伍沿着崇山峻岭继续西进。已经是6月份了，不是烈日当头，就是暴雨淋身。战士们想到就要打更大的胜仗，什么苦和累呀，日晒和雨淋呀，也全都不在乎了。6月25日，部队又转回到山阳小河口地区。当晚，徐海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说：“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上来，就吃掉它哪一路。”

等了4天，看好了地形，休整了部队，敌警备第1旅爬上来了。敌人这个旅战斗力不算强，可是由于没吃过败仗，开始很骄横，加上旅长唐嗣桐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心想抢个头功，更忘乎所以了。哪知他们这支队伍被红军拖着走了20多天，就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了。7月2日拂晓，红军在袁家沟口突然发动攻击，经八个小时冲杀，全歼敌1800多人。

徐海东常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比普通士兵还不如，活象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这个旅长支支吾吾，不肯回答。徐海东恼了，狠狠地训斥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眼气，没有你的好！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听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下，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警第1旅被全歼，唐嗣桐被俘，震动了陕南，震惊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坐镇西安指挥这次“围剿”的总指挥官杨虎城，接到蒋介石

的命令之后，曾一再发电报，命令进到山阳以西洞峪口的第110师继续追击，当第110师距红军40华里时，再不敢冒然前进了。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破产了。

从此，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25军战争史上，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军事家的欣慰，决不在于一两次胜仗，他所关心的是整个战局。这时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都急于想知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

中央红军的消息；想知道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消息；更想了解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以及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情况。可是由于没有电台，没有固定的交通联络，他们只能偶尔从党内传来的文件、从敌人报纸上得到零零星星的情报。徐海东一开始也只知道整个战局不妙，各地红军都在转移，却不知道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已转危为安，如今越过雪山、草地正在继续北上；他更不知道，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了。

为了继续调动敌人，把敌人从陕南我游击根据地拖出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7月初，北出终南山，步步逼近西安。这一突然举动，使西安的敌人一时乱了阵脚。

就在7月中旬的一天，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来到了距西安15里的“引驾回”。据说，这是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等候迎驾的地方，又名“接驾回”。徐海东虽然一向喜欢打听这类历史传闻，但是如今一心想了解西安敌人动向，也就没去多问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接驾”的了。他随着这支先头部队，占领了镇中敌人一个区公所。手枪排排长跑来向他报告说，捉到了一个区长。

“押进来，我问问他。”徐海东在区公所一张桌前坐下，这才发现墙上挂着部电话机。他拿起话筒听听，里面传出嗡嗡的声响，想是还畅通哩。这时手枪排排长把那个区长押进来了。那个家伙手里捏着一顶礼帽，一进门，就躬身折腰，连连向徐海东行礼。

徐海东问了他几句，掏不出什么军情，便指着电话机说：“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不料对方回答说：于学忠、毛炳文的队伍都向西开了，无兵可派。徐海东从而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于学忠、毛炳文两个军都向西开，很可能是那边发现了红军。如果真还有红军，那又是哪一路呢？他正想要探明这一情况，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原来，这报上刊登着一条消息：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流窜……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军部几个领导人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是啊，从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西征以来，两年多了，红25军一直是在孤军奋战。5个月前，他们在陕南的华阳地区，曾听到一个消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队伍已经越过了大巴山。当时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率领先头团赶到了城固至小河口附近，不料四方面军却从陕南折回四川北部去了。从那之后，再没打听到真实情况。没想到如今四方面军已与中央红军会合了。

7月15日夜晚，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在长安丰裕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这时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传递来的中央文件，证实了《大公报》的消息：党中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准备北上。这是多么难得的喜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吴焕先、

程子华、徐海东和省委的所有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就像一群远游他乡的孩子，突然得到妈妈和亲人的消息一样，异常兴奋。

“迎接党中央！”

“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这一个个口号，在徐海东心中呼喊。

年轻的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平时讲话鼓动性强，战士们说：“听见政委的声音就有劲！”如今他得到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真实消息，激动得眼里的泪花不停地滚，嘴唇翕动着，几次欲言又止。省委会上，他用低沉而又庄重的声调，宣誓般他说：“我们一定要去迎接党中央！”涂海东握紧拳头说：“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3000多人都牺牲，也要保卫党中央！”

最后，省委会议还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第二天，即7月16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干部、战士这会儿的情绪，和半年前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为了“打远游击”，可以说是无目的的转移；如今却是目的明确：为了去迎接党中央，去与红军老大哥会合。徐海东的伤势这时也完全好了。他一想到这次部队行动的目的，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脸上的酒窝和那块伤痕，也显得格外明晰。连续15天的急行军，他都和往常一样，跟随着前卫团。

部队路经户县、周至、骆驼口，遇上连日大雨和敌骑兵的尾追，也全然不顾，一直沿着秦岭北麓不停地向西挺进。8月1日，他们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附近，先头部队切断了敌人宝鸡至汉中的公路要道，一举歼灭了胡宗南别动队4个连，并活捉了一名少将参议。徐海东亲自审问了俘虏，口供证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正越过草地北上，敌胡宗南纵队、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第3军王均部、新编第1军邓宝珊部、第35师马鸿宾部，都已分别布置在四川西北部、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

为了及时掌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徐海东给了手枪排一个任务：每到一地，要特别注意搜集报纸，越多越好。如今，占领双石铺，缴获的文件、报纸最多。大家都在文件、报纸中寻找“朱毛红军”和“徐向前”、“贺龙”的名字，连过去不大关心敌人报纸的徐海东也是如此。一天，不知是哪双慧眼，最先在7月16日和22日《大公报》上，找到了这样几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匪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迅行……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桃州、岷县、西固等处。……”

徐海东看着报上这些话，眼亮得像盏灯，嘴笑得合不拢，那两个酒窝在脸上不停地闪动着。他连声大叫，“好好！”叫人快把报纸送给政委、军长。

吴焕先看到这消息高兴！

程子华看到这消息高兴！

打下双石铺第二天，就是“八一”军部举行了纪念会。傍晚，徐海东说这一带是古战场，便走出镇口，拿起望远镜，饶有兴致地向四周山峰观望。一个参谋说，这双石铺正是三国时代马谡失守街亭的地方。徐海东便借题发挥，讲起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来。

徐海东不是历史学家却爱历史。参谋和警卫人员也都爱听他讲古时候打仗的故事。每到一地，他总能结合现他讲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尽管有

些是野史，有些是传闻，同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其实，双石铺是不是“街亭”，徐海东自己也没完全搞清，只不过是借古论今罢了。

8月2日一早，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豪情满怀地向天水方向进发，不料，被蒋介石发现了，由成都“行辕”连发五道电报，命令“追剿”部队“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徐海东“残部”。

在敌人多路追击、堵截下，红25军象一条游龙，活跃在陇南地区。徐海东一马当先，随先头团切断西兰公路，攻占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北关，乘胜北渡渭水，进占秦安县城，威逼静宁，横跨六盘山……

真是山高不过战士的脚底，路遥方知欲和亲人相会的心情。徐海东一路上想：这几年大家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要是找到党中央就好了！他甚至想到了，一旦见到中央领导人，要说些什么，问些什么，送上点什么小“礼物”。总之，他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英雄流血不流泪，他却泪水不干

一天，行军到达宿营地，吃饭时，徐海东自言自语他说：“嗨嗨，天天说迎接党中央，现在党中央在哪里呀？”

吴焕先接过话题说：“是啊，他们在哪里？”

徐海东放下碗筷站起身来。

政委吴焕先是个能猜透人心的人。不错，徐海东这些天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

他们东奔西走快一个月了，也打听不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面对重要行动，谁都要想怎么办。徐海东这时考虑的是：很快接到党中央，那是上策；接不着党中央，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是个中策；下策是转一圈，转回陕南去。若是回陕南，不但是孤军奋战，过渭水也是一关。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背水作战全军覆灭的历史，徐海东记得很牢。他想：决不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啊！

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红25军从白小镇向东行进。路上，徐海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吴焕先的马也由伤员骑着。他们两个人沿着泾河北岸往渡口走去。

“该死的，这雨专浇我们，”徐海东骂天，“我们停下，它就不下了；我们一走，它就泼下来，鬼天气！”

“这叫天公与我作美嘛！”吴焕先笑着说。

“美，美个屁！”

“大雨不停，大家都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呀！”吴焕先说着，两手往脸上抹了一把雨水。

还不满28岁的政委，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神采。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小孩似的。这时，说俏皮话，是宽宽徐海东的心。他是大别山红军中的“才子”。17岁那年就写下一首诗《咏天台山》：“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分左右，独与上天齐。”他还曾是河南箭河一带闹革命的“孩子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大别山红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这首歌谣就是吴焕先一次被困在深山中写的。

徐海东和这位政委相处几年，只见他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从没见过他气馁。干部战士说他是“好政委”，徐海东认为他是好共产党员。这几年，不管是过江过河，吴政委都是等队伍全部过完了，他才过去。徐海东知道政委

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对他说：

“你先进村休息，一会我去渡口看看就行了。”

“你昨夜一夜没睡，”吴焕先说，“要休息，还是你进村睡一会儿。”

他们俩谁也不肯休息，一同走向渡口。

队伍挤在河边，吵吵嚷嚷，有人涉水，有人划船。大雨不停，大家都怕山洪暴发，争先恐后，队伍很乱。吴焕先和徐海东一出现，队伍顿时秩序好多了。吴焕先立在岸边，挥动着手，指挥伤病员上船；徐海东在雨水中跑上跑下，进行安排。他听说村里还有一批伤员，雨大都不愿意出屋，忙跑进村里去找，只听人们呼叫：“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徐海东听说山洪，扭头又跑回河边。只见洪水奔腾而下，刚才还平平稳稳的河水，突然变得汹涌狂暴。倾泻的洪水里，夹着木块、树枝和猪狗杂物。有一条船，被山洪冲跑了。政委吴焕先跑向下游，去寻找被水冲走的一船人……

没想到山洪来的这么快，这么凶猛。一个团部队被隔在北岸。万一敌人袭击上来，那是孤军背水作战了。徐海东叫来没能渡河的第223团团团长和政委，对他们说：“敌人离这儿不远，你们团要做好准备，准备背水死战！”

下午，传来一阵枪声，敌人果然趁雨天袭击渡河的红军来了。徐海东最担心背水作战，眼下偏偏陷入了这种境地！

电闪雷鸣中，大雨倾盆而下，径河里山洪怒吼着。一阵马嘶人喊，敌人的骑兵冲来了。骑兵之后，步兵又蜂拥而至。红军战士背水应战，把敌人的步兵死死地堵击在河堤外。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苦战，右翼突然杀出来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手里挥着驳壳枪高喊：

“共产党员们，跟我往前冲啊……”

这挥着驳壳枪的人，就是政委吴焕先。

“快吹号！”徐海东一看政委出动了，忙叫号官。

“吹……吹什么号？”号官问。

“告诉政委，我在这里！”

号官的军号里，已灌上了雨水。他鼓足气，吹了好几下，没有声，便用了甩军号，再使劲儿吹。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水声，回荡在泾河北岸。

红军战士们冒雨厮杀半天，击败了敌人的进攻。敌第104旅第208团团团长马开基，原想趁着红军渡河的机会，捞个便宜，没料到他自己却被红军击毙在河堤旁边。1000多名敌人死的死，降的降。红军背水一战，取得了全胜。

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负重伤。徐海东急匆匆往四坡村方向跑去。他跑啊跑，一口气跑进村，还没见到人，却听到一阵阵沉痛的哭声。

一群干部战士围在一个院子里，哭着，喊着。徐海东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他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极度疲劳，沉沉地安睡了。他那娃娃似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他那能文能武的双手，已经冰冷僵硬。

“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只体温消失的手，大声呼喊，“政委！焕先！……”

徐海东虽比吴焕先大7岁，但他敬重政委的人品和才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兄长。打仗用兵的事，吴焕先多是听徐海东的；属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事，徐海东有句习惯语：“请政委决定。”他俩都是急性子，徐海东又有个暴脾

气，可是他们俩一起配合着工作，很少有变脸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意见不一致了，争论几句，很快就过去了。干部战士背后说他们两个人：“他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他！”他们两个简直比亲兄弟还亲！

门外雨不停，屋里泪长流。徐海东过去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他亲密的战友吴焕先战死了，他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他悲痛欲绝，一会儿放声痛哭，一会儿默默流泪。他不禁怀念起近年来相继去世的令人尊敬的同志。红军长征前，省委书记沈泽民饥病交加，逝世在天台山上；长征路上，第二位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在陕南。如今，接任的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没走完长征的路，又倒在这泾河边上。

徐海东想不出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位好政委，他在人群中看到经理部长，叫过来说：“政委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和小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妻子饿死了，听说只有老母亲还活着，一个人在外讨饭。我们要买口好棺材，把政委埋葬在山上，立块碑，日后革命胜利了，好把他送回家！”

“是，我这就去办。”经理部长泣不成声地回答。

干部战士在外边，要求看看政委的遗容，向政委最后告别。徐海东按照大别山人的风俗习惯，叫人端来一盆水，亲自给政委洗了脸，擦了身，让警卫员从马袋里拿来自己喜欢的一件青呢大衣，给政委穿上……

夜黑了。战士们还轮流守着政委。徐海东一夜没睡，泪水把眼睛都淹红了。

第二天，徐海东和省委、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抬着棺材，渡过泾河，把吴焕先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墓前仁立了许久，许久。

接着两天，徐海东只能喝点汤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吴焕先的形象就浮现在他跟前。一想到他，徐海东就禁不住落泪。他有生以来头一次这般伤心。他多次负伤，有几次重伤几乎危及生命，都没有掉泪；他的家族中几十人为革命献身，也只是暗自难过，只有吴焕先政委的牺牲，使他悲痛欲绝！

革命的征途还长着呐，长征的路还没有走到头，徐海东强忍悲痛，擦干泪水，率领红军继续向前走。

深山断粮 羊群从天而降

西北高原的秋风，刮遍荒山、野岭。山花谢了，树叶黄了，小草枯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陕甘边区的大华山里缓缓行进。

山路崎岖。队伍的步伐越走越慢。队列中没有笑语，没有歌声，时时发出的是抱怨声：

“这鬼山，看看不高，爬着真是累死人！”

“穷山，树没多少，人都死绝了！”

“……”

怨山，怨人，怨这怨那，都是因为肚子饥饿。三天前，各连通知开始吃自己背的干粮。可是，每人干粮袋里那半袋炒面，新兵和大肚汉一天就吃光了，就是会节省、饭量小的人，最多两天，干粮袋也抖空了。“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许多人已经是米面一天没沾牙了，荷枪负弹的战士们把裤带一紧再紧，有的人的皮带已扣到了最后一个眼。

先头部队正在行进中，突然从后边跑来四匹马，一匹白马，三匹枣红马。白马上坐的是徐海东，他带着一名警卫员，一名号官和一名侦察参谋，急急往前赶去，想找个大村庄，快些解决队伍的给养问题。战士饿着肚子行军，

当指挥官的心里比爹妈看着儿女挨饿还要难受。他们原打算三天穿过这个山区，可是走了三天还没有出山。山中人烟稀少，3000 多人的队伍找不到大村大户，很难搞到粮食。

山连着山。远看山不高，爬上去，曲曲弯弯硬是不见尽头。眼看山头与山头是相连的，但中间却隔着一条沟，从这边爬到那边就要多半天。太阳西斜，很快就要落山了。徐海东骑着马刚刚翻过一道山梁，走在前面的侦察参谋勒住马，扭回头惊喜他说：“报告首长，前边有人家了！”

徐海东抬头瞄瞄，什么也没看见，一簇簇小树丛挡住了视线。“你们听，有羊群叫唤！”侦察参谋侧着头说。

“真是羊群！”参谋又叫，“听！”

“真是的哩！”小号官也喊道。

徐海东因头部负过伤，一只耳朵不好使，他侧起另一只耳朵听听，可还是什么也没听到。他相信同志们的话，心头不禁一阵高兴，催马向前跑了一口气，只见一条沟的对面，徐徐冒出缕缕青烟。从望远镜中看去，山凹凹里散着一群羊，附近有几孔窑洞，烟就是从那里飘出的。再看看，山沟里有流水，只是不像有什么村庄。徐海东让侦察参谋去看看。

侦察参谋飞马而去，不一会儿跑回来报告说：窑洞里住的是看山人，羊群是羊贩子从山北贩来的，在这里歇脚吃饭，看来无粮可筹。

徐海东问：“有多少羊？”

侦察参谋回答：“说不准，总有二三百只吧。”

徐海东嘿嘿一乐，说：“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快去把羊都买下，今天吃羊肉。”随后又命令号官：“吹号，原地休息。”

队伍听到休息号，在山中停下来。战士们也真是饿得不行了，挖野菜，掘草根的，找着点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填。徐海东依着一棵树坐下来，摊开地图。他想从地图上看看自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可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这老地图连山的高度都没标出，只能大体判断出这儿是华山山脉。

这几个月，他们走的路，爬的山，记都记不清了。为了迎接党中央，部队东奔西走，就象迷路的孩子在找娘。党中央的行踪打听不到，他们才决定进陕北，找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没想到进了人烟稀少的深山野岭，怎么也走不出去了。如今真是马克思在天显灵，正找不到吃的，遇上这么一群羊，要是能买下来，连汤带肉足够同志们饱餐一顿。

“报告首长，”侦察参谋跑回来，垂头丧气地说，“羊贩子说，他们贩的是种羊、母羊，不肯卖。我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们还是说不卖……”

“别听他的。不卖也得卖！”徐海东一听火了，“分明是怕我们不给钱，你快传经理部长跑步上来。”

“那羊贩子像好人。”侦察参谋见首长发火了，急忙又说。

“好人？什么是好人！”徐海东打断参谋的话，“说句好话就是好人？你这个同志呀，耳朵太软，不能光听好听的，要想想我们这些人的肚子，肚子！”说着拍拍自己的肚皮。

侦察参谋是不久前刚从侦察员提升的，是个有名的快腿。侦察、送信、传情报跑起来像脚不沾地似的，只是心肠软。有一回，他和一个侦察员抓了两个“舌头”，一个俘虏走到半路，突然跪倒，鼻涕眼泪一齐流，口口声声说他是被抓的兵，家中还有八十岁的病危老母，恳求能回家和老娘见一面。这位参谋信以为真，就把那“孝子”放了。放后才从另一个“舌头”口中得

知，那家伙原来是一个杀害过红军伤病员的坏蛋。徐海东得知他放跑“孝子”的事情，常常取笑他心软得像块豆腐。如今这老弟当了参谋，还是不改心软的本性，全军都在饿肚子，可他拿钱都买不来吃的。

“给钱不卖，你就没办法了？”徐海东说，“嗨嗨，俗话说，奸商奸商，专欺老实人。今天他的羊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经理部长是管吃穿的，行军多走在队伍后面，这天为搞吃的，却赶到尖兵连来了。从首长命令，到经理部长到面前，也还得一二十分钟。徐海东心急，看看怀表，天也晚了，又向侦察参谋说：“快去！把那个羊贩子叫来，我和他谈判谈判。”

羊贩子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半老头，一身短打扮，毛巾包着脑袋。他满脸堆笑地走到徐海东面前，深深躬了下腰，没开口先掏出包烟：“长官请用烟！”

徐海东坐在地上仰脸一看，像是山里人，就对他说：

“我不会抽烟，只想吃你的羊肉啊！”

“好说，好说，我那边正煮着半只羊。”

徐海东说：“半只不够，你的羊我们统统吃了！”

“好说，好说。”羊贩子蹲在地上，不慌不忙他说他的羊为什么不卖。

“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徐海东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知道，知道。红军，是红军，那是天底下少见的好队伍！”羊贩子翘起拇指。

“你见过红军？”

“见过，见过。红军买卖公平，斗富济贫，好队伍，好队伍！”羊贩子不住嘴他说好听的。

徐海东好气又好笑，怪不得侦察参谋来回折腾，这个羊贩子的嘴像抹了油。他见过红军，知道红军讲政策有纪律，才这样嬉皮笑脸，分明是想讨个高价，所以才不轻易开口。

“我说老哥，”徐海东客气地称呼他，“话要和你说明白，我们行军断粮了，今天一定要买你的羊。红军是斗富济贫，可对奸商也不客气。”

“那是，那是。我是小本买卖人，有话好说，好说……”

“快说吧！”侦察参谋忍不住了，一旁插嘴道，“你的羊一共多少只，要什么价？”

“300多只。”羊贩子转动眼珠，报出价钱：“这样吧，我3块大洋一只买的。卖给红军嘛，还是原价……”

“什么？什么？”徐海东从地上跳起来，两眼瞪着羊贩子，“你听着，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只小羊能卖3块大洋？嘿嘿，嘿嘿！”

羊贩子忙改口道：“我是说大羊，小羊一块就卖……”

徐海东看见经理部长从队伍后面跑过来了。这是个放羊娃出身的干部，平日里盐多少钱一斤，油多少钱一两，脑子里非常清楚。徐海东指指经理部长对羊贩子说：“我这位老弟放过羊，最了解行情，你和他说去吧。”接着又转身对经理部长说：“把羊统统买下来，今晚吃顿羊肉！”

经理部长向羊群走去，羊贩子点头哈腰地跟在后面。

“吹号！”徐海东向身旁的号官一摆手：“命令各团团长跑步上来分羊肉！”

小号官一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直不起腰来，现在听到军长的命令，顿

时来了劲头。他操起军号，嗒嗒嘀嘀地吹了起来……

队伍中传着喜讯，满山遍野，到处是赶羊的吆喝声。各连队支起了行军灶，战士们把洋磁脸盆也拿出来烧开水。大家欢天喜地，忙乎着煮羊肉。

阵阵歌声，阵阵欢笑，这山起，那山落。入夜，山坳里到处散发着羊肉的香气和膻味。徐海东想到战士们不能只顾吃饱肚子，忙又传下命令：“所有的羊皮统统收好，一张也不准丢，留着做羊皮坎肩用。”

正在吃羊肉、喝羊肉汤的战士们，有的想到过，有的真没想到，一张张羊皮还能派个小用场呢！于是，队伍里很快就传开了：“军长命令，羊皮不准扔！”

“军长命令，羊皮一定要保存好！”

“……羊皮坎肩，暖和哩！”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山间的小路，战士们又踏上了征程。一顿羊肉、一夜好梦使每个人都变得精神十足，他们沿着弯弯的山路，翻过一座山梁，走向陕北红军根据地。

心急只嫌马儿慢 幸会毛泽东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

陕北流行“信天游”，从几岁的娃娃到年过半百的老人都爱唱。他们自编自唱心中的歌。一时流传着这样一首“信天游”：“一道道水来，

一道道山，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了队伍下了横山

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的村村镇镇，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人，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的学生。他和谢子长等领导的红军，生长、战斗在陕甘高原上。

徐海东率领的红军进入陕北后，当地的娃娃们很快唱开了一首新编的“信天游”：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拐枪，

对对喇叭对对号。

头号盒子坠着红绳绳，

军号吹得嘀嘀嗒。

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此后，徐海东换骑了一匹大红马，他和刘志丹并骑行军，并肩作战。他们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第110师两个团，打死了敌师长何立忠，俘虏3700多人。接着，红军攻克榆林桥，歼灭敌人1800多人。

这时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得到这个喜讯，徐海东高兴万分。这天，他带领队伍正在富县张村驿一带打仗，突然七匹快马飞奔到眼前，原来是通讯员从军团部驻地道佐铺送来程子华政委写的信。信上说：

今日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将来到军团部，望速回。

“快拉马！”徐海东看完信便大声吩咐。

那位外号“猴子”的小马倌，早已把马喂饱，备好马鞍，拴在屋外树下。他一听军团长发话，就把马牵了过来。徐海东手提马鞭，跃身跨上马背，鞭儿一晃，大红马昂首扬尾，四蹄生风，飞奔起来。

徐海东最喜欢好兵、快马。他常说：“战士，要打仗不怕死的；马，要能上刀山下火海的。”每次打过胜仗，徐海东就让部队从俘虏中选出一些出身苦、会打仗的人，动员他们参加红军。徐海东还经常亲自从缴获的战马中，挑出一些身躯壮实的马，补充到骑兵排。有人说：徐海东有一双象伯乐那样能识千里马的慧眼，只要他看中的马，只有跑死才停蹄。他每天手不离马鞭，一跨上他的战马，那马儿就奋蹄飞奔。

在大别山区，徐海东骑过大红马、大黑马，长征路上，他换了一匹大白马。警卫员开始都不喜欢那白马，因为白马目标太突出，战场上不好隐蔽。徐海东见那匹马毛白蹄亮，昂首紧身，跑得又快，坚持要它。他说：“不管黑马、白马，跑得快的就是好马！”

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流了很多血，昏睡好几天，伤口还没痊愈，他又跨上了大白马。

一年多来，他和红25军的同志们转战在河南、陕南和甘肃等地区，象娃娃找娘似的，到处打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哪个地方。

他们一直积极作战，打到西安城附近。此后，又西进甘肃，北渡渭水，在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两侧转战了18天。天天盼，夜夜想，也没能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吴焕先政委在径水河畔牺牲前，还念念不忘迎接党中央。如今，他们盼望已久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终于来到陕北了。

徐海东心急火燎，一心想快点赶到驻地，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不管马儿跑得多快，徐海东还是不停地摇着鞭子催促它。那马儿好象懂得徐海东的心思似的，一会儿狂奔，一会儿小跑。被甩在后头的骑兵通讯员、警卫员，只好不停地抽打他们的马。

从前线到军团部驻地，相距135里，当中要翻过一条山脊，他们只花了三个钟头，就回到了军团部。徐海东进村下了马，这才发觉战马浑身流汗，像雨淋过水洗过似的。他自己也汗流浹背，湿透了衣衫。

他在屋里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来了。徐海东不认识毛泽东，也不认识彭德怀。程子华以前在中央红军工作过，他们互相认识，正要一一作介绍，毛泽东已紧紧握住了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这才认定，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人，就是毛泽东主席啊！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还是毛主席辛苦！”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同志，确是历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一年多来，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跨越十一个省，强渡大渡河，飞夺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忍饥挨饿，顶寒冒暑，战胜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好不容易才征战到陕北。眼下已是初冬天气，可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还穿着单军装，衣服上补丁加补丁。

早在大别山区，徐海东就听说，井冈山那边有朱德和毛泽东。后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更使他敬仰。在交谈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还在长征路上。

毛泽东和彭德怀关心当时的战局。他们取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

图，一边看，一边听徐海东汇报。

初次相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对他一见如故。他们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作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谦虚地说：

“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彭德怀说：“我们都是‘粗人’嘛！”

徐海东不信彭德怀也是个“粗人”。

警卫人员端上饭来，大家很不习惯地蹲坐在炕上，边吃边聊。毛泽东说话风趣，彭德怀笑声豪放，使徐海东感到亲切。吃完饭，谈完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起身要回中央驻地，徐海东也急着返回前线。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照你的部署，先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我这就回前方去。”

毛泽东问：“你那边有电台吗？”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指挥打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哪里弄得到电台。他说：“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

毛泽东说：“给你一部电台，我们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啊！”

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听着，都笑了。

“不要你自己动手嘛。”毛泽东说，“电台有报务人员，他们会使用。”

徐海东嘿嘿地笑了。这个窑匠出身的“粗人”，他没想到这下真是“鸟枪换炮”了。打了这些年的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党中央一来，给配备电台了。他想：好！回前方打个胜仗，就用这电台给中央发个捷报！

天晚夜黑，徐海东冒着凉风，骑上他的战马回前方。马儿也习惯了，只要徐海东一上背，就竖起两只耳朵跑开了。徐海东这时的心情，比来时还急。他想快点回到部队，把见到毛主席和彭司令员的喜讯告诉同志们。

奔驰中的战马，象一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又把警卫员、通讯员甩在后头了。

第二大拂晓，部队攻占了张村驿。战斗结束，毛主席派给徐海东的电台人员来到了指挥所。他们架好天线，支起手摇马达，把耳机递给首长，要他亲自听听。徐海东戴上耳机，听到嘀嘀嗒嗒的悦耳声音。他不懂这玩艺怎么会通话，孩子似的感到新鲜，笑着说：

“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一阵嘀嘀嗒嗒的声音，战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发出的电报！

文韬武略黄大将 苏北、东北展雄才

窦孝鹏

黄克诚（1902～1986）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湖南省永兴县人。早年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营政治教导员、团政治教官等职，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参加了湘南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第35团团团长，农军第二路游击司令，红3军第4师政治委员，红5军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军委卫生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第115师第344旅政治委员兼太南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冀鲁豫军政委员会书记，八路军第4纵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治委员。中共苏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天津市军管会主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和彭德怀元帅一起被错定为“反党集团”成员。1977年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1982年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黄克诚大将是我军著名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他审时度势，具有战略眼光，文韬武略，样样拿得起；性格坦直，无私无畏。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的威望，同志们都尊称他为“黄老”，连年长他9岁的毛泽东主席也叫他“黄老”。这里记叙的是他开辟、建设苏北根据地和进军、建设东北根据地的军旅生涯片断。

奉命南下

1940年4月，担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奉中央军委命令，率部离开太行山，越平汉路东进南下，来到冀鲁豫地区，奉命组建了冀鲁豫军区和军政委员会。上级任命黄克诚兼任军区司令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

第2纵队原司令员左权同志奉调回八路军总部工作，上级任命杨得志代理司令员，韩振纪为参谋长，下面共指挥4个旅，其阵容为：

第344旅旅长刘震，政治委员康志强。

新1旅旅长韦杰，政治委员唐天际。

新2旅旅长田守尧，政治委员吴信泉。

新3旅旅长韩先楚，政治委员谭甫仁。

全纵队共2万余人。部队全面展开以后，黄克诚感到，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一地，不利于今后的发展。他根据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精神，经过认真考虑，向中央和总部提出建议：将第2纵队分成两摊子，一部分留冀鲁豫坚持斗争，一部分南越陇海路，向华中发展。

黄克诚的建议，很快得到上级领导的赞同。中央电令杨得志留冀鲁豫，黄克诚率主力南下华中。中央在电报中强调：“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

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发生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不入中原。故华中是我重要的生命线。”电报进一步指出了发展华中的重要性，使黄克诚感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

6月下旬，黄克诚率领第344旅和新第2旅到达豫皖苏边区的新兴集，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会合。根据中央电令，两支部队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纵队司令员，黄克诚任纵队政委，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

新兴集是皖北涡阳县北边的一个镇子，北临河南省永城县地界。黄克诚到这里不久，即连续接到中原局（1941年5月改为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的4次来电，要他率部分部队过津浦路东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经过与彭雪枫的协商，又请示了毛泽东主席后，黄克诚于8月上旬率3个多团的兵力到达皖东北地区；8月中旬，他来到中原局驻地江苏省盱眙县的莲塘，与刘少奇同志会面。

两人见面，亲密地畅谈了两天两夜，从当前的国内形势，谈到目前皖东北和苏北的情况；从今后的任务谈到部队的整编。刘少奇告诉黄克诚：现在皖东北地区有好几支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活动——有张爱萍组建的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由张爱萍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有由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第685团主力改编而成的苏鲁豫支队，由彭明治任支队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由钟辉、韦国清、孙象涵、李浩然等领导的山东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也到达皖东北，建立了游击根据地；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江华也从山东带来一批干部和部队到达皖东北。由于这几支部队没有形成统一的指挥领导系统，彼此谁也指挥不了谁。后来，刘瑞龙在皖北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军政委员会，但号令仍不行于军队。为此，刘少奇于6月份曾给中央发电报说：“我在皖东北之部队，系统指挥不统一，内外部情况均复杂，请中央及朱、彭令黄克诚同志速来苏皖地区统一指挥，任军区司令，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否则不能完成任务。”

这便是刘少奇急催黄克诚速来皖苏地区的主要原因。

刘少奇与黄克诚经过研究，遵照中央的指示，确定将淮河以北、津浦路以东所有我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5纵队下辖3个支队，每个支队辖3个大队（团），共2万余人。

第1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委朱涤新，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2支队司令员田守尧，政委吴信泉，副司令员常玉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

第3支队司令员张爱萍，政委韦国清，副司令员孙象涵，参谋长杨志雅，政治部主任张震球。

这样，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黄克诚的职务已变化了四次之多：八路军第2纵队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八路军第4纵队政委——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这变化说明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也说明了中央军委对黄克诚同志的器重。

会师白驹镇

第5纵队的整编工作结束以后，黄克诚便开始部署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刘少奇告诉他：苏北这块地方虽然不大，但它却扼守于国民党及敌伪统治下的南京、上海的近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党中央指示：“八路军

到华中以后，要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中央也指示江南的新四军要渡江北上，但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不执行中央的指示，要留在皖南。陈毅和粟裕坚持执行中央指示，已渡江北上，进入黄桥地区，但力量却有限，且时时受到敌伪势力的进逼。我们如果能迅速控制苏北地区，就为接应江甫的新四军北上，创造一块可靠的后方根据地。

经过研究，黄克诚除留第2支队的一部坚持皖东北斗争外，其余部队迅速挺进苏北各地——第1支队重点深入淮海地区，第3支队进入临近陇海铁路的宿迁、沐阳一带开辟工作。黄克诚率纵队部和一个团于9月中旬进入淮海区。

苏北地处陇海路以南，大运河以东，黄海海岸以西，包括淮海、盐阜两个地区。日本侵略者占领这里后，即控制了水陆交通要道，北起徐州、南到扬州的大运河沿线各城镇、陇海路东段各城镇直至连云港等港口，均沦落日军之手。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是国民党的统治区，并建有县、区、乡、保等各级政权。

统治这里的土皇帝是江苏省主席兼国民党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提起此人，黄克诚大熟悉了：他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顾祝同的大将，是个出名的反共顽固分子。早在1931年下半年，当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时，时任国民党第52师师长的韩德勤，就率部充当了进攻红军的急先锋。时任红3军团红3师政治委员的黄克诚，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带领部队与韩德勤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结果敌第52师全部被歼，连韩德勤也当了红军的俘虏。那时我们的俘虏政策是：愿意留下的欢迎，不愿留下的发给路费放走，结果狡猾的韩德勤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堆里被放走了。此番韩德勤拥兵苏北，不思抗日，却积极反共，千方百计要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被人们称为“磨擦专家”。

10月1日，韩德勤指挥部队向驻守于黄桥地区的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发动了进攻。

黄桥是位于江北泰兴县与如皋县之间的一个大镇子。此地的烧饼酥软香甜，远近闻名。陈毅、粟裕在此地的兵力此时不过7000人左右，而战斗人员不满5000，枪支只有4000多。对方的兵力却达6万人之多，是我方的10倍。为了反击敌人的进攻，陈毅急电黄克诚，请他率部驰援。

黄克诚回电：即刻出发。

10月4日，中央也向黄克诚发出指示，叫他南下阜宁，并向盐城挺进，以增援陈毅。指示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

遵照中央指示和陈毅的电令，黄克诚于10月4日率八路军第5纵队主力兼程南下。他们犹如一股疾风，一路突破顽敌的盐河、旧黄河等防线，连克佃湖、东沟、益林、阜宁、东坎、建阳、湖垛、苏家嘴等城镇，直下盐城。沿途歼灭了顽军第10常备旅和独立第3旅等部，切断了韩德勤的归路，动摇其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对韩德勤造成南北两面作战之势。

进攻陈、粟的顽军，10月3日进抵黄桥外围。4日，顽第33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顽第117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之线进攻黄桥；顽独立第6旅经高桥从北面进攻黄桥。新四军的3个纵队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巧布奇兵，以第1、第2两个纵队埋伏于高桥至黄桥之间，待机出击；以第3纵队在正面阻击进攻之敌。4日下午，当韩德勤的主力独立第6旅由高桥逼近黄

桥时，我第1纵队从埋伏的两侧突然出击，将敌第6旅切成数段，分割包围，经3小时的激战，全歼该敌。尔后由八字桥与黄桥之间南下。与此同时，我第2纵队经八字桥直插分界，切断了进攻黄桥之敌的退路；这时，第3纵队也由黄桥正面出击。至此，我新四军的3个纵队将敌第33师及第89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接着，第1、第2两个纵队向敌第33师发起夹击，歼其主力于小二房；尔后围攻敌第89军军部和第349旅。战至6日晨，顽军大部被歼。与此同时，增援敌第33师的顽军预备队，也在营溪遭我阻击，被歼大半，残部向海安溃退而去，我军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海安县城。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只得收拾残部，逃回他的大本营兴化。至10月8日，黄桥战役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10月10日，南下驰援的八路军第5纵队与北上的新四军部队，在东台县的白驹镇会师了。秋风飒飒，战旗猎猎，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士们拥抱在一起，激动得热泪盈眶。

打了胜仗的陈毅特别高兴，特地从海安乘汽艇，沿串场河北上盐城，并带着刚从桂林转移到这里的新安旅行团，慰问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指战员；黄克诚也急忙从阜宁县的东沟南下，赶到盐城相迎。

这是他们两人从江西中央苏区分手后的第一次会见。那时黄克诚参加了长征，陈毅留在了赣南，经过无数枪林弹雨、九死一生后的这次相逢，使两人分外激动，分外亲热。他们在盐城相聚几天，阔叙别情，感慨万端。陈毅当即赋诗一首，云：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黄桥战役的胜利和两军的会师，意义重大，它打通了华北、华中联系的通道，打开了苏北抗战的局面，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把我军限死在黄河以北的阴谋。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黄克诚回到阜宁第5纵队司令部后，立即给刘少奇同志发了电报，请他进驻盐城。10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机关到达阜宁，随即进驻盐城。

11月，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叶挺、陈毅分别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这里的新四军、八路军的一切军事行动。11月中旬，陈毅率总指挥部机关，亦移驻盐城。

盐城遂成为我华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中心。

当时，中共中央对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提出的总方针是：“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应由陈毅、黄克诚部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由黄克诚部发展阜宁、淮安、盐城以北地区，陈毅部发展泰县、如皋及其以东地区。不仅扩大主力，并且应努力与地方党共同建立无数小游击队，建立政权，把这些地区抗日民主化。”

遵照中央的指示，在中原局的领导下，黄克诚在苏北农村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和游击小分队，扩大抗日武装，清剿匪特，打击顽军的“摩擦”进攻，粉碎日寇的“扫荡”，使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迅速地开展起来。

但是，一场“皖南事变”，却使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到严重的损失。

“皖南事变”以后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及部队近万人，遭到8万多国民党军队的围歼。除少数部队突出重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实力政委，党的领导人）、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负伤后自杀。如此惨重的损失，是红军改编八路军、新四军后从未遇到过的。

早在事变发生的半年前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就电令项英等及早渡江北上，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遵命率部到了江北，但项英却迟迟不动。直到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等调兵遣将，布好埋伏，处心积虑地要对新四军动手了，项英才挥军北移，钻进国民党反动军队设好的“口袋”之中，致使近万名新四军健儿惨遭毒手，实在令人痛心。

“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华中后，引起新四军、八路军全体指战员的无比愤慨。黄克诚更是悲愤万分。他为近万名战友的死难而悲痛，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愤怒异常。人们通过镜片可以看到，他的两只眼睛似乎已被怒火烧红了。

1月25日，由黄克诚领头，以华中八路军将领18人的名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发电报严厉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卖国罪行；并建议我党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电文如下：

江南新四军遵令北移，惨遭当局下令围歼。消息传来，全军震愤！此次惨变，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反共顽固派有计划地制造内战，实行卖国罪行之开端。阴谋家不仅欲置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于死地，且欲将全国一切抗日军民一并出卖，以求得他随时向敌人作投降之勾当。阴谋险恶，罪恶滔天！民族生存危如垒卵，克诚等为国家生存、民族解放计，特提出下列七项建议，请鉴核示遵：

- （一）迅速撤回八路军、新四军在大后方各地之办事处。
- （二）撤回我党在国民参政会之参政员。
- （三）调必要的武装加强陕甘宁边区，保卫陕甘宁边区。
- （四）我全党全军应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事变的继续发展。
- （五）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回大后方去肃清内奸。
- （六）联合抗日党派及军队，准备成立新中央政府来坚持抗战大业。
- （七）立即布置全国性的清除年好的计划。

克诚等谨率全华中八路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誓在我党中央领导之下奋斗到底。

临电悲愤，立候明令。

电文的字字句句，渗透着黄克诚等同志对时局的关心和思考，渗透着他们誓在党中央领导下战斗到底的决心。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中共中央就向全党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我党组织开展反对顽固派破坏抗战的斗争，兴起一个声讨顽固派的群众运动。

接着，中央军委发布了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1月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苏北

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7个师、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其阵容为：

- 第1师，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炎，驻苏中地区；
- 第2师，师长张云逸兼，政治委员郑位三，驻淮南地区；
- 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驻苏北、皖东北地区；
- 第4师，师长兼政委彭雪枫，驻豫皖苏边区及淮北；
- 第5师，师长兼政委李先念，驻鄂豫边桐柏山区；
- 第6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驻苏南地区；
- 第7师，师长张鼎丞，政治委员曾希圣，驻皖中、皖南地区；
- 独立旅，旅长梁兴初，政治委员罗华生，活动于皖东北一带。

黄克诚领导的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的同时，原第5纵队的第1、2、3支队，也依次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的第7、8、9旅。上级任命彭雄为新四军第3师的参谋长，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新四军第3师兼苏皖军区，9月以后，又改兼苏北军区。黄克诚也同时兼任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军区下辖淮海、盐阜两个军分区。与此相对应，苏北地区组建了淮海、盐阜两个地委，地委书记也都由部队的同志兼任。

此时，黄克诚一肩挑起了领导苏北地区党政军民抗击敌伪和建设根据地的重担，他决心竭尽全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尽快使这一地区“抗日民主化”，成为我党的“红色区域”。

建设苏北根据地

开辟、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千头万绪，黄克诚首先从选派干部，发动群众，建立县、区、乡村政权，打击地主土匪，进行减租减息，组织生产自救，安定民心等工作抓起。他日以继夜，又是开会布置工作，又是下乡村搞调查研究，忙得身不挨家。

在阜宁县召开的一次绅士座谈会上，有人提出了抢修海堤、治理海啸的问题。原来盐阜地区东靠大海，有几十公里长的海岸线，每年夏秋季节海啸经常漫上陆地，为害百姓。海啸一来，房倒屋塌，人亡畜伤，难民遍地。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曾迫于当地绅士和老百姓的呼声，勉强拨了一点经费兴修海堤，但各级官员层层克扣，偷工减料，凑合修的一道矮堤，一次就被海啸冲垮了。

目睹沿海人民背井离乡，苦不堪言的惨状，黄克诚决心修起一道坚固的堤坝，防御海啸，造福群众。他向阜宁县县长宋乃德交待说：“这是一件关系到民生的大事，再困难也要修。这会使群众了解共产党和他们是一条心，是为他们办事的。我们把这事要看作不仅仅是修一道堤，而是筑起人民军队、人民政府联结广大群众的一条坚固的纽带。”

为了解决修堤的经费问题，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他们发行了100万元的筑堤公债，并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了上万民工，加上部队的一部分兵力，军民一齐上阵，在海滩展开大战。以宋乃德县长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还专门聘请了工程技术人员江擎宇为总工程师，进行现场指导。

坝堤在一天天的增高，沿岸人民欢欣鼓舞，但敌人却使出各种手段来破坏。

有一天，八滩公粮管理局局长陈景石的屋里来了20个穿军装的人，声称

他们是新四军，是来协助施工的，要陈局长为他们准备饭。结果把陈景石骗到二里路外的一个无人处，开枪杀害了。

原来这是一伙十分凶恶的匪特，想以此手段来破坏人民群众与新四军的关系。黄克诚闻讯，一面派部队去追剿这伙匪特，一面赶到工地，和民工们一起铲土筑堤，稳定大家的情绪。

很快，长 54 里、底宽 18 米、顶宽 2.5 米、高 3 米的北堤修成了。接着，大家一鼓作气又开始了南堤的修筑。

又在南堤快要竣工时，不甘心失败的敌特又伸出了黑手：他们偷偷绑架了一直在海边领导修堤的区长李正东，凶残地砍去他的两只腿，把他抛入了海中。

消息传来，黄克诚万分震怒。他一拳砸在桌子上，狠狠地说：“一定要彻底消灭匪特，为李区长等烈士报仇！”

1941 年 7 月底，全长 90 华里的南北长堤终于修成。就在海堤竣工的第二天，又遭到狂暴的海啸的袭击。尽管这次海啸比往常高出近一尺，但新修的大堤却巍然不动，成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道屏障。

群众从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才真正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就连一些曾有抵触情绪的乡绅们也改变了看法，开始向人民政权靠拢。

当地的群众提出：为了感谢共产党、新四军的恩德，把这条堤命名为“宋公堤”，以表彰带领他们修堤的“修堤委员会”主任宋乃德县长。在他们看来，宋县长是共产党员，即代表政府，又代表共产党、新四军，以他的姓命名最合适。宋乃德却一再恳切推辞。黄克诚拍着他的肩膀说：“这是群众对你的嘉奖啊！我们只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为了使广大农民能休养生息，在经济上得以缓解，黄克诚根据上级的布置，在根据地内开展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的运动。在当时土地改革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这是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的一个好方法。

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时，有些群众心有疑虑，再加上受地主恶霸的威胁，有的白天减了，晚上又偷偷送了回去，形成了明减暗不减的局面。黄克诚了解情况后，便派出一些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干部下去进行纠正。他们加强宣传教育的力量，派工作队和文艺宣传队下乡，通过各种方式来打消群众的顾虑。当时宣传队演出了一出话剧叫《照减不误》，群众看了很受教育，认清了翻身求解放的道理，使减租减息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与此同时，他领导群众开展了勤俭节约和大生产运动。他看到师部附近有一户老乡，因无牲口种地，非常着急，就命自己的马夫牵着枣红马去帮老乡把地种上。老乡过意不去，说：“黄师长没马骑怎么行？”黄克诚说：“农时不可违，先把地种上要紧。”驻地有位朱姓人家，夫妇患病，靠 15 岁的儿子卖油条维生。黄克诚便从自己的生活费中拿出 3 块钱给他们作本钱，帮他们渡过了难关。贫苦农民出身的黄克诚不但能打仗，劳动生产更是内行。他不但指挥全地区广大军民开展生产节约运动，而且亲自开荒种地，有时去开会的路上也要背上一个拣粪筐，他种的西红柿又大又圆，分外惹人喜爱。指战员们都在议论：“我们的黄老头真是多面手！”

苏北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我军到这里后，国民党顽固派更是利用土顽、匪特纷起作乱。他们互相勾结，打砸抗日政府，杀害我方干部，抢劫残害群众，欺压平民百姓，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为了保卫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主政府，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从 1941 年上半年开始，黄克诚下

决心抽调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清剿镇压土匪顽劣，为民除害。

这是9月的一天。黄克诚师长及新任副师长张爱萍和参谋长彭雄，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敌顽据点上——郑潭口。

郑潭口位于阜宁县西北、涟水县东北部，距涟水县城60里，处在一帆河与完蛮河交叉的河湾里。这个镇子虽然不大，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盐阜区和淮海区两个根据地联系的纽带，也是控制日伪大新集、新安镇及五港等据点的咽喉，为兵家必争之地。

郑潭口驻扎着恶霸地主孔礼清、王士珍和叛徒徐锦同的部队800多人，有900多支长短枪，还有少量轻重机枪。这伙土顽匪特经常配合日寇进行扫荡、清乡，扩大伪化区，残害蹂躏周围群众，对我军执行任务威胁极大。于是，黄克诚、张爱萍决定：拔掉这个钉子！

但是，要拔掉这个钉子谈何容易！

敌人把这个镇子建成了一个据点，据点东西宽300余米，南北长500多米，四周是6米多高的围墙，南、北、西三面还建有两米厚的夹壁墙，夹墙内可行人，有对内对外的射击孔。在墙下面还筑有地道，地道与90多个地堡、暗碉和炮楼相连接。镇内有6个炮楼，还有一个12米高的用水泥筑成的中心炮楼。围墙外建有4道防线，最外面的是一道鹿寨，东边的一帆河更是一道天然防线。所以伪军吹嘘说：郑潭口是“攻不破的铁镇”。日本人也称之为“模范工事”。

郑潭口据点除驻有800多名土顽外，在其西北6里的大新集还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300多名伪军；在其西南部的五港和新安镇也驻有日军，可随时增援。故在敌人眼里，郑潭口简直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了。

经过考虑，黄克诚把攻打郑潭口据点的任务交给了第8旅第22团去完成。28岁的团长张天云（以后曾任总后勤部副部长）立即来领受任务。黄克诚看着这位虎将叮嘱他：“这可是个硬仗啊！为此，把师炮兵营调给你们，涟水县大队也配合你们行动。”

张团长信心十足地表示：“保证完成任务！”

暮色中，第22团悄悄进入战斗位置，完成了对郑潭口的包围。他们的战斗方案是：由担任主攻的第3营打下东南角炮楼，消灭两面夹墙的敌人后，再进攻敌人的中心炮楼。第2营从东北角进攻，突破外围后，消灭围墙外炮楼和北面夹墙中的敌人。第1营和特务连及涟水县大队担任阻敌增援的任务，师炮兵营的任务是击毁敌堡垒和炮楼。

晚上7点钟，张团长一声令下，第3营营长郭本炎带领第9连，用4辆木轮车蒙上七八层湿淋淋的棉被叠成的“土坦克”开路，一边冲锋，一边射击，冲垮了鹿寨、土圩，迅速把东南角炮楼和两侧的地堡拿了下来，顺利控制了东南角一带。第2营营长何文清带领第5连，一举歼灭了镇子北面炮楼的敌人；教导员尹培良率第6连猛攻镇子的东北角，经过七次冲锋，通过五道封锁线，毙伤敌人80多名，终于攻克了东北角炮楼。这时，预备队的两个连队也投入了战斗，他们在夹墙中同敌人拼开了刺刀，逐段、逐墙地进行争夺。经过一整夜的战斗，东方露出鱼肚白时，第22团完全占领了所有夹墙和四角的炮楼。

这时，敌人凭借坚固的中心炮楼，负隅顽抗，以猛烈的火力阻我前进，企图固守待援。副团长童世民带领战士们反复冲锋，均未奏效，他本人和20多位同志都负了伤。

团长张天云重新进行部署，他从各连调来优秀射手，组成神枪队，压制敌人的火力，掩护第11连向中心炮楼突进。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抬着云梯向前冲锋。他们把云梯一次次架上炮楼，却一次次被敌人推倒。战斗一直对峙了三个小时，中心炮楼还未拿下。

在这紧急关头，师参谋长彭雄和张团长经过冷静思考，决定抽出精悍的战士组成奋勇队，在干部的带领下从东北角中心炮楼的地下挖地道，给它来个中心开花。

在地面火力的掩护下，地道慢慢进入到中心炮楼的底下。一声爆炸，震天动地！

顽固的中心炮楼终于被拿下。

汉奸大队长王士珍开枪自杀，其余全部交枪投降。此役我军毙伤敌伪官兵300多人，俘虏伪支队长徐锦同以下500余人。

当郑潭口战斗打响后，附近的日伪军增派部队来增援，但均被我第1营击退。后来，他们看到大势已去，郑潭口难保，便灰溜溜地来了个向后转逃走了。

就这样，为害苏北地区多年的匪患被平息了，人民群众得以安生，抗日政权得以巩固。

在开辟和建设苏北根据地的过程中，黄克诚在剿灭土匪的同时，广泛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亲自上门拜访，向一些开明士绅和知识分子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知名人士进行接触，发挥他们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当地颇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如前清举人庞友兰、曾任北洋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的杨芷江、教育界颇有名望的宋泽夫以及韩紫石、计雨亭、李明扬等，在我党政策的感召下，为抗日救亡活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盐城县参议长、著名教育家宋泽夫被日寇捕去后，面对敌人的淫威，大义凛然，手指敌酋痛骂不休，在狱中不食敌人送来的一粒米、一口水，宁死不屈，表现了很高的民族气节。杨芷江老先生曾做过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黄克诚邀请他参加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后，他非常感动，逢人便讲：“黄克诚师长不愧为共产党的将才，他胆识过人，能团结朋友，在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民族的希望。”当日伪军对苏北地区进行大“扫荡”时，杨老先生大义灭亲，为掩护我党我军的干部做出了重要贡献。计雨亭先生在一次参议会上，看到抗日政府经费困难，当场捐献10万元支持抗战，并动员自己的儿子带领10多名青年参加了新四军。

当时，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钱杏邨（阿英）、沈其震、薛暮桥、贺绿汀等，也纷纷来到苏北，参加抗日工作。黄克诚总是热忱欢迎他们，保护他们，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这样，不仅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化工作，而且也为我党保护、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文化战士。1942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从上海辗转来到苏北后，黄克诚像老朋友一样的同他亲切交谈，并专门为他召开欢迎会，安排有关部门为他治病，照料他的生活，为他的工作提供方便。1943年日寇开始大“扫荡”前，黄克诚亲自安排师部特务营将邹先生等护送到安全地点。邹韬奋先生曾动情地说：“我遇到许多老革命家，黄克诚的朴实诚恳、平易近人，给我印象极深。我病愈后，一定要大书特书黄克诚的忠诚、忠厚。”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应付敌后斗争的各种严重情况，积蓄力量，

发展壮大自己，苏北从1942年11月起，实行了精兵简政、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以及一元化领导等措施。为统一全苏北地区的党政军的领导，经上级批准，成立了苏北区党委，归华中局领导。由黄克诚任区党委书记，金明任副书记（后改为李一氓），金明同时兼任淮海地委书记，区党委委员向明任盐阜地委书记（反“扫荡”期间，为便于统一指挥，盐阜地委书记曾由张爱萍兼任）。对领导机关作了最大限度的精简，使基层部队得到了充实。

鉴于地方部队成分比较复杂，纪律也比较松弛，干部缺乏带兵和指挥部队作战的经验，新四军第3师在实行主力地方化的过程中，先后将4个主力团分散编入地方部队，使地方部队大大充实了骨干力量，加速了地方部队的主力化。地方部队升级为主力部队后，又重新组建起新的地方部队。这样，主力部队地方化和地方部队主力化滚动发展的结果，不仅巩固了地方政权，加速了地方建设，同时也使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都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淮海军分区的两个主力团地方化以后，在群众中生根立足，发展很快，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两个团发展成了6个团，由原来的3200人扩大到1.5万人，主力部队成倍的扩大了。

不搞“抢救运动”

1942年1月，中共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奉调回延安工作。中央决定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饶漱石，50年代初与高岗联合，进行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1955年被开除出党）。饶漱石为独揽华中党政军大权，采取很不正派的手段，不久就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排挤走了。陈毅离开华中后，饶漱石仍在各种会议上散布陈毅如何如何，以标榜自己的正确。黄克诚对他这种作风很看不惯，决心大胆为陈毅同志辩白。在一次华中局扩大会议上，饶漱石又借机对陈毅同志进行诋毁，正直无私的黄克诚再也坐不住了，他针锋相对地发言说：“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军队一位有影响的老同志，他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有很大贡献。陈毅同志离开华中，是华中工作的一大损失，对整个华中工作及对敌斗争，都很不利。我们都为此感到痛心！你无论如何不该把陈毅同志挤走！”

饶漱石没想到黄克诚竟敢这样面对面地、不留情面地批评他，感到脸上火辣辣的难受。黄克诚却不管这一套，继续仗义执言：

“同志间合作共事，彼此发生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据我所知，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一起工作多年，彼此也有过不同意见和分歧，但他们始终团结合作得很好，为全党全军树立了榜样。你刚来不久，就把陈毅同志挤走，实在不应该。陈毅同志走后，你继续讲他的一些不是，这不仅不利于工作，也会在下面造成不好的影响，这种做法，很不光明磊落，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黄克诚襟怀坦白的发言，刺得饶漱石如坐针毡，但他面对这位老党员有理有节的批评，却提不出反驳的意见来。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42年6月，苏北根据地开展了整风学习运动。黄克诚正确掌握党的政策，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采取和风细雨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帮助干部提高政治觉悟。通过整风，团结教育了广大干部，调动了大家的革命积极性，党政军民形成了空前团结的局面。

1943年夏，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饶漱石在会上布置，各单位要开展“抢救运动”。

所谓“抢救运动”，是因为党中央在整风过程中发现国民党顽固派和日

伪特务打入延安等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为了打击敌人，纯洁干部队伍，中共中央决定结合整风对干部队伍进行审查。但是，这个工作却受到了康生等人的干扰。1943年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作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夸大敌情，借机发动了错误的“抢救运动”，迫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诬陷、株连了许多好同志。

听了这个布置以后，黄克诚心里很不平静，感到有点像在中央苏区时打“AB团”的样子。

“AB团”是当时国民党在江西省的反动秘密组织。“AB”系英文Anti—Bolshevik（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中央苏区搞打“AB团”的肃反运动时，不断升级，严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沉痛教训。

想到这里，黄克诚便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建议：华中不要搞“抢救运动”了，以避免发生逼供信，伤害无辜同志。他特别提出，我们应该接受中央苏区打“AB团”的教训。

但“抢救运动”是中央在康生的主持下布置下来的，不允许不执行，而且要求各单位立即开展起来。

从华中局开完会回来，黄克诚心里极为矛盾。眼下大敌当前，根据地军民正在与敌伪顽进行浴血奋战，在这种情况下搞“抢救运动”，弄不好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害。假若铺开摊子，一搞扩大化，局面就更不可收拾。但既是中央的指示，作为下级组织不能不动。

为了稳妥起见，黄克诚先在第7旅小范围内搞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试点。他亲自考察，掌握动向。他发现被“抢救”的几个人在硬逼的情况下表现很不正常，后来一审讯，有的人就乱供一气，简直不着边际。黄克诚一见，立即下令第7旅停止搞“抢救”，把被“抢救”的人统统释放，做好善后工作。

这时，黄克诚心里反而踏实了。他从第7旅回到机关后，立即以苏北区党委书记和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的身份，分别通知苏北各地委和第3师各部队：一律不开展“抢救运动”。如果发生可疑情况，可按正常工作程序，由主管部门处理。在整个整风运动中，只搞正面教育，提倡主动反省，不准逼供、诱供。

在做这些决定的同时，黄克诚心里已打定了主意：假若因此上级领导怪罪下来，我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就因为这些事情，有些人曾给黄克诚扣上“右倾”的帽子。但一向遵从实事求是原则的黄克诚问心无愧，只一笑置之。过了一段时间，华中局召开汇报会。会议期间黄克诚同第7师政委曾希圣住在一起，他们是老相识了，见面几乎无话不谈。可是这次黄克诚发现曾希圣情绪有些不正常，成天闷闷不乐的，很少讲话，就问：

“老曾，你心里有什么事吧？”

“没有……”曾希圣摇摇头。

“你就不要瞒我了。说出来我也好给你出出主意嘛！”见黄克诚再三追问，曾希圣叹了一口气说：

“怎么说呢……我爱人……”

“你爱人怎么啦？”黄克诚知道他爱人是上海来的大学生。“她可能是特务……”曾希圣说得非常艰难。

黄克诚一听吃了一惊。忙问：

“你自己相信吗？”

“唉，人证、供词都有，不相信有什么办法！”

“是什么人供出来的？”

“是第2师政治部一个女干部。她和我爱人在上海上学时是同学，说她们是一起参加的特务组织……”

黄克诚感到这件事靠不住，弄不好是逼供出来的。就对曾希圣说：

“你别急。你不好出面，我给你调查调查，把事情弄清楚。”下来后，黄克诚就通过第2师政委谭震林，把第2师政治部那位女干部找来进行单独谈话。

黄克诚看着这位20多岁的年轻女干部，问她：“你们是怎么加入特务组织的？”

女干部很熟练的讲了一遍，有名有姓，有时间有地点，越听越像真的。

黄克诚又问：“你们都搞了哪些特务活动？”

女干部又绘声绘色地讲了一大套，过程说得神乎其神，不由你不信。

黄克诚最后问她：“你说的这些，是不是真话！”

“千真万确，绝对没有错！”女干部回答得很干脆。

看着她年轻的面孔，黄克诚感到心情很沉重。他耐心地开导她：

“我们党是讲究实事求是的。你不要有顾虑，要对组织讲真话，不能有半点虚假。否则，既对革命事业不利，又害了自己和同志

“哇——”那位女干部看着这位温厚的首长，突然放声大哭起来。她委屈地哭了好一会，才啜泣着说：“首长，我上面说的这些，都是编造的假话……”

“那么，你为什么要说假话呢？”黄克诚问。

“运动刚开始时，我说的是真话，可人家不相信呀！硬要对我进行‘抢救’，结果大会斗，小会批，我被整得没办法，只好瞎说一气。他们问什么我就交待什么。这样一来，反而受到了表扬、欢迎和优待。我就只好昧着良心乱供起来……”女干部越说越伤心，充满了愧疚之情。

黄克诚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了第2师政委谭震林。问他：“第2师共搞出多少特务？”谭政委说：“每个团都有百多名吧！”

黄克诚故意问道：“哎呀，你一个团就有那么多特务，部队驻地离敌人那么近，你又在审查他们，部队还不都乱了套，都跑光了？”

谭震林笑笑说：“一个也没跑！”

黄克诚也笑着说：“快回去给人家平反吧，哪有这样的特务！”

黄克诚随即又向饶漱石谈了运动搞得过了头的看法，建议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饶漱石表面表示同意。

开完会回到师部不久，黄克诚接到华中局的电报，让他立即将第3师政治部保卫部长杨帆逮捕，押送华中局。理由是：延安有人供出杨帆是暗藏特务，需要逮捕审查。

黄克诚想：情况未经证实，不便贸然逮人。就告诉杨帆说，华中局让他去开会，并派人护送他前往。杨帆一到华东局，就被关押起来。后来查清他确实是受了冤枉，饶漱石才释放了他。解放后，杨帆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出了问题后，杨帆再次被捕入狱。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与潘汉年的问题才得到平反。

黄克诚后来在谈到这些事情时颇有感触地说：“幸亏毛泽东主席吸取打‘AB团’的教训，在运动中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使许多蒙冤的同志能得以平反。否则，这种‘左’得要命的运动方式，不知要整死多少人呢！”

反“扫荡”斗争

苏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新四军的不断壮大，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惊恐和仇视。1941年7月，日军出动1.7万余人，并配以装甲汽艇百余艘，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对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我华中局及新四军的首脑机关。

黄克诚师长按照上级的布置，带领部队利用河网港汊的复杂地形，对“扫荡”之敌进行阻击和侧击；当敌兵力开始南移后，他们则转入全面的反击。他们人熟地熟，又有群众的支援，无论走到哪里都如鱼得水。而敌人在我的坚壁政策面前，有时连饭都吃不上，犹如盲人骑瞎马，到处碰壁。到8月下旬，在我苏北、苏中军民的协同打击下，敌人以损失3800多人、30多艘装甲汽艇的代价，宣告“扫荡”结束。

1942年底到1943年冬，是苏北抗敌斗争的最艰苦的阶段。日寇集结重兵对苏北海海区 and 盐阜区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1942年11月，日本华北派遣军调动日军第17师团的一个旅团及伪军第36师等部，开始对淮海区进行分进合击式的大“扫荡”。11月15日，敌5000余人分别由泗阳、淮阴、涟水、沭阳等地出动，向小胡庄、陈圩、张圩等地的我党政军机关和部队发动进攻。

按照苏北区党委和新四军第3师领导的安排，淮海地区军民在地委书记金明和军分区司令员（旅长）刘震的指挥下，以一部分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在根据地内展开游击战，和敌人“捉迷藏”，消耗、疲惫和迷惑敌人；机关和大部分主力则跳到外围，和敌人兜圈子，逮着机会就狠狠咬它一口。

当敌人在根据地内转了几圈找不着我主力后，就寻迹向外追击，企图找我主力决战；这时，我主力又巧妙地潜回根据地内，给敌人一个不照面。就这样，经过反复周旋，拖得敌人精疲力尽，不但没有打着新四军，反而经常被新四军吃掉一块又一块。最后，敌人只好在我根据地交通要道上构筑碉堡，安设据点，扩大伪化区，企图分割蚕食我根据地。根据这个情况，黄克诚指示淮海军分区兼第10旅的部队，广泛开展游击战和交通破袭战，采取袭击、围点打援等战术，先后拔除敌军据点35处。到1943年夏，淮北根据地基本恢复到了“扫荡”之前的态势，日军发动的大“扫荡”又一次被粉碎了。

日军在对淮海区发动“扫荡”后，又气势汹汹地扑向盐阜区，其“扫荡”规模更大。不但出动了第17师团、35师团、15师团之独立第12混成旅团的1万多日军，而且还动员了伪军徐继泰、李实甫、潘干臣、刘湘图、胡冠军等部的近万人，于1943年2月自北至南对盐阜区构成一个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我沿海港口，在飞机的掩护下，对盐阜根据地实行“梳篦式”的搜索和“扫荡”。

为适应斗争的需要，这时华中局机关和新四军的军部，已由盐城转移到淮南以东地区。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黄克诚师长和副师长张爱萍进行了分工，由黄克诚率师部、区党委机关和部分部队跳到外围，由张爱萍（他同时兼第8旅旅长和盐阜地委书记）指挥主力部队在根据地内同敌人周旋，采取内线与外线相配合、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战法，展开了反“扫荡”斗争。

广大新四军健儿，在黄克诚师长、张爱萍副师长和洪学智参谋长的指挥下，打得英勇顽强，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在陈集战斗中，第8旅第23团和旅特务营的勇士，以白刃格斗的方式发起攻坚战，守敌日军中队长以下全部被歼，敌人的全部装备被我缴获。

——第8旅第22团在攻打日军守卫的单家港时，战士们前仆后继，奋勇向前，不但缴获了日军的许多汽艇和船只，而且打死打伤日伪军200多名。

——地处阜宁县黄海之滨的八滩，在“大扫荡”中被日军占领。八滩海产丰富，位置重要，是一个很富裕的小镇子，故此地有“金八滩”之称。日军山本中队进占八滩以后，欺压群众，无恶不作，群众早已痛恨在心。

八滩，又处于我黄海之滨的要道上，对我方威胁甚大。

黄克诚师长和张爱萍副师长研究后决定拔掉这个据点，夺回八滩，并由张副师长和洪学智参谋长亲自指挥。主攻任务交给了第8旅第24团来完成，师特务营和阜东总队配合作战。第24团团团长兼政委谢振华（离休前曾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来师部领受了任务。

1943年3月30日晚，谢振华带领部队包围了八滩。晚上11时半，张副师长一声令下，部队向敌人展开了猛攻，枪声立即响成一片，炮火映红了半个海面。

在西北角担任主攻的是第2营，副营长王光汉带领突击队一马当先，翻过围墙向里冲去。敌人拼命进行反扑，一次次被突击队击退。王光汉带领部队机智地占领了东圩一条街和敌人的两座碉堡。然后留一个班掩护，另一个班冲进敌人的中队部，一阵手榴弹炸毁了日军的电台和报话机。

这时，大多数敌人刚刚睡下，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使许多日本兵连衣服都顾不上穿，摸起枪来就乱放。新四军战士有的向屋里扔手榴弹，有的放火烧，日本兵慌得四下奔逃，不少人被活活烧死。

山本中队长住在一个碉堡里，他指挥几个护兵往外冲，两次都被打了回去，最后一次他带头向外冲，“叭叭”两声，山本当场被击毙，像死狗一样地躺在了那里。

在八滩西边的一座草房里，有被敌人抓来的20多个民工关在那里，枪声一响，敌人想放火烧死他们。特务营副连长叶殿功见状，带领几个战士扑上前去，打退敌人，把民工救了出来。这时，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头部，叶副连长为营救民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因为敌人分驻在许多院子里，所以要一座一座地围歼。有十几个鬼子住在一座瓦房里，他们又是打照明弹，又是用机枪扫，十分顽固。新四军战士便冲上房顶，揭开瓦盖向里扔手榴弹，炸得敌人哇哩哇啦地乱叫，却不肯投降，还一个劲地向外打机枪。新四军战士只好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送上了西天。

黎明前，有一座大屋里的敌人仍不肯投降，谢团长遂决定用火攻。战士们用粘着油棉花的手榴弹向敌人投去，房子被炸得熊熊起火，几个敌人冲向门口，立即被我军两挺机枪封住，敌人的尸体把门口都堵塞了。剩下的十几个鬼子见大门冲不出去，就推倒后墙，拼命向外逃去。谢团长立即带领战士追击，突然一枪射来击中他的右肩，他顾不得伤痛，继续指挥部队围歼残敌。

这次八滩之战，我军击毙日军中队长以下73名，只有11名鬼子侥幸逃走；俘虏伪军200多名，还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3挺、步枪250多支。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和“蚕食”计划，改变了这一带的斗争形势。

——在淮阴县城北部，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叫刘老庄。1943年3月中旬，

当日寇对淮海区进行大“扫荡”时，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来到了这里。他们全连共有82位同志。

3月17日夜，日军第65师团团长早渊四郎中将率领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配以部分炮兵，共1300多人，从淮阴城出发北上，与北边的敌人相呼应，从四面向离刘老庄北边不远处的张圩子压来，妄图把淮海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消灭。

驻在刘老庄的第4连指战员看到驻在张圩子的我军政领导机关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严重局面，连长白式才、指导员李海波立即把部队带到通往张圩子的道路上，紧急抢修工事，决心在这里阻击敌人，掩护领导机关转移。

82个人的连队，要与上千名拥有现代化武器的敌人对垒，无论是人数还是火力，都不能相比。但是，他们是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他们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有为革命利益敢于牺牲自己的崇高精神。连党支部进行紧急动员后，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纷纷要求担任最艰巨的任务；青年战士也纷纷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请党在战斗中考验自己。

扼守在通往张圩子道路边的刘老庄，变成了一座阻敌前进的坚固屏障。

太阳冒红时，敌人扑来了。他们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把敌人放近打！”白连长下了命令。

500米，300米，200米，150米……

“打狗日的！”白连长一声令下，冰雹似地枪弹，带着战士的仇恨，射向敌群。

敌人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钉子，队形一下乱了套。但他们毕竟是训练有素的法西斯军队，稍加整顿后，便开始向刘老庄进攻。

敌人凭借优势的火力，先用大炮轰了一气。第4连的工事被炸烂了，泥土飞扬，不少战士被埋在了土里。乘这当儿，敌人的骑兵耀武扬威地向前冲来，马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扑通！”冲在最前面的那匹马栽倒了。

“扑通，扑通！”紧跟在后面的两匹马也倒在了阵地上。

战马体积大，正好成了第4连战士们的活靶子。战士们展开了“打靶”比赛，不一会，这些活靶子一个一个被放倒了。

敌人恼羞成怒，驱赶步兵挺着刺刀向前冲来。此时的刘老庄阵地，已成为燃烧的火海，敌人立即被复仇的火焰吞没了。

敌人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冲锋，他们急于冲过这道障碍去张圩子“围剿”中共领导机关。但此时的刘老庄，犹如一道坚固的铜墙铁壁，敌人碰得头破血流也未能逾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阵地前敌人的尸体，叠了一层又一层。第4连战士也伤亡过半。但最重要的是，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没有了。第4连指战员面临着弹尽粮绝的严重局面。

中午时分，当第4连指战员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连长白式才撑起负伤的身体，异常镇定地命令：把机关枪毁掉，把刺刀上在枪头上，准备与敌人拼刺刀。血流满面的指导员李海波用尽力气动员道：“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革命战士绝不当俘虏，拿起刺刀与敌人拼，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

敌人见第4连阵地上枪声停止了，知道他们的子弹打光了，便哇哩哇啦

吼叫着冲了上来。

但他们碰到的却是一双双喷着怒火的眼睛，一把把明亮的刺刀。

“杀——”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第4连勇士们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此时，已把生死置于度外的第4连勇士们，一个人对付着两三个敌人，他们如雄狮、似猛虎，前刺后劈，左杀右挡，杀得敌人污血四溅，魂飞魄丧。敌人被第4连勇士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震慑住了，惊呆了。这伙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的日本兵，也不得不后退溃逃……

第4连只剩下了十几个人，但英雄的刘老庄阵地仍岿然不动地屹立着。

时间已是后半晌了。敌人调集大炮对四连阵地一阵猛轰。炮轰停止后，第4连阵地上一片沉寂。

敌人端着刺刀，小心翼翼地踏入这让他们伤透脑筋的共军阵地。

“啊，全部斯啦斯啦的！哈哈……”一个日军小队队长站在一堆新四军战士的尸体前狂喊。他的话音未落，突然“轰隆”一声，他与旁边的两个日本兵被炸飞了。原来这是一个躺在尸堆里的身受重伤的新四军战士，拉响了腰间的最后一颗手榴弹，与三个敌人同归于尽了。

英雄的第4连战士，与敌人激战竟日，毙敌170多名，为领导机关的转移赢得了时间。82名指战员全部殉难。

苏北人民为了纪念第4连的82名英雄，在刘老庄为他们修建了一座陵墓，墓碑上刻着82位英雄的名字。淮海区领导人写的一副挽联刻在墓碑两旁：

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

从拂晓，达黄昏，全连英勇战刘庄

第4连指战员以身殉国的英雄事迹，传遍了苏北大地。朱总司令称赞他们是“我军指战员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根据地人民称赞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不少青年纷纷要求到第4连所在部队当兵杀敌，走英雄的道路。新四军第3师以新参军的刘老庄一带的青年战士为主，重新组建了这个连队，并命名他们为“刘老庄连”。

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改善了苏北地区的战略态势，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热情，更加坚定了大家抗战到底的胜利信心。

反“摩擦”作战

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皖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为首的顽固派，始终把苏北抗日根据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寻隙挑衅，进行摩擦。

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吃败仗以后，又纠集余部2万多人，退守曹甸、车桥、兴化一线，依托坚固的据点，继续与抗日军民为敌。

如何选择恰当的时机，解决韩德勤的顽军，消除苏北抗日斗争的这大大障碍，是苏北我军在同敌伪顽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的重要一环。

1941年8月，正当日军向苏北抗日根据地“扫荡”之际，韩德勤乘机指使其部属、江苏常备第7旅王光夏等部，向新四军展开进攻，并深入淮海根据地构筑据点，企图分割新四军各部的联系，策应由豫皖地区东犯的反共顽军汤恩伯部。

如何对待处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国民党顽固派？中共中央指示：必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黄克诚师长感到：韩德勤部乘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之际，在后面打我们，是典型的落井下石，助纣为虐。对这种冥顽不化的反动家伙给点颜色

看看，正体现了我们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于是，他下令第7旅对王光夏旅盘据的陈道口据点发起进攻，夺回被顽军占领的地盘。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第7旅第11团，他们组成一个个冲锋小分队，突破敌人挖的沟壕，冲破他们构筑的地堡防线，奋勇地向中心据点冲去。

王光夏手提驳壳枪，催赶着士兵拼命抵抗。

新四军战士对这种不打日本兵、专门搞反共害民的顽固派愤恨异常，大家高喊着：“活捉王光夏！”“为根据地人民报仇雪恨！”等口号，打得敌人蒙头转向，纷纷举手交枪。

天近黄昏时，战斗结束，1500多名顽军全部被歼。敌旅长王光夏乘乱化装成老百姓，在夜色的遮掩下，只带着几个人狼狈不堪地逃走了。

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顽军对淮海地区的进攻，使淮南、淮北、淮海、盐阜四块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但是，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顽固派反共反人民是由他们的本性所决定的。

1943年当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韩德勤率部从淮海区西渡大运河进入皖东北，强占了我淮北市的金锁镇、山子头一带，公然宣称要在洪泽湖畔建立反共基地。韩部所到之处，疯狂地捕杀我抗日干部和群众，残酷地镇压各界的抗日活动，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韩德勤还暗中勾结驻守津浦路西的国民党反共军队王仲廉部，企图夹击淮北的新四军第4师。

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打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新四军首长决定对韩德勤的反动气焰给以迎头痛击。

黄克诚师长派出第3师第7旅，配合第4师主力，在新四军军部的统一指挥下，于1943年3月18日，向韩德勤占据的山子头据点发起了反击。战士们已经是几次与这个“摩擦专家”打交道了，知道不打疼他，他绝不会认输，所以一出手就机枪、手榴弹一齐上，打得敌人难以招架，乱成一团，兵找不到官，官指挥不了兵。新四军乘势一举全歼了韩德勤的总部及保安第3纵队和独立第6旅等部。上次在陈道口战斗中化装逃跑的王光夏，这次再也跑不脱了，被击毙在据点里头。韩德勤则被新四军生擒活捉，当了俘虏。

韩德勤被俘后，起初还装腔作势充硬汉，不吃不喝，也不开口讲话，满有点“不成功则成仁”的架势。

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考虑，新四军领导给韩德勤指点迷津，讲了顽固不化的后果，韩德勤很快便软了下来，口也开了，饭也吃了，表示自己一定要认真考虑新四军领导的话。

为了表示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新四军释放了韩德勤，希望他能拿出实际行动来，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点有益的事情。

韩德勤从此收敛了许多。国民党顽固派留置于苏北的这一抗战障碍被清除掉了。

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后

当1944年向我们走来时，日军的侵华战争开始转入守势；太平洋战争发起后，日军为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力量，从华北、华中抽掉部分兵力南调，这为苏北我军开始局部反攻造成了有利的时机。

黄克诚师长敏锐地抓住这个机会，积极组织部署部队，向附近的日伪军占领区发动了反攻。

是年4月，黄师长首先发起了高沟、杨口战役。高沟、杨口位于涟水县

的西北部，为敌伪建立的中心据点。黄师长部署第10旅主力和第7旅一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拔除了以高沟、杨口为中心的敌据点14处，歼敌2000余名。

5至10月，黄克诚又指挥部队在滨海地区连续发动攻势，先后攻克了苏北的产盐重地陈家港及合顺昌、通洋港、青龙港等据点，解放了日寇掠夺食盐和棉花的重要基地合德，并攻克了运河线上敌人新设的重要据点林公渡。一系列的攻势作战，将淮海区内的敌人分割在几个孤立的据点上，并将根据地的边缘区推向了陇海路。

1945年春，日寇的侵略战争已面临穷途末路。根据形势需要，黄克诚决定发起阜宁战役。

阜宁城地处盐阜区的东部，东有射阳河出海，南有串场河及通榆线，是水陆交通要道和军事重地。因此，敌人在这里驻有重兵：主要有伪第2方面军孙良弼部的第41师、43师7个团，还有第5军特务团、苏北屯垦警备第1总队等。

黄克诚同张爱萍、洪学智及作战参谋人员详细讨论确定了作战方案，决定以第8旅、10旅、师特务团及阜宁、阜东、建阳、射阳、盐东5个独立团，共11个团的兵力投入这次战斗。

4月24日深夜，战斗打响了。第一步，是清除阜宁城外的据点。在黄师长的亲自指挥下，第8旅第24团及旅特务营，连续攻克了大顺庄、头灶、九灶等据点，全歼了守敌。驻掌庄的300多名伪军见势不妙，知道顶下去没有好结果，便放下武器投降了。

阜宁城内的敌人见城周围的据点被新四军拔除，一下慌了手脚。25日上午，他们组织1000多人冲出北城，向新四军进行反扑。早就等候在那里的第22团指战员来了个迎头痛击，打得敌人抱头鼠窜，向城内退去。第1营的一个排紧冲进了阜宁城，随后第3营第11连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抢占了北城门的4座炮楼。

敌人固守在城中的工事里，新四军也在加固刚刚占领的工事，双方相距不过百米，紧张地对峙着。

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黄克诚师长，弯着腰来到了工事里。他俯身向前，仔细观察着敌情。突然，“哒哒哒”——敌人扫过来一梭子弹，一个战士眼明身快，立即扑倒在黄师长身上，急切地说：“师长，这里太危险，你快下去！”

黄克诚拍拍那位战士的肩膀，动情地说：“你不是同样危险吗！现在我们观察仔细一些，进攻时就会减少一些危险和不必要的伤亡呀！”

战士们深为黄师长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所感动。

外围据点清除完毕后，下午3时，黄克诚下达了第二步的任务——攻城。

战士们在炮火的配合下，从工事里一跃而起，互相掩护着向前冲锋、跃进。大家的战斗情绪特别旺盛。几年来我们大多打的是游击战、运动战，今天，我们也能打攻坚战了，要攻占敌人占领的“大”城市了，怎不令人振奋！

新四军的突击小分队，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下，把云梯搭上城墙，冒着敌人呼啸的子弹，一个个奋力向上攀登。

守卫在城上的敌人，从墙垛里、枪眼里不断向下扔着手榴弹。战士们倒下一批，又一批接着向上爬；云梯被敌人推倒了，十几个人一拥而上，竖起来再上。这样的“拉锯战”在几处城头进行着，反复着……

看！有两个战斗小分队终于爬上了城头，控制了北城楼。接着，城门被打开了，大部队拥进了城里。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伪军第43师师部被占领了，守卫在县府的顽敌被歼灭了，阜宁城的主要街道被控制了……

但是，困兽犹斗。面临灭顶之灾的敌人仍在顽强抵抗，在指挥官的督战刀下，一小撮死顽分子利用纵横交错的街巷，与新四军展开了“捉迷藏”。战士们上起刺刀，逐街逐巷与死顽分子展开了白刃格斗。“杀——杀——”的喊声和此起彼伏的枪炮声震耳欲聋。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

困守在城内天主教堂的一部分顽敌，凭借高墙大屋仍在顽抗。他们想借夜色作掩护，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要打破敌人的幻想！不投降就用炮轰！”黄克诚师长在我军反复喊话劝降、敌人无反应的情况下，下了这样的命令。

于是，把各团的炮火集中起来，一齐对准敌人轰击。

轰隆！轰隆！轰隆！炮火映红了天主教堂内外，瓦砾尘土飞扬，敌人哭爹喊娘乱叫……

“停止射击！”为了保护这座建筑，在对顽敌施行严惩后，指挥员下了停止炮击的命令。战士们端着刺刀冲了进去，被炸得惊魂未定的敌人一个个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东大街的守敌一个营，见大势已去，顽抗无益，遂打起了白旗，由营长率领向新四军投降。

当东方露出曙光时，全城枪声平息，整个阜宁县城获得了解放。

解放阜宁的战斗，摧毁敌人碉堡143个，歼灭伪军副师长以下4000余人，收复了周围的560多个村镇，是华中抗日战场战略反攻的一次重要战斗，也是苏北新四军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第一座县城。苏北人民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欢庆我军取得的这一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斗，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这一天，全国到处是一片欢庆的气氛。

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发出命令，要求各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向一切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进攻，迫使敌人放下武器。

黄克诚立即部署，把握战机，集结主力部队进行战略反攻，相继解放了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等县城。旋即准备挥师乘胜攻取淮阴，淮安，继之攻取盐城，以扫清苏北根据地内的残敌。

正当这时，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来电，令第3师立即向淮南津浦路以西推进，会同第2师阻止桂系顽军可能的东犯。

黄克诚根据对时局的分析认为：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一时尚不可能向我根据地纵深进犯。若我军主力西出津浦路，势成守株待兔，反而坐失肃清根据地内敌伪的有利时机。于是，他当即致电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并党中央，建议扫清苏北根据地内的敌伪后，再西出津浦路。但他的建议未得到采纳。

于是，黄克诚将原定的扫清苏北残敌的作战计划暂时搁置，率第7旅和第8旅进至淮南津浦路两侧的定远、盱眙、涧溪等地区，

与第2师的部队会合，而将第10旅留置于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地区，以便既能西出作战，又便于东返，相机歼灭两淮之敌。

西进途中，考虑到肃清苏北敌伪作战的需要，黄克诚又让洪学智参谋长

返回苏北，相机组织攻取两淮的作战工作。

黄克诚率部集结于津浦路两侧，与第2师部队一起，一直等了半个多月，也未见国民党军队有东犯的动静。若再等下去，将使我军主力置于无用之地。为此，他与第2师政委谭震林进行研究后，

两人联名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建议：将第2、第3师主力调回津浦路东，夺取铁路一段，牵制国民党军队；主力一部回师肃清苏北、苏中各城市伪军，创造联成一片的大块根据地，作长期斗争的准备。此电报同时报到了中央。

饶漱石接电报的当天就回电指示：第3师主力不宜调返苏北。两日后，刘少奇从延安电示华中局：“顽军进占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我欲阻止顽军前进已很困难或不可能，而桂顽进占城市与要道后，暂时亦不会向我根据地深入进攻我军。因此，我欲求歼灭顽军一路暂时恐无机会，以此配合谈判更不可能。在此情况下，请你们考虑黄、谭意见，将第3师部队抽调（或再加第2师之一部）向东肃清敌

伪部队据点，造成将来作战的有利条件，似乎是必要的。否则，主力部队将陷于无事可做的地位。以前，黄克诚主张第3师部队首先肃清苏北敌伪后再西调的意见似乎也是对的。”

刘少奇代表中央发表的意见，使半个多月来的争论有了结果，证明黄克诚的意见是正确的。

黄克诚接电后，即刻率部回师苏北，着手发起两淮战役。

两淮战役

所谓“两淮”，是指苏北地区的淮阴县和淮安县，淮阴在北、淮安在南，两城相距17公里，面对运河，水深城固。城上有日寇经营几年的工事，城墙四角和城门上都筑有炮楼，城内主要街道和路口均筑有地堡。

日寇投降以后，长期盘踞在苏北的伪军潘干臣、吴漱泉等部，摇身一变，被编为国民党第6军第28师和淮安独立旅，分别占据了淮阴和淮安县城，拒绝向抗日军民缴械投降。

淮阴、淮安又是两座历史名城，周围有许多历史遗迹。由于这里文化、经济和交通比较发达，所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江苏省政府曾迁移到淮阴城。敌人占据两淮后，这里成为分割我苏北、苏中、淮南和淮北各根据地联系的一大障碍，根据地的军民早就盼望拔掉这颗钉子，让两淮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当黄克诚从津浦路西带队东返时，就提前打电报给留在苏北的师参谋长洪学智和第10旅旅长刘震，要他们带部队提早行动，向两淮开进。并规定了先打淮阴的行动方案。

两淮地区的人民群众，听说新四军要攻打淮阴、淮安的消息后，立即沸腾起来。他们组织了“反攻动员委员会”，动员了几万人参加担架队、运输队、工程队，为部队修造攻城器材，运粮碾米，赶做军鞋，写慰问信。为了让部队顺利越过城壕，上万名民工在三天之内挖通了30里长的水道，放完了城壕内的水。地方医院还增设了上千张床位，准备供抢救伤员使用；民兵们赶着骡马和牛车，帮部队拉土炮，运弹药；学生、教师和文艺工作者赶排宣传节目，到攻城部队进行演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的场面非常令人感动。

淮阴城墙高8米，城四周除有运河及护城河天然屏障外，又增设了鹿砦、铁丝网，城外围还附设有星罗棋布的卫星据点。城内驻扎着敌第28师师长潘

干臣带领的 8000 多人的队伍。

8 月 27 日，新四军第 3 师以第 10 旅为主力，又派出师特务团、淮海军分区新第 2 团、射阳独立团、涟水警卫团、淮阴警卫团等部队，对淮阴县城进行了包围。随即展开了清除外围据点的战斗，利用 5 天时间拔除了淮阴城外大大小小几十个敌据点，清理了外围障碍。

这时，新四军一方面作攻城准备，挖了近百米长的地道直通城墙下；另一方面向敌人展开政治攻势，向潘干臣发出通牒，要他认清形势，缴械投降。

但潘干臣以“曲线救国的胜利者”自诩，不但拒绝缴械，还残忍地杀害了为新四军送信到城里的张老汉。

敌人死不回头，就叫他灭亡！

9 月 6 日下午 2 时，围城新四军对淮阴县城发起了总攻。第 10 派第 28 团第 1 营，通过 60 米长的地道，对城墙实施爆破。随着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气浪卷着石土冲上天空，城墙被炸开了一个豁口。紧接着嘹亮的冲锋号声响起，突击队仅用 5 分钟就登上了城头，在东城门楼上插上了红旗。旋即，他们迅速扩大战果，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向纵深挺进，又在观音寺消灭掉了伪淮阴保安团团部。

从南门进攻的师特务团，在前进中爆破器材被敌人炮火击中，未能按计划实施爆破，便提前 5 分钟发起进攻，虽然遭受很大伤亡，但仍前仆后继，奋勇登城。尖刀班班长、战斗英雄徐佳标第一个攀上城墙，把一面红旗插上了城头。突然，一串子弹向他射来，打穿了他的肚子，他顽强地扶好旗杆，把红旗稳稳地插在城头。然后摸出身上的手榴弹，奋力投向向他开枪的敌人，送敌人上了西天。这时，从城上敌人的一个暗堡里，射出一串串火舌，封锁住了新四军前进的道路。满身是血的徐佳标摸摸身上，手榴弹用完了。他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向敌人的暗堡爬去，地上流下了长长的血印……突然，他撑起身子，扑向敌人暗堡上的枪眼，用身体堵住了敌人机枪的射击，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淮阴城解放以后，为了纪念这位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战斗英雄，当地人民群众把他献身的淮阴城南门，命名为“佳标门”。

在西门，攻城部队突破敌人的防线后，一直冲到敌教导营的营部，抓住了敌营长和一名号兵。突击排排长曾当过司号员，他命令敌号兵交出号谱，机智地吹起了敌人的集合号，把敌人的一个营集合起来，全部当了俘虏。

第 28 团第 2 营的突击队，冲进城后，直捣敌指挥部。潘干臣组织他的警卫队进行顽抗，结果不但警卫队被全歼，潘干臣也被击毙。

到下午 3 时半，战斗全部结束，淮阴城宣告解放。

淮阴解放以后，黄克诚又移师淮安，开始了解放淮安的战斗。

淮安城城高 12 米，全部用巨大的青砖砌成，城墙高大坚固，墙的东、南、北三面有宽大的护城河，西面是大运河，故有“铁打淮安”的称谓。城内驻的是国民党淮安独立旅旅长吴漱泉带领的 6000 余人。吴漱泉曾夸下海口：“我这个淮安，天兵也难以攻破！”

但是新四军要比天兵更厉害。

1945 年 9 月 15 日，黄克诚部署新四军第 3 师的第 7 旅、第 8 旅及射阳独立团、淮安独立团包围了淮安县城。敌人插翅也难飞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打进城里去？

黄克诚带着旅长和团长，围绕着淮安城进行了仔细侦察和研究。回到指

挥部后，他定下了这样的方案：鉴于我军目前还缺乏重炮武器，所以攻城只能用我们特有的打法：在城外用沙袋构筑起十几个高于城墙（12米）的制高点，并挖掘一条直通城墙底部的长达150米的地下坑道，以作炸城用。

各部队按照这个部署，积极地行动起来。同时，新四军还对城内敌人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通过喊话、发放传单，劝敌人缴械投降。

但顽固的吴漱泉不但拒绝放下武器，还组织了120人的“敢死队”，于9月21日拂晓从西城墙上沿绳索坠下，企图打开缺口，突围逃跑。结果40多人被打死，剩下的80人举手投降，当了俘虏。

22日上午8时，黄克诚一声令下，新四军对淮安城发动了总攻。

十几个制高点上的炮火、机枪一齐发射，压住了敌人城墙上的火力点。

乘机机会，第22团第6连通过150米长的地道，引爆了一颗预先置于城墙下的500磅的炸弹，“轰隆”一声，西南城墙被炸开一个大缺口，敌炮楼被炸得飞上了天。第8连的勇士们呼喊着重从城缺口冲进了城里；第9连、10连的战士，抬着4架云梯，在制高点火力的掩护下争先恐后地向城上爬去，只用了9分钟就登上了城头，突破了敌前沿防御阵地。

第19团和第20团的勇士，分别从城东南和城南突破敌人城墙的一线防御，向城内突进。经过短时的激战，敌依托高大城墙精心设置的防线，全部被摧毁。各攻击部队随即向敌纵深穿插，对敌实行分割包围。

战斗进行到上午10时，城内的敌人大部被歼。残敌被分割围困在几个院子里。这时，敌人已成为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新四军便展开阵前喊话，迫使大部分残敌交枪投降。

但是，敌旅长吴漱泉和专员李云需带领的200多人，依托城中心的钟楼和楚王殿工事，仍在继续进行顽抗。

黄克诚皱着眉头说：“这个家伙，看来要走潘干臣的路子了！”遂命令部队集中火力猛攻，经30分钟激战，将顽敌全歼，吴漱泉亦被击毙。

下午3时，号称“铁打淮安”的这座苏北重镇，宣告解放。

两淮战役是华中敌后我军进行的第一个较大的战役。此役共计全歼淮阴、淮安敌师长潘干臣、旅长吴漱泉以下1.5万人，缴获大炮15门、轻重机枪180余挺、长短枪8870余支、各种车马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

至此，黄克诚领导的新四军第3师自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五年以来，共作战5000多次，歼敌6万余人；部队也由最初的2万多人发展到7万余人；开辟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解放区。黄克诚及新四军第3师的广大指战员与苏北的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鱼水之情。

进军东北

在黄克诚指挥新四军第3师攻克淮安的第二天——1945年9月23日，他即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要他率新四军第3师的主力3万余人，挺进东北，开辟新的根据地。

接到命令，黄克诚心里异常激动。

原来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并曾建议中央采取的重大战略措施。

还在9月上旬，当黄克诚率部从津浦路西回师苏北，途中经过华中局驻地时，从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中得悉：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后，留驻在我国东北地区。同时，华北我军也有少量部队进入东北。黄克诚敏锐地意识到，现在国民党军队主力尚在大后方，一时还来不及接管东北。这正是我军进军东北，开辟创建东北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于是，他就请华中局书记

饶漱石给中央发电报，建议中央及军委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不可错过时机。但饶漱石却不同意发电报。黄克诚当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电报，向中央及军委提出了对当前局势及军事方针的意见，并于14日用华中局的电台发出。电文如下：

“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有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蒋介石对我党谈判毫无诚意，只以和平谈判作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而在军事上敌人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以必要兵力控制我军可接近之山脉（大别山、黄山、天目山、陕南等），防我军向其背后挺进。估计顽军到达指定之城市交通要道后（华北、华东），仍将在敌人掩护下构筑铁路封锁线，甚至纵深封锁线，以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使我军不能自由调动。到适当时机，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向我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

（二）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坚强之主力不多，且占领地区大，我主力分散。各大战略根据地，除山东外，突击力量均欠强大，均很薄弱，各根据地内均有敌顽之据点，均控制有铁路及大城市，且无一个根据地在人民、地形、粮食诸条件之结合上，比得上过去之中央苏区。各根据地联系做得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

（三）在上述情况下，目前我们的方针约有下面三个：

1. 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削弱军队与地区到极大限度）。
2. 有利基础下让步，长期和平谈判，争取和平，保持力量。
3. 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游击坚持），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铁路有城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

（四）我们若执行第一项方针，将走希腊路线，造成严重失败（蒋介石永远不会放松我军我党）。第二项方针，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因此，我们应采取第三项。政治上仍进行谈判，而军事上应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取得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军事具体部署上，我建议：

1. 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五万人，能去十万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 以晋、绥、察三地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3. 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十五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 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五）为执行上述方针，山东应调三万人到五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三万到六万人去山东。在河南和平原主力的一部，应调山西。江南一师主力应调回江北，只以一部留在江南活动。一师为新四军之坚强部队，目前向顽作战毫无希望，估计将来被截断之后，会被迫打游击。以坚强主力去打游击，极为不利，故应迅速北调。

（六）我对各方面材料了解甚少，可能有片面之处。但我认为目前我党若没有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就不会有大的胜利；若没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就不会有联系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故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是否有当，请考虑指示。”

应该说，这是一封很有见地的电报。电报发出后，黄克诚即率部队返回苏北，发动了两淮战役。现在，两淮战役刚一结束，党中央就来了调他挺进东北的命令，真是太及时了。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仅仅是5天以后，即1945年9月28日，黄克诚就率领新四军第3师主力3.5万人，离开苏北这块熟悉的土地，挥师北上了。新四军第3师挺进东北的指挥员序列是：

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
副师长刘震
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
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7旅旅长彭明治政治委员郭成柱
第8旅旅长张天云政治委员李雪三
第10旅旅长钟伟政治委员王凤梧
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吴信泉
特务第1团团团长关贵卿
特务第2团团团长何文清
特务第3团团团长高峰

当大军启程之际，黄克诚遇到了三个问题：

- 一、部队要不要带武器，全副武装？
- 二、要不要带棉衣？
- 三、途经山东时要不要停留？

这几个问题的提起，都是有原因的。

关于武器，有人提出要北进部队把武器和装备都留下来交给地方部队。原因是日本人在东北有不少兵工厂，日本兵在溃逃时丢的武器到处都是。当时，党中央还转发了一份先期进入东北的一个部队领导的报告，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所以到东北去的部队根本不用自带武器装备。但黄克诚考虑问题从来都是很慎重和周到的，他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他宁肯把不利因素想得多一点，以便有备无患。大军千里行军，没有武器，路上遇到情况怎么办？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了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怎么打仗？于是，他决定：北上的部队武器不能留下，要全副武装上路。

关于棉衣，部队从苏北出发时，正是花鲜草绿，阳光灿烂的时候，但黄克诚却坚持要部队带上棉衣。不少人发牢骚说：“这黄老头怎么了，天这么热，不但要我们带装备，还要背棉衣！”但黄师长对问题却想得很深：部队挺进东北，全靠徒步行军，路上要走两个月时间，到东北后即已进入严冬；再加上东北天气本来就比较冷，南方的部队初来乍到，没有棉衣怎么过冬？我们部队在东北没有后方，靠当地筹集根本不可能，因此，棉衣必须自带。

这两件事，尽管当时受到不少人的责难，但最后的事实证明，黄克诚的

决定完全正确，不少人的“埋怨”变成了由衷的赞叹。

当新四军第3师启程北上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黄克诚：“部队到达山东后，要停留一个时期，休整待命。”行军途中，黄克诚反复考虑：大军行动，从来强调兵贵神速。我军进军东北必须分秒必争，不失良机。若在山东滞留太久，再动员北上，不但要费周折，而且可能贻误战机。于是，他在行军途中于10月4日向中央军委发电报，建议部队不宜在山东停留。10月6日中央军委回电指示：“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第3师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能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

有了中央军委的“尚方宝剑”，黄克诚率领大军跨陇海，过黄河，穿津浦，越华北，一路风尘仆仆，浩浩荡荡，直指山海关外……

建议建立东北根据地

新四军第3师，在黄克诚的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徒步行军，穿越江苏、山东、河北、热河四省，于1945年11月下旬进入辽南锦州附近，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部队经过长途跋涉，非常疲劳，亟需休整恢复，但眼前遇到的情况却并不令人乐观。

首先是给养补充无来源。由于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后，受到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所以不准我军进入大城市，也不准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的各类军用物资。各地由于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和人民政权，群众对我军不了解，所以部队给养相当困难。派人出去搞粮食需要整排整连的武装，由于各地土匪蜂起，少数人出去根本无法通行。不但用的弹药、吃的粮食无保障，就连穿的棉衣也无来源。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不能抵御东北摄氏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至于棉帽、棉鞋、棉手套等更是没有。

为了使党中央了解情况，黄克诚给毛泽东主席发去一封电报，报告了部队到东北后，遇到的具体困难。他在电报中对这种困难状况概括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政权、无群众支持、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服装。他在电报中建议：“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东北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着手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毛泽东主席很快给黄克诚回了电，指示他将这些问题和建议向东北局提出。中央军委也给黄克诚回电指示：“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

中央东北局是中共中央于9月15日决定成立的。书记为彭真，副书记是林彪。进入东北的部队则以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

接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电报后，黄克诚当即给东北局发去一封电报，提出了对目前工作的建议。电文如下：

（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大，力量强大。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被土匪占据（大多与顽有联系），我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

之五个月期间，发动乡村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党与政权，应为当前之急务。求得五个月内建立根据地的初步基础，便利明春之大规模作战。

（二）要发动群众，需要干部。各地干部一时不易赶到，东北局手中无干部，我作如下建议：

1. 立即划分主力师（或旅）的熟悉地区，作为该师（旅）之根据地，每师（或旅）划三个县到五个县。

2. 该师（或旅）立即派遣地方工作干部，前往规定地区，开辟工作，建立政权、党委，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

3. 该师（或旅）派出必要兵团负责肃清土匪，恢复社会秩序。

4. 该师（或旅）在规定地区内收集粮食资财，建立医院、工厂，扩大新兵，源源补充主力部队。

5. 被规定之地区，如已有党委、军区，则派出干部受党委领导；如无党委，须由军队派得力干部组织临时党委、政权、分区，以领导工作之进行。

6. 主力部队集结作战，伤病员则送该地休养。

（三）上述建议如整个部队不能实施，则请划十个县地区给三师各旅去建立后方，开辟工作，以免除伤病员随队，妨碍主力行动与作战。

我认为二十万军队没有千万以上群众支持，是不堪设想的。是否有当，请考虑示复。

这封电报，黄克诚以战略家的目光，进一步提出了在东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迫切性以及一些具体做法的设想，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

几天后，林彪派李天佑来找黄克诚，黄克诚这才知道林彪的总司令部离此不远，便一同去见林彪。见面后，他又向林彪陈述了电报上的意见。指出：部队在现在的状况下不宜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我们是疲惫之师，且无根据地作依托；而我们的敌人则是乘坐轮船来的精锐之师。“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将来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

林彪采纳了黄克诚的意见，并命令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转移到义县、阜新一带，做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的工作。

正在这时，毛泽东主席从延安来电，询问对东北工作所采取方针的意见。黄克诚根据自己的想法，拟了一份电报稿，送给林彪看后，发给了党中央、毛主席。这封电报对东北我军必须作长期斗争准备、而目前应立即转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作了详细阐述，提出了较具体的设想。

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著名电报指示，指出东北斗争的艰苦性，及时地提出了把东北的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方面，“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以便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逐步积蓄力量，准备在将来转入反攻。毛泽东在电报中还特别提醒说：“必须使一切干部明白，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如果我们不从发动群众斗争、替群众解决问题、一切依靠群众这一点出发，并动员一切力量从事细心的群众工作，在一年之内，特别是在最近几个月的紧急时机内，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础，我们在东北就将陷入孤立，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不能战胜国民党的进攻，而有遭遇极大困难甚至失败的可能；反之，如果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我们就将战胜一切困难，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毛泽东在电报中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

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将军队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军。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指明了东北工作的正确方针。黄克诚赞叹道：“太及时了，太正确了！”他立即命令部队分散在阜新、彰武一带活动，消灭土匪，发动群众，建立政权。

1946年1月，他又率领部分主力北上，攻下了通辽城，消灭了1000多人的土顽武装，在通辽、开鲁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工作，建立根据地。

黄克诚是个勤于动脑筋的指挥员。对做过的工作及时总结、找出经验教训；对形势站在全局的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对策，是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进入东北以来，虽然没有打什么大仗，但在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中，他深切地感到，我们必须采取稳妥的办法和有利的措施，解决好部队集中兵力以打破敌人的进攻和分散兵力以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的矛盾，并为此提出了一套可行的办法。这个办法体现在他给东北局的一封电报里。电报说：

（一）我们在东北军事上的一个困难问题，是集中与分散的矛盾。我们没有根据地很难打胜仗，但没有胜仗又建立不起根据地。故需要分散兵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创造根据地；又需要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来掩护创造根据地。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又必须得兼。在东北若不适当解决这个矛盾，军事上有继续遭受挫折，甚至失败的危险。

（二）东北地区辽阔，乡村村落稀少，气候寒冷，没有近代交通工具，运动不灵活，分散之后不易集中，集中之后不易分散。敌人据有铁路、公路，集中分散运动灵活，与内战时代不相同。关内敌人有对我作战的社会基础，兵力也与抗战时期之日本大不相同。故过去内战、抗战两时期集中分散对付敌人之办法，已不能完全适应今天东北之情况，必须有新的办法来适应今天之情况。

（三）东北地区广大，土匪众多。蒙汉杂居，无工作基础与革命传统，在干部缺乏和与人民尚无联系等条件下，要求长时期控制全部除大城市与铁路干线外之城市乡村，是不可能的，在短时间即变成根据地亦是不可能的。如现在企图长期全部控制成为根据地，而平均使用力量，则有得到相反结果的可能。

（四）根据上述三项，为解决集中与分散之矛盾，照顾作战与创造根据地两个方面，根据中央子寝（电）指示精神‘力求和平，不能长期进行内战，又必须有胜利战斗和根据地才能达到和平’，我意我们可以西满、东满、南满为单位，划分为下述三种地区来使用力量：

1. 决战地区；2. 游击坚持地区；3. 政治攻势地区。三个单位中确定一个主要决战区。

（五）所谓决战地区，即是预定在该地区与顽进行决战，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者。现在即将军队主力和地方干部主力集中该地区，进行打匪、发动群众、改造政权，整个部队熟悉地形、民情，准备粮草，创造战场，到顽军向该区进攻时，即不顾一切进行决战。目前在顽未进攻前，则分散于三五天行程内之地区，便于集中作战。

（六）所谓游击坚持地区，即不准备在该地区决战，只与顽打游击，消灭顽小部队。这种地区只配备次要部队和地方干部。顽进攻前，则控制现有

城市，打匪，创造根据地；顽军进攻时，则以游击战消耗疲惫敌人，达到牵制敌人兵力之目的。

（七）所谓政治攻势地区（即中央指定不作战地区），完全不准备在该地区作战，只进行群众工作，与（向）顽进行政治攻势。这种地区顽军未到前，以小部队维持治安；顽军到后，即退到乡村掩护群众工作和进行政治攻势。

（八）上述划分地区办法，可能解决集中与分散的矛盾和兼顾创造根据地与作战两个方面的要求。是否得当，供你们考虑之参考。

黄克诚的意见，为东北局和总部领导的决策，提供了有用的参考价值。

开辟西满

1946年元月，党的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成立。在黄克诚的建议下，将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与西满军区合并，为的是使主力部队与地方相结合，便于开展工作。不久，上级任命黄克诚为中共西满分局副书记兼西满军区副政委。当时西满分局书记是李富春，西满军区司令员是吕正操。但吕正操很快就调到东北局工作了，于是，黄克诚又被任命为西满军区司令员。

所谓西满，是指沈阳至哈尔滨铁路以西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洗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市）、扶余等地区。分局和军区机关驻在郑家屯。

黄克诚在西满工作以后，开始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后来李富春同志调到东北局去工作，黄克诚又担任了西满分局的代理书记，一肩挑起了开辟西满的全面领导工作。

西满地区从南到北处于今辽宁、吉林、黑龙江省的西部边沿和

内蒙的哲里木盟的一部分，区内山多、草原多，比较贫穷落后，是土匪流寇出没隐藏之所，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其害。根据部署，黄克诚将第3师的主力部队及一部分地方干部，分配到各地发动群众，消灭匪患，建立政权。

此地各种团伙、各种类型的土匪，或几十人一股，或数百人甚至上千人一伙，他们各据一方，为非作歹，称王称霸，对根据地的建设造成很大祸患和威胁。这些土匪熟悉地理环境，消息灵通，活动诡秘，出没无常，且大多数是马队，行动和逃审极为快捷，对我们的剿匪工作造成很大困难。

但是，我们的部队是打过各种仗的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部队，他们打过日本侵略者，打过汗奸伪军，打过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今天面对这些股匪，虽然环境变了，条件不一样，但只要认真对待，这些刁顽的土匪同样是不堪一击的。

黄克诚根据土匪的活动规律，发动广大指战员出主意、想新招，很快摸索出了一套清剿土匪的经验，分别采取小分队进剿与大部队围剿相结合、政治瓦解与军事斗争相结合、收编改造与严厉打击相结合、群众举报与军事侦察相结合、群众民兵捕捉与个人投诚相结合等办法，很快打掉和剿灭了一个个土匪团伙。部队还组织了各种规模的骑兵部队，专门对付土匪的马队，一旦发现，就咬住不放，没过多久，就将大部土匪马队打光了，残余的土匪无处藏身，一直被骑兵部队追到中苏边境将其全部消灭了。

与此同时，黄克诚还部署部队，将西满境内的伪军、伪警察、特务和地方流氓武装，也逐一收拾干净，这样，就摧垮了国民党在当地的社会基础。

在剿匪反霸的同时，黄克诚把从苏北带来的一批地方干部和部分部队干部派到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基层政权，进行土地改革。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有了真正的了解，把共产党看成了自己的救命

恩人，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青年踊跃参军，人人支援前线。军民关系、党群关系又像老根据地那样如鱼得水了。

黄克诚在大力开辟农村根据地的同时，时刻关注着军事斗争的形势，逮着有利时机，就狠狠给敌人一个打击，发展一下自己的力量。

1946年2月13日，新四军第3师第7旅和兄弟部队在林彪的指挥下，在彰武和法库县之间进行了著名的秀水河子战斗，歼灭了国民党第13军第89师4个营和一个山炮连、一个运输连。

1946年2月，国民党在南京组织反苏示威，要求苏联红军撤出我国东北，全部移交国民党政府接管。斯大林遂下令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全部撤走。这样一来，反把国民党当局搞得措手不及。因为当时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在沈阳，一时无力去接管其他各大城市，南京国民党政府更是鞭长莫及，向东北调兵遣将尚需时日，便只好由他们在东北各地收编的伪军、地主土匪武装去接管。黄克诚觉得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放开手脚去夺取各个城市，发展壮大我们的力量，扩大影响。3月12日苏军从沈阳一撤出，他就立即把活动于彰武地区的第10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以相机攻取四平市。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他指令第10旅就趁势于18日攻下四平，俘虏了几千名伪军，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四平攻下来后，黄克诚又将第10旅部署在开原一线，以阻敌北进。4月中、下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撤退，刘震即率新四军第3师第8旅一部和特务一团，在东满部队一部的配合下，于4月18日攻克长春，歼伪军“铁石”部队1万余人，缴获甚众。刘震率部夺取长春之后，特务一团乘火车北上，于4月24日攻克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名。在北满的山东部队第7师和第359旅之一部，于4月28日攻克哈尔滨，歼敌万余。这一阵连续攻城作战，共毙俘伪军二三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休整、补充时机。从而，更加快了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步伐。

为了适应战斗的需要，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对进入东北的我军进行了统一整编。由黄克诚带到东北的新四军第3师的部队分别被编为几个纵队。

其中原新四军第3师的第8旅、第10旅和独立旅共同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后改为第39军），由刘震任纵队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原新四军第3师第7旅与山东部队第7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6纵队（后改为第43军），由洪学智任纵队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杨国夫任副司令员。

在西满的原新四军第3师的3个特务团，加上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为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改为第44军），由邓华任纵队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

1947年4月间，第7纵队再次打开通辽，消灭了这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到夏季攻势结束后，整个西满地区完全打通，境内的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成为联成一片的巩固的根据地。

至此，黄克诚觉得开辟和建设西满的战略任务已经完成，便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将有关工作交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直接领导。这样，更有利于统一调动和发挥根据地对前线的支援作用。

上级同意了黄克诚的建议。

主持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工作

为了着手准备同东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决战，进一步加强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勤和支前工作，1947年4月，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将民主联军总后勤部扩建为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8月，中央军委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统管整个东北我军的后勤工作。原民主联军总后勤部部长钟赤兵改任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原总后勤部政委杨至成改任副政委，原西满军区参谋长李聚奎任后勤司令部参谋长。

黄克诚结束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的撤销善后工作后，赶到总部所在地哈尔滨来主持后勤司令部的工作。

到任后，黄克诚会同钟赤兵、杨至成等同志，连续几次召开后勤党委扩大会议，对后勤工作当前的任务、方针、政策及组织体制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鉴于东北地域辽阔，部队活动范围广泛，为使后勤工作能及时有力地保障部队作战需要，他们决定在后勤司令部下分别组建东线后勤司令部、西线后勤司令部和北线后勤司令部，并分工杨至成副政委具体抓好落实工作。

杨至成是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前在中央苏区曾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搞后勤工作是行家里手。他认真调查研究，选调干部，配备骨干，很快完成了三线后勤司令部的组建工作。

东线后勤司令部组成于朝阳镇（即现在的吉林省辉南县），后迁往吉林市，由周纯全任司令员，谷广善任政委，常树仁任参谋长。

西线后勤司令部组成于郑家屯（即现双辽市），由倪志亮任司令员，李梓斌任副司令员，张汉丞任参谋长。1947年底李梓斌调军大分校任校长后，由李聚奎兼西线后勤司令员和政委。

北线后勤司令部成立得比较晚，于1948年组成于德惠县。由兵站部部长黄曹龙任司令员，后勤政治部主任陈林任政委，马绍华任参谋长。

对各线后勤组织和后勤力量的配备，杨至成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比较健全、完整的方案。其组成部分有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兵站部、军械处、警卫团、汽车团、辎重团和医院。医院东线配有10个，西线配有9个。鉴于西线路线长、土匪多，所以另增配一个骑兵团。

三线后勤司令部的分工大体如下：

东线后勤司令部以吉林为中心，以吉（林）长（春）线为供应线，负责其以东及以南地区部队的保障供应。

西线后勤司令部以郑家屯为基地，负责长春西南方向部队之供应，并担负长春外围道路的修筑维护工作。

北线后勤司令部以德惠为中心，以滨长线通过松花江为供应线。

联军后勤司令部以哈尔滨为供应基地，负责总的后勤领导工作和供应指挥工作。

联军后勤司令部的建立和三线后勤司令部的组建，为联军秋季攻势的后勤保障工作及部队行动的需要，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为后勤革命化、现代化、战斗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为了提高后勤工作的保障能力，及时有力地保证前线的需要，在黄克诚的领导下，后勤司令部制定了一套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中央军委认为这是当时全军后勤范围比较完善系统的一套规章制度，特意向关内其他各根据地和

解放区作了转发。

黄克诚全面的才能，不仅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而且搞后勤领导工作，也是行家里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也许就是这次担任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职务的一种扩充。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1948年4月，黄克诚又受命担任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政治委员。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第2兵团司令员是程子华，参谋长是黄志勇。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东北获得全部解放，黄克诚遂向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领导机构，由东北局和东北军区来统一领导整个东北的工作。上级接受了黄克诚的建议。

但同时一个新的任命又落在了黄克诚的肩上：中央任命他为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准备随部队入关南下，去接管即将被我军解放的华北第一座大城市天津市。

1949年元月，平津战役的天津战役打响，元月15日天津获得解放。黄克诚率军管会人员进入天津市。

此时，他不但是天津市军管会主任，而且已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副书记为黄敬（同时为天津市市长、军管会副主任）和黄火青。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三黄治津”。

回想起来，从1945年11月出关，到现在入关进驻天津市，才三年多一点时间，形势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三大战役的胜利结束，已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牢固基础。

黄克诚暗下决心：“胜利来之不易，我一定要竭尽全力，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解放战争初期的陈赓大将

晓天文剑

陈赓（1903～196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陈庶康。湖南省湘乡县人。1917年投湘军当兵。参加了护法战争、驱张（敬尧）战争、湘鄂之战。后脱离军阀部队，投身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第二、三、四期入伍生连长、副队长。参加了省港大罢工、第二次东征、镇压商团叛乱和平定刘杨叛乱等一系列战斗。1926年，他被派往苏联学习，次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特务营营长，暗中保卫了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8月，参加了南昌起义，任营长，后经香港转上海治伤。伤愈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情报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13师第38团团长，第12师师长，红军步兵学校校长，干部团团长，陕甘支队第13大队大队长，红1军团第1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太岳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内战又起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指挥国民党军25个旅、21万余人，围攻我中原解放区，并以此为起点，挑起了全面内战。

接着，他抽集了193个旅（即整编前的师）、160余万人，向我晋南、苏北、鲁西南、胶东、冀东、绥东、察南、热河、辽南、广东、海南等解放区发动猖狂进攻。一场由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局性的内战正式开始了。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6月份，用48个小时歼灭中原解放军；7月份，用两个星期占领苏皖解放区；8月份，用3个星期打通津浦线和胶济线；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而消灭我党我军，摧毁解放区，在全国建立法西斯反动统治。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当时都狂妄地吹嘘：“五个月内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蒋介石的反动气焰所以如此嚣张，主要是依仗他的军事优势。他认为：在数量上、装备上都处于劣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一定抵挡不住他的全面进攻。

当时，从表面上看，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的确相当强大，他们有430多万人，其中正规军就有200多万，有45个师是美械装备。并且在美国“调处”的掩护下，完成了进攻解放区的准备：占领了3亿以上人口的地区，人力、物力的来源相当雄厚；控制着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的交通运输线；不仅接受了大批的美国军事援助，而且还接收了100万日本侵华军队的全部装备。人民解放军当时只有120多万人，数量上不足国民党军的1/3；武器装备更不及国民党军，只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只有1亿3000万人口，而且还没有连成片，其中大部分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土地改革进行的还

不普遍、不彻底，也就是说，人民解放军还没有一个十分巩固的后方。

冤家路窄

战争中，常常发生耐人寻味的事情。陈赓与胡宗南就是这样的一对。陈赓生于湖南，胡宗南长于浙江，两省之间还隔着一个江西省，相距数千里，一西一东，本无恩怨与仇怨。1924年4月，他们同时考入了黄埔军校第1期，陈赓被编在学生第3队，胡宗南被编在学生第4队。同年11月毕业，二人又都留在了学校工作，陈赓任黄埔第2期入伍生队连长，胡宗南任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少尉排长。1925年6月，他们都参加了平定刘杨叛乱；10月，又都参加了第二次东征。

可是，他们的信仰不同，终究会分道扬镳的。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成立后，胡宗南是骨干分子之一，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谬论，以博得校长蒋介石的欢心。陈赓见此情况，则针锋相对，驳得胡宗南体无完肤。胡宗南之流，也不甘心败垒，就寻找机会挑衅，陈赓等则大棒相还，揍得他们抱头鼠窜，作鸟兽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及其之后，蒋介石一直精心培养胡宗南作为他的忠实走狗、内战工具，希望胡宗南在“党国有难”时，能救其驾。可是这个胡宗南，就是不争气，在与红军作战中，屡战屡败。

1932年至1933年，胡宗南在鄂豫皖首先出马围攻红军，被徐向前、陈赓等率领的部队所击败。1935年在川陕甘边区作战时，又被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围困于川西北的松潘地区，几乎全军覆灭。1936年的陕甘宁边区山城堡战斗，胡宗南部被红军消灭了一个旅。消灭这个旅的红军主力部队就是红一军团第1师第13团，指挥员又是胡宗南的对头——陈赓。红军长征时，胡军尾随数千里，不但没有消灭了红军，相反，胡宗南一直扮演着运输大队长的角色，把蒋介石装备其部队的枪炮子弹、军需给养，源源不断地“送”给了红军。

如今，这对老同学、老对头，又要面对面的展开争斗了。蒋介石把胡宗南摆在西安，控制陇东、关中、豫西和晋南，以对付共产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共产党把陈赓布防在晋南，控制着华北右侧要冲同蒲铁路，肩负着阻止国民党军打通同蒲铁路的任务，又要保卫太岳、太行根据地，还要保障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直接策应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这对老同学，一方是崭新的全副美械装备，并掌握制空权，有飞机支援；一方是从日军和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三八大盖”枪，加上晋南的小米。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有如天壤之别。但是，谁胜谁负还需观看战局的演变。

晋南敌情

晋南，富庶之地，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坐镇西安之后，就日思夜想进犯晋南。

早在1945年8月下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胡宗南就派其第34集团军第16军假道山西开往河北受降。第16军由陕西省东部大庆关东渡黄河，在山西省永济县登陆，沿同蒲铁路经运城、临汾北运，沿途遇到阎锡山的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百般阻拦。胡宗南再三向阎锡山解释、保证，只是假道，决不滞留。阎锡山同意假道，但不准胡军进入太原，以防“鹊巢鸠占”！所以，阎军自始至终如临大敌，戒备森严，象送瘟神一样监督胡军离开山西省境。胡宗南对其下属说：阎老西把我们当作小偷一样防着！这口气实在令人难咽。事后不久，胡宗南冲破阎锡山阻拦，把他的第1军第1师楔入晋南，

逐步扩大地盘。胡宗南的气消了，可阎锡山却被气得鼓鼓的，操着重重的山西五台腔说：我怕什就来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走着瞧！

1946年5月中旬，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胡宗南部的第31旅、第167旅从陕西省境东渡，第78旅也进驻晋南永济地区。7月3日，胡宗南又令第47旅等部，源源开进晋南，扩大内战。

胡军所到之处，开始勒令群众“维持”，随后即大肆抢掠奸淫，逮捕屠杀无辜群众。敌人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愤怒与反抗。从此，胡军好似一头野牛，闯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想不出任何应付的办法，只好命令士兵，整天端着机枪，开着大炮，向解放区漫无目标的乱射瞎放。看见一个老百姓，也要放一枪，怕是游击队的探子！一阵微风，吹动了地里的庄稼，也要打一炮，怕是游击队在活动！

民谚说的好：兵二熊一个，将二熊一窝！胡军的如此处境，与他们的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的志大才疏、常打败仗分不开，特别是，他的部队一到晋南，就遇到了他的老对手陈赓及其部属，这就更使他“雄图”难展、“壮志”难酬！

确立方针

山西省侯马市。

第11旅司令部作战室里，第4纵队正在开党委会。

地形图前，第4纵队司令员陈质手持木棍，正在地形图上指指点点他讲述着：

“太岳解放区，处在华北的前哨。左侧，控制着华北要冲同蒲铁路，是国民党军全面进攻中的战略方向之一。国民党军对我中原解放区发起围攻之后，对晋南的进攻接踵而来。现在，胡宗南的第1师、第27师、第90师等部的6个旅，勾结阎锡山的军队，共7万多人，在晋南地区，向我大举进攻，企图在一个月之内，打通同蒲铁路的南段，席卷全晋南，寻歼我军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然后再与阎锡山军会攻上党，策应其主力向华北左侧要冲平汉线进攻。面对胡、阎两军的联合进犯，我们太岳纵队担负着战略性的重要任务：既要阻止胡阎军打通同蒲铁路，又要保卫太岳、太行根据地，还要保障陕甘宁边区东侧的安全，直接策应西北野战军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

我们第4纵队和太岳军区均隶属于晋冀鲁豫军区的建制。但是，由于晋南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它与西北战场的联系十分密切。因此，党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在遂行作战任务方面，第4纵队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

针对敌人的进攻态势，中央军委指示我们第4纵队的作战方针是：协同太岳军区的部队，在吕梁部队的配合下，在晋南方面，乘胡、阎两军尚未靠拢的时候，利用胡、阎两军的矛盾，集中纵队主力，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进攻。

陈赓司令员传达完中央军委指示后，接着说：敌情、中央军委的指示，纵队的任务，我传达完了，请大家讨论，我们怎么理解中央军委指示的作战方针，我们怎么利用胡、阎两军的矛盾，集中纵队主力，各个击破敌人？请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

陈赓司令员话音刚落，会场立即活跃起来。有的委员说：依我看，胡、阎的矛盾根深蒂固，既有历史根源，又有新的过节，可以说旧仇新恨，一起涌来。从阎锡山当政的第一天起，就把山西省看作是自己的领地，一切的一切，都要另立新章，不按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规定办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铁路和火车，轨距比人家的窄，火车比人家的小。这就是说，谁要想进入山西省境，就得乘他的火车，走他的铁路，否则，你就无法运兵、输货。一句话，你只要进入山西，就得受他制约，受他控制，事事都要请示他，通过他。否则，你就别办事！

他的这种作法，梦寐以求一统天下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欢迎，不会欣赏。所以，蒋的学生胡宗南深知校长意图，在对待阎锡山时，采取的政策是能占则占，能吃则吃，能吞则吞，早一天整垮阎老西，早一天为他的主子蒋介石消除心头之患！

陈赓司令员插话说：基于以上分析，我军与阎军作战中，阎军即便陷于绝境，胡军也不会拼死相救。

接着，那位委员又说了下去：

当前，阎锡山的内心也十分矛盾，他想让胡宗南帮助他打通同蒲路，却又怕胡军打通同蒲路，扩大胡军占领区的同时，也把他的部队“一勺烩”了，一起吃掉。基于这一点，阎锡山的部队在这次联合进犯中，不会轻举妄动，一定是以保存实力为宗旨，有便宜仗就打，无便宜仗就撤。综上所述，我纵队在粉碎胡、阎两军的联合进攻中，必须把重点对准胡军，放在打胡宗南部身上。

有的委员发言说：胡军在这次进犯中，会以一种十分傲慢的姿态出现。胡宗南是黄埔实力派的首领，是蒋介石精心培养的一张“王牌”，胡军的装备在国民党军中也是最优良的，其中第1旅曾是蒋介石的警卫团，且不说这个旅能不能打仗，单把这张招牌打出去，就足够吓唬人的。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些共产党人，天不怕，地不怕，不信鬼，也不信神，机械化、飞机、大炮，这些武器不能说威力不大、火力不强，但是，它们有很多的致命弱点，那就是我军与敌人越靠近，那些现代化的装备就越用不上。相反，越靠近敌人，就越能发挥我军的特长，用步枪、冲锋枪、手榴弹、刺刀解决问题。敌人怕近战、夜战，怕刺刀见红、白刃格斗。敌人越害怕，我们就越提倡，越发扬。打胡宗南，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那就是可以打出我军的威风来，打出我们的精神来、士气来，使敌人闻风丧胆，彻底摧垮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我们军心大振，民心大振，为打好今后的自卫反击战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讨论中，委员们进一步温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及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一系列教导。委员们异口同声地说：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军变劣势为优势，从而扭转战局的法宝。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北犯的胡军引调至运城地区，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纵队主力，消灭其中一部。

首战必胜

夜黑如墨，夜雨凄迷，雨点像坚实的冰弹从高空射下来，打到人们脸上，又麻又痛。道路崎岖，泥泞难行，摔得人们东倒西歪，站不稳脚、走不快路。整个的行军纵队如同一条蟒蛇，东摆西摇，在晋南大地上慢慢前进！

向北！向北！！再向北！！！一定把胡军调出来。

为了吸引胡军北进，以便在运动中歼灭其一部，陈赓司令员又一次召开了纵队党委会。经过讨论，决定主力先行北上，攻打洪洞、赵城、霍县、灵石等城，吸引胡军北上增援，转过头来再打胡宗南。这个作战方案报请中央批准后，陈赓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韩钧、副政治委员杨奇清

等，即率领部队北上，纵队负责同志中，只有参谋长刘忠留在翼城纵队司令部。

7月3日，胡宗南部第27旅、31旅、47旅、53旅、78旅、167旅，附重炮团、特务团等，即由运城地区沿同蒲铁路北进。7月10日，刘忠接到第3分区司令部的电话报告：胡军疯狂北犯，气焰十分嚣张，先头部队第167旅正向我闻喜进攻。第3分区司令员请示刘忠参谋长：“胡宗南冲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此时，陈赓等率领大岳纵队前线指挥所已经到达浮山。刘忠打电话请示陈赓。陈赓听他汇报完情况，回答说：我们纵队的几个人都听到了你的汇报，一致意见是部队停止北进，马上打胡宗南。纵队党委还决定：“这次战役由你指挥，第10旅旅长周希汉任副指挥。党委决定给你们7个团，即第10旅3个团、第13旅3个团，再加上第11旅的第31团。”

讲到这里，陈赓语重心长地反复叮嘱刘忠：“我们这个部队还没有打过胡宗南，你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过去有些人打过中央军，但为数很少了，而且如今都是干部了。我们这些打过中央军的老同志，心里对打中央军都有个底。我们的战士没有打过，他们就心中无数。所以，这第一仗，千万不能主观，必须关注到战争双方的各个方面，把这一仗打好。第一仗的胜负，关系极大，常会影响到以后的整个战局。关于这一点，毛泽东主席早在1936年12月，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讲得很清楚。据说毛主席这篇总结写成后，曾在“红军大学”作过讲演。那时，你是否已到“红军大学”工作了？”

刘忠说：“那时我还没去，我到学校去时，早已改名叫“抗日军政大学”了。不过，在‘抗大’时我们工作人员和学员都学过这篇讲演。司令员，你想告诉我的，是不是毛主席的这段话。”

说着，刘忠翻开过去的笔记本，念道：

“处在防御地位的红军，欲打破强大的‘进剿’军，反攻的第一个战斗，关系非常之大。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第一，必须打胜。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刘忠念完后，问道：“司令员，是不是这一段？”

陈赓高兴地答道：“对，对！就是这一段。我们要把主席的这段话，当作我们打好第一仗的座右铭！时时刻刻对照检查。”接着，陈赓又对刘忠说：这一仗，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口不要张得太大，一定要一口一口地吃。你们要集中3个团、4个团，甚至两个旅打敌1个团。如果一次吃不掉1个团，吃它1个营也好。抓住一个，吃掉一个，务求全歼，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嘛！这样，吃一个营，再吃一个营，把它吃得光光的。要跟敌人打夜战、打近战。白天不能打，白天部署、准备，晚上打！”在一个小时里，陈赓连续打了四次电话，反复叮嘱刘忠：第一仗一定要打好，第一仗关系着战争的全局！

闻夏告捷

纵队参谋长刘忠，福建省上杭人，今年刚刚四十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由于他的工作经历，养成了考虑问题周全，战斗作风细致等特点。他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曾当过上杭县赤卫军军需长，红军学校的排长，大队、团政治委员，军团政治部组织科

长，司令部侦察科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间，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第6分校校长，第129师第386旅副政委、旅长，太岳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日本投降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第10旅旅长。最近，由陈赓司令员提议：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同意，调刘忠任第4纵队参谋长。

刘忠参谋长佩服陈赓司令员的指挥才能，更佩服他敢打强敌、敢打硬仗的勇气，和善于创造战机、捕捉战机的智慧！所以，刘忠调任纵队参谋长后，很注意虚心向陈赓学习，与陈赓司令员密切配合。

刘忠放下电话，立即招来第10旅旅长周希汉，根据陈赓司令员的指示，制定作战方案：决定以第10旅全部，第11旅、13旅各一部共6个团攻歼敌右翼突出的第31旅，以13旅1个团监视曲沃城内的守敌。

第10旅、13旅受领任务后，当天夜里由曲沃地区出发，在夜雨泥泞中奋力前进，于7月12日进抵闻喜，分别集结在堰掌、孙家庄一线待机。

12日，敌先头部队第167旅也进到闻喜；第31旅进占我赵家庄、朱村、胡张镇等地；第78旅进到水头镇；第27旅进到夏县。胡军主力尚在夏县以南地区。

敌先头部队孤军深入我根据地70多公里，除曾遭到我游击队袭扰外，尚未与我主力接触，因而，队形比较分散，态度十分骄横，造成了我军歼敌的有利条件。

13日夜，我军依据拟好的作战计划，对敌第31旅发起攻击。首先在朱村、胡张镇歼敌第94团和旅直属队一部。14日夜，又在如意、下晁地区歼敌第92团和旅直属队全部，旅长刘铭钊跑得快，没有当成我军的俘虏。14日，由闻喜南援的敌第167旅第499团，也被我军歼灭了两个营。

陈赓司令员虽然没有亲自指挥这场战斗，但比亲自指挥还要费力用心。他既要从指挥者的角度去判断敌情、定下决心、处置问题，当然这些活动只能停留在心里、脑海里，以鉴别刘忠和周希汉指挥的有无失误之处；又要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观察作战双方的经验与教训。所以，自部队开进起，他的脑子一会儿也没脱离战场。他不断地接到刘忠的告捷电报，也不断地发出鼓励的回电。13日夜间，第一仗打胜了，陈赓简短而有力地发出回电说：“好！”第二次的电报是：“就这么打！”

15日，陈赓带领司令部的少数参谋人员，快马加鞭，赶到闻夏前方指挥所。他一见到刘忠，就风趣地连连朝刘忠作揖，嘴里反反复复地说：“好啊，好啊，打得好啊！开头难，开头难，开头实在有点担心，现在一块石头落地了。”

这个时候，刘忠已经五天五夜没有睡觉了，陈赓马上“命令”他休息。刘忠在作战室里往小床上一躺，立即进入梦乡，一觉睡了24个小时。

陈赓心疼地望着过分劳累的刘忠，心想：抓紧时间喘口气吧，马上就要投入新的战斗了。

16日，敌第47旅北援闻喜，我军在峨眉岭阻敌，予敌重大杀伤，挫败了敌人北援的企图。19日，水头镇的敌第78旅北上增援，其第232团第1营在东西韩村又被我军全歼。

经过十天激战，到22日止，敌第31旅全军覆灭，敌第47旅和第78旅也受到了歼灭性打击，闻夏战役以全胜宣告结束。

夜战万岁

7月25日，绛县横水镇第4纵队司令部里，正在召开干部会议，总结闻

夏战役作战经验。

陈赓司令员对总结这次战役的作战经验极为重视，从敌人向北开进、采用什么队形开始，到每日如何宿营，到用什么方式与我军接触、接触后队形如何展开、阵地如何选择、地形地物如何利用、火器如何配置、工事如何构筑、通讯联络如何沟通等等，敌人的一举

一下巧——动，敌情的每一变化，都在他的注视之中。他口袋中装着一个小本子，记录着由敌情变化使他联想到的一切。真是点点滴滴，包含万千。7月22日，闻夏战役结束的当天，陈赓司令员在前方指挥所——设在农民打麦场旁边一间挂满军用地图的小土屋里，亲自总结这次战役的作战经验。

这天夜里，他在打麦场上踱步、徘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一宿没有睡觉。他兴奋，因为打了胜仗。但他想的更多的是今后怎么办？这次战役摸到了用美械装备起来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的“脾气”，也找到了对付装备优良敌人的最好作战方法，那就是夜战与近战。但他怕自己想的不完全对，总结的不全面，23日拂晓，他把身边的几个参谋早早叫起，说了自己的看法和得出的结论，请参谋们讨论与鉴定。陈赓司令员懂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类的智慧与才干蕴藏在群众之中。

两天过去了，陈赓将军又想了两天，这才召开干部大会，总结这次作战经验。他取得了发言权，他要大讲特讲了。

陈赓说：闻夏战役是我军对美械装备的胡宗南部第一次作战。这次战役在参谋长刘忠、第10旅旅长周希汉两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达到了预期计划的消灭敌第31旅的目的，除此而外，还重创了敌第47旅和第78旅，所以说，这次战役取得了全胜。这些胜利，大家都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这当然值得我们庆幸、祝贺。我不知同志们除了看到这实实在在的胜利之外，还想到什么没有，想没想到我们思想上有哪些提高。比如，对胡宗南军队作战的特点和弱点，对我军坚持夜战、近战的作战方法战胜敌人的重要意义，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提高。我们不能白打这一仗啊！我们尽最大努力打胜这一仗，不光是为了消灭第31旅，更大的目标、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经验，取得今后每次都能打赢胡宗南部队的经验，这是最重要的，最值得高兴的。……

接着，陈赓司令员对这次战役取得的经验，作了精辟的阐述。他说：

“我军战士士气旺盛，勇敢顽强，能够各自为战，机动灵活，但是装备差、弹药缺乏、兵力少；敌人装备优良、兵力多，有时还有空军配合，但不勇敢、不善于夜战，恐惧我军的手榴弹、刺刀，缺乏肉搏勇气，又不能各自为战。如果采取夜战、近战，我军的长处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敌人的弱点也将充分暴露。每次战斗一打响，就和敌人扭在一起，他们的飞机、大炮都用不上，火力再强也没有用。敌人的长处不能发挥，斗志也会严重挫伤。夜战也是敌人最害怕的。夜间观察困难，敌人援兵不敢运动，害怕在野战中被我军歼灭。这次围歼第31旅，敌人有两个旅离第31旅就只有几十里路，但是夜间不敢行动，我军就能各个击破，将它一举歼灭。因此，对胡宗南军作战，应当采取夜间突然攻击，集中兵力坚决干脆消灭其一点或数点。采取勇猛迅速的攻击动作，充分发扬手榴弹与刺刀的威力，求得在近战中消灭敌人。至于作战的时间，以在黄昏攻击、拂晓结束战斗为好。轻易不作白昼的野外火力战，不得已时采取野战防御，但应注意野外伪装与隐蔽。平时部队还要特别注意侦察、通讯联络，加强夜间村落战斗、利用地形地物、土工作业等科

目的教练，战时尽量采取夜间行动……。”

从这次战役起，夜战、近战就成了陈赓将军指挥作战的基本战术思想。所以，他在临终前总结毕生作战经验时写道：

“在战术上，要强调夜战、近战。过去作战历来是敌强我弱。夜战，敌人观察困难，有突然性。我们可以利用夜色掩护接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都不习惯夜战，害怕夜战，火力不能发扬，指挥紊乱，士兵恐慌，甚至开小差。因此，我们的训练，要用迂回、包围、分割、穿插、渗透等等战术动作，和敌人扭在一起。这种打法，不但原子弹、导弹用不上，飞机、大炮也用不上。只要能和敌人扭在一起，就对我有利。因为我们的士兵觉悟高、战斗力强。为了打近战，部队要有最大的机动力，一下子分散，一下子集中，一下子搞到前沿，一下子搞到翼侧。近战兵器也要注意发展，不断研究改进。”

上述这段文字，是陈赓将军写在《作战经验总结——序言部分》，并没有展开写，在“序言部分”的结尾，他还反复强调：“近战、夜战是非常重要的，我还想再补充一些内容”。准备在正文中加以阐述、发挥，不幸的是正文没来得及写出，他就与世长辞了。

总结闻夏战役作战经验的干部会还在继续。陈赓将军在讲话的最后，表彰了作战有功人员，当然其中也有参谋长刘忠、第10旅旅长周希汉。

陈赓讲话完毕，刘忠参谋长说：

这次闻夏战役，名义上是周旅长和我指挥的，但作战方针、任务区分、兵力使用上，纵队党委和司令员同志都有明确指示，所以，要说这次战役指挥有方，那“方”就来自党委和司令员，所以，功劳应该归于党委和司令员。此外，这次作战中对敌情了如指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作战初期，我们俘虏了敌人的报话员，缴获了报话机，但我就没有想到“敌为我用”。司令员同志赶到指挥所后，立即找报话员谈话，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希望他能开机，收听敌人对话，为我军提供最新情报，也为他自己赎罪立功。报话员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很愿意做这件事。司令员的这一手，实在高明，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问题。我看今后是否形成一个制度，再遇有类似情况，也应照此办理。

总结会还在继续着……。

闻喜、夏县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胡军进攻气焰，增强了解放区军民的必胜信念。蒋介石、胡宗南将逃回去的第31旅旅长刘铭剑撤职惩办，第91团团团长李国培及第92团团团长柳际春判处徒刑，晋南前线指挥官董钊也受了一顿训斥。胡军遭此重创，再也不敢继续北进，所订的“三个月打通同蒲铁路”的计划，无限延期。

横扫阎锡山

闻夏战役后，老区人民看到子弟兵打败了装备优良的中央军，很是高兴，自觉自愿地展开了慰问子弟兵的活动，杀猪宰羊，做鞋送袜，送子参军，搞得轰轰烈烈。在此情况下，我军指战员更是严格要求自己，戒骄戒躁，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再一次体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

陈赓司令员为了诱敌深入，造成在运动中便于歼敌的有利条件，以摧毁胡宗南、阎锡山军队“南北夹击、打通同蒲路”的计划，我军便主动撤离闻喜、绛县等地区，大踏步地向北转移，进逼临汾以北同蒲铁路沿线，于8月14日夜，突然发起同蒲战役。为了迅速攻取洪洞、赵城两县城，王新亭指挥太岳军区第24旅等部队，主动配合第4纵队作战。第24旅于灵石以南的霍

县地区发动攻势，扫除了城东、城北的敌人大部据点，对霍县县城形成包围态势。24日夜，对霍县城发起攻击。攻城部队在强有力的火力掩护下，登城突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残敌不支，500余人从南门突围，向汾河西逃，我军追歼残敌于汾河两岸。9月1日，我军进占工业重镇富家滩。

到9月1日止，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陈赓指挥所部，连续攻占阎锡山部盘踞的洪洞、赵城、霍县、灵石四座县城。并协同吕梁军区部队攻占了汾西县城，歼灭阎锡山军1.2万余人。

同蒲战役的胜利，不仅重创了阎锡山部队，破坏了同蒲铁路的交通，粉碎了胡、阎南北合击我军的计划。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开辟了继续歼敌的广阔战场。

这次战役，在作战指挥上，陈赓司令员始终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导思想，大踏步后退，大踏步前进，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充分显示了我军在指挥上和战术上的主动性、机动性、灵活性，打得阎军叫苦不迭。阎军不想打时，我军逼着敌人打；阎军想打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

同蒲战役，我军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同时，也创造了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的良好榜样。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被新区的人民群众誉为“仁义之师”。中共中央特致电陈赓等，嘉奖第4纵队全体：“你们部队在自卫反击光复洪洞、赵城、霍县诸城时，纪律甚好，闻之甚为欣慰，望全军将士加以勉励”。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也打来电报，表扬嘉勉。

胡军北犯

1946年8月17日，胡宗南乘着他的专机，由古城西安起飞，越过黄河，降落在晋南名城运城市。在运城市他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部署新的攻势。

胡宗南说：“闻喜、夏县之战，是国军初战陈赓，失之大意，让陈赓钻了空子。今后北进，必须百般警惕，精心配置，以临战的姿态审慎推进，再有疏忽、大意之举，必定严惩，决不姑息！”

最后，胡宗南果断决定：以他的部队中战斗力最强的精锐主力第1师沿同蒲铁路北进，第30师沿铁路东侧经绛县、翼城向北，压迫我第4纵队主力于洪洞、赵城地区，尔后与阎锡山的部队协同动作，实施南北夹击，逼陈赓司令员与他们决战。

9月初，胡军北进至临汾、翼城地区。

9月5日，临汾城里一片忙乱景象。胡宗南晋南前线指挥官、第1军军长董钊，带着“天下第一师”进驻临汾城。

董钊的军司令部里，灯火辉煌。董钊带着得意的神情站在地形图前，向他的参谋长说：“我以11个旅之众，对他陈赓4个旅，他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下一步看他陈赓作何打算？在哪里出现？又以何种方式出现？”

参谋长请示：“是否向西安发报，报告我军进驻临汾。”

“当然，当然！告诉胡长官，就说临汾至浮山的公路以南，共军全被肃清，陈赓正向洪洞以东大山里逃窜！”董钊的口气，十分傲慢。

董钊，从今年5月份国民党军整编以来，一直情绪低沉，牢骚满腹。整编前，他是第38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整编后，他这个集团军总司令一下子成了第1军军长，虽然中将军衔没变，但他的职权缩小了。所以，他经常对他的心腹流露：1924年4月，他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时，被编在学生第1队。这个队最受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赏识。因此，同年9月，孙中山到韶关督师北伐时，这个队担任了孙中山的警卫工作。11月，从黄埔军校毕业时，这个队

的学员分配的职务最低是连长。而和他一起入校的胡宗南，则编在第4队，毕业后只当了个小小的排长……。董钊的言外之意，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当年还不如他。

今天，董钊一扫低沉情绪，显得特别兴奋。他心中在想：从当前的态势来看，自闻喜、夏县作战后，陈赓所部被他指挥的胡军逼得步步后退，眼下，陈赓手里只控制着洪洞、赵城、霍县三座县城了，从地理位置上看，打通同蒲铁路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9月中旬，胡军主力移至临汾地区后，董钊的部署是：

以整编第1师集结于同蒲铁路线上的临汾、史村、蒙城地区，以整编第30师集结于绛县、翼城、曲沃地区，完成了第一线部防。

以整编第27师集结于主力后侧，作为二线。以整编第90师第53旅守备后方。

火中取栗

在董钊找不到陈赓在哪里的时候，陈赓对当面敌情进行了分析，估计敌人基本完成进攻准备。敌人当前的进攻目标将是浮山县城。敌整编第1师可能沿临浮公路、第30师可能沿翼浮公路向浮山进攻。翼浮公路靠近我解放区，且多山地，地形复杂，由翼城来的敌人第30师必然加倍小心，不敢轻举妄动。而临浮公路两侧情况恰恰相反，多是新区，地势平缓，视射界良好，因此，由临汾来的敌人第1师的主力第1旅，新由河南洛阳调来，装备优良、战斗力强，但对地形生疏，傲气十足，有隙可乘。如果我军进逼侵占浮山的敌人，则第1旅势必前去救援。陈赓想来想去，总感到他的分析有根据、有道理，只要上述情况一旦出现，纵队不失时机地把主力集中起来，在敌人由临汾东进的过程中，我军突然由临浮公路北侧出击，包围歼灭第1旅于临汾、浮山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陈赓司令员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政委谢富治。谢富治没有吭声，只是淡淡一笑。笑得那样不自然，那样轻蔑！

陈赓没有生气，还是心平气和地对他说：你担心敌人会从东西两面向中央实施卷击。我的想法，就是刘伯承司令员破“一字长蛇阵”的打法，打这种仗，动作要快，卷击的敌人还没有赶到，我们早已结束战斗，打扫战场完毕，走得无影无踪。

听了陈赓的话，谢富治依然不放心。但好久没有说话。最后，他自言自语地、又好像是在下结论：“这等于火中取栗！”说完他看着对方，以他找到了一个适当的比喻而得意。

陈赓不为所动，还是和缓地对政委说：“你听说过赵城人和洪洞人当初分广胜寺山下泉水的故事吗？两地的人为分水打得不可开交。最后达成了一条协议：当众架起一口大锅，里面倒满了油，等油烧得滚沸，中证人把十个铜钱投进油锅里，谁家一把从滚沸的油锅里捞到几个铜钱就分得几股水。洪洞人不敢下手捞钱，说：你们赵城人先抓吧，抓剩下的铜钱数，我们就如数分水。洪洞人万万没有想到，赵城人一下子能抓到五个以上的铜钱。赵城人要抓了，在场的人鸦雀无声，眼睁睁地看着这‘油中取钱，惊人的一幕。一个赵城人走近油锅，脱去衣服，把胳膊伸进了滚烫的油锅里，一把捞到了七枚铜钱，为赵城分得了七股水。洪洞人见此情景，一个个傻了眼。”

陈赓讲完后，盯着谢富治看了一会儿，最后如同作结论似地说：这一仗能不能取胜，就看你敢不敢向滚沸的油锅里下手了！”

董钊就范

9月20日，胡军终于行动了。

董钊下令，第30师第27旅由翼城向浮山攻击前进；第167旅自史村出动，经大阳镇、塔儿山沿第27旅左侧北犯。这两部分敌军于22日侵占了我浮山城。随着我军的“败退”，敌人落入了陈赓司令员布设的网袋。

但是，坐阵临汾指挥的董钊，并未觉察自己钻进圈套，喜形于色地对参谋长说：“发报，向西安发报，报告胡长官，浮山城被我占领，陈赓在躲避国军势头，空军侦察也没有发现陈赓有应战迹象，依然向东北山区撤退。”

董钊没有忘记，他挨胡宗南训斥时下定的决心：走着瞧吧，我会拿出赫赫战绩让你改变对我的态度的。董钊现在心里美滋滋的，以为改变胡宗南对自己态度的机会来了。

战争，这个瞬息万变的魔棍，狠狠地打在了董钊的头上。第27旅、167旅连连告急，都说陈赓所部向他们的部队紧紧逼来。董钊这时如梦初醒，意识到又中了陈赓的圈套。董钊慌了手脚，立即召来第1师师长罗列，商定派第1旅沿临浮公路东去救援。军令难违，罗列命令第1旅第2团速去救援。第2团杀气腾腾地向东开进，沿途进展顺利，并没有遇到陈赓所部阻拦。

22日18时，敌第1旅第2团已经全部集结于官雀村。陈赓指挥所部立即紧紧地扭住了第2团。

要打敌第1旅，是陈赓早就下定的决心，也是最近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这次胡军沿同蒲路及其以东地区向北开进时，陈赓就密切地注视着胡军的一举一动，特别注视着第1师的动向。我军退出浮山后，下一步敌人如何行动，更是陈赓关切的重点。

正在陈赓对敌人动向尚未完全判明的时候，在闻夏作战中缴获的敌人报话机里，传来了第1师师长罗列的声音，他告诉第1旅旅长黄正诚：“在行动中当心临浮公路右面的高地！”黄正诚的答复是：“明白，请师长放心！”接着，罗列又和在浮山的第167旅旅长李昆岗通话，叮嘱他注意同第1旅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要李注意“浮山城西面的高地”。

陈赓一听，就明白了罗列所担心的高地，指的是塔儿山。当时，临汾至浮山间为我军占领区，公路以南山区是老根据地，其中有一高峰叫塔儿山，抗日战争期间为我军所控制。如今，敌人要沿这条公路行动，自然需要“当心”点。

陈赓回到作战室，在地图前面观测了好久，判明敌第1旅正在沿临浮公路东犯，策应浮山之敌；根据罗列的电话判断，敌第1旅第2团要在塔儿山北面的公路旁的村庄驻防，最有可能驻防的村庄就是官雀村一带。其任务是东西巡逻，维护这条交通线的畅通，保障浮山驻军的补给，一旦浮山告急时，也便就近增援。

针对这一情况，陈赓决心乘敌分散、立足未稳的时机，以突然的行动，出敌不意地首先歼灭东进的第1旅。

陈赓指着地图对大家讲了当面敌情之后说：我决心歼灭第1旅，这是蒋介石的王牌部队，胡宗南的发家老本。第167旅，这次我们歼灭不了，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闻夏战役歼灭第31旅后，我就想歼灭第167旅，但没能实现，只吃掉了它的一个营，这次看来还顾不上吃掉它，只能等以后再说了。

歼灭第1旅，具体的部署是：

第11旅（欠第33团）首先攻歼官雀之敌；

第 10 旅位于老姆村、合理庄，截断官雀敌人同临汾的联系，并阻止临汾敌人东援，相机捕捉敌人而围歼之；

第 13 旅位于南北韩略村，阻止浮山敌人第 27 旅和第 167 旅向西增援；
太岳军区第 3 军分区的部队向浮山佯动，钳制浮山敌人；

第 11 旅第 33 团向临汾的敌人近迫作业，迷惑和牵制敌人。这次作战部署，是个非常大胆的计划，西面临汾城，是董钊的大本营；东面浮山城，有敌两个旅；陈赓撒下两头，从中间下手，真是有如“火中取栗”、“油锅捞钱”。陈赓明白，东西两头的敌人会以几倍于我的重兵向中间卷来，并且附有重炮和飞机，对我兵器简陋、又没有制空权的三个步兵旅，而且敌人的二梯队也会很快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要吃掉敌人一个主力团，谈何容易！但这正是陈赓的性格：有胆，有识，果断，专拣硬的打。陈赓十分自信，略施小计，就会使董钊就范。

陈赓的部署，使得一些人提心吊胆。他们说：这一仗怎样开始，他们心里明白，却无法知道怎样结束。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还是一夜之间，全歼“天下第一旅”第 2 团，尔后迅速脱离敌人，不被敌人缠住？这很难说。官雀村恰好位于临汾到浮山的正中间，距临汾、浮山各 30 华里。对于机械化部队来说，30 华里意味着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小时的路程，这样大胆的设想的确没有先例。所以，有些同志提心吊胆，为这场未曾开始的战斗攥了一把汗，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命令已经下达，不便再提异议。一场使人不甚了解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包围二团

部队立即出动了！

前天的雨夜行军，为的是使自己销声匿迹，悄悄地进入大山深处，以待猎物放胆前来。现在时机来临，各旅领导带着全旅指战员迅猛地扑向敌人。

部队跑步前进。雨过天晴，秋高气爽，景物清新。太阳落在吕梁山顶，把霞光反射回来，映出了希吴岭紫色的群峰。大地暮色苍茫，又是遍地的青纱帐，敌人无法觉察我军的行动。大队人马矫若游龙，蜿蜒奔腾在山岭和溪谷中。

三位旅长——陈希汉、李成芳、陈赓，都很佩服陈赓司令员的胆识和手段：隐蔽接敌、伺机而动，接近到敌人跟前，迅速、突然发难，出敌不意。司令员了解自己的战士，也了解下级干部，懂得他们的心：敢打硬仗，敢挫强敌；愿打硬仗，愿挫强敌。他们对敌人的长驱直入，早已攥紧了拳头，忍无可忍了！

22 日 21 时，陈赓接到第 11 旅旅长李成芳报告：“天下第一旅第 2 团，全部集中在官雀村，我旅已到达官雀村西北。”

第 11 旅的报告很简单，但很振奋人心。陈赓眼里顿时射出希望的光芒——抓住第 1 旅第 2 团，这一局棋就活了，今后不管是红棋还是黑棋，都将由陈赓摆布了。陈赓立即命令李成芳：“包围官雀，迅速侦察，组织火力，部署进攻！”放下电话，他大骂董钊：“董钊狗胆包天，敢以一个第 2 团出城对我！”

第 1 军第 1 师，是蒋介石军队中嫡系的嫡系，胡宗南曾任这个师的第 1 任师长。以后延续下来，任这个师的师长，必须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第 1 师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全部美式武器，战斗力强。因此，这个师的官兵，历来高人一等，骄横傲慢，目空一切。其中第 1 旅第 2 团，曾作过蒋介石的

“御林军”。消灭掉这个团，会痛在胡宗南的心上，也会给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以有力的惩戒。

李成芳接陈赓命令后，通过侦察，发现第1旅第2团敌人比较集中，决定先以第31团主力由村西北、沿公路两侧突入村中，随即在发展比较顺利的公路南侧突破口，投入后续部队，猛插纵深，割裂敌人。为了迅速歼灭敌人，李成芳又令第32团加入战斗，并以一部由官雀村西南向敌进攻，分散敌人兵力火器，防止敌人逃跑。

为了各个歼灭敌人，李成芳集中兵力先打敌驻村西头的第1营。激战至黎明前，歼敌两个多步兵连和配属第2团作战的第1团团属战防炮连，迫近了敌团指挥所阵地，占领了该村的西部和南部。

我第13旅在当夜进至南北韩略村，发现村中没有敌军，忽闻官雀村方向枪声激烈，立即主动向西攻击前进，占领了官雀东侧高地，并以一部突进官雀村中。

这样，我军就以四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包围、分割了官雀村的敌军。我军第10旅照预定计划进驻老姆村、合理庄后，尚未发现敌人踪迹，周希汉旅长便将部队集结在合理庄附近，准备歼击临汾出来的援兵。

怕什来什

“第2团急电呼救，陈赓包围了官雀，战斗激烈！”

参谋长破门而入，手里拿着第2团呼救的电报，神情紧张地报告，顿时使董钊的司令部慌乱了起来。

董钊大惊失色，一时手足无措，冷汗涔涔，顺着脸往下流。情况太突然了，太出乎意料了。董钊对陈赓是领教过的。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陈赓的这一击，单单会打在第2团头上。他最怕陈赓这一手：拣对方的痛处打，而且采取夜间行动。当初，董钊考虑到共军的作战原则是：拣弱的打。董钊认为：因为共军弱，不敢打强。所以他才把一个强团推到了第一线。他万万没有想到：陈赓会专打硬的。陈赓选这个对象、这个地点、这个时间，真是用心良苦。第2团如遭不测，事关重大。第31旅全军覆灭，胡宗南赶到前线对他大加训斥，如今，言犹在耳。眼下第2团告急，他这位晋南前线总指挥，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一时董钊心乱如麻。

第1师师长罗列操着十分难以听懂的闽西南地方话催问：“请钩座明示，救援第2团，采用什么有力措施？”

罗列，福建长汀人。1926年10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之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当过陆军大学战术教官。1929年秋，因涉嫌为共产党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经多方力保获释。此后，一直在胡宗南部任职。1944年升任胡宗南部第1军中将军长。1946年5月，国民党军整编，第1军整编为第1师，罗列为中将师长，隶属董钊第1军。

罗列这一提问，如同火上浇油，一下子泼起了董钊心中的怒火。董钊能有什么措施呢？他只能命令第1旅旅长黄正诚带第1旅旅部和第1团连夜出城，去解官雀之围。接着，他对参谋长说：“命令第2团，固守待援，支持到天明。”

就在董钊给第2团下达固守命令的同时，一个变被动为主动的方案，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用第2团拖住陈赓，迅速调集部队，逼迫陈赓作主力决战。

董钊认为：他有11个正规旅在手，足可以击破陈赓的3个旅。于是，董

钊向参谋长口述了他的战斗命令：

“第167旅、27旅放弃浮山城，全力西援官雀；第1旅黄正诚旅长带全旅主力速速东援；其余各旅迅速向官雀推进。”

董钊下完命令，心里好像轻松了许多。他很自信，他的部署，别人——包括他的上司胡宗南也会满意的：以第2团为诱饵，诱使陈赓上钩。

22日夜对董钊来说，实在太漫长了，太难捱了。电报虽然立即可以发出，但见诸部队实施，也得等到天明。黑夜，对于董钊和他的部队来说，是个不敢涉足的禁区，尤其现在是遍地青纱帐，更加剧了他们害怕夜战的心理。可是时间不是一闪而过，而是一分一秒地在走，走到天明！董钊受不了这漫长的黑夜，他焦急，他不安，他坐不稳、站不住，他在作战室里不停地踱步。他担心一夜之间，陈赓吃掉了他的第2团，然后继续东撤，进入大山，使他的，也是胡长官的决战计划彻底落空。

第2团呼叫甚急：阵地被突破，共军攻势猛烈，现正进行村落战。

此时距天明还有4个小时，4小时是240分钟。在这紧急关头，每一分钟都有可能使战况发生急剧变化。此时此刻，董钊意识到陈赓此人，难以对付。即使十分小心、百倍警惕，也挡不住陈赓的出其不意。

战况十分糟糕，使董钊头痛。但是，这不好的战况又不能不向西安报告，让参谋长报告战况时，一并报告了他的变被动为主动的作战计划。

胡宗南接到电报，大发雷霆。他知道，陈赓对他的第2团绝不会客气的，第2团难逃厄运。这时，黄埔同窗，战场相见，各分高低的景象，一幕幕在他的脑海里闪现……胡宗南气急败坏地命令董钊：“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从东西两面夹击陈赓，解第2团之围。”

董钊一口答应一个“是”，这是他到晋南后第二次挨训斥了。

夜，好像故意与董钊作对，走得慢慢的，拖得长长的！

“钓”出一旅

我第11旅在官雀村一打响，陈赓就令刘忠参谋长带一部报话机，前往第11旅指挥所驻地陈村。刘忠刚把报话机架起，就听到罗列正用密码命令黄正诚：“进攻官雀！”

黄正诚着急了，大声叫喊：“司令官，别用密码了，就直接讲话吧！”

“好啊，你攻官雀是手段，目的是接出第2团，一起撤退。”

刘忠听到罗列与黄正诚的对话，马上打电话告诉第10旅旅长周希汉，同时也报告陈赓。陈赓这时也正站在报话机前，高兴地答道：“我也听见了。”

22日晚上9点多钟，陈赓打电话给周希汉，叫他速到纵队指挥所领受任务，并要他通知部队，作好立即行动的准备。

半小时后，周旅长来到了。陈赓一手举着蜡烛，一手拿着红蓝铅笔，走到地图前说：陈康在浮山以西佐岭地区挡住了敌人，李成芳正在围歼官雀敌第2团，临汾敌人焦急万分，第1旅旅长黄正诚准备率第1团东援官雀。你旅应于23日2时前，进至陈村、老姆村、王村之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坚决阻击敌人，保证李成芳翼侧安全，并积极创造条件，彻底歼灭东援之敌。

周希汉速返旅司令部，根据受领的任务、当前敌情和所属各团的作战特点，研究了部署：确定第30团坚守正面阵地；第29团待正面打响后，派一个营堵住敌人退路，并且监视、牵制临汾的敌人；第28团全部和第29团主力为旅的预备队，埋伏在来犯敌人的翼侧。

经过现地勘察，陈堰东南的陈村、老姆村位于山梁上面，由西向东都是

梯形耕地，因此决定第30团进行三线配置，一线阵地摆一个连，二线阵地摆两个连，所余两个营作为团的预备队配在第三线。

陈堰以北有一条由西向东的小山梁，与陈堰隔一条沟，部队隐蔽在小山梁后面，敌人极不容易发现。所以，周希汉旅长决定将第28团埋伏在陈堰的东北，第29团埋伏在陈堰的西南，旅指挥所在第30团与第28团之间开设。

23日凌晨2时前部署完毕，部队开始构筑工事，架设通信线路，沟通营、团、旅和纵队各级指挥所之间的电话联络。

陈赓司令员不断地要通第10旅，向周希汉通报李成芳、陈康两个旅的作战情况，并督促第10旅迅速完成迎敌准备。

23日凌晨4时许，第10旅派出的监视敌人的游动小组，在陈堰西南方向发现敌人，先敌开火，边打边退，将敌人诱入我军预设的阵地前面。

敌军迅速展开，并且很快地占领了陈堰村以南的高地，做好了攻击的准备。上述动作，敌人完成的干净、利落，不愧他们自己标榜的“训练有素”。接着，在四门山炮和迫击炮、轻重机枪的掩护下，用一个加强连的兵力，向我第30团第2营阵地发起了猛烈攻击。

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等敌进到我阵地前30米至50米的时候，所有火器猛烈还击，将敌火力压住，从阵地上甩出一颗颗手榴弹，炸得敌人东倒西歪，喊爹叫娘，一下子就使敌人伤亡过半。随后指战员们跳出堑壕，将残敌打退。

陈赓密切地注视着战斗的进展，当他知道敌人已被打退，就在电话里对周希汉说：“打得好！但不要麻痹，敌人是不会甘心的，要准备敌人再来十次、二十次……。”

果然，不出陈赓司令员所料。不久，敌人就以一个加强步兵连卷土重来。被我击退后，又增至二个连、一个营、一个加强营、最后增至二个营的兵力，从凌晨5时起到下午5时半，时针整整转了一圈有余，连续进攻十三、四次，全被我军击退。

硬汉陈康

在董钊的命令下，浮山敌人第167旅、27旅全力回援，扑向我第13旅——陈康的阵地。

陈康估计到他处的地位：对面是敌人两个旅的全部兵力和火器，背后是官雀。他的阵地距官雀太近，没有多大的回旋余地，只能死守阵地，抗拒敌人两个旅的猛攻。这预示着要有一场激烈的拼杀，惨酷的恶战。在敌人巨大的压力面前，他不能灵活机动，因为他要保证第11旅的官雀歼灭战，还要保障第10旅陈堰的作战。他这里一旦抵挡不住敌人的猛攻，那将使陈赓司令员全歼胡宗南“天下第一旅”的计划全部落空。

陈康登上西佐岭用望远镜远眺浮山，四周群山起伏，层层叠叠，连绵不断。在群山的环抱中间，形成一个小小的盆地。他的阵地正处在这个盆地的西部边沿。公路从他的脚下通过，他的阵地正处在敌人的回头路上，这是兵书禁忌的。兵书明确指出：归师勿遏。但陈康的任务，正是遏止敌人的归师，而且是超过他数倍兵力与火力的归师。此处的地形，又没有给陈康选择的余地。可以肯定：敌人会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挣扎向他进攻，以解官雀第2团之围！

陈康作了两线配置：以第37团的第1、2营在西佐岭一线构筑防御工事；第37团第3营，在南北韩略村布防，作为二线。第38团为旅的预备队。

23日上午11时，战斗打响了。敌人两个旅分两路向西佐岭展开攻击。至此，临汾到浮山的公路上全线打响，上陈到西佐岭仅仅30里长，敌我两方在上陈、官雀、西佐岭三处展开激战。大炮轰鸣，敌机狂炸，烟雾弥漫，火光冲天，大地、山岗、庄稼在震颤、在发抖、在毁灭，……。

陈赓司令员站在观察所里，注视着战场上的每一变化。但是，他对第13旅是放心的，因为他了解陈康，信任陈康，再重的任务交给陈康，都可以圆满完成。

陈康，湖北省广济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伍后，他从战士、班长、排长、连指导员、营长、团长、到旅长，一个台阶也没有跳过。所以，他不仅了解战士，也十分熟悉各级指挥员。他打起仗来，从来不拘一格，“战无常法”这句名言被他运用的尽善尽美。平时，他与他的下级和战士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没有一点首长的架子，当官的“尊严”。战时，他却像是换了一个人，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对完成任务好的单位与个人，从心里喜欢。对完成任务不好的，又没有什么客观原因，他就大讲特讲，一批再批。在战争的间隙，他就住到这些单位，帮助总结教训，寻找差距，使其迎头赶上。他的这种作风，很受下级指战员们欢迎。陈赓司令员，十分欣赏他不拘一格的战斗作风，所以，每当遇有不寻常的战斗任务，他总是首要的人选。这次，把抗拒两个整旅敌人进攻的任务，交给了陈康。

全歼二团

23日上午，正当我军第11旅在官雀与敌激战、第10旅抗击东进之敌一次又一次反扑的紧张时刻，陈赓接到了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歼灭第一旅”的命令，当即传达到所有参战部队，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士气，进一步增强了指战员们歼敌的信心和决心。第11旅旅长李成芳当即命令各团、营指挥员进一步查明敌军固守各点的地形，适当调整部署，重新明确任务，要有勇气，敢于大胆分割包围，逐个歼灭敌人。

当天下午5时，李成芳下达了向敌发起总攻的命令。分割包围敌人一个营的我第31团第1营，一举突破敌人固守的房院，经过两小时激战，将敌彻底歼灭。我第32团第2营，向敌第2营攻击，经过逐屋逐点争夺，突入院内，用刺刀、手榴弹与敌打近战，战斗异常激烈，我军无比英勇，有的连打到剩下一个人，还在往前打；有的班手榴弹打光了，就冒着极大的危险，把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拣起来再甩过去。就这样，一个院、一堵墙地和敌人争夺，打得敌团长王亚武直叫喊，向黄正诚、罗列、甚至向董钊求援！

23日夜里，陈赓站在观察所里，注视着官雀方向。围歼官雀之敌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

官雀已经是一片火海，在漆黑的夜里显得特别刺眼，手榴弹爆炸的火花看得清清楚楚。这时，陈赓想起，李成芳受领任务后，一再要求纵队后勤给他准备5000枚手榴弹。陈赓理解了李成芳的用意。现在李成芳正在发挥着这5000枚手榴弹的作用。透过望远镜，千言万语涌上了陈赓的心头：

他对李成芳和李成芳所领导的第11旅是信任的，第31团、32团都是参加过百团大战的，是久经战阵的。这开头的一仗就已表现出不凡的力量，真不愧是老部队。他想到当初区分任务、配备兵力的时候，正是考虑到，如果把3个旅同时撒开，包抄敌第1旅第2团，可能会以绝对优势一下子解决了敌人。但也不可能如愿。他现地勘察、看了地形之后，就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把李成芳放在当中，第31团、32团以攻坚破敌著称，可以打好这个硬

仗；把周希汉放在右翼对付临汾的敌人，因为临汾没有多少部队了，只剩下一个旅部和一个第1团，周希汉不仅可以挡住一旅的东援，并可以粘住敌人，直至歼灭；东面敌人是两个旅，把陈赓放在战线的左侧，挡住两个旅的援兵，陈康堪当此任。这样的部署，既可保证消灭敌第1旅第2团，还可捕捉到敌第1旅第1团。战况的发展、战局的进程完全按照他的计划在顺利进行。

此时，报话机里传来了敌第1师师长罗列与第167旅旅长李昆岗的对话。罗列说：“看来这次不是散匪骚扰，可能是陈赓主力，明日西进要当心些！”

李昆岗说：“不怕，可以算算嘛！我们兵力多，他的兵力少。只要亚武兄守得住，我们定能解他的围。”

王亚武，打仗凶猛，是个张飞式的人物，是胡军中有名的“闯将”，胡宗南很器重他。这次被围后，胡宗南曾在电话里亲自询问过他的情况。

就在罗列与李昆岗对话的时候，我第31团第3营在官雀向敌纵深猛冲猛打猛插，包围了敌第2团团部和团直属机关。该营爆破组在团组织的火力掩护下，实行连续爆破，很快开辟了通路。部队乘着爆炸的硝烟猛扑楼房院内，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逐屋争夺，激烈拼杀，于24日凌晨3时，彻底肃清了最后一股顽抗的敌人，第2团团团长王亚武被我击毙，数百名官兵被俘。

当机立断

黄正诚，黄埔出身，留学德国。他决心荡平共军，完成蒋校长“勘乱救国”的大业。初到晋南前线时，他趾高气扬，似乎拯救党国，非他莫属。可是，这第一天的战斗，就使他手足无措，狼狈不堪。他昨夜一出临汾城，就大吃了一惊。这丘陵起伏的土地，交通不发达的农村，对现代化装备的军队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他就要在这糟糕的地形上，施展本领、显露才华吗！一天的战斗，他领教了陈赓，他刚出城时的心情早已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怨天尤人。他哀叹：在这错误的地点，遇上了错误的敌人，打了这场错误的仗。

23日下午，坐镇临汾指挥的董钊，见黄正诚率部东援受阻，官雀第2团又不停地向他呼救，这糟糕的战况使他坐不住、立不定，于是他决定：亲自出城督战。

董钊出得城来，站在吉普车上，直接用报话机和黄正诚通话。晋南前线总指挥亲自指挥前线作战，真有一种不可一世的气概。

董钊的意图十分明确，在三个点上——浮山西援之军，临汾东援之军，以及官雀的第2团——同时展开攻击，会使陈赓应接不暇。但是，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却在原地踏步，七、八个小时不能前进一步，使他十分恼火。他在报话机里叫着黄正诚的名字，气急败坏地叫骂：“全副美械装备，又有八架飞机助战，连共军一个小小的土包都拿不下来，无能、笨蛋、草包！”

黄正诚被董钊骂得哑口无言。他恼羞成怒横下一条心：要给董钊看看，不打出个名堂来，决不回临汾城！决不见董钊！

此时此刻，隐蔽在陈堰村以北的我第10旅第29团的健儿，正在摩拳擦掌，憋足了劲，准备参加战斗。突然电话铃声响了，团政治委员吴效闵拿起电话，传来了陈赓司令员的声音：

“效闵同志，你知道吗？董钊骂黄正诚是草包，连个小山头都攻不下，董钊这个大草包决定，他要出城亲自指挥。你们团立即插到临汾至陈堰的公路上去，活捉董钊，动作要快！要跑步前进！除了带武器，其他的東西全留

下……”

陈赓司令员在战场上向来如此，哪里紧要，他就出现在哪里。遇到情况紧急，他就直接同团的指挥员讲话。第 29 团团长在闻夏战役中负伤住院未归，现在团里只有政委吴效闵一人主持工作。

吴效闵患疟疾正在发作，浑身颤抖。听到电话铃响，用颤抖的手接过话筒。话筒刚接近耳边，是陈赓司令员的声音，他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是！立即出动！”

吴效闵放下电话，立即率领部队抄小路直插陈堰以西、临汾以东。命令部队上刺刀，跑步前进！

吴效闵他们借着青纱帐的掩护，一口气跑了十多里路，上了公路，直到距离临汾只剩五、六里处，也没碰到敌人。侦察员听当地群众说，下午两三点钟有很多汽车来到这里，时间不长就又跑回临汾城去了。显然，董钊又变卦了，把刚刚伸出的头，又缩回了乌龟壳里。

第 29 团的指战员们有些泄气了。副政委康起华放声向部队喊道：“同志们，跑了军长，跑不了旅长，快去捉黄正诚！”

部队经他这么一鼓动，大家的劲头来了。部队快速回到陈堰村西北的一个高坡上，发现敌人正在向陈堰村寨西门转移。原来黄正诚被我第 30 团阻击了一天，伤亡惨重，害怕夜里在野外被我军吃掉，赶快缩到筑有寨墙的陈堰村里固守。

吴效闵看准这难得的战机，当机立断，决定攻击陈堰，打敌人一个立足未稳，措手不及。他召来各营干部开了个“诸葛亮”会，一面向上级请示报告，一面作攻击部署：第 1 营打西门，第 2 营打北门，第 3 营在村外，防止敌人从西南方向跑掉。同时派人与第 30 团取得联系。

任务下达刚刚半个小时，第 2 营就全部进了北门；又过了一会，第 1 营的前卫第 3 连也咬着敌人的尾巴进了西门，并顺手抓了 200 多名俘虏。因为是“神兵天降”，来得突然，俘虏直向我军叫嚷：“不要发生误会，咱们都是自己人！”

天色黑了下來，陈堰村的战斗激烈，村中一片火光。不久村东面也响起了猛烈的枪炮声，我军第 28 团也开始了攻击，两个营很快打进村里。

这时，第 29 团的请示已经得到陈虚和周希汉的批准，周希汉还给第 29 团配属了山炮连和工兵部队，以加强 29 团的攻击力量。

陈赓同意周希汉的整个部署，在电话里一再嘱咐：攻陈堰的部队多，从四面八方进入村中，要防止发生误会。他还特别嘱咐：要活捉黄正诚。

由于我军攻击的突然，一下把敌人捅乱了营。可是当敌人清醒过来的时候，立即凭借其美式装备，疯狂地向我反扑。一连七、八次都被打垮了。于是，敌人缩回屋内顽抗，在房顶上架起一挺挺机枪，一间房、一堵墙地与我军争夺。

敌第 1 团团团长刘玉树，土匪出身，少将军衔。他现在一手抡着一支手枪，象一头被困的野兽，在一所房子上跳来转去，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挣扎着，指挥着他的部队继续顽抗！最后他被我军撵的无路可逃，摔到了一个极度窄小的院落，站在那里，还是不停地叫嚷：“你们快把我毙了吧！我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我与你们不共戴天，你们抓住我，算我倒霉，你们想消灭“天下第一旅”，凭你们这几条不如烧火棍的破烂枪，那是妄想！”我军战士抑制着无比的愤怒，没有开枪把他打死，最后将这只困兽活捉了过来。

董钊服了

自从前线打响，接连几天几夜，陈赓一直没有离开作战室，也一直在对敌人无线电话进行监听。现在，官雀之战已近尾声，陈堰村正在激战。敌第1师师长罗列督促第167旅旅长李昆岗赶快向陈堰村增援，只听李昆岗说：“你听，敌人打来的炮弹就在附近爆炸，可是我们有准备，共军没办法，明天我就发起进攻，请师长转告黄正诚坚守！”

陈赓轻蔑地说：“只怕黄正诚等不到‘明天’就完蛋啦！”夜深了，陈堰村的战斗进展顺利。陈赓心想：第29团已经打进去了两个营，有把握了。平原作战，村落战，谁也比不上第29团，他们翻墙、打洞、上房顶最快。今夜一定能够解决战斗。陈堰村的战斗已临近结束，罗列还在报话机里给黄正诚鼓劲。罗列先讲了李昆岗明早发动进攻的“决心”；接着，他要黄正诚“固守待援”。黄正诚说：“我一定沉着应战，坚持到天亮，等到援兵的到来！”

听到这里，陈赓就给周希汉打电话。周希汉说：“我也听见了，黄正诚还在吹牛！”

陈赓说：“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队，黄正诚要坚持到天亮，我们一定要在天亮以前解决官雀、陈堰的敌人！”说完，陈赓笑了，笑得是那樣的自信，那樣的轻松！

周希汉马上打电话给各团。吴效闵听完后回答说：“保证天亮前解决战斗！”第28团团长周学义，也作了同样的回答。

黄正诚刚和我军接触的时候，还是非常狂妄傲慢的，罗列向他询问战况，他回答：“土匪骚乱，不足挂齿，请钧座放心。”为了赌气，嫌董钊骂他是草包，他决心不解第2团之围、接出第2团，决不回临汾见董钊。可是，当他在陈堰村过夜时，一被我军包围，就惊慌万分。开头还想凭借火箭炮等优势火力，向东面和西南方向突围，不料我十几路突击部队，一齐楔入村来。他在我军四面包围、几路对进、穿插分割的情况下，穷于招架，防不胜防，一些部队在巷战中被我歼灭，团长刘玉树被我活捉。瞬时速变的战况，对他的打击太大了，气得他两手发抖，脸色苍白。他万万没有想到：仗还没有打，一个团就完了。他不知道，我军是怎么进入陈堰村里的？一开始就打了个被动仗，成了近距离的巷战。他害怕我军的夜战和近战，他没有打夜战、近战的经验，更没有打夜战、近战的勇气！他没有任何办法，急得他只能在屋子里打转转。在这以前，频频向罗列、董钊呼救的是官雀的第2团团长王亚武，现在，轮到——黄正诚呼救了！

我军多路一齐楔入陈堰，使黄正诚明白了一条道理：国民党军是等上司的命令行事的，没有丝毫的主动精神；而陈赓的部队，下级指挥员和士兵，恰恰和国军相反，都有主动攻击精神，在战斗中都能各自为战，想方设法完成任务，正是这种精神，使共军神不知鬼不晓地进了陈堰。

我军打进陈堰，不失战机，立即展开巷战，使得黄正诚的武器无法发挥效力。加之，第1团长刘玉树被我军活擒，一下子把黄正诚置于了十分尴尬的境地。黄正诚怕董钊骂他“草包”，可他这一天多来的所作所为，让别人不说他“草包”，又能说他什么呢？越想他越感到前景不妙，他只有拿出他全身解数，来对付陈赓所部了！

董钊得到情况后破口大骂：“草包”“草包”，“一堆草包！”第2团之围未解，旅部和第1团又陷重围，并且团长当了人家的俘虏。现在是官雀与陈堰两处呼救，董钊又有什么良方妙策呢？

参谋长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说：钧座，我们中了陈赓的诡计，官雀的战斗，根据陈赓的攻击力量，今天拂晓就能解决战斗。但是，陈赓突然停止了对第2团的攻击。我们当时判断，是陈赓所部伤亡惨重，需要调整部署，补充兵力与火器；也认为第2团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是陈赓遇到了第2团这块啃不动的硬骨头，才被迫停止攻击的，现在看来，这种判断错了，错了，一切都错了。是陈赓以第2团为诱饵，钓我们的第1旅旅部和第1团出临汾，以便让他们消灭！”

参谋长的分析，说得董钊脸色一会变红，一会变白，实在难看至极，但董钊并不服气。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攻陈赓所必救？”

参谋长淡淡一笑，带有轻蔑的味道说：“毛泽东给共军规定的战术原则是：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这样他们就没有什么所必救的。而我们想围他们，又没有办法围住，想打他们，连个人影也找不到。可悲，实在可悲！”

“现在怎么办？”董钊下意识的提出了问题。

参谋长说：“固守待援，依然是第2团的老方子。或者命令第1、2团同时突围。”

董钊生气了：“突围就等于全军覆灭！”

参谋长也没示弱：“不突围，就请钧座速调第78旅吧。”

董钊也没有良策，开始在屋子里踱起步来。接着自言自语他说：来不及了，官雀和陈堰的防御已破，恐怕他们都支持不了多久了。”

突然，董钊停下脚步，质问参谋长：“黄正诚为什么不回临汾过

参谋长直言不讳：“攻不下上陈，钧座骂他草包，他没脸再见临汾父老了。”

董钊现在才意识到：近些日子，他如同作了一场恶梦。9月22日以前，一切都顺利，进驻临汾，攻占翼城，夺取浮山，事事如意，处处告捷，逼的陈赓步步后撤，处处失利。22日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战况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的部队处处被围，防不胜防，伤亡惨重，一败涂地！

董钊慢慢地低下了头，承认自己不是陈赓的对手了！

陈赓笑了

时间的车轮，已经滚到了24日凌晨3点多钟。现在战场的情况是：

我第11旅已经全歼官雀之敌，并打扫战场完毕，李成芳带着部队向北转移了。由浮山出发西援的敌第167旅、27旅正在拼命猛攻，我第13旅在陈康旅长的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攻击。陈堰村的残敌，由于刘玉树被我活擒，失掉了团一级的指挥，黄正诚直接指挥十分不便，一再失掉战机，因此，残敌早已丧失信心，无心再战。

第10旅旅长周希汉，对陈堰村的敌情了如指掌，他决心迅速消灭残敌，尽早结束战斗。于是，周希汉命令第30团在陈堰村东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阻击西援之敌；命令第28团第1营向南前出至合理庄地区阻敌增援；旅的主力集中全部兵力与火力，痛歼残敌；炮兵对敌实施抵近射击，工兵以湿棉被做成“土坦克”，逼近敌人盘踞的院墙，用炸药包、爆破筒为冲锋的部队开辟通路。

残敌狗急跳墙，施放催泪性毒气，妄图阻止我军进攻，以拖延时间，等待援兵到来。

我第29团第4连第5班长李新田，带领两名战士，冲过一道七、八十米

长的封锁口，闯进了黄正诚躲藏的一座高墙大院，机关枪、手榴弹密集的火力，把院子里打得硝烟弥漫，乌烟瘴气。新战士时来亮向一座窑洞甩出一颗手榴弹，正好打在窗口上，窑洞里的敌人慌了手脚，高声尖叫求饶，七、八个满脸灰尘的敌兵，从窗口里跳出来。后续部队涌进院来，收缴了俘虏的枪械！

陈赓此时监听到敌人报话机里，传来了越来越猛的枪炮声。忽然，黄正诚向罗列呼叫道：“敌人已经进屋了！……”话没讲完，一声非同寻常的巨响，报话机的音响，戛然而止。

罗列还不甘心，象招魂一样，在报话机里连连不断呼喊黄正诚的名字，叫声不绝。黄正诚的电台沉默了，再也没有任何回响。

陈赓司令员望了望电台，乐呵呵他说：“别叫了，你的黄正诚已经落到了第29团手里了。过一两天，你罗列要找黄正诚，就到我陈赓司令部里来找我吧！”陈赓的一句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勇抗援敌

24日凌晨3点多，官雀敌人行将彻底覆灭的时候，陈赓打电话给第13旅旅长陈康说：“李成芳在官雀的战斗就要打完了，要不要派兵给你支援？”

陈康向陈赓汇报了当前的战况，接着笑嘻嘻地说：“不需要麻烦李成芳老兄了，我们主攻‘天下第一旅’，不够资格，打敌人的援兵还是有把握的，请司令员放心，西援的敌人前进不了！”

陈赓听出了陈康的话里带有牢骚情绪，但他没有再说什么，把电话放下了。陈赓把陈康的话告诉了在场的参谋们，接着，他又对大家说：“陈康是水手出身，是个乐天派，什么时候他都嬉皮笑脸，高高兴兴，天大的困难他不在乎，再难打的仗，他不发愁，再硬的骨头，他也敢啃，能啃，啃出个名堂来！”

事实确实如同陈赓司令员所说。陈赓这次率第13旅主力，在东面阻击敌第176旅和第27旅西援，在西佐岭地区组织了顽强的防御，给围歼官雀之敌的第11旅赢得了时间，后因黄正诚的旅部、旅直属部队、以及第1团被围在陈堰村，董钊害怕第1旅全军覆没，命令第167旅和第27旅立即放弃浮山，全力西援，因此，战斗异常激烈。我第13旅指战员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每天都要打退敌人十几次集团式的轮番进攻。该旅第39团第2营、第3营伤亡均已过半，但指战员们为了保证官雀与陈堰歼灭战的全胜，仍然顽强阻击，决不后退半步。第8连第4班长赵小虎，当敌向我冲击时，怀着满腔怒火，赤手空拳跳出战壕，勇猛扑向敌人，用拳头将敌排长打翻，并夺获其美造自动步枪，继续战斗，打死了许多敌人，直到最后一息；第2营营长何光金，当我机枪射手牺牲后，挺身而出，不顾敌人炮火轰击，向敌猛烈扫射，大量杀伤敌人，最后光荣牺牲在阵地上。面对我军的顽强抗击，敌人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才突破了我第13旅的前沿阵地，我军即以机动防御、节节抗击的手段，消耗、迟滞敌人。最后，又在官雀村至韩略村之间组织防御，顽强地挡住了敌人，直到官雀敌人全部被歼，未让敌人越雷池一步。

“搜”黄正诚

战斗进展得出乎意料的顺利，9月24日拂晓4时许，就将敌人全部彻底歼灭了。这个整编第1军第1师第1旅，被胡宗南吹嘘为“天下第一旅”（又称“天下第一军”），在陈赓所部的打击下，已经不存在了。它的中将旅长黄正诚，曾经留学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学校，被吹嘘为“百战百胜的将军”，

同国民党其他部队相比较，这支蒋家御林军确实与众不同，全副美械装备，训练有素，战术、技术比一般部队高，士兵都是七、八年以上的老兵，受反革命宣传欺骗蒙蔽的毒害较深。因此，这支部队非常骄横。在行军路上，其他蒋军部队遇上它，都要赶快让路。可是，在陈赓所部的铁拳打击下，一败再败，直至最后彻底覆灭。

战斗结束了，摆在敌旅部附近的四门美式山炮，竟然一炮未放，就被我军缴获了。我们战士问俘虏：这么好的炮，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俘虏说：“你们一下子就包围了上来，炮还没有进入阵地，怎么打！”

陈堰的枪声停止不久，周希汉打电话问吴效闵：你们捉到了黄正诚没有？吴效闵回答：没有。有的俘虏说，黄正诚被炸死了。

周希汉想了一下说：“不可能，你们大炮、炸药包响的时候，黄正诚还和罗列在报话机上讲话，我听的清清楚楚，你们要好好搜索，别让他化妆逃跑了！”

按照旅、团的命令，部队开始了认真的搜索，把俘虏中一些穿马靴、外表模样象大官的都询问了一遍，仍不见黄正诚。敌副旅长兼参谋长少将戴涛、参谋主任少将顾铁、第1团团团长少将刘玉树，都找到了，唯独没有找到黄正诚。

东方呈现出鱼肚白，天要亮了。部队押着俘虏迅速撤出战场后，吴效闵带着几名参谋，来到俘虏集中的一片树林里，只见这些昨天还骄横霸道、不可一世的蒋家御林军，如今个个疲惫不堪、蓬头垢面，耷拉着脑袋坐在树下，有的背靠树干在“闭目养神”，有的还呆呆地望着陈堰村，好像在说：这个倒霉的村庄让我当了共军的俘虏，断送了我“戡乱救国”、升官发财的美梦。这个时候，十数架吊丧的美造蒋机飞临战地上空，围着官雀和陈堰兜圈示威，从浮山方向来救援的第167旅和第27旅，往这两个村发射着送葬的丧炮！俘虏们见景生情地自言自语：晚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吴效闵注目环视，忽然在俘虏中发现一个上身穿士兵衣服，下身着呢裤、脚穿皮靴的人，鼻梁上还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这人低垂着头，偷偷地向另一名俘虏背后挪动，神态很不自然。吴效闵走上前去问他：“你是做什么的？”

“书记官，我是书记官。”回答得很慌乱，此人好像在发抖。

吴效闵没有说话，紧紧盯着他的裤子和皮靴。他更加不安了，连忙解释说：“我确实是书记官。这裤子和皮靴，是我去年在西安结婚时朋友送的。……”

黄正诚作贼心虚，越解释破绽越多。经过查对，揭穿了他的谎言，他就是“名扬天下”的“天下第一旅”旅长黄正诚。

此时此刻，黄正诚的尴尬相惹得周围的俘虏哈哈大笑。黄正诚感到无地自容，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说：“我要见你们的陈赓将军。”

吴效闵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闷了半天，他才说出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你们打仗不按规矩。”

是的，我军打仗是不按他们的规矩。这大概是胡宗南系的军官吃了败仗后都要说的一句话。两个月前，我军在闻夏地区歼灭胡军第31旅时，曾经传出过这样一个笑话：俘虏大队经过闻喜县横水镇时，镇上老百姓围着观看，一位老乡问一个被俘的连长说：“你们‘中央军’不是厉害吗？怎么被解放军抓了俘虏？”

这位连长说：“不是我们不行，而是解放军打仗‘超过’了战术原则，

我们还没有拿起枪，架起炮，队形没有展开，就把我们捉住了。”

这位被俘连长蠢猪式的诡辩，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嘲笑。如今，这位学过希特勒操典、受过美国人栽培的中将旅长，也对陈赓司令员的指挥才能发出了蠢猪式的“埋怨”，理所当然地受到人们同样的嘲笑。

和吴效闵一同来“搜索”黄正诚的团副政委康起华又问了黄正诚一句：“规矩？什么规矩？”

黄正诚念念有词：“你们不按操典，偷偷摸摸，乱冲乱打。如果摆开阵势，凭我们的武器装备，和多于你们几倍的兵力，你们是打不赢的。……”

为了让黄正诚头脑清醒一些，康起华严正他说：“黄正诚，收起你们那套规矩、操典吧！你们打的是反革命战争，不得人心，不管按什么规矩打，用多么好的武器装备，最终注定要失败的！”

陈黄对话

陈堰村的战斗结束了，陈赓司令员满怀喜悦的心情打电话给陈康：“这次歼灭‘天下第一旅’，13旅虽然没有攻官雀，也没有打陈堰，但你们旅给攻官雀、打陈堰的第11旅、10旅挡住了援敌，赢得了时间，保证了他们翼侧的安全，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打。第13旅在战斗中守得住，打得漂亮，纵队党委决定传令嘉奖你们。你们下一步任务是：实施机动防御，掩护第10旅、11旅和纵队直属队撤出战斗，转移到安全地带。尔后，你们迅速脱离敌人，向北部山区转移。”

陈赓高兴地说：“坚决执行！”

接着，陈赓又给周希汉打电话：“第11旅在这次战斗中，守得住，攻得下，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当前，你们要防止敌空军的报复，快速脱离战场，撤至原出发地待命。”

周希汉答复“坚决照办”后，陈赓又接着说：“你安排好部队之后，带黄正诚到纵队指挥所来。”

纵队指挥所里，参谋们正在忙碌着整理这次战役的文书与地图，陈赓司令员虽然已经两天没有睡觉了，可他精神抖擞，毫无倦意，一见黄正诚进来，首先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这个个子高大却一脸晦气的败将。

黄正诚羞愧地低下了头。

陈赓问：“你是黄正诚？”

黄正诚低着头，先是不语，后来抬起头来，畏怯地望着陈赓：

“您是……？”

陈赓爽朗地答道：“我是陈赓，你们胡先生、董军长在黄埔和我是同期。”

黄正诚连连点头说：“久仰，久仰！……”

陈赓又问：“你们本来是要消灭我们的，现在被消灭的不是我们，而是你们，不知你对此作何感想？”

黄正诚带着非常丧气的神态，又把被俘时曾对吴效闵、康起华说的话重复了一遍：“国军自从进入解放区，就如同瞎子一样，不了解贵军任何情况，相反，贵军对我军的行动却了解的十分清楚，又善近战、夜战，我们的火力还没展开，就遭到了贵军的攻击，……”

陈赓已从吴效闵那里知道了黄正诚的托词，没等黄正诚讲完，就打断他：“是不是有点不服气？”

黄正诚小声答道：“我的部队还没有展开，就被消灭了，这不能说是贵军的高明。”

“你想摆开部队、拉开架式和我们打吗？妄想！”陈赓火了，指着周希汉说：“你去问他，是他打的你，他叫周希汉，我的旅长。”

在上陈阵地上，两个用望远镜对看的人，竟在这里面对面地站在一起了。黄正诚像作了一场恶梦，偷眼看了一下周希汉。

陈赓说：“你在上陈村的阵地上，陆空配合，步炮协同，兵力、火器全部都展开了，连续打了十二、四个小时，没有攻下我方一个小小的山包，这难道也是你的部队没展开！”

讲到这里，陈赓停顿了一下，以待对方领悟他的意思，然后又说：“告诉你，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不得人心的，你们的装备再好，火力再强，也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为的是消灭你这王牌军。为的是给无视中国人民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的蒋介石、胡宗南之流一个警告。”

黄正诚谦卑地坐在一旁，洗耳恭听，没再吭声。

陈赓这时转变话题，向黄正诚询问了一些有关蒋军内部的情况，最后转身对身边的人说：“带他下去，生活上给予照顾。”

黄正诚立正。

陈赓说：“我们不杀你，让你看看蒋介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面前惨败的狼狈相，虽然目前蒋介石还正在趾高气扬。”

大煞敌威

临浮战役，以歼敌主力“天下第一旅”全部、重创敌第27旅、167旅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一战役共计毙敌2000余人，俘敌2500余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斗的激烈，敌人的顽抗，尤其说明了我军指挥员、战斗员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即使像敌人“精锐”的第一旅，这样的“天下第一军”，也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

“天下第一旅”的彻底被歼，引起了蒋军内部的极大恐慌。胡宗南痛惜他发家老本的覆亡，大发雷霆。气得他不得不离开西安飞往晋南前线，要亲眼看看黄正诚和陈赓作战的战场，他的第一旅什么都是第一流的，竟然被陈赓轻而易举地吃掉了，并且是吃得如此干净，如此彻底。从士兵到旅长，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虏，无一幸免。这对他打击太大了，使他脸面无存。

飞机越过平坦的秦川，飞越秦晋交界的弯弯曲曲的黄河。胡宗南看到富饶的河东、晋南此刻是一片绿洲，真令人羡慕不已。胡宗南曾是得意的，因为他掌握了秦、晋、豫三省的把柄，晋南又是插手华北的跳板。形势曾使他得意忘形，只是在这里遇到了陈赓这个冤家对头使他扫兴。真是冤家路窄，中国那么大的地方，却总是狭路相逢。而且每次都是他想当勇者，却偏偏老是败在陈赓手下。胡宗南此时此刻的心情，就如同三国时的周瑜，哀叹“既生瑜，何生亮”时的心情一样。

胡宗南飞往临汾“整饬军纪”，进行“检讨”，部署北犯。同时也大骂了一通董钊，以此为自己挽回一点面子。

10月5日，敌又集结了11个旅的兵力，自临汾出发分三路北犯。陈赓决定以少数部队阻敌，并在运动中给敌以大量杀伤；而将主力转移到敌人的侧后，相机歼敌。

胡军这次北犯，凶焰大煞，11个旅“齐头并进”，猬集一团，畏首畏尾，行动极度迟缓。从甘亭到洪洞，仅仅30华里，竟然花了4天的工夫，平均每天只走7里半。经过临浮一战，胡宗南、阎锡山会师晋南，合击我军，打通同蒲路的企图，完全落空了。

功垂青史

这次全歼“天下第一旅”的胜利，是陈赓司令员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的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机动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强大的敌人的疯狂进攻下，在三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下，巧妙地利用了胡、阎两敌的矛盾，将运动战和游击战结合起来，指挥部队勇敢战斗的结果。

闻夏、同蒲、临浮，晋南前线的三战三捷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闻夏战役的胜利，取得了打败胡军的实战经验，增强了我军指战员战胜敌人的勇气和信心，给同蒲、临浮两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后两个战役又是前一个战役的继续和发展。三个战役连连告捷，充分表现了陈质将军出众的指挥才能。

陈赓部队在晋南前线的三战三捷，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表扬。刘伯承同志在晋冀鲁豫边区干部会议上说：“7到11月敌由主动到开始被动，同蒲方面打得很好，中央夸奖说是出乎意料之外。”

1946年9月25日，临浮战役刚刚结束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即向全军各部队首长发出了《关于陈赓部队作战胜利通报》，高度评价了这次胜利的重要意义和陈赓将军卓越的军事指挥艺术。《通报》说：

“一、我陈赓纵队三个旅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与胡宗南之第一师第一旅（即老一师，全部美械化，是胡的最嫡系），在浮山城附近激战两日，该旅被我全部歼灭，同时胡部第一师之一六七旅全部及二十七师之一团，被我击溃，损失惨重。

二、晋南战场，蒋军八个旅约六万人，而我军只有三个主力旅及一个地方旅，兵力上敌占绝对优势，四、五倍于我。除七月间被我歼灭二十七师之三十一旅外，此次又被歼灭一个旅及击溃一个旅以上，再次证明只要在指挥上集中优势兵力，可以坚决歼灭敌人一路，并可继续取得胜利。至八月间陈赓纵队攻占洪、赵、霍、灵及汾西五城，共歼阎军万余尚未计算在内。望以此例教育部队，鼓励士气，坚决歼敌。”

1946年9月26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为《向大岳纵队致敬》。社论中指出了这次临汾战役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时说：

“第一是该部与当地人民有血肉不可分的亲密关系”；“第二是太岳纵队指战员的沉着坚定，英勇善战”；“第三是陈赓和王新亭将军之指挥有方，机动作战，不斤斤于一城一市的得失，而专心致志于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善于出敌不意，攻敌无备。”

在解放战争开始后的7、8、9三个月中，陈赓纵队在晋南前线三战三捷，同粟裕部队在苏中前线的七战七捷，南北辉映，振奋人心。在这三次战役中，大岳纵队以4个旅的兵力，在中央的正确领导、解放区群众的全力支援和老区地方武装的积极配合下，先后歼灭了胡宗南军队两个多旅，歼灭了阎锡山军近3个旅（师），获得辉煌的战绩。

1946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指出，解放战争头三个月，我军歼灭国民党军，共计25旅，其中胡宗南的两个多旅、阎锡山的4个旅（师）中的近3个旅（师）是陈赓部队歼灭的。中央的这份电报，是在陈赓纵队进军晋西南地区的前夕收到的，全军上下异常高兴。陈赓同志亲自将中央这份电报向干部传达的时候，心情激动他说：在歼灭国民党军第二个25个旅的作战中，我们要多做点贡献！

谭政大将在井冈山和长征途中

张喜德

谭政（1906～198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谭世名。湖南省湘乡县人。早年任小学教员，投身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2月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秋收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秘书、第31团党委书记，红四军第3纵队政委，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长，红12军政治部主任，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主任、政委，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参加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江西修水县渣津。警卫团驻地。

明媚的阳光洒满小城，洒满警卫团驻地，南国的秋风吹过，使燥热的空气透过几分凉意。

警卫团的战士们在紧张地忙碌着、准备着，因为今天是秋收起义发动的日子，他们的任务是从修水出发，攻取平江，然后会合其他方面义军，攻取长沙。

原来，中共中央为贯彻“八七”会议关于“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在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有系统有计划的尽可能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12300470_0213_0的精神，决定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

8月中旬，中共中央特派员兼中共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回到长沙。18日，参加了以彭公达为书记、毛泽东为委员的新组建的省委会议。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并制定了秋收起义的具体计划，设立了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毛泽东为前委书记；行动委员会由地方党委负责人组成，易礼容（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为书记。最后，省委决定，9月9日，以破坏粤汉铁路和株萍铁路为信号，发动秋收起义。

会后，毛泽东乘火车途经株洲等地到达江西安源，具体布置秋收起义的军事行动。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湖南新省委书记彭公达前往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秋收起义的计划。

毛泽东在安源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着重讨论了起义的军事部署问题，决定起义在修水、铜鼓、安源3处同时发动，然后3路合击长沙。会后，毛泽东奔走于萍乡、醴陵、浏阳、铜鼓之间，深入发动群众参加起义。

1927年9月9日，岳阳至黄沙街、长沙到株洲街的两段铁路被工人农民拆毁，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

参加起义的武装共 4 个团，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1 军第 1 师，全军由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师长余洒渡，总指挥卢德铭。

第 1 团由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崇阳农民自卫军以及通城一些农民军组成，团长钟文璋，下辖 3 个营，共 2000 余人。第 2 团由安源矿警队和工人纠察队、醴陵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新亚，下辖 3 个营，1 个特务连及 1 个机枪连，近 2000 人。第 3 团主要由浏阳工农义勇队组成，团长苏先俊，下辖 3 个营，1600 人。第 4 团是国民党军队邱国轩部改编，团长邱国轩。

这样，按照既定计划，现驻修水的武昌警卫团及与其相汇的其他农军，便被编入第 1 团，并决定即日暴动，参加秋收起义，向平江进发。

“滴滴嗒！滴滴嗒！”紧急集合的军号吹响了。

部队总指挥卢德铭作了简短的讲话后，向部队授旗，宣布秋收起义开始，指挥部队向国民党反动派进攻。

第 1 团从修水县城出发，经马坳、渣津、朱溪厂，随即越过了平、修边界，12 日占领了平江县龙门厂。

第 1 团以收编的第 4 团邱国轩部打前锋，为右翼，第 1 团 2 营为左翼，第 1、3 营和师部居中。在起义部队向平江推进时，敌已在平江增兵 1 个团，邱国轩部又乘机叛变，并埋伏在距长寿街 15 华里的金坪附近。11 日，当第 1 团路经金坪攻打长寿街时，突遭邱部袭击，第 1 团遂腹背受敌。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损失枪人二百余”，“此役第 1 团团钟文璋失踪”12300470_0215_0。起义军被迫撤出战斗，向平江、浏阳、铜鼓方向转移。

此时，谭政任第 1 团团部书记，随部队一起参加了秋收起义。战斗中，在卢德铭等共产党员及广大指战员模范行为影响下，谭政也在激烈战斗的枪林弹雨中，穿梭似地做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救护伤员，掩埋牺牲的同志。谭政所以能在艰难困苦的时候，与部队战士患难与共，是因为他牢记着老团长卢德铭常说的一句话：“弟兄们，你们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7 年 9 月 20 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

天气格外晴朗。初升的太阳照耀着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沐浴在一片金色的光辉中。

广阔的操场中央，1500 多名面色憔悴、而又充满活力的指战员，列队整装待发。队前，一位身材修长、蓬松着满头厚发、身着老蓝布普通农民服装、脚穿草鞋、黑红的圆脸透出坚毅的青年，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在讲话。他就是秋收起义的领导者毛泽东，在向起义遭受挫折的队伍作动员报告。谭政坐在队伍里，静静地聆听着他崇敬已久的毛泽东的教诲。

原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后，虽然先后占领了几座城镇，但遭到优势敌人的围攻，形势发展对革命极为不利。

当时湖南全省有唐生智所属军队 35690 人，其分布情况为：长沙 6100 多人，湘东洛洋路及平、浏一带约 4700 多人，湘南 6700 人，湘西 13600 余人，湘北岳州驻熊震 1 个师 3500 余人。此外，非唐系军队 16900 人。全湘反革命军队总计 52590 人 12300470_0216_0。而秋收起义军只有 5000 多人，相差 10 倍。

由于力量对比相差悬殊，起义刚开始便遭受了挫折。毛泽东 9 月 14 日在浏阳上坪召开的三团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上，果断决定放弃攻长沙计划，改

向文家市集结。9月19日，秋收起义各路部队先后退到文家市。

文家市是湖南浏阳与江西的万载、宜春、萍乡交界的一个边陲山区小镇。这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大革命时期群众基础好。

部队进驻文家市后，立即在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研究部队下一步去向问题。最后，前委会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长沙，转兵向南，退到萍乡。为此，在出发前，毛泽东对起义部队的指战员进行革命的理想、前途、信念的教育。

毛泽东左手卡着腰，挥动着右手富有哲理地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12300470_0216_1。

谭政专心静听着他早已崇敬的毛泽东的讲话，细细琢磨着每字每句。他完全被毛泽东的讲话所征服。那耐人寻味、富有逻辑的哲理，那充满激情、钢铁般坚定的信念，使谭政感叹不已！

队伍出发了。队伍沿着毛泽东指引的方向前进着。

谭政怀着凝重的心情，带着毛泽东的激情与哲理，跟着毛泽东，消失在沸腾的人群中。

1927年9月29日晚。江西永新三湾村枫树坪。

浓黑的夜幕伴着连绵的秋雨，在这湘赣边界九陇山区茶陵、永新、宁冈、莲花四县交界处，有一个由陈家、钟家、上李家、下李家、三湾街组成的、有50多户人家的永新三湾村。

在三湾村枫树坪一座破旧的古庙里，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正在微弱的灯光下紧张地进行。会议通过了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的决定。

原来，就在谭政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从文家市里仁学校出发后，部队沿着罗霄山脉向南进军，一路爬山越岭，道路崎岖难行。由于疟疾、痢疾蔓延，病员大量增加，疲劳、疾病威胁着整个部队。

9月21日，部队到达萍乡县芦溪镇宿营。次日清晨出发，行至距芦溪镇15华里的山口岩，遭到江西军阀朱培德部特务营和江西第4保安团的伏击。起义部队仓促应战，损失很大。在此危急时刻，总指挥卢德铭亲自率领一个连，占领路旁高地，阻击敌军，掩护部队转移。敌军人多势众，抢占了附近的山头，居高临下，向起义军阵地猛烈射击。起义部队损失严重，死伤数百人，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

芦溪受挫后，起义部队中弥漫着消沉情绪。不少人以为失败已成定局，纷纷不告而别。瑟瑟的秋风染黄了路边的树叶，身穿五颜六色便服的起义部队，越走越显得稀稀拉拉。有的人干脆跑到队列外，一屁股坐在路旁休息；有的人擅自跑去采摘树上的野果子；有的三五成群，咬着耳朵瞎嘀咕；有的干脆开小差，逃跑了。有的干部军阀主义严重，以错对错，对士兵的错误，开口就骂，动手就打。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回忆说：“那时，逃亡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第1营第1连的1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的机会全部逃跑了，并

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12300470_0218_0

这一切，毛泽东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三湾整编的因素还有：其一，起义军从秋收起义时的 5000 余人，经过短短半个多月的战斗，只剩下不足 1000 人了。虽然还保持着师、团、营、连的架子，但官多兵少，枪多人少，事实上处于组织涣散的状态；其二，从部队的成员看，各地工农运动的骨干分子、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从旧军队出身的人，他们怀着对旧社会的刻骨仇恨和对新社会的美好向往，投身到革命洪流中来。在严重的考验面前，多数人表现是好的，然而也确有不少意志薄弱者悲观动摇；其三，从党的组织看，过去党以城市为中心，主要在工人阶级中活动。现在到农民中来，一部分党员干部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思想上产生了混乱，认为这样搞，革命前途无望。等等。

为此，当部队到达三湾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毅然作出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措施是：

第一，对部队进行组织整编。把 1 个师缩编为 1 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实际上只有第 1、第 3 两个营，每营 3 个连，加上原来的特务连，共有 7 个连队。多余的干部组成军官队。伤员与战斗员分开，成立卫生队。谭政被编入军官队。经过整编，人员虽然减少了，但队伍却精干了，战斗力有明显的提高。

第二，在组织整编的基础上，部队着手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根据北伐军中建立共产党组织的经验，进一步提出将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立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为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建立了党委集体领导制度。

第三，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长不许打骂士兵，连以上设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可监督军官；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的带兵方法；官兵生活待遇一样，吃一样饭菜，穿一样衣服。

三湾改编是从三湾开始，一直到古城会议才逐步完成的。

9 月 30 日清晨。

雨过天晴，部队集合在三湾村的枫树坪。灿烂的朝霞映红了雨后的三湾村。偌大的三湾村显现出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

部队首先宣布向秋收起义中阵亡的烈士致哀。站在军官队队列中的谭政情不自禁地哭了。他深切地怀念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同志。

毛泽东站在队伍前面，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

他兴奋他说道：“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他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说完，他又大声宣布：“起义部队的人，完全是自愿的。现在，愿留者留，不愿留者，根据路途远近，发 3 至 5 元钱的路费，开证明信允许离队。希望他们回到本地继续革命，将来如果愿意回来，部队仍然欢迎” 12300470_0219_0。

谭政默默地站在军官队的队列里，敬慕地聆听着毛泽东的教诲，回忆着秋收起义以后的日日夜夜。胜利，失败，挫折，困难，奋斗，牺牲……“啊！

共产党人，钢铁般的意志！”谭政的热血在沸腾，他的眼睛又湿润了，跟毛泽东跟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更坚定了！

10月3日，金色的阳光洒满枫树坪。改编后的部队又一次集合在枫树下，整装待发。火红的枫树，高大挺拔，枝繁叶茂，象一支支燃烧的通天火炬。枫树下，革命指战员精神焕发，红光满面。毛泽东宣布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2300470_0220_0。

一声出发令下，在三湾群众的热烈欢送下，谭政紧跟部队，迈着雄健的步伐，迎着朝阳，向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跟着毛泽东，去谱写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军官教导队的学习生活

1927年12月。井冈山宁冈砦市军官教导队。

井冈山的深秋，叶落草黄。秋风刮过，荒草落叶随风飘旋。刚刚扎根井冈山的工农革命军，缺米少粮，顿顿吃的是南瓜汤，缺布少衣，天天穿的是当初那身单军装。军官教导队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这个100多人的教导队，名曰“军官连”，实则是个集训队，过的是士兵生活，吃的是大锅饭，睡的是地铺，铺头的稻草常常冒出铺外，他们便弄来根木料或砖头挡住，这种“挡头”同时兼作枕头。

地铺上靠西墙一角的稻草窝里睡着两个人，合盖一床又薄又小的毯子，四只脚全都露在外头。这两个人，一个叫王大年，另一个便是谭政。

原来，自1927年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茨坪以来，为了训练下级军官，提高指挥员政治、军事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1927年12月，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砦市创办了军官教导队，由吕赤任队长。

教导队的学员，除了来自军队中的班、排长以及有培养前途的基层战士外，还有来自地方武装的指挥员，训练时间一个半月。受训的内容既包括军事方面的，也包括政治方面的。政治方面的内容有：政治形势的分析，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习，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方法、人民军队的宗旨与任务的学习与教育，游击区域或社会经济的调查与研究等。

受训期间，学员们还争分夺秒地学识字，学文化，还通过解释“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扩大革命武装”、“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等政治口号的学习，既了解它们的政治含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又学会了识字，提高了文化水平，把学政治和学文化结合起来。

军官教导队的学习，很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学习群众工作的策略与军事技术方面内容时，不仅在教导队内讲授基本知识和基本方法，同时还组织学员到附近乡村实地开展群众工作，学会如何做好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工作，使学员们在巩固、深化课堂上所学内容的基础上，提高实际工作能力。遇到战斗时，学员们拿起武器上战场，在战争中实践所学的军事理论与军事技能。

谭政东来就是个“书生”，入伍后也一直做文书、书记之类的文职工作，没有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更没有带兵打过仗，但却是一个很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于是，经组织推荐便参加了军官教导队。

王大年是秋收起义时农民自卫军的排长，作战非常勇敢，但没有文化。在军官教导队正巧同谭政编在一个班。两人各有所长和不足，相互取长补短。

大年教谭政学军事，谭政教大年学文化，相互帮助，亲如兄弟。

一个多月的军官教导队或军官连的生活，使谭政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与磨炼。每天“三操两讲”，谭政毫不含糊。

早晨出操，谁也没有谭政去得早。学习军事，他拼命的苦练。练持枪，练跑、立、卧三式射击，练投掷手榴弹。学习战术，和大家一起摸爬滚打。学政治，练演讲口才。在政治课的演讲会上，谭政演讲的题目是：《‘马日事变’和它的历史意义》。他的演讲获得了第一。

在军官连不平凡的学习生活中，经军官连党代表宛希先和廖春芳介绍，谭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多么难忘而又庄严的时刻啊！入党的仪式在党代表宛希先住的房子里举行。墙上挂有写着“CCP”的鲜艳红旗，入党的誓词是：“……阶级斗争，努力革命，牺牲个人，服从党纪，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从此，谭政成为一名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优秀战士。他决心在更加残酷和火热的武装斗争环境中经受更加严峻的锻炼与考验！

解放遂川显才能

1928年1月初。遂川。国民党县政府驻地。

山区的寒冬早已来临，蜿蜒起伏的群山覆盖着皑皑的白雪。座落在赣西南、井冈山脚下南侧的国民党遂川县政府驻地——遂川县城，已是兵临城下，危在旦夕。

本来，上井冈山不久，毛泽东曾考虑工农革命军向北侧永新发展。永新是一个拥有30万人口的县份，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群众基础好，党的工作开展得早，战略地位重要。然而，鉴于当时永新敌人驻军较强，遂川却没有多少敌人驻军，只有地方上的靖卫团，战斗力较弱。因此，毛泽东决定先打遂川，日后条件成熟时再向永新发展。

在砦市，毛泽东向整装待发的工农革命军作了战前动员。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等率千百人的队伍，离开砦市，翻山越岭，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层层积雪，向遂川挺进。

此时，红军部队已扩大了。原“三湾改编”的秋收起义部队已改成工农革命军第1团；在井冈山争取过来的袁文才、王佐的部队改成工农革命军第2团。这时，军官教导队的集训也已结束，谭政调回红1团任宣传队队长。

1月4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遂川城西北重镇、靖卫团头子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反动巢穴——大坑发起进攻。由于工农革命军全体官兵的英勇冲杀，不到3个小时，肖部全线崩溃，狼狽向各处逃窜。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次日兵临遂川城下。守城敌军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随即占领遂川县城。

工农革命军进入遂川县城后，店铺紧闭，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偌大的遂川成了一座死城。显然，这是由于地主豪绅的反革命宣传所造成的。群众由于受反动宣传的蒙骗，一时不了解工农革命军，所以纷纷躲了起来。

看来，军事行动没有政治工作的配合，是难以发生效力的。此时，政治工作、政治宣传、思想工作，真的要大显身手了。

工农革命军在前委领导下，组成一支支小分队，立即开展大规模的宣传工作。谭政带领他的宣传队，在遂川县城走街串巷大搞宣传。他们手持小红旗，逐家逐户地进行宣传。他们还采取大会宣讲、文娱表演等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通俗易懂、形象生动的宣传。

宣传队在向群众作口头宣传时，揭露了敌人的种种罪恶和欺骗政策，宣

传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和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性质和纲领，宣传工农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只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一定会翻身得解放，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权。

宣传队等还在墙上、门上写满了各种标语、宣传口号：“打倒土豪劣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工农要武装起来！”“工农革命军是保护穷人的军队！”“欢迎遂川工农起来参加革命！”等等。

你再看谭政，身着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的军装，身上斜挎着一枝盒子枪，胳肢窝下夹着一捆写好的标语，带领宣传队在大街小巷张贴。他还站在石阶上，打拍子，教少年儿童唱歌子：“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反侵略！反侵略！”

在进行革命宣传的基础上，谭政又和工农革命军一起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刚开始，群众怕反动阶级的报复，对于地主的不义之财，往往不敢接受。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们就采取新的工作方法，待夜深人静时，把豪绅的浮财送到群众家里。起初只是送一些粮食、现金等没有标记、群众又经常需要耗费的东西。这种作法深深地感动了群众。没过几天，很多群众走出家门，兴高采烈地挑着箩筐，跟着部队到各处打上豪、分浮财，出外躲避的群众也陆陆续续回到了县城，工作的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这样，由于军事行动与政治工作双管齐下，遂川县城的人民得到了解放。他们欢欣鼓舞，编了歌子高声地唱：

“过新年，
过新年，
今年不比往常年，
共产党军来到了，
土豪劣绅哭连连。
过新年，
过新年，
你拿斧子，
我拿镰，
打倒肖家壁，
活捉罗普泉……”

12300470_0224_0 在解放遂川的过程中，谭政的政治才能首次得到施展。

草林镇的群众发动

1928年1月下旬，遂川县重镇草林。

春节的烟火尚未散尽，草林的早春已经来临。由谭政带队的工农运动委员会和一个营的工农革命军及部分赤卫队，满怀火热的激情，开进这居住着600余户的集镇，深入各乡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乡村红色政权，开辟新区斗争。

原来，就在遂川县城解放、政治局面打开，遂川县城军民欢庆胜利、共度新春佳节之后，毛泽东、张子清、何挺颖、宛希先等领导人，又带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和地方政府，分成三路行动委员会，开赴草林、左安等乡村地区，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豪绅、分田地的游击暴动。

在很短的时间内，遂川全县迅速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阶级、肃清封建势力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在遂川江两岸的辽阔土地上，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摇摇欲坠，开始土崩瓦解。昔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豪绅地主，惶惶不可终日，成了过街的老鼠。广大人民群众，昨天当牛马，

今日作主人。席卷遂川全县的革命风暴，扫荡着一切污泥浊水、残渣余孽，呈现着一派人类新世界的大千景象。

谭政恰在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时调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带队来到草林圩，分赴乡村开展工作。

工作开始时，地主恶霸不甘示弱。他们勾结民团进行抵抗，分散粮食，隐藏贵重物资，以保护他们的家产和田园。

有的恶霸地主还到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切莫上当。说什么红军来了呆不久，国军马上就来收复遂川。说什么“红军一走，粮米没收。谁要是吃了分得的一粒粮，鸡犬不留全杀光！”

面对敌人的反宣传，谭政带领的武装工作队则是针锋相对，开展正面的宣传攻势。

在村头墙壁上，他们用石灰刷写了醒目的大标语；在村头的稻谷场上，他们说歌谣，唱歌曲，演出小剧目和打倒地主豪绅、戴高帽游街的活报剧；在群众集会上，宣传“埃先生”（即苏维埃）和革命的道理。

谭政带领的工作队与劳苦大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到当地几户地主恶霸有血债，有民愤，便把他们抓起来公审，又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挨饿受冻的农民。群众慢慢地被发动起来，揭发地主恶霸的罪行。

随着群众运动的深入，问题也越来越复杂，需要谭政的果断处理。

打开地主粮仓的粮食，可以分发给农民群众吃，但从地主夹壁墙里翻出的衣物、银元等浮财怎么处理？请示上级时间已来不及，因为当时已得到情报，敌人要来攻遂川，上级团部已先行转移，谭政只好“自作主张”了。

谭政拍了板，他通知各乡工作队，分头召开群众大会，把搜出来的衣物，全部分给群众，并告诉群众，地主的这些东西，连同分给大家的粮食，都是地主剥削农民的血汗和铁证，这些东西应该归还给农民。至于银元，就作为红军部队的薪饷，用于革命的需要。

在群众运动的热浪中，遂川的冬雪悄然融化，草林的草坪一片碧绿。工农革命军解放了这块土地，武装工作队开辟了这块新区的工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草林的早春，阳光明媚，和风煦煦。熙熙攘攘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了草林圩这片辽阔的草坪。这是草林镇前所未有的盛大万人集会，他们在庆祝草林镇苏维埃政权的隆重成立。

在万人群众大会上，一位个子不高、身着灰色军装、头戴军帽、脚穿草鞋、腰系皮带和盒子枪、腿打绑带、脸色黝黑的年轻武官，威风凛凛地登上了主席台，操着纯正的湖南腔，开始了他铿锵有力的演讲。这不是别人，正是谭政。

谭政宣讲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伟大成果，宣讲了共产党的基本主张。然后，谭政郑重宣布：“老乡们，遂川草林圩区人民政府成立了！这个区政府的正式名字叫‘工农兵苏维埃’。那么什么是‘苏维埃’呢？这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的新政府的名称，我们在‘苏维埃’前面又加了‘工农兵’三个字，就是说，我苏区人民经过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有了自己的新政权！”接着，谭政又拉大嗓门宣布：“遂川草林圩区工农兵苏维埃，属于井冈山苏维埃的组成部分。井冈山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家作了主人！”

谭政的讲话结束了。掌声、喝彩声、欢呼声经久不息，在这广阔的草林圩大地、春意盎然的井冈山区回荡……

新城战斗的对敌喊话

1928年2月18日。宁冈新城。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

初春的晨风，夹着寒意，不时地刮着。座落在宁冈东北面、距茅坪20余里的新城，四周被高大坚固的城墙围绕着。城内有数百户人家，国民党驻军300多人，地主靖卫团200多人。这是国民党宁冈县政府所在地。

在城外已埋伏了一夜的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正寻机向新城发起进攻。

不一会儿，新城南门慢慢打开。蒙在鼓里的敌军和往日一样，照常出南门操练。待他们放下武器准备做操时，突然喊声震天，埋伏在南门外的工农革命军一部一齐向敌军袭击。这突如其来的攻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慌忙逃回城内。随即，第1团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守城敌军发起攻击。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加上城墙牢固，一时敌我双方处于相峙状态。

原来，正当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掀起红色风暴的时候，江西敌军蠢蠢欲动，老军阀朱培德增调第27师第79团一个营至宁冈新城，妄图会同该地的靖卫团，伺机进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张子清在遂川得知敌人的意图后，决定攻打新城，击破赣敌的第一次进犯，巩固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迅速从遂川赶向宁冈茅坪。

第1团返回茅坪后，与刚收编的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第2团会合。

2月17日上午，前委在茅坪攀龙书院召开军事会议，部署攻打新城的作战计划。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第1团第1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之东门；第3营攻击南门和北门，以配合第1营的行动；袁文才带领第2团第1营埋伏在西门外，利用开阔地形，待机歼灭溃逃的敌军；王佐率领第2团第2营留守井冈山，密切监视遂川方向的敌军。

2月17日深夜，大地沉睡，四周异常寂静。做好充分准备的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张子清、袁文才等率领下，由茅坪出发，分两路向新城奔去。到达新城脚下，按照原定的部署，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待机进攻。

在棋山高地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子清等，决定佯攻南北两门，吸引敌人的火力，然后集中第、团的兵力猛攻东门，以打破缺口，迫使敌人全线崩溃，取得战斗的胜利。

根据指挥部的意图，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搬来了许多云梯、煤油、稻草。工农革命军一面用机枪向东门敌军密集扫射，用煤油、稻草火烧城门，一面架起云梯，组织突击队登城。

在第1团的奋力攻击下，东城门被攻破。接着，南门和北门也相继被攻下，守城敌军被迫向西门溃逃。

敌人发现西门外火力较弱，便产生错觉，误以为西门外工农革命军兵力不多，于是便打开西门，妄图向外逃窜。其实，在西门外埋伏起来的第2团，早已布置好了一张严密的大网。溃逃的敌人进入包围圈后，第2团会同前来围剿的第1团，向敌军猛烈攻击，把逃跑的敌人打得死伤遍地，很快结束战斗，胜利地占领了宁冈县城——新城，击毙、击伤包括营长王国贞在内的敌军300多人，生俘100多人，活捉敌县长张开阳。

新城战斗，从清晨打到傍晚。在战斗中，谭政英勇善战，特别是发挥了 he 组织政治攻势的本领。

谭政和他的队员们，从这个山头转到另一个山头。一会儿把红旗插在山巅，一会儿又插在山坡，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迷惑敌人。

当午后敌人准备突围时，谭政带领宣传队，在我军战士掩护下，开始对新城敌军喊话：“弟兄们，快投降吧！你们已被红军牢牢包围，你们逃不了啦！”

敌人无力还击，但不作声。谭政等又换了个位置大声喊：“红军优待俘虏，红军就要攻城了，快反正投诚吧，投诚过来才是活路！”

对于谭政等人的喊话，城里敌人的回答最初是谩骂，继而又是沉默。没过多久，敌人一个两个地跑了过来。谭政等对投诚者以诚相待，感化了投诚者。于是投诚者又返回敌群做守城敌军的工作。这样滚雪球，敌人三五成群、一个班、一个排地跑过来了。

在攻打新城的战斗中，谭政不仅把在军官教导队学来的知识（军事的和政治的），巧妙地运用于实践，而且在实践中又有发明创造。

新城战斗的对敌喊话，使谭政深刻认识到做好敌军工作的重要性。此后，谭政担负政治领导职务工作中，便把瓦解敌军工作作为军队政治工作原则之一。

毛泽东的首任秘书

1928年2月下旬。井冈山苍市毛泽东住所。

一轮朝日从东方慢慢升起，生意盎然的井冈山川、翠竹绿树，正沐浴在这春日的阳光下，显得格外雄伟壮观。可是，在宁冈苍市一幢大房子——毛泽东住所里，还夜寒未尽，灯火通明。伏案疾书一个通宵的毛泽东，此时正在吸着纸烟，深深地沉思着。可能由于过于劳累，乌黑的长发，使早已瘦削的脸庞显得更加憔悴。“砰！砰！”一个身着整洁军装的年轻军官，匆匆敲响毛泽东住所的房门。此人就是23岁的谭政，他是接受组织的指派，前来报到，担任前委书记即毛泽东的秘书的。

“请进！”毛泽东打开房门，热情地迎了出来。

“谭政同志，你从草林圩回来了！”毛泽东亲切地问道。

“是，毛泽东同志！”谭政有些拘谨地回答道。

接着毛泽东风趣地说：“前委目前只有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实际工作就咱俩来做。”

毛泽东又说：“你们在草林圩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搞得不错嘛！你先说说情况吧！”

随后，谭政把他带工作队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称赞谭政“搞得好！搞得好！”

谭政觉得在草林开辟新区工作中，自作主张把没收地主的银元作为罚款带回来用作军晌的处理上没有把握，不知对错，就把事情的经过、处置的原委向毛泽东如实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他说：“处理得好！处理得好！我们每人都可以发两元钱的军晌了！”

毛泽东又问谭政：“工作队的事完结了没有？”谭政慢条斯理地回答道：“一回来，就汇报过。我带的那个工作队也归建了！”然后，谭政把复写出来的一份工作报告递给了毛泽东，并说：“这是我的工作报告，不妥当地方，请您指正！”

“那就把你的行李搬过来吧，你就住在外面这屋里！”毛泽东接过报告放在桌上，并指着外屋说。

然后，毛泽东又接着说：“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帮忙的。”毛泽东又指了指桌子上已写成的厚厚一叠子草稿说：“你看，这不，为湘赣

边区党的二大写了个决议，还没找到人抄写呢？你来了，先把这件事办办。”

就这样，谭政成了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第一任秘书。

这位未来的共和国主席、党的领袖与未来的共和国大将，在这幢简陋的草屋里居住着，交谈着，工作着……

井冈山的日月星辰伴着毛泽东、谭政共居的草屋，从春夏走过秋冬，从黑夜迎来黎明。

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毛泽东共居一室，朝夕相随，他从毛泽东身上学到的东西可真不少。

秋收起义部队刚上井冈山不久，前委决定工农革命军第 1 团由团长程浩、副团长韩壮剑、参谋长徐庶指挥，下山去打茶陵。当时，毛泽东没有跟部队下山。但恰恰在这次军事行动时，团长程浩等人与国民党部队暗中勾结上了，准备回井冈山拉留下的部队一起投靠国民党，这是一起十分严重的叛党、叛军政治事件。

然而，毛泽东在处理这起事件的过程中，态度是十分冷静的，方法是相当高超的，表现了一个伟人的魄力与策略。

事件发生的当时，毛泽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亲率部队把攻打茶陵的第 1 团接回井冈山，稳住部队的情绪，摸准事件的真相。

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耒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了如何处理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并果断决定：召开干部大会，公开揭露、宣布程浩等人的叛变罪行，以教育我们的部队。

在耒市干部大会上，根据前委的决定，毛泽东总结了部队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当众宣读了程浩等人的十大罪状。其中一条是：阴谋叛变投降方鼎英。

然后，毛泽东问大家：“大家说，对于程浩、韩壮剑、徐庶该怎么办？”接着，按着大家的意见，便将程浩等人捆绑起来带走处决了。尔后，毛泽东又宣布了新任命团长、党代表、参谋长的名单。

毛泽东对这一军内重大案件断然处理的重大举措，对谭政的教育与影响是相当大的，这对后来谭政对某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产生了深刻的启迪作用。

谭政在任秘书期间，又直接参与毛泽东对陈伯钧枪走火打死人案件的处理。

那是 1929 年的一天，一个被五花大绑的青年军官，被士兵簇拥着，送到前委办公室的房子里。谭政一见，这不是陈伯钧连长吗？没有细问，谭政急忙去报告了毛泽东。

毛泽东不慌不忙地从屋里出来，让士兵松了绑，说：“你们先到隔壁房里休息去吧！”

谭政奉命通知其他前委委员来毛泽东住所开会。

会议开始了。

委员们对陈伯钧枪走火打死军官教导队队长吕赤事件，争论不休，各抒己见。有的说，这虽是内部事件，但也要严惩。多数人认为，打死人就得偿命，陈伯钧应当枪毙！

谭政作为秘书列席会议并担任记录，他为陈伯钧的“死罪”暗暗吃惊。

按照惯例，前委会议讨论决定问题，一般都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今天，到会的除毛泽东一人尚未发言，其他人都同意从严处置陈伯钧，这不就等于判了“死刑”吗？

毛泽东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慢条斯理地说：“已经死了一个，还要死第二个吗？”

前委会在毛泽东提议下，又研究了一番，一致同意从轻处理，但提出：“可以不枪毙，但要打屁股！”

毛泽东风趣地说：“屁股也不要打了吧，要打，打个手板就可以了。”

陈伯钧含着泪水来到前委会会场，向在场的人深鞠了一躬，说：“我对不起吕赤同志！”

陈伯钧把手伸给毛泽东，说：“毛委员，打我的手板吧！”毛泽东拍拍陈伯钧的肩膀，说：“伯钧同志，接受这个血的教训吧！手板也免了。”

陈伯钧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失声大哭起来。这哭声饱含着对吕赤同志的内疚、悼念，饱含着对自己错误的自责、反省、悔恨，饱含着对党的治病救人政策的感激！

毛泽东对陈伯钧事件的处理，教育了陈伯钧，教育了同志们，也深深地教育了谭政。

井冈山的深夜。星光灿灿，春风拂拂，夜幕下的毛泽东、谭政住所四周显得格外寂静。

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谭政，又开始了夜间的工作，不时穿插着推心置腹的交谈。

在谈到井冈山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向谭政：“你还记得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不就地做群众工作、不打土豪筹款的错误吗？他们不懂得工农革命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还有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的任务，说这是地方政府的事。而当时我们成立起来的县政府呢，又没有担负起新政权的职责，还是沿用旧政府收税、审案、过堂一套官僚老办法，不替人民群众说话、撑腰、办事情，还能不失败？有失败，才会有成功。谭政，你信不信这个话？” 12300470_0234_0

谭政似懂非懂，愕然地支吾着。

毛泽东看出了谭政的不解，又进一步地举例道：“你还记得秋收起义攻打县城，还准备打长沙、打了败仗那个灰心丧气的狼狈情景吗？要不是打了那些个败仗，还不会使人们认识到攻打大城市战略方针的错误！也由于吃了败仗，碰了壁，才逼迫我们上了井冈山，你说是不是？” 12300470_0234_1

谭政经毛泽东这么一解释，心中顿时悟出了道理。

毛泽东紧接着又问谭政：“要不是总结工农革命军打茶陵的经验，纠正了茶陵新政府的错误，你谭政能把遂川打土豪得来的钱带回来做军饷吗？”

12300470_0234_2

谭政心中的疑团，被毛泽东这深入浅出的比喻化解了。

谭政还断断续续地向毛泽东提出了红军的政治工作问题，红军的成份问题，对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对俘虏敌军官兵的改造问题，红军内部的民主问题，等等。对此，毛泽东都耐心而又说理地给了满意的回答。

时光一分一秒地过去，问题一个又一个地提出。当他们还你来我往谈趣未尽的时候，朝霞已遮盖了那暗淡的灯光。又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不眠之夜。

整顿军纪

1928年5月4日。宁冈砦市砦溪河滩。

蔚蓝的天空，飘着朵朵白云，鲜艳的杜鹃花，盛开在山山岭岭，弯弯曲曲的碧溪河，唱着歌儿，流向远方。宁冈砦市的砦溪河滩，沉浸在节日的气

氛中。

今天，井冈山军民庆祝朱、毛两军胜利会师暨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大会，即将在这里举行。

一大早，穿着整齐军装、佩戴着红袖章的毛泽东、朱德两部指战员，以及数千名湘南农民自卫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进入会场。从宁冈、井冈山、遂川、永新、酃县等地赶来的人民群众，也兴高采烈地拥入了会场。

会场周围，贴满了五彩缤纷的标语。主席台上，插满了鲜红的旗帜，为大会增添了热烈的气氛。整个会场，人山人海，水泄不通。

大会由陈毅担任执行主席。

在一片锣鼓声、鞭炮声、军号声、欢呼声中，陈毅首先向全体军民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已正式成立。接着，他宣布了第4军的组成及领导人名单。

在庆祝大会上，毛泽东、朱德、王尔琢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毛泽东在讲话时，代表军委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三大任务、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要求每一个指战员认真执行，付诸行动。

谭政坐在主席台的一角，感到格外兴奋。

为了布置会场，迎接红4军新的领导人，谭政跑前跑后，忙个不停。他那平日严肃、紧绷的面孔，今日也笑容可掬。

井冈山会师后，红4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会剿”，接二连三地打了几个胜仗。然而，在胜利的凯歌声中，红军内部政治工作基础薄弱的缺点也日益暴露出来。

对此，谭政心急如焚，想方设法给以妥善解决。对于红4军在永新县城违反城市政策和部队内部违纪等问题，负责检查、整顿这一问题的谭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给前委的报告，强调了军纪的重要性。

毛泽东对谭政的报告十分重视，他看过报告后批示道：“军纪是军队的命脉。”

为毛泽东抄写《井冈山的斗争》

1928年11月。茨坪毛泽东住所。

呼啸的北风，夹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吹落在茫茫无际、重重叠叠的荒郊野岭。井冈山的冬寒，已经降临。

在茨坪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有两个人正在不分昼夜地紧张忙碌着。里屋，毛泽东在全神贯注地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即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井冈山的斗争》。外屋，谭政在聚精会神地抄写。

半年以前，即5月2日，毛泽东在永新县城曾以中共工农革命军第4军军委书记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报告朱、毛会师后的基本情况，并提出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和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根据地的建议。

6月4日，中共中央收到由江西省委转递的毛泽东5月2日的信件后，于当日复函朱、毛并转前委诸同志，该信题为《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信——关于目前形势及今后的任务与工作》。

中央六月来信，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肯定了朱、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制定了边界党的工作方针、原则和政策，指出了边界党组织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巩固与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为使井冈山根据地党组织收到这封重要的信件，中央复写了4份，两份

由湘赣两省委各转边界 1 份，两份交两省委阅存。

由于交通不便，中央 6 月 4 日指示信，经过江西省委与吉安县委，11 月 2 日才到达边界。

接到中央重要来信后，正在遂川开展群众工作的红 4 军立即返回井冈山。11 月 6 日，边界特委召集 30 余人参加的会议，讨论了中央来信。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认为中央来信除主张废除党代表制与游击区域过宽之外，“全部原则及政策都切合实际，应依照执行” 12300470_0237_0。特委还把这封信交给军队及地方各级党组织传阅、学习，以便共同遵照执行中央来信的正确指示。

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精神，在 11 月 6 日的会议上，重新组成了前委，毛泽东任书记。3 月份，曾因湘南特委的要求，前委被取消，至今，遵照中央的指示，又重建前委，以领导红 4 军军委与湘赣边界特委，使井冈山根据地有了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

正是在这一变故下，毛泽东接到中央来信后，代表前委写长篇报告给中央，总结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历史经验，阐述红色政权理论，答复中央来信。

毛泽东在写这篇报告时，谭政正在前委给毛泽东当秘书。此时，井冈山已经历了八月失败的考验，井冈山的冬寒使人格外难以忍受，部队的生活动常艰苦，缺衣少吃。

这篇报告，毛泽东是断断续续写成的。部队一面打仗，毛泽东一面写报告，部队转移一个地方，毛泽东写一部分。写成一个部分，谭政使用工整清晰的字体抄写一部分。抄写完了，再交毛泽东修改。这样毛泽东反复修改若干次，谭政抄写多次，《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谭政几乎能一字不漏地背得下来。

1928 年 11 月 25 日，经过近 1 个月的昼夜奋战，毛泽东代表前委写给中共中央的答复信，即《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写完了。

谭政甲很薄的纸张复写了两份。这两份报告，也是谭政派人送走的。

谭政的秘书工作，做得十分认真。他抄清的报告与原稿校对两遍，真是一字不差，毛泽东校阅后对谭政真是赞不绝口。他夸奖说：“你谭政抄得好啊！两套文稿，上面写上：一套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套由江西省委转中央。”

最后，谭政找来送报告的交通员，当面告诫：“就是脑袋掉了，也不能把这件东西让敌人拿到！”

这样，谭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将近一年。无论生活多么艰苦，工作多么劳累，他总是兴致勃勃，精神焕发。一年的时光，在谭政的一生中，是多么短暂，可又是多么难得，多么宝贵呀！一年里，毛泽东对他的教诲与启迪是具有历史性的。

转战赣南、闽西

1929 年 1 月中旬。红 4 军转战赣南、闽西。

和煦的春风吹过丛林，山冈的积雪日渐融化。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彭德怀率红 5 军和红 4 军的一个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 4 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扩大根据地。

1929 年春节刚过，因工作需要，谭政依依不舍挥泪告别共事一载的“老上级”毛泽东，调到红 4 军第 31 团，任团党委秘书。

“谭政——‘谈政’，名符其实喽！”

这虽是毛泽东在谭政受命第 31 团党委秘书时，同他开的一句玩笑。却铸

定了谭政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谭政虽说是团党委秘书，实际上已是独当一面的团一级党代表了。

部队就要开始向赣南、闽西进军。作为一个团党委秘书，党代表，他深知这次军事行动的艰苦性和自己承担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

谭政一次又一次地深入部队，给部队讲政治课，作政治动员，进行队前讲话。

在谭政“谈政”的鼓动、教育下，将要出征的红4军第31团战士，个个精神抖擞，英姿焕发，决心做好思想、物资准备，打好这一大仗。

谭政在进行战前动员的时候，突然发现大个子战士张更生站在队伍里，两眼直盯着自己，像有什么心里话要跟他说。

队伍解散后，谭政走到张更生面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张大个儿，没想到我们又要一起战斗了！”张更生眼含泪水，久久说不出话来。

张更生从小也是个穷孩子，18岁被江西军阀抓去当兵。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开进的时候，他开了小差投奔工农革命军。

然而，张更生由于受旧军队军阀习气的影响，当红军占领永新城时，违反了纪律，拿了群众的衣物，还把商店老板给他的两块银元也放进自己的腰包。

红军撤出永新城，谭政奉命来整顿纪律，张更生对自己的错误作了检讨，把得来的衣物、银元也交了公。

对此，谭政表扬了张更生：“知错改错就是好同志！”并说：“张更生同志，上井冈山以来，战斗中勇敢杀敌，该是英雄；打新城，他冲锋在前，抓到了敌人的县太爷张开明，该是勇士；打永新，他头一个爬上城墙，为部队扫除前进的障碍，该是尖兵！”

自此，张更生受到了教育，结识了谭政，交上了朋友。

此次，老朋友重逢，百感交集。张更生从衣兜里掏出早已写好的决心书，递给了谭政。谭政顺手接过去，打开一看，上面请人代笔、歪歪斜斜地写了一句话：“保证遵守执行好群众纪律！”

他俩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两双粗大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地没有松开。

1月14日，谭政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3600余人，悄然离开日夜相伴的井冈山，千里驰骋在辽阔的赣南、闽西大地。

战场救下罗荣桓

1929年10月31日。广东梅县红4军第3纵队。

深秋的凉风，微微地刮着。北方已是黄叶遍地；南方，广东梅县，却草木繁盛，夏意正浓。

红4军第3纵队二次攻打梅县的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由于敌人的拼命顽抗，我军队形的拥挤，一时间，我军伤亡多达600多人。

突然，随着一场枪响，一个大个子指挥官应声倒下，负了重伤。谭政、孙开楚两人见状，拼命冲了过去，冒着弹雨，将他抬下火线。此人不是别人，正是红4军第3纵队第9支队队长，后来的共和国元帅罗荣桓。

原来，10月上旬，前委接到中央指示，要求红4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之机，向东江地区出击。当这一指示到达前委时，两广军阀的混战已经停止。然而，由于消息闭塞，红4军前委（此时前委书记是陈毅）仍然按照中央指示执行，率第1、2、3纵队开往东江地区。

此时，红4军的番号已有所改变，团改纵队，营改支队，连改大队。第28团改称第1纵队，特务营、独立营改称第2纵队，第31团改称第3纵队。第3纵队司令员伍中豪，党代表蔡协民。罗荣桓任第3纵队第9支队（即原第31团第3营）党代表，第9支队长是张宗逊。

10月25日攻入梅县后，红4军三个纵队又撤出，稍事休整。10月31日，又返转过来攻打梅县。三个纵队将梅县包围起来。罗荣桓率领第9支队进了梅县北门，冲上了大街。敌人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手榴弹、机关枪封锁街道。罗荣桓率队冲锋时，腰部右肋骨下被子弹打穿，负了重伤，昏迷过去。

此时，随第3纵队作战的谭政回头一望，看见部队后尾第9支队党代表罗荣桓突然倒下，他急忙向罗荣桓倒处猛扑过去，慢慢扶起罗荣桓，背起他一口气跑到一家小院子里，为他包扎好伤口，借了块门板，与孙开楚两人，抬着罗荣桓随部队前进。这时，谭政接替罗荣桓负责第3纵队收容工作。

协助起草《古田会议决议》

1929年12月28日。闽西上杭古田曙光小学。

纷纷扬扬的鹅毛雪花，伴着阵阵春雷飘落下来，连绵起伏的山岭，披上了洁白的银装。鲜艳的午时莲，在晶莹、滋润的瑞雪映衬下，象一支支燃烧的火炬，放射出耀眼的红光。

这天，闽西古田溪背村的廖氏宗祠即曙光小学，人如潮涌，热闹非凡。我党我军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红4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这里隆重举行。

会场是一间普通的厅堂即小学教室，北墙上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横幅，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党旗下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主席台是两张拼在一起的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喝水用的泥土碗。代表们的席位就是学校的长条凳和长条课桌。为了随时准备应付战斗，代表们都背着背包进入会场。

大会开幕后，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政治决议草案的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并就禁止枪毙逃兵问题作了发言。由于大会决议草案是会前经过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后由毛泽东起草的，因此很顺利地为会议所通过，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古田会议虽然只开了两天，便胜利地落下帷幕，但它所通过的以《古田会议决议》著你的文件，却为我党我军留下了价值连城的宝贵精神财富。

说起《古田会议决议》，就不能不提起谭政。

自红4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以来，虽然取得了首战长岭寨、三打龙岩城、攻占铁上杭的卓著战绩，但也打过一些败仗，暴露出红4军内部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问题。

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县城召开的红4军“七大”，毛泽东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不仅问题未解决，而且毛泽东落了选，失去了前委书记之职，于7月8日与贺子珍、江华等去上杭县的蛟洋苏家坡、永定合溪等地从事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在上杭县太忠庙召开的红4军“八大”，朱德等力图解决这些问题，但会议“无组织状态的开了3天，毫无结果” 12300470_0242_0

7月下旬，陈毅离开部队经厦门、香港，乘船到达上海向中央汇报红4

军的情况，10月22日回到驻在闽粤边境松源的红4军前委，带回了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委员会议定、由陈毅起草、于中央政治局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11月23日，红4军重占汀州。

这时，谭政已升任红4军军委秘书长和政治部训练部长，军委办事机关就设在旧时汀州府院内。

在迎接陈毅来汀州的路上，陈毅对谭政说：“这次我到上海找到中央，向周恩来同志详细汇报了红4军的情况，周恩来指示，要把毛泽东请回红4军，当前委书记”。接着，陈毅指示谭政，要求派一个连，接毛泽东回红4军负责前委工作 12300470_0242_1。

谭政得知毛泽东要回红4军前委主持工作的消息，紧绷的圆脸又露出了笑容。当一个连的部队出发前去迎接毛泽东的时候，谭政便指令行政后勤管理干部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夫妇，在汀州府内安排一套宽敞的住房。

同时，谭政又昼夜不停地整理材料，列汇报提纲，准备向毛泽东反映自己对加强红4军政治工作的意见。

阳光煦煦，暖风轻轻，汀州的寒潮虽已降临，可今日却有几分春意，11月26日，在中央的指示和朱德、陈毅等红4军其他领导人的再三催促下，毛泽东与贺子珍偕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组织部长谢汉秋，从蛟洋抵达长汀军委所在地，同朱德、陈毅会合，重新主持前委工作。

谭政兴奋地迎了上去，与毛泽东等亲切握手，然后把毛泽东、贺子珍带进了准备好的住房。

毛泽东刚坐定，便急不可待地要谭政汇报部队的情况。

什么“单纯军事观点”呀，什么“严重的军阀主义”呀，什么“非组织观念”呀，什么“走州过府的流寇思想”，什么“违反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等错误倾向，谭政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地一古脑合盘端

毛泽东惊讶道：“哦！这么短时间，红4军中的问题竟如此严重！”

尔后，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谭政说：“近日，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准备召开红4军‘九大’，请你为我组织几个座谈会，有各类干部、战士参加，时间、地点由你决定。但要注意，开座谈会，可不是把人叫到军委来，是下去，到各纵队去开，希望你和我一起去，你也作些发言准备！”

最后，毛泽东恳切而又严肃地对谭政说：“你能不能把罗荣桓同志接到军委来？请你和罗荣桓助我一把，作些调查研究，帮我起草红4军‘九大’决议草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谭政爽朗地答应了。

由于战局的变化，12月3日，毛泽东率红4军离开汀州，前往闽西红色区域的腹地连城的新泉。前委、军委机关以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都驻在张育才家——“望云草室”，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为期10天的军政“新泉整训”。

在“望云草室”的小厅里，谭政、罗荣桓协助毛泽东召开了各级、各类干部小型调查会，了解问题，分析原因，研究解决办法，酝酿和草拟文件。同时，谭政、罗荣桓还带头发言，揭发错误，分析原因，提出解决办法。

12月中旬，由于敌金汉鼎部再占汀州，进逼连城，毛泽东等又率红4军主力由连城新泉移驻上杭县的古田。前委、军委机关设在八甲村，4个纵队分别布防于周围的赖坊、竹岭、溪背、荣屋等村。

在古田，谭政、罗荣桓继续协助毛泽东开好红4军各级党代表联席会议、

各级党组织干部联席会议和战士座谈会，帮助毛泽东起草决议。

战局紧迫，寒风凛凛，红4军“九大”的筹备工作正在加速进行。

各类座谈会开完，毛泽东留下了谭政，对他说：“这一段时间的各种座谈会，你都参加了。你看是不是把揭露出来的问题，大家提出的解决办法，加上你的意见，一类一类归纳一下，形成几个材料，争取“九大”形成个决议案，部队才好贯彻啊！”

时间如梭，“九大”在即，经过夜以继日的奋战，谭政已把座谈、调查来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整齐地放在毛泽东办公桌上，为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提供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

这样，在谭政协助、参与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谭政出席了会议，并作记录。

后来，谭政回忆说：

在此以前，在党内、在红军内部存在着严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例如：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单纯军事观点、个人主义，等等，而这次会议上，在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决议》中，才明确指出这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严重性。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并使在我军已经形成的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以及军队中的民主制度，等等，都已成为我军的优良传统 12300470_0245_0。

高兴圩战斗的政治攻坚

1934年9月前后，高兴圩以北红1师阵地。

秋风夹着硝烟、带着浓烈的火药味，时而掠过红1师阵地。在阵地的最南端高兴圩高地上，师政治部主任谭政，正在向接受任务、坚守这块高地的红一团指战员作战前动员。

谭政拉大嗓门讲道：“高兴圩是兴国苏区的前哨阵地，是敌人妄想吞并兴国苏区的咽喉。只要我们守住这块高地，敌人的阴谋就休想得逞。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要求我们必须紧密依靠苏区人民群众，发扬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他的政治鼓动下，红1团的指战员，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

原来，自1930年8月至1932年5月蒋介石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发动的四次反革命“围剿”被粉碎以后，便气急败坏、变本加厉地于1933年9月，以50万的兵力分北、南、西三路，又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更大规模、更加残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其兵力部署是：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线总指挥蒋鼎文，辖第1路军、第2路军、第3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准备经黎川、广昌直取瑞金。

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辖23个师又3个旅、4个保安团，外加5个空军队，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协助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辖9个师又3个旅，“围剿”湘赣、湘鄂赣苏区，相机东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经过6个月的战争，虽经苏区军民的浴血奋战，但由于错误军事路线的指导，中央苏区的处境日益恶化，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归化、永安、连城，南至筠门岭的大片地区，均被敌人占领。

1934年6月，蒋介石又重新调整部署：

以北路军第 8 纵队 6 个师，由泰和向兴国方向推进；以第 6 路军第 7 纵队 4 个师，由龙冈向古龙冈方向推进；以第 3 路军第 5 纵队 4 个师，先占头陂，尔后汇合东路军第 10 纵队，共 9 个师，向宁都、白水镇、驿前、小松市、石城方向推进，以东路军第 2 路军，由朋口、连城向汀州方向推进；以南路军 3 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推进；另以 3 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为总预备队。7 月上旬，上述各路军完成筑垒、修路等任务后，便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全面进攻。

在这种严峻的态势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没有采纳党内、军内的正确意见，实行了“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策略。其兵力部署是。

以红 3 军团第 6 师和第 61 团、第 62 团、赣江独立团，抗击向兴国推进的北路之敌；以第 23 师及江西地方武装，抗击向古龙冈推进之敌；以红 5 军团第 13 师，抗击由头陂向宁都推进之敌；以红 3 军团（欠第 6 师）、红 5 军团（欠第 13 师），抗击向石城推进之敌；以红 1、红 9 军团和第 24 师，抗击向汀州推进之敌；以第 22 师，抗击向会昌、雩都推进之敌。

自红 1 军团（含红 1 师）9 月 1 日、9 月 4 日，在连城西南的温坊，以 700 人伤亡为代价，取得毙伤敌 2000 余人，俘敌 24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械 1800 余支（挺）、迫击炮 6 门、各种子弹 44 万余发、迫击炮弹 341 发、手榴弹 3000 余枚、骡马 50 匹、西药 11 担，以及各种通讯器材等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少有的好成绩以后 12300470_0247_0，红 1 师便奉命，日夜兼程，赶往兴国以北的高兴圩、狮子岭，投入了为时 1 个月的艰苦卓绝的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兴国方向防御战 12300470_0247_1。

此前几月，在国民党北路军主力进逼宁都、石城方向时，国民党军第 8 纵队 6 个师，从泰和出发，准备经沙村、车背坑、老营盘、高兴圩、狮子岭等，占领兴国。

这时，早已布防在这个方向的我红 3 军团第 6 师和第 61 团、第 62 团等部，在陈毅、袁国平等指挥下，在沙村及其以北地区，连续进行了 10 多次反击战，但部队伤亡多达 2000 余人，未能阻止敌军的推进，被迫退守兴国西北、以北的万安、老营盘一线，沙村、车背坑等阵地，均被敌军占领。8 月 28 日，敌第 8 纵队又向老营盘进攻，红军又受重创，陈毅负伤，不久，老营盘又失守。

在这种战局下，仓促进入阵地的红 1 师，担负坚守兴国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任务的艰巨程度与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加之，高兴圩、狮子岭的战略地位重要，是夹在两座大山之间的丘陵地带，是进入兴国的门径，是敌我双方必夺之地，这就更加剧了高兴圩、狮子岭防御战的艰巨性、重要性。

战云密布，炮声隆隆。看来，高兴圩、狮子岭，又要经受一次血的洗礼！

红 1 师师长李聚奎 12300470_0248_0、政治委员黄甦 12300470_0248_1、政治部主任谭政等师领导的精神压力十分巨大，忧心重重。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军事指导者实行单纯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寸土必争”死守根据他的作战方针，而不是采用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实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此役是必败无疑的。但军令如山，只好竭尽全力，争取打好这一仗。

师长李聚奎把坚守高兴圩高地这一最艰巨任务，交给了红 1 师战斗力最强、素有“能攻善守”称号的由杨得志任团长、符竹庭为政委的红 1 团。

在严峻的情况下，谭政的压力格外沉重。他清楚地知道，一个政工领导

干部现在的职责。

他先是召开了全师连以上政治工作干部会议，部署打好高兴圩、狮子岭战斗的政治工作，尔后来到了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1团，作了激动人心、鼓舞士气的政治动员。

时间就是生命，阵地就是战场。红1师部队进入紧张的构筑工事阶段。

谭政带着几名师政治部的干部来到红1团，进一步深入了解该团战前动员的情况。“以团为单位的连以上干部会开了没有？”“以营为单位的活动分子会议开了没有？”“以连为单位的党团员大会、军人大会开了没有？”“有哪些思想反映和思想顾虑？”等等，谭政一一进行询问。

谭政又来到红1师的其他团队，激励战士们：“工事挖得快，筑得好，做好防御准备，就能减少伤亡。”谭政发现有的战士怕苦怕累，对修筑工事的意义认识不足，就动员说：“只有保护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现在多流一滴汗，战时就可少流一滴血！”

根据红1师部队成员构成的复杂情况，谭政指示有关指挥员和政工干部，把政治上动摇的人员留在后方；在前沿阵地担负警戒、作战任务的，大多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的老战士；党小组长、支部委员、党员战士，更是重要、关键部位的骨干力量。

每当战斗间隙，谭政便指派“青年队”来到前沿阵地，为战士唱歌、跳舞，表演各种“活报剧”，组织战士猜谜语等，活跃战地文化生活。后来，这种形式又慢慢发展到红1师阵地上的文化娱乐活动和露天晚会。他们时常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过来吧！一块唱歌，一块玩吧！”作为瓦解敌军、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

坚守高兴圩高地的红1团，真是可敬可佩。无论环境怎样恶劣，任务怎样艰危，只要是上级的命令，他们便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执行。他们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性，坚强不屈、勇于献身的奋斗精神，创我军传统作风之先，在火红的军旗上，添上了永不消失的光辉。

兵力数倍于我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天天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有时一天连续攻击几次，都被我红1师的指战员一次又一次的击退。有时白天阵地被敌人占领，晚上红1师又组织反击，再把丢失的阵地夺回来。

就这样，红1师部队在高兴圩、狮子岭与敌人死拼了1个月，未丢一寸土地。

高兴圩以北红1师战斗中的政治工作是极为突出和成功的，它对启发指战员的觉悟，激励他们英勇献身意识，提高战斗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后来，为了总结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经验，谭政在紧张的战争环境里，写出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为我军政治工作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

长征前的政治动员

1934年10月中旬。兴国东南靠近瑞金一个村庄里的红1师师部。

波浪翻滚的绵水河，泛着银光，在深秋洁白的月色下，默默地绕过瑞金城。油灯下写完了《高兴圩以北战斗的政治工作报告》的谭政，伸了伸疲惫的身躯，走到窗前，目光久久地凝视着月夜皎洁的东方。远处，不时传来早已听惯了的隆隆炮声和嗒嗒的枪声。

谭政陷入了深思。他所想的，已不再是保卫兴国外围的防御战，而是如何说服红1师部队撤出苏区，实行重大的战略转移——长征。明天，红1师

指战员就要离开中央红色根据地，告别血肉相系的父老乡亲，这时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何等的艰难啊！

原来，正当红1师指战员死守高兴圩、狮子岭防线，不让敌人前进半步，战斗打得正酣的时候，红1军团长林彪突然来到红1师师部。他简单地看了一下战况，尔后对师领导李聚奎等人说：“你们回去马上布置一下，把阵地交给第5军团的第13师，你们撤下来，把队伍带到兴国的东南地区集结。”稍停片刻，他又小声而神秘地说，“可能有大的军事行动”。“有什么行动，以后再说”。

这里林彪所说的“大的军事行动”，就是即将开始的长征。啊！红1师撤出高兴圩以北战斗，原来是为长征作准备。然而，长征一事在当时是一个绝对保密的军事行动。

10月15日，红1师刚刚收拢集结，军团司令部便派机要参谋送来了林彪、聂荣臻写给师长、政委的绝密信及中央军委关于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命令。信中指定红1师（附红1军团供给部、卫生部）为红1军团右翼队，于10月16日（即次日）向信丰县属的新田、固陂前进。当天，上级又给红1师补充了几百名新战士、一批子弹和500块大洋。红1师长征就此起步。

以往，部队转移，只要条件允许，军团首长总要开会，讲明情况，面授任务。即便遇到情况紧急，不便开会，也要给师的主管干部直接打个电话。可是，这次部队转移，一反常态，军团司令部只是通知红1师按照行军路线指定的方向前进。而且，每天所要到达的地点，是一天一天的通知，即第一天指定第二天所要到达的地点，第二天指定第三天所要到达的地点。至于红军主力为什么要转移？转移到何处去？便不得而知。其实，由于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强调保密，不但师一级领导蒙在鼓里，就是军团一级的领导也不了解这次转移的全部意图。

这样，就给专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来许多困惑和烦恼。

几年来的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区生活，军队和人民已结成了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鱼水之情。现在，要莫名其妙地离开，离开后，苏区人民的处境将会如何？怎样做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说服情深似海的父老乡亲？

是的，这块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怎么能忍心丢弃？这些勤劳、勇敢、善良的人民，怎么能与他们离别？怎能放那些凶恶的敌人进来，让地主恶霸复辟，听任他们蹂躏、屠杀我们的人民？想到这，谭政的泪水夺眶而出。

对于红1师的撤离，战士们不会答应，群众也不会同意的，但红1军团的命令已下达，又不能不执行啊！现在关键是做通部队的工作。

营级以上的干部会就要开始了，谭政擦了擦脸上的泪水，稳定一下激动的情绪，走进了会场。

然而，会场的气氛却使谭政吃了一惊。一个个低着头，苦着脸，好象有一种说不尽的委屈。

见此情景，谭政心想：“营级以上干部都是这个劲头，战士们的情绪又会如何？处于这种思想状况的部队何以能战胜敌人？”

谭政下意识地骤然扭转了自己的伤感情绪，抬高嗓门说：“同志们，抬起头来！”

空旷的会场上寂静无语，大家依然低着头。

谭政又恼火似地大声说：“怎么搞的！都霜打啦？”

突然，刘得胜营长打破沉寂，首先开了腔：“谭主任，请允许我先提个问题。”

“你说吧！”谭政的火气有点消了，回答道。

刘营长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敌人如此凶狠地进攻苏区，咱红1师接到的命令不是到前线打击来犯的敌人，而是什么‘准备出发？’”

紧接着，又有几名干部也表达了与刘营长类似的意见，要求谭主任回答。

谭政一见会场开始活跃起来，便因势利导地开始了他的发言：“我也向大家提一个问题，是保存下来红军这颗革命的火种呢？还是让目前凶狠的敌人，大兵压境，把这颗种子一口吃掉？让咱们的脑袋统统搬家？”

嘿！经谭政这么一问，会场的气氛顿时平和了起来。

本来，会场在座的都是红1师部队营级以上的领导骨干，都是水平很高的中高级指挥员，都有指挥部队作战的丰富经验。对于这次反“围剿”阵地战的战术，他们早就有意见，只是上级命令不可违反，只好硬着头皮执行。对于目前的战局，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敌人兵多、枪多、弹药多，而我们是兵少、枪少、弹药少。敌人步步为营，重重封锁，紧缩包围圈，如果红军不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其结局只能是死路一条，革命的火种也只能就此熄灭。

这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所以，谭政把关键问题一挑破，用不着再说很多大道理，大家便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会场上，干部们的头抬起来了，精神也振作了起来，愁云和牢骚顷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啊！有这么多懂道理、顾大局、识大体的好干部，何愁战士工作没法做？

谭政严肃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他开始向与会的干部布置工作：“同志们，散会后，大家分头检查部队出发时的各项准备工作。不，同志们，我们不光是准备‘走’，还要准备‘打’！这是最最最重要的！要知道，我们的敌人不是钢铁、石头，但也不是豆腐一块。我们一旦冲破敌人的包围圈，他们还会组织力量前截后追的。所以，我们的作战行动，不仅要敏捷，还要似箭穿梭，打垮敌人的围追堵截！”

散会后，干部们便深入部队，分头去做战士的思想工作了。

第二天拂晓，嘹亮的军号响彻了兴国的山野。红1师部队，正紧急集合，整装待发。苏区的群众，早已站在村口，欢送即将离别的子弟兵。

本来，当红1师决定撤离苏区时，不但来不及召开驻地群众的告别会，有的干部连自己在地方工作的家属也来不及通知。这除了因为时间仓促之外，还因为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次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会那么久、那么远。但是，苏区的人民群众凭着多年的斗争经验，还是从红1师的行动上感觉到红1师的这次转移不是一般的战斗转移。因此，他们闻讯后，便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在村口和路旁为红1师送行。

乡亲们一面跟着队伍往前走，一面将鸡蛋、糯米团等往战士们口袋里装。有的拉着战士的手问：“什么时候回来？”有的止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一时间，队伍成了军民汇合的人流。

红1师指战员的心情也是异常沉重，大家都为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后人民群众的安全担忧，许多人泪流满面地与乡亲们依依惜别。

为检查部队纪律，做好群众赔偿工作，并适当向群众做一些红1师撤离苏区的解释工作，谭政与几名干部留在后面，最后出村。部队已经开拔很远了，群众还没有散去，他们还要欢送谭政等人出庄，目送着红1师的亲人远

去。

不一会，谭政带领着几名干部出庄了。大家立刻围了上来，并再三嘱咐谭政：“将来打败老蒋，你们一定要回来！”

谭政眼含热泪激动地回答：“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东方的霞光，已悄悄地散出。火红的朝阳，正冉冉升起。谭政等人率领红1师这支用钢铁铸成的队伍，踏着南国金秋的晨露，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长征。

夜袭新田的政治工作

1934年10月21日深夜。江西信丰新田。

火光四起，喊杀声震天。红1师的红1团和红2团配合作战，向新田敌人据点，发起了急袭战斗。

新田，是红1师长征起步后奉红1军团首长之命向敌人攻击的第一个目标。它地处敌人第一道封锁线的边沿和关键部位，守敌是国民党广东陈济棠部队的一个团，敌人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群，用以防止中央红军穿越广东，向湘西转移。

虽然我党曾与陈济棠密谈，陈已答应适当“让路”。但敌人的话是不能轻信的，更不能因轻信敌人而丧失战斗力、延误战机。这样，对于新田据点的敌人，还是立足于打。红1师师长李聚奎、代政委赖传珠、政治部主任谭政，正是基于上述考虑，部署了军事行动计划和政治工作的具体措施：

以杨得志为团长的红1团为前梯队，采取长距离奔袭的战法，而且要在夜间急袭，使敌人措手不及；万一红1团急袭受挫，那么，红2团紧接着强攻，夺取新田据点，不能迟疑。而政治宣传鼓动工作，也必须紧密配合军事行动，设立宣传站、宣传鼓动棚等，做好部队和沿途群众的政治工作。

一声令下，部队的作战行动开始了。

部队从苏区的北侧向苏区的南头开进，要经零都穿过整个苏区，行程多日。一路上大张旗鼓，浩浩荡荡，大长了苏区群众的志气。

谭政首先召开了连队党支部以上政工干部开会，布置部队开进时的政治任务，同时派出政工组沿途设置宣传鼓动棚，运用讲话、唱歌、呼口号、化装表演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以提高士气。尔后，谭政又与地方各级苏维埃政府商量，派军队干部参加地方各宣传站的工作，动员和指导沿途群众配合部队各宣传站的活动。

当红1师部队开过兴国时，在师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鼓动下，兴国城各界群众上万人，出城热烈欢送。

你看，城边路旁红旗挥舞，人如潮涌，热闹非凡。

你听，歌声、欢呼声、讲话声、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

红1师行军途中，每隔几里，都有欢送的群众在村旁等候，送吃的、喝的和各种慰劳品。

鲜艳的政治之花，结下了丰硕军事之果。在上述多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激励之下，红1师的战士，各个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日夜兼程，准备去拿下敌人新田据点。

红1师在苏区行军和宣传的另一个军事目的，就是企图造成“保卫苏区”而不是突围的假象，使新田的敌人放松警惕，以达到奇袭新田的目的。

红1师在苏区以外的行军，则是十分隐蔽的。

红1师经过两天的急行军，秘密集结于新田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深秋的赣南，宽阔无际的田园风光。红1师潜伏在这不大的村落里，表面一派和平景象。

在村落里，红1师指战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一堆堆等待夜间点燃的干柴，已经备好，各个连、排、班的“诸葛亮会”正在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地纷纷举行。他们焦急地在等待着夜幕的降临……战斗终于打响了。

在火光和喊杀声中，杨得志率红1团战士向新田据点的敌人猛冲猛打。敌人误以为红军撤出苏区后已“溃不成军”，结果一碰上英勇善战的红1团，犹如锈铁碰上了利钢，顿时阵脚大乱。不到3个小时的战斗，红旗就插上了新田据点。

红1师夜袭新田的战斗成功了。同时，红2师6团袭占了金鸡。随后，红1师又攻占了版石圩，追歼敌人至安息。至此，被敌人吹嘘为“钢铁封锁线”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我红1军团红1师摧垮了。

为了总结红1师夜袭新田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谭政在紧张的作战之余，又写下了《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的总结报告，为我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潇水阻击战的政治鼓动

1934年11月25日。湖南道县潇水西岸。

初冬的北风，夹着潇水的寒气，阵阵向潇水西岸袭来。岸边的红1军团红1师指战员和红3军团红6师的指战员，阻击敌人的战斗打得正酣。

敌人一只又一只向西岸冲来的渡船，被我军一只只地打沉。敌人一批又一批企图泅渡过河的部队，被我军一批批地消灭。潇水成了敌人不能逾越的障碍，敌人只好望河兴叹，不能前进一步。红1师于10月25日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以后，11月8日随一方面军在广东境北仁化的城口附近突破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14日在湖南境南宜章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继续向嘉禾、蓝山前进。越过嘉禾、蓝山，红1师面前有两条大江堵住了去路：一条是潇水，另一条是湘江。两江相距百余华里。

这时，蒋嫡系薛岳、周浑元的几个师已尾追上来，湖南何键、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也从两边猛扑过来，阻截我军。

原来，当我军主力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十分震惊，立即亲抵南昌行营，部署第四道封锁线。11月12日，蒋介石命令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北路入湘的薛岳部、周浑元部统归其指挥，并率在湘各部队及团队，追剿红军。

蒋介石的计划是：第一步，堵截我军于潇水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于道县与天堂圩之间；第二步，万一第一计不成，就调集湘、桂军和“中央”军阻击我军于湘江以东地区，把我军消灭在湘江之滨。这两步计划，构成了敌人大兵云集、部署严密的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还怕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深入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或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因此，他又拟定了一个在湘江以西地区消灭红军的第三步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急电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全力堵截红军。广西军阀随即将他们的两个军全部调往桂北防堵。

同时，湖南军阀何键在就任“追剿”总司令以后，即于11月13日下令调集15个师的兵力，分5路对我军进行围追堵截：第一路，以湘军刘建绪的4个师，由郴县急调广西的黄河河、全州；第二路，以蒋介石嫡系薛岳的4

个师，由茶陵、衡阳向零陵推进。这两路的主要任务，是防堵我军去湘西。担任追击我军任务的是第三路蒋介石嫡系周浑元部的4个师、第四路湘军李云杰的两个师。而第五路湘军李韞珩的1个师，则在我军南部跟进，以配合粤军、桂军围堵我军。

在薛、周、李、白准备合击红军于潇水之滨的紧急关头，先敌占领潇水的大渡口——道县，迟滞追赶之敌，则成了我军的当务之急。这时，红1军团首长把抢占道县的任务交给了红2师，把迟滞、阻击追敌的任务交给了红1师。

11月22日，红2师第4团在团长耿飏、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以日行百余华里的速度，长途奔袭潇水西岸的道县，获得成功。红1师指战员抵达潇水西岸后，立即展开队伍，在长40华里的正面阻击敌人周浑元部。

11月25日，当中央纵队渡过滞水后，红1师第1、3团又和红3军团的红6师一起，在潇水西岸阻击敌人。

此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带师政治部几名干部穿梭往来于这40华里长的正面战线上，紧张地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决不能让敌人上岸，坚决把敌人消灭在潇水河中。

初冬的寒气阵阵逼人，可是，坚守在潇水西岸的红1师等部指战员，却打得热火朝天。

潇水涛涛，激流滚滚。敌人在火力掩护下，乘船渡江。严阵以待的我军，以潇水为天然屏障，用机枪、步枪、小炮向敌人猛烈开火！

敌人船只中弹沉没，尸漂半江。敌人又组织新的进攻，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次次溃败。

敌人的渡船被击沉了，又组织泅渡过江。

红1师指战员哪能让敌人阴谋得逞，他们怒不可遏地等待着敌人靠近西岸。

敌人靠近了，再靠近，再靠近……

“打！”一声令下，机关枪、步枪、小炮，再一次向敌人猛射过去，仇恨的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手榴弹在江面开花，泅渡过江的敌人，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死在潇水中。奔腾不息、碧波万顷的滚滚潇水，顿时成了万恶敌人的葬身之渊。红1师等部潇水西岸的阻击战胜利了。

阻击敌人的战斗，整整进行了3个昼夜 12300470_0259_0，红1师指战员都是在战火中度过的，几乎没有吃过一顿饭。

激战中，我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他们的斗志却越战越强，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英雄事迹层出不穷。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战士带头与敌人拼搏，许多战士负伤不下火线，有很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生命。一次，一小股敌人登岸靠近红1师的前沿阵地，英勇的我军战士跳出战壕，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把敌人全部消灭在阵地前沿。

11月28日，红1师等部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星夜出发，昼夜兼程，追赶红军主力，投入了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

谭政与红1师的战士浴血奋战在一起，共同抵御了敌人的“追剿”。潇水西岸红1师的阻击战，一件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谭政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入了上报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的《红1师政治工作报告》中。同时，撰写了战地报导，刊登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

制止军阀主义的蔓延

1935年1月下旬。贵州遵义土城附近猿猴场红1师集结地。

隆冬的寒风，带着赤水河的冷气，吹向待命渡河的红1师指战员。一个个头不高、威风凛凛的首长，正在向红1师全体指战员传达遵义会议的精神。他就是红1师政治部主任谭政。

不久前，谭政同师长李聚奎、政委黄甦一起在渡口边上的一所小房子里，曾见到过思念已久的毛泽东。

这是他们在长征途中第三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是1934年11月3日前后，在粤北的九峰山一带，红1师一个团掩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所在的中央纵队，经粤汉线过敌人第三道封锁线。第二次是1934年12月19日（黎平会议后）向贵州剑河前进的行军途中。

这三次见面，在长征历史上是三个不同的时期。三次见面时，毛泽东因身份不同而流露出三种不同的情感。第一次，当时中央领导人勉强同意他随军转移，参加长征。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的危急时刻，在湖南通道会议上，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强烈责任感，参与决策意见，但他的话语中，却流露出难言之隐。第二次，虽然他的领导地位未被恢复，但因他的意见已被采纳，而显得特别乐观。这第三次，使人感到，在他亲切幽默的谈话中，又有一种肩负重任的艰辛之感。

毛泽东一见到谭政等红1师三位指挥员，立刻热情地招呼他们坐下。

谭政又见到他多年跟随的老上级，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向他们介绍了遵义会议的情况，讲述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如何解决军委的领导问题，特别提到周恩来在会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接着，毛泽东又讲了关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问题。他高度评价了红1师在长征途中所取得的成绩。他高兴地说：“你们红1师在长征途中几次被敌人侧击，都随机应变地处理得很好，你们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按照军委的意图，当机立断，这是正确地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今后这样的情况还会很多，就是要发挥机动灵活的作战方法。”

尔后，毛泽东谈到了红1师部队的缩编问题。

毛泽东谈完了上述三件大事后，又问了些红1师部队生活和战士们们的思想情况及师政治部政治工作情况，然后亲切地送走三位师领导。

谭政等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毛泽东，返回了红1师集结地。

这样，从与毛泽东谈话获得有关遵义会议最权威信息的谭政，便在全师部队面前，传达贯彻了遵义会议的精神。

谭政绘声绘色地论述了遵义会议解决军委领导问题的意义。他指出：“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敌人？哪有不能取得长征胜利、革命最后胜利的道理？”

是啊，谭政这个政治工作的能手，从多年的政治工作中，已经尝到了它的甜头，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想当初，在中央苏区，红3团4连有个战士叫戴有标，操练进攻动作没有做好，连长要他重操，他不干，说：“操鬼，操了又不打，看见敌人又跑回苏区！”

收操时，连长在队前讲话点名批评说：“今天连上的戴有标练兵时不认

真操，大家说要得吗？”连队全体回答：“要不得！”连长又点了他的名字，要他出列，在队前作检查。

戴有标拒绝检查，说道：“要我讲话检查，就拿刀杀死我！”

回到排里后，排长处罚戴有标在太阳下站立正，他又拒绝，排长动手打了他。戴有标自己觉得委屈、窝火，趁全连上政治课的时候，他借机去伙房喝水，持枪自杀。

此时，正是古田会议以后，红军中贯彻决议精神、克服军阀主义倾向的时候。谭政来到红3团，对4连战士戴有标自杀事件作了详尽的调查。

显然，这个连长和排长对战士戴有标采取了严重的军阀主义态度。

对于这种军阀主义习气的复发，谭政毫不手软，他在4连队前讲话，严厉地批判了军阀主义，说它是红军建设的一个大敌，论述了红军开展民主运动、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深远意义，并当众宣布了对那个连长和排长的处分决定。

谭政的这一举措，有效地制止了军阀主义习气在红军中的蔓延，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为了检验政治工作的作用与威力，谭政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专门考察了一个连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看党团员在困难危险情况下的模范带头作用。

谭政考察1930年8月份的一次战斗，党团员都能带头冲锋、勇敢杀敌。有一次，我红1团一个排的兵力在枫坪一带被数倍于我的敌人团团包围。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我排连攻3次，未能得逞，而这个排坚持战斗长达7个小时之久，最后终于安全脱险。

谭政仔细分析这个排如此特别能战斗的原因，主要就是党团员在战斗中起到了骨干、带头、模范作用，坚定了全排战士的斗志。

1933年12月，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1师在五都附近的一次战斗，与敌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相遇。谭政很了解吴奇伟这个敌军首脑人物的反革命历史，他是镇压广州暴动、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此时正是12月11日广州暴动纪念日前后，谭政想利用广州暴动纪念日活动来激发部队的战斗情绪，以加深对吴奇伟的愤恨，提高战斗力。

主意已定，谭政立刻叫来师部政工干部，通知集合队伍，召开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消灭吴奇伟动员大会。

大会开始了。红1师全体指战员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师首长慷慨激昂的演说，不时爆发出阵阵的掌声和呼喊声、口号声。这位演讲的师首长就是谭政。

谭政说道：“大家还不知道我们红1师面前之敌吴奇伟的真面目吧！6年前的今天，他手持反革命屠刀，镇压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举行的广州暴动，杀害我们无数革命群众。今天，他又带着反革命军队，来进攻我红色根据地，‘围剿’我们红军来了！”

“但是，”谭政几乎愤怒地喊了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已不再是广州暴动时的起义军了……”

最后，谭政发出战斗号令：“同志们！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暴动6周年，以吴奇伟的头和血来祭奠广州暴动烈士的英灵！我们要为保卫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

谭政的政治动员奏效了。雷鸣般的掌声、呼喊声，震撼了五都的山冈和

村庄，震撼了红 1 师指战员的心！

第二天，红 1 师与敌军吴奇伟部的战斗打响了。红 1 师指战员仇恨满腔，枪弹满膛，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向敌人阵地冲去。

战斗结束，战绩记录在由师长李聚奎、政治部主任谭政签署的战斗报告中：

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敌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进行民族政策教育，和平通过大凉山 1935 年 5 月 23 日清晨。四川大凉山彝族地区。

朝霞的余辉还没有散尽，以红 1 军团红 1 师红 1 团为基干组成的中央红军先遣队，便踏着初夏的晨露，从冕宁出发，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准备直奔大渡河畔安顺场。

大凉山，山峦重叠，怪石凌空，道路崎岖，荆棘丛生，林木葱笼。彝族区就分布在这大凉山深山野岭之中。彝民百姓缺衣少吃，贫病交加、文化落后。由于国民党实行欺压少数民族的政策，使贫穷落后的彝民视汉人为仇敌。

为了和平通过彝族区，队伍出发前，谭政等领导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深入细致的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他们的目的，不仅要顺利、和平地通过彝族区，还要给彝族兄弟留下好的印象，并规定无论发生什么异常情况不得开枪。

先遣队以工兵连为先导，手攀带刺的藤蔓，脚踏厚厚的腐叶，艰难地行进在这阴森恐怖的密林之中。

本来大凉山的天然险阻，已使先遣队步履艰难，加上彝民兄弟误听谣言，把汉族红军与汉族国民党军混为一谈，听说汉族军队来了，就搬开溪流里的垫脚石，拆毁山涧上的独木桥，这就更加剧了先遣队的行进困难。

先遣队工兵连逢山开路，遇河架桥。

当他们在一个山谷里穿行时，突然有许多拿着土枪、长矛、弓箭、大刀的彝民蜂拥而来，把他们团团围住。工兵连同志向彝民解释，他们是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时，彝民根本不予理睬。彝民开始动手了。他们把通信员小刘按倒在地，用脚踩住他，扒光了衣服，抢走了武器。

连长王耀南一气之下，下意识地拔出了手枪，战士们也跟着拉开了枪栓。突然，他想起了总部的命令，想起了谭政主任等领导同志亲切而耐心的民族政策教育，立即大声地对战士们命令道：“不准开枪，执行民族政策！”他马上收起了手枪，战士们也立刻把枪收了起来。

彝民兄弟见战士们收起了枪，就蜂拥上来把工兵连同志的衣服扒光，把武器、工具全部抢走。工兵连的同志只好光着身体退回到大桥镇，兄弟部队的同志凑了衣服给他们穿上。

当时红 1 团第 1、2 营走在前边，杨得志团长带领 3 营掩护刘伯承、聂荣臻等，走在后面。王耀南连长赤着身子回来见到了杨团长，汇报了衣服被扒、武器、工具被抢的经过。杨团长说：“赶快找衣服穿上，我去向刘、聂首长报告。你要把部队带好，前面还要你们开路哪！”

王连长回答道：“请杨团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我看彝族同胞不错，他们光扯着嗓子喊，却不开枪。可惜语言不通，不然，讲讲道理，我看他们是会让我们通过的。不过……”王连长不好意思笑笑说：“我们红 1 军团的工兵连，这还是头一次‘打’这样的‘败仗’哩！”

的确，一个红军连队，被不了解红军的彝族兄弟剥光了衣服，“缴了械”，

这种事不仅在工兵连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在红军战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绝无仅有的！

当王耀南连长见到刘伯承时，又检讨说：“司令员，我们没有完成任务，还……”刘伯承打断他的话，表扬说：“你们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就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后来，刘伯承同志派了稍懂彝族语言风俗的工作人员丁伯霖前去联系，请来了彝民首领小叶丹，按照彝民风俗，刘司令员与他同饮鸡血，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派人护送红军部队。同时，由于红军部队又作了广泛动员，准备了一些银元衣物沿途发放，部队才顺利、和平地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并给彝族兄弟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小叶丹等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下。

谭政等人的政治工作在先遣队执行民族政策上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上午7时。四川康定大渡河安顺场。

夏日的朝阳冉冉升起，大渡河畔安顺场依然是一派雾气茫茫，如雷灌耳的汹涌涛声，更给这迷离的自然景观，增添了神奇莫测、险恶恐怖之感。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条支流，古名泅江，别名叫铜河。它从高山峻岭奔泻而下，水流湍急，水深莫测。两岸的悬崖险滩，劈波阻流，激起排空巨浪，搅成无数漩涡，使人闻声胆寒，触目惊心。

大渡河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约200米左右，水深约10余米，流速每秒约4米，水中布满礁石，急流咆哮震耳欲聋。对岸高山连绵，易守难攻，有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杨森的部队据险扼守。这是中央红军及其红1军团红1师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天险（第一道天险乌江，第二道天险金沙江），也是一道最难渡过的天险。

集结在安顺场的红1师红1团第1营第2连的十七勇士，在遵义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正严阵以待，整装待发。

几天前，杨得志团长来到河边观察对岸敌情。通过望远镜，他看到对岸离渡口一里左右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全是黑色岩石。估计敌人可能把主力隐蔽在这个小村子里，以阻挡我渡河部队登岸。

他立即作了渡河部署：

火力部署：令配属红1团的军团炮兵连，将3门八二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布置在阵地上，轻机枪也进入阵地掩护。令有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机炮连的3个特等射手进入阵地。

兵力部署：当时渡船只有一只，乘不了多少人，杨团长决心组织一支坚强精悍、战斗力特强的渡河奋勇队，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第1营。

在谭政多年开展政治工作的红1师，战士们养成了这样的作风：遇到困难顶着上，碰到战斗任务抢着上。这次第1营战士听说要组织渡河奋勇队，战士们一下子围住了第1营孙营长，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加。孙营长请示杨团长后决定：集中在第2连选派，然后营长批准。

最初，选定了16人。可是，第2连连信员陈万清哭着喊着争着要去。他是遵义会议后入伍的新同志，参军不到半年，年仅16岁。刘伯承、聂荣臻等首长到达安顺场时，见他要求很坚决，便对孙营长说：“由你们营长最后下命令定吧，叫谁去谁就去。”当孙营长批准他参加奋勇队时，陈万清破涕为

笑了。

最后确定的 17 名渡河尖兵，后来成了中共历史上的著名十七勇士。这 17 名尖兵是：

- 2 连连长熊尚林
- 2 排排长罗会明
- 3 班班长刘长发
- 3 班副班长张麦克
- 3 班战士张桂成
- 3 班战士萧汉尧
- 3 班战士王华亭
- 3 班战士廖洪山
- 3 班战士赖发秋
- 3 班战士曾先吉
- 4 班班长郭世苍
- 4 班副班长张成球
- 4 班战士肖桂兰
- 4 班战士朱祥云
- 4 班战士谢良明
- 4 班战士丁流民
- 4 班战士陈万清

渡河奋勇队以熊尚林为队长，每人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个手榴弹和其他作业工具。一切准备停当，整装待发。

这时，杨得志团长对奋勇队作了简短有力的强渡动员。他说：“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中国革命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强渡过去，消灭对岸的敌人！”

上午 7 时整，当大渡河畔还雾气弥漫的时候，我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开始了。刘伯承看了看怀表，对杨团长发出命令：“开始！”杨团长立即传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

我登上渡船的 17 名勇士，在当地熟练船工的摆渡下，在首长、同志们的激励、嘱托下，满怀革命豪情，悄然地离开了南岸的首长和战友，匆匆地向北岸敌人阵地驶去。

不一会，雾已散尽，对岸的敌人发现了目标，向我渡船开起火来。

我军立即以更猛烈的炮火向敌人射击。神炮手赵章成用百发百中的炮弹，掀掉了敌人的碉堡，轻重机枪和步枪也一齐向敌人开火。

渡船迎着敌人密集的弹雨在前进着。

刘伯承、聂荣臻走出了工事，命令吹号，故意暴露大目标，以转移敌人的视线，分散敌人的火力，萧华从司号员手中取过军号，挺起胸膛吹了起来，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了冲锋号。

渡船迎着汹涌的波涛，越来越驶近对岸，敌人的火力也越来越猛。敌人的炮弹落在船边掀起的巨浪、水柱使小船剧烈地晃动，敌人的子弹扫伤了我一个战士的胳膊，渡船的船帮被打了一个洞，忽而又撞到了一块大礁石上……一切困难，都被我英雄的、用政治工作陶冶出来的红 1 师勇士克服了。

渡船离北岸只有五六米了，战士们一齐站了起来，准备冲上岸去抢占北岸渡口。

敌人更加疯狂地向我渡船射击。对岸小村子里的敌人也向北岸渡口冲去，企图消灭我勇士于岸边。

赵章成奉命射击，他的两发炮弹准确地敌群中开了花。第1营机枪排排长、神枪手李得才等同志的轻重机枪一齐向敌人扫射，敌人纷纷倒地，残敌四散逃窜。我十七勇士飞身下船，迅速登岸，以手榴弹、冲锋枪消灭了岸边的敌人，占领了敌人的渡口工事，为我军胜利渡河取得了立足点。

守敌不甘心失败，又拼命地进行反扑，妄图趁我立足未稳、过河人数很少的机会，夺回渡口工事。

在我南岸炮火的强力掩护下，十七勇士冲向敌群，大刀飞舞，敌人血肉横飞，溃不成军，拼命逃窜。我十七勇士牢固地控制了北岸渡口据点，站稳了脚跟。

敌韩槐阶营一崩溃，敌第7团余味儒的阵地立即全线动摇，敌人号称固若金汤的大渡河防线被我军突破了。

十七勇士控制敌阵地后，依靠那只小船及以后又找到的两只小船，接我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过河。

孙营长率领机枪射手过了河，进一步巩固了渡口阵地。杨团长率领部队乘第三条船过了河，扩大了北岸渡口阵地纵深。又找到了52个船工，分成4班，昼夜不停地为红军摆渡。靠这3只小船，在这里渡过了红1军团红1师和军委干部团。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成功了。附近群众说：“红军是飞过来的！”蒋介石妄想“叫朱、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计划破产了，红军胜利了。红1师的红1团为长征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了一大功！十七勇士的英名永垂史册！在十七勇士的军功章里，谭政的政治工作功不可没！

严格的群众纪律赢得了群众的欢迎

1935年6月中旬。蜀西夹金山以北藏族游牧区。

风和日丽，草原青青。红1师主力翻越了白雪皑皑的大雪山

夹金山，来到了山脚下草场辽阔的藏民游牧区。

这一带的藏民信奉喇嘛教，每个圩镇都建有富丽堂皇的喇嘛寺，晚上一家人团聚在一起烤火念经。他们生活简单，以牛、羊肉和青稞为主食。

红1师主力来到这个地区，开始大家很高兴，以为到了游牧区，吃肉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由于藏民误信敌人的宣传，不但把牛、羊赶走了，而且人也跑光了，粮食也埋藏了起来。而我们所带的粮食已经吃完了，顿时部队的口粮无以为继，饥饿严重地威胁着部队。部队到达马河口时，已经断炊两天了。

怎么办？有人提出说，地里的豌豆苗可以采摘充饥。师政委黄甦 12300470_0270_0 觉得这是违犯群众纪律，不同意。

然而，人总是要吃饭的，红军指战员也不例外，就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也要吃饭。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同志 12300470_0270_1 想出了个主意，既解决了吃饭问题，又基本上不违犯群众纪律。谭政说：“为了不损害群众的利益，又可以用豌豆苗充饥，我们可以在采摘群众的豌豆苗后，在地头上放上几块钱作为赔偿，并插上木牌说明。”大家觉得除这个办法外，也就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大家也就按这一办法去做了。

谭政的这一发明，初步解决了部队的粮食危机问题。

1935年9月中旬，甘肃迭部县哈达铺藏族农牧区。

秋高气爽，红日当空，万里蓝天飘着朵朵白云，辽阔的甘南草原一片翠绿，阵阵凉风拂面掠过，好一派祖国西北的自然风光啊！

草原上，一场藏族同胞盛大的欢迎宴会，正在隆重地举行。他们以藏族风俗的最高规格和礼节，设宴招待了途经这里的红军领导干部。谭政也出席了藏民这次盛大的宴会。

多少天来，红军指战员都是靠野菜、草根、皮带等充饥，米面从未沾唇。现在一看到藏粑团子，肚子饿得直叫，口水快要流了出来。谭政狼吞虎咽，一口气吃了七八个还不觉得饱，但却不敢再吃了。谭政在后来回忆那难忘的一幕时，万分感慨地说道：

当时，觉得藏粑团子可真香啊！可是，不能再吃了。这是因为：我们也在教育部队，饿过头的胃不能吃得过饱，吃多会胀死的！所以，我吃了八个藏粑团子以后，便克制自己，不能再吃了；尽管肚子饿得很，可我们终归是红军的领导干部呀，要是没完没了地吃，连受苦的藏族同胞也会笑话饿瘪肚皮的红军的！这大概也是红军长征路上艰苦生活中的一个插曲吧！不，我一生是把它作为红军长征中的一次很有纪念意义的活动！

12300470_0271_01935年10月19日傍晚。陕北苏区保安县吴起镇。

陕北秋日的晚霞，带着落日的余辉，慢慢洒落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洒落在群山环抱、炊烟缕缕的保安吴起小镇。此时，中央红军穿过黄褐色的山谷——头道川，来到了这个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吴起镇，最终找到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吴起镇，是陕北革命根据地保安县属地，传说是为纪念古代名将吴起而命名的。镇里住着100多户人家，700多人口。当红军到达吴起镇时，群众误以为是国民党军队前来骚扰，男女老幼牵着牛羊逃避一空。我军便四处寻找群众，找着几个老弱病残者，但因语言不通，未打听到什么情况。

为此，谭政等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开始了紧张的工作，广泛开始政治宣传。在他的发动指挥下，战士们开进宿营地后，首先打扫街道卫生，清除垃圾，到处张贴“北上抗日，收复失地”、“与红二十五、二十六军会合，一致抗日救国”等标语。

老人们见状，判断这是红军无疑，就去叫老百姓回来。很快，吴起镇的党支部书记和乡政府主席回来了，第二天全镇男女老少都回来了。

一见红军，他们就高兴地说：“咱们以为国民党军队来了呵，原来是自己人！”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乡镇干部和部队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解决部队的各种需要，了解周围的敌情。广大指战员兴奋地说：“我们真的回到自己家了！”

在吴起镇，我军根据当时的敌情，部队的需要和当地物质条件的可能，决定在这里休整7天，进行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整训和准备。

在政治工作方面，深入解释、宣传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抗日新根据地及与陕北红军会合的重大意义，宣告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动员广大红军指战员，为保卫陕北苏区而战。在军事工作方面，训练新兵，擦拭武器，充实弹药，整顿军容，严格军纪。

在物质准备工作方面，补充服装，赶编草鞋，洗澡，洗衣，理发，整顿内务等。

这样，中央红军及其红1师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历时1年，长驱25000里，途经11个省份，转战跋涉，历尽艰辛，今天，终于胜利

地到达陕北苏区，结束了伟大的长征。广大指战员的激动、兴奋、喜悦、欢乐的情怀，是语言、文字无法表达的。

整个吴起镇，沉浸在无限美妙的欢歌笑语声中。

谭政，作为中央红军红1军团红1师的政治领导者，不仅自始至终参加了长征，亲身经历了长征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接受了来自敌人和大自然的严酷考验，而且还亲自领导了红1师的长征，使红1师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奇功。

参加红军长征，不知在何地、何时，谭政身上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脚掌上留有一个很硬的东西，说是枣刺，可又不是，它好象变成了“化石”，走路碰上这个硬块，非常痛。

到延安后，医生给他做了手术，手术虽不大，但很复杂，结果还是没能把那块硬物挖掉。

建国后，医疗条件改善了，医术提高了，那块硬物仍没有做掉。但诊断的结果是，那块硬物是一小截木棍，被肌肉紧紧包缠着。据医生分析，估计是谭政在长征路上扎进脚掌上的枣刺！

后来，谭政富有风趣地说：“这个手术不用做了，就让它永远在我的脚上长着吧！当做长征纪念吧！”“我的脚掌有时痛得难忍，但是，一痛，倒使我想起了艰苦年代的长征路！”

萧劲光在海军创建初期

漆剑影

萧劲光（1903～198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萧玉成。湖南省长沙市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师党代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11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7军团政治委员，红3军团参谋长，陕甘宁省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主任，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曾任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萧劲光大将，在他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为海军建设奋斗了整整30个年头。他是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奠基者。他把我军一整套建军方针、作战原则和优良传统同海军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最早确立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组织路线，规划了海军建设的蓝图，确立了三大海区的战略格局。他特别重视海军各项基础工程建设，创建了第一所正规海军学校，组建了第一支快艇部队、第一个航空兵师、第一个潜水艇支队、第一个驱逐舰大队……就是这许许多多多个第一，铸造了这位为结束我国有海无防历史，在万里海疆构筑钢铁长城的第一位人民海军高级将领。

本篇记述的正是他在新中国海军初创时期的部分业绩。

“旱鸭子”被“赶”向大海

1949年，金秋十月。首都北京欢庆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像阵阵春雷，在神州大地滚动，震撼着全球。

十月中旬，在中南海“含和堂”的会客室里，神采奕奕的毛泽东主席紧紧握住四野第12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的手，兴奋地说：

“劲光同志，你来得蛮快嘛！”

“接到电报后，我不敢耽搁，第二天便动身了。”

萧劲光是几天前才离开湖南长沙的。他当时正沉浸在衡宝战役刚刚取得重大胜利的喜悦里，谋划着如何肃清湖南境内残敌，整顿社会治安，突然接到第四野战军总部转发的一份加急电报，说毛主席召见他，有要事面商，要他火速进京。

萧劲光对毛泽东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早在1920年夏天，是毛泽东等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把他这个17岁的中学生，引上了革命的征途。1925年，他同毛泽民一起，离开安源去广东之前，在长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1934年，当他受王明“左”倾路线残酷迫害、欲置他于死地的时候，是毛泽东等坚决反对，才保住了他的性命。八年抗战期间，他留守延安，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经常聆听他的教诲。宝塔山下，延水河边，有他们一同漫步的足迹；

凤凰山麓、杨家岭下的窑洞里，有他们亲切交谈的身影。领袖和部将、同志加战友的情谊交织在一起。此情此景，是多么令人难忘啊！现在，在阔别四年之后，又见到了自己敬爱的领袖，萧劲光不禁心潮起伏，热血翻腾。

“衡宝战役的电报我都看了。你们把‘小诸葛’ 12300470_0276_0 的王牌打掉了，这意义很大。白崇禧想在广西同我军决战，没有多少本钱了，进军广西，全歼白崇禧集团指日可待了！”落座后，毛泽东谈笑风生。谈着谈着，他突然话锋一转，切入正题：“劲光同志，这次叫你从长沙跑来，是想和你商量件事情。经过20多年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我们终于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但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现在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渡江后，张爱萍同志筹建了华东军区海军。现在要着手筹建全国范围内的海军了，中央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萧劲光从1925年穿上戎装，参加北伐战争那天起，一直战斗在陆地上。除了两次赴苏留学坐过海轮和在列宁格勒登上阿芙乐尔巡洋舰参观过一次以外，从没在海上生活过。他在进京途中，对于毛主席为何召见他曾经有过种种猜想，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有可能要让他去当海军司令。由于思想上毫无准备，他的神情不免有些紧张起来。毛泽东话音刚落，他便连连摆手说：

“主席，这使不得，使不得！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我晕船挺厉害，连海船都坐不得。我这辈子总共坐过五六次海船，每次都躺在舱里，动弹不得！”

“我就是看中了你这个‘旱鸭子’哩！”毛泽东哈哈大笑起来。

的确，对于两次赴苏学习军事，喝过六年“洋水”，又在自己眼皮底下工作过八年的萧劲光，毛泽东可谓了如指掌。他深知肖劲光为人谨慎，刚正不阿，不仅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组织才能，而且有着比较系统的军事理论知识，在自己撰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部分地采用了他的一些观点。抗战胜利后，萧劲光作为林彪的助手，在开辟东北根据地，特别是在“四保临江”战役、围困长春、解放平津、解放武汉等战役中，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和组织才能。正是这些斗争经历，使毛泽东在选派海军司令员时，看中了这位自称“旱鸭子”、年方46岁魁梧而又英俊的将领。他见萧劲光神情紧张，便收住笑容，认真地说：“你这个同志，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去当司令，又不是让你去当水手！再说，晕船就那么可怕？多锻炼几次，慢慢会适应的。”停了一会，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不错，20多年来，我们同日本人打仗，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可是，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总得有人去领个头。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和刘亚楼都有很长的斗争历史，又都在苏联学习过，有文化，会俄语，比较了解苏联军队，又懂得我军一整套优良传统。我看，中央选定你们去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萧劲光不好再推辞，却仍然默不作声。毛泽东继续耐心地开导他，给他讲起了近百年来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他说：“有海就要有防，要防就要建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侮。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侮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而且要尽快地搞！”

听了毛泽东一席话，萧劲光紧锁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临走时，毛泽东

嘱咐他，回长沙后，继续抓好第12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调海军工作的事等待中央的正式调令。

12月下旬，四野总部转来了中央军委的调令：“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及现有舰艇，调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刘道生同志为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并允许由原兵团直属队抽调部分机关与干部，以作为海军直属机构之基础。”接着，中央军委于1950年1月12日发布了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

手捧命令，萧劲光心情激动。他清楚地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条多么崎岖的路，有多少艰难险阻。但为了结束有海无防、任人欺凌的屈辱历史，萧劲光义无反顾地走马上任了。

驾驭大海先学“游泳”

武汉的长江水面上，马达轰鸣，船只穿梭来往，一片繁忙景象。除了渡轮、商船和渔船以外，远远近近，还停泊着四五十艘大大小小的军用舰艇。1950年2月初，萧劲光赴京上任途中在汉口逗留期间，得知这些舰艇是华东军区海军当时的主要战斗力量，喜悦之情，立刻涌上眉梢。他想：我这只“旱鸭子”已经被赶下了海，要想爬上岸已不行了。驾驭大海，正如毛主席所说，晕船等生理上的困难是可以慢慢克服的。对我来说，最大困难就是不懂海军。怎么办？等着进学堂深造，没有可能！甘当外行吗？不是自己的性格！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干中学，边学边干。现在我正遇上了学习海军知识的一个大好机会，不能错过。

随行参谋把肖平、陈绍海两位舰队主要负责人领到萧劲光下榻的扬子饭店。通报姓名后，萧劲光问道：

“你们这些舰艇属哪个建制？”

“这几十艘舰艇分别属华东军区海军海防第1、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

“都是些什么舰艇？”

“有护卫舰、炮舰和登陆舰，更多的是一些小艇。”

“你们怎么来到武汉？”

“长江口一带，国民党军队天天派飞机来狂轰滥炸。这些舰艇都是起义和缴获来的。华东海军首长让我们疏散到这里来，免遭空袭！”

接着两位干部把舰队的人员编制、武器装备、部队思想情况详细作了汇报。萧劲光听得很仔细，不时提出问题。临行时，两位干部热情地说：

“欢迎首长登舰视察！”

萧劲光高兴地回答说：“我是准备花几天时间到各舰去看看的。但谈不上视察，我是来向同志们学习的。干海军我还是个‘门外汉’，可我既然来到了海军，就想尽快学点东西，不想当外行司令！”

从第2天起，萧劲光在肖平、陈绍海等陪同下，登上了一艘艘舰艇。当他踏上第一艘战舰的甲板时，心潮起伏，有如滔滔江水。无论是作为海军司令员，还是一个普通中国人，他都是第一次登上中国人民自己的战舰。几十年的南征北战，多少先烈、战友流血牺牲，才迎来了这一天。他从舰首走到舰尾，从舰面下到舱里，察看了航海、轮机、火炮、帆缆等每一个战位，走遍了会议室、水兵舱、伙房、弹药库等每一个舱室。他走到哪里问到哪里。舰艇航速多少？火炮性能如何？主机小时多少？油水供应是否充足？弹药补给有无问题？水兵伙食好不好？……他把航海兵、轮机兵、帆缆兵、炮手，以至炊事员，都当作是自己的老师，不耻下问。随后，他登上了高高的舰桥，

迎着阵阵江风，眺望着浩浩荡荡的江水流向远方。此时，在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身上，升腾起一种诗人的浪漫情怀。他低声吟诵起北宋大诗人苏轼《赤壁怀古》中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凝望良久，萧劲光突然回过身来，指着水天交接的远方，对陪同他的肖平说：“这里只是你们暂时的避风港。你们的战场应该是在长江口外的大海，那里才是水兵们驰骋扬威的地方！”说完，他又补充一句：“这日子不会太久的。”

长江水面上的这几天，对萧劲光来说，既是一次深入基层的调查研究，又是学习海军知识的第一课。

抵达北京后，萧劲光在紧张工作的同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继续贪婪地学习着，不断地充实自己。那时，按照党中央的统一战略部署，全军上下，首先是华东地区的部队，都在紧张地进行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渡海作战，第一位重要的任务，当然要海军来承担。在陆地上指挥作战，对于身经百战的萧劲光来说，已经驾轻就熟。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别说指挥，连见都没见过啊！怎么办呢？还是老办法：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他大量阅读敌情资料，找原国民党海军的一些高级军官交谈；同时抓紧时间，突击学习了指挥登陆作战的有关知识，组织技术人员计算登陆作战所需舰船和物资的数量。

就在萧劲光到处拜师求教的时候，一位老师送上了门。他，就是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

3月31日，萧劲光来到了粟裕的住处，登门求教。

“粟司令，干海军我还是个小学生，请你多多赐教！”萧劲光态度很诚恳。

“哪里，哪里！你是海军司令，我得向你学习！”粟裕也很谦虚。

粟裕领导组建了华东军区海军，对华东海军和东海海区的地理水文情况，都比较熟悉。他将这些情况作了详细介绍。萧劲光聚精会神地听着，打心眼里表示感激和钦佩。

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未能实现。但萧劲光从与粟裕的这次交谈中却获得了许多有益的知识。

转眼半年多过去了。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当一些最迫切的工作大体安排就绪以后，在报经中央批准后，萧劲光轻车简从，专程到苏联进行考察访问。随行的除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景宜亭、翻译张森以外，还有从苏联请来的我海军的首席顾问库兹敏。萧劲光在苏联海军的一位副司令员的陪同下，参观了波罗的海舰队的许多军舰和一个造船厂、一所海军学校。

然后，萧劲光又就出国前开列的长长一串问题，例如，英美海军的发展趋势、国际领海的有关规定、海空军的作用、潜艇在海军中的地位、海岸防御工程和兵力部署、登陆和抗登陆的战术原则，以及苏联海军在政治、后勤、干部工作等方面的建设情况，等等，不辞辛劳地一个个走访苏联海军的高级将领、部门和部队的负责人，登门求教。

因为这是新中国的第一位海军司令访苏，斯大林还拨冗接见了她，并赠送给她一把佩剑。萧劲光怀着崇敬的心情，接过佩剑。他懂得，斯大林赠送这把佩剑，不止是对她个人，也饱含着对中国海军全体将士所寄予的殷切希望。

经过半年多的考察、访问，萧劲光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海军知识。这为他

带领他的同志们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确立三大海区战略格局

“司令员同志，下一着棋你打算怎么走？”1950年4月，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刚开过，一天，总顾问库兹敏向萧劲光提出了这个问题。

萧劲光不慌不忙地走到地图前，成竹在胸地说：“总顾问同志，你看，我们中国的四个领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大海区。渤海、黄海紧挨着，可以算作北部海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及其附近海岸，都在这一防区之内。江苏、浙江、福建一带濒临东海是东部海区。广东、广西、海南岛一带濒临南海、北部湾，算南部海区。这三大海区就像是三扇大门。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从这三扇大门入侵我国沿海地区竟达400多次。人民当家作主了，大门口得有海军部队站岗。眼下，只有华东军区成立了一支海军，虽然小，总算有了；而北部海区，却还是一片空白，还没有海军的一兵一卒。在华南，几个月前，刚刚组建起一支小小的江防部队，归广东军区建制。因此，下一步的工作是要在北部和南部海区，各搭起一个海军领导机构的架子，以便组建和统率本防区的海军部队。20多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的是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路，看来，海军建设也要走同样的一条路！”

听完他的分析，库兹敏连连点头：“很好，很好！”

“五一”刚过，萧劲光一行偕库兹敏等人，风风火火来到了青岛。这是我国北部沿海的一座重要城市，是一个有名的商港，也是华北最重要的军港之一。萧劲光此行的任务是着手筹建青岛基地（以后改称北海舰队）的组织机构，同时实地勘察山东半岛各港口的海防设施情况。

走出火车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到何处歇宿呢？萧劲光说，不要去打扰市委和陆军部队，在附近找个地方对付一夜吧！他们来到了一座小楼前。这里设有一个小办事机构。工作人员为难地说，毯子、被褥倒能弄上几条，就是没有床铺。萧劲光指指木头地板说：“这地板平平的，不是很好的床铺吗？”

让司令员和总顾问睡在地板上，参谋人员过意不去，萧劲光却笑着说：“这比战争年代打游击睡在野地里强多了！”说着，将一条毯子铺在地板上。

见司令员这样乐观随和，库兹敏也连声说：“很好，很好！”

第二天，萧劲光把青岛市委、青岛警备区、四野后勤第2分部的领导同志请到一起，研究组建海军青岛基地的问题。经过磋商，决定先成立个基地筹备委员会，由青岛警备区司令员赵一萍任主任、第2分部政委许培仁任副主任。从第2分部调出1000余人充实筹委会的办事机构。9月9日，以原二野第11军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了青岛基地，由易耀彩任司令员、段德彰任政委、赵一萍任第一副司令员。

青岛是原日伪海军和国民党海军多年经营的一个重要海军基地，留下了不少供海军使用的设施，如码头、仓库、水上跑道、电台、气象台、医院、学校、兵营等等。萧劲光兴奋地对库兹敏和随行人员说：“这些建筑虽然比较简陋，总比没有强多了！”

“可是，码头上没有军舰，没有油水补给船，阵地上没有火炮，电台，气象台没有机器、仪表，什么都没有啊！看来一切还都得从头开始！”库兹敏想到了困难的一面。

“是的，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现在，机构成立了。我们有了人，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的。”萧劲光满怀信心地说。

在青岛的几天时间内，萧劲光处理了一系列的问题。哪里住基地机关，哪里办学校，哪里设医院、疗养院，港内哪个码头为海军专用码头等等，都是他亲自确定的。

离开青岛，萧劲光一行到烟台地区察看。除了在烟台山看到几所房子，在海边看到一个渔船码头以外，别的海军设施一点没看到。接着，他们来到了威海。

在中国近代海军史上，威海这个弹丸之地，曾经显赫一时，也曾蒙受过奇耻大辱。这里，曾经是北洋水师所在地，水师提督丁汝昌的提督府便设在对面的刘公岛上。当年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水师的主要舰艇，曾经云集港内港外，练兵习武，一时间好不热闹。但在甲午海战中，日军继攻陷旅顺口之后，又在山东半岛登陆，从南北两路夹击，攻占了威海。黄海海战后，北洋水师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服毒自杀身亡。萧劲光想起这段惨痛的历史，自然是感慨万千。他登上当年曾经与日军激战两天的南北两岸炮台，但见断垣残壁，满目凄凉。随后渡海登上刘公岛，也没有见到任何海防设施。海上、港口全无屏障，旗顶山炮台也只剩下一个锈迹斑斑的炮座。他久久仁立山头，远眺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潮像浪花一样翻腾。他清醒地意识到，要想屈辱的历史不再重演，只有加快建立起一支足以防御外来侵略的海军。

回到北京后，萧劲光把此行的收获、观感和今后的打算，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表示了加快建设青岛基地海防设施的决心。

5月16日，萧劲光接到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的一份电报。电文中提出了“广东建设什么性质的海军，如何组织”的问题，并说江防工作由他兼管“实际上是兼而不管，长此不是办法”，建议海军研究解决。萧劲光和其他海军领导商量后，于5月21日给中央写了报告，建议迅速成立华南海军司令部。电文中说：“中南区海岸线甚为辽阔，北起汕头，南及西沙群岛，还有江河，地形复杂，土匪、特务、海盗利用我不设防的空隙，肆意骚扰。因此，统一指挥沿海与江河水上防务和剿匪，亦是迫切的任务。”随后，萧劲光把建立华南海军领导机构的意见电告了中南军区领导，并向当时任中共华南局书记的叶剑英同志征求意见，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两个月后，军委正式致电中南军区领导，责成他们负责组建华南海军。由谁来领头呢？萧劲光想到了曾在长征途中和在延安八路军留守兵团共过事、当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第44军军长的方强。他征得林彪同意后，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12月3日，奉军委电令，华南地区海军领导机构在广州正式成立，番号为中南军区海军（以后改称南海舰队），由方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仁杰任副司令员。

继1949年4月组建华东军区海军（以后改称东海舰队）之后，青岛基地和中南海军的成立，标志着海军北部、东部、南部三大战略防御格局的初步形成。在这三个相当于陆军兵团级的领导机构之下，随后又陆续组建起几个军级单位的基地，一大批师级单位的支队、水警区和团级单位的大队。组建海军各级机构的人员主要是从陆军中选调的。到1955年止，先后从陆军调来组建海军的有一个兵团部、5个军部和直属队、11个师级单位和28个团级单位。

指针、红线和蓝图

1950年6月下旬，萧劲光在他的住处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第一次会议。王宏坤、刘道生、罗舜初等领导人都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交心通气会，也

是一次工作研讨会。大家畅所欲言，会议开得很活跃。谈到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时，共同的想法是：前一段每天事务性的工作太多，领导干部要设法从中解脱出来。萧劲光综合大家的意见说：“日常工作要处理好，但海军领导机关是个决策机关，必须首先研究解决那些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成天忙干事务！”他建议在近期内召开一次有各大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解决以下几个重大问题：一是建设一支什么样的海军，明确提出海军建设要遵循的具体方针；二是制定一个具体计划，为海军的近期建设描绘一幅蓝图；三是研究海军建设应依靠哪些力量，提出一条明确的组织路线。

时局动荡，风云突变。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6月30日，萧劲光应周恩来总理的紧急召见，来到中南海。党中央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形势及时作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听了周总理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萧劲光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对海军建设有了更强烈的紧迫感。他向总理汇报了海军组建以来的主要工作情况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的设想。总理听后，点头说：很好。朝鲜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我们正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加快海、空军建设。你们要很好把握住这个时机，把海军建设搞上去！制定计划既要考虑需要，又要考虑可能。我们国家底子薄，人民生活还苦得很，要量力而行，花较少的钱，办更多的事！

7月13日，萧劲光接到朱德总司令写来的一封信。信中提醒说，要加强海军建设，必须有造船厂、飞机厂，还要有石油厂，建议海军可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要求，争取在3至5年内首先解决好燃料问题。总司令的主动关怀，使萧劲光很受感动。他要求与总司令面谈一次，总司令爽快地答应了。

见面后，萧劲光详细地谈到了自己对加快海军建设的初步设想，并说：“我们打算根据现有财力和物力，制定一个三年计划，明确海军建设近期的奋斗目标。”

“要得！干工作要有计划，不能打乱仗！”总司令表示赞同。

萧劲光谈到制订计划要从兼顾攻打台湾和长远建设着眼时，总司令插话说：“是的，不能单从打台湾打算，而忘记了海军的基本建设！”

萧劲光继续说：“计划中除了武器装备，还要把学校、基地等方面的建设考虑进去。”

“应该充分利用时机和现有的兵力，首先把沿海海岸各要地及岛屿的防御工事、防御设备建立起来，把各地基地组织起来。中国地方宝贵，寸土都要保护啊！这一任务应该成为海军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总司令谆谆嘱咐。

总司令从要重视发展造船工业，谈到要抓紧解决燃料问题；从要培养懂得业务的海军干部，谈到“招兵要注意招收水性熟悉的人”；从要搞好武器装备建设，谈到要注意搞好生产，建立家务，改善部队生活。最后，语重心长地说：“海军的防卫在海上，巩固海防，你们海军是第一道屏障。你们又是白手起家，任重道远啊！”

两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给予萧劲光以巨大鼓舞。对于搞好海军建设，首先是开好即将召开的会议，有了更明确的指导思想，也增添了信心。

海军建军会议从8月11日开到30日。参加和列席会议的有海军和华东、中南海军的领导同志，有大连、南京两所学校和海直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共20余人。

会议首先讨论的问题是海军近期建设要遵循的具体方针，萧劲光从就任

那天起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早在 1949 年秋天，毛泽东主席就为华东海军写下了“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够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的题词。随后，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致开幕词时，他又庄严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毛泽东的题词和讲话，表达了全国人民建设海防力量的决心，提出了人民海军担负的根本任务，规定了海军建设的规模。萧劲光想：这应该是海军建设必须遵循的总方针。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导下，4 月 14 日在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上讲话时，他就谈到了自己的初步设想。他说：“我们要建设的是一支保卫自己海防的海军，而不是一支侵略别国的海军。”“我们在战略上是防御的，在战术上是进攻的。我们有优越的条件，靠近海岸，我们的陆地就是航空母舰，我们的海岸炮就是军舰的主炮。”“我们不建大的。只建轻的小的，比如潜水艇、驱逐舰、鱼雷快艇、扫雷艇……我们还要建设海岸要塞。”“只建轻舰，不造重舰。这就是我们目前的建设方针。”在建军会议上，他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这些设想。

到会同志展开热烈讨论，一致赞同萧劲光的设想。在会议总结中，对这条方针作了如下概括：“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于攻防力的、轻型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和发发展现有力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这一方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海军建设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接着，会议对《海军建设三年计划纲要（草案）》进行讨论。这一计划（草案）是在罗舜初的主持下草拟的。事先，萧劲光对罗舜初说，制定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一是需要，就是要能满足我们准备解放台湾和保卫海防的实际需要；二是可能，就是国家能拿出多少钱来建设海军。今年年初，毛主席、周总理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 3 亿美元军事贷款的协定。中央决定将其中的一半，即 1.5 亿美元，拨给海军建设使用。这就是我们制定三年计划的经济来源和基础。钱虽不是很多，使用的好，还是能办不少事情的。

然而，计划制定出来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这笔贷款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购买战斗机和武器装备。在两年之内，海军建设实际只开支了约 2000 万美元。萧劲光等顾全大局，愉快地服从了军委的决定，把海军建设的许多项目都往后推延了。

会议讨论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海军建设要依靠的力量。当时，海军部队主要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从陆军部队来的工农分子；二是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三是新入伍的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无疑，这三部分人都是海军建设中的重要力量。但他们在海军建设中所处地位如果处理不好，势必会产生摩擦和矛盾。事实上，在一些部队已经出现种种不团结的现象：原海军人员和知识分子瞧不起工农分子，认为他们是“土包子”；而工农分子由于文化低，不懂技术或者瞧不起自己，要求离开海军，或者自恃有战斗经验、有功劳，而瞧不起别人。会议认真分析了这些情况，经过深入讨论，为海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以工农为骨干，以解放军为基础，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

这条组织路线的提出和贯彻落实，对于海军初期的建设，也起了很大作用。它像一条无形的红线，把海军建设的各种力量连结在一起，在各级党委

的具体领导下，形成了一个统一坚强的战斗集体。

对于这次会议的历史作用，多少年后，海军许多领导同志回忆起来无不感叹说：“纲举目张。萧司令通过那样一次会议，把海军建设的纲提了起来，使许多工作都有了头绪！”

海军建设中的“鞍钢”

还在1949年10月，萧劲光到北京受命组建海军期间，遇到了张学思。张学思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同父异母兄弟——一个17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封建军阀家庭的叛逆者、人民解放军的年轻指挥员。萧劲光是解放战争期间在东北同他相识的。那时萧劲光任南满军区司令员，张学思任辽宁省主席兼辽宁军区司令员。在著名的“四保临江”战役中，张学思率领群众和地方武装支援、协同主力部队作战，双方配合得十分默契。如今，在首都重逢，尤其是得知今后两人又要战斗在建设人民海军的同一个岗位上的时候，彼此都很兴奋。

原来张学思从这年夏天起，奉军委之命，负责筹建海军第一所正规军事学校（以后简称大连海校）。军委曾派他赴苏联进行一次考察，参观了几所苏联海军学校，还代表中国政府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来华帮助建校。当他得知萧劲光将任海军司令员时，便向他汇报了筹建海校的情况。萧劲光听了，非常高兴，说：“军委的决定非常英明！海军是一个技术非常复杂的军种，而建设海军没有一批懂行的干部是根本不行的。培养这样一批干部靠什么？首先靠学校。学校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和基地。治军要先治校。学校办好了，再经过实际锻炼，干部就能很快成长起来。”

张学思说：“军委原打算让我担任这所海校的校长，我深感自己难以胜任，但一时又提不出合适人选。现在好了，我觉得由你来兼任最合适。在我军历史上，建校和建军历来是一致的。海军司令员兼任第一所海校校长，事情就好办多了。何况，你对办校又有着丰富的经验。”

提起办校，萧劲光的确不陌生。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中央苏区担任过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时期，又创办了军政研究班，定期轮训营以上干部，对提高干部的军政理论水平起了很大作用。听了张学思的话，他却说：

“你风华正茂，过去又在抗大工作过。既然军委让你牵头，你就大胆干吧！”

“具体工作我来做。有了你当校长，我胆子就壮多了！我打算向军委正式提出意见。”张学思继续坚持着。

果然，军委不久下达了由萧劲光兼任第一所正规海校校长和政治委员的命令。张学思任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

年方33岁的张学思表现出了献身海军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忘我的工作精神。从勘察选定校址，到安排教员住房和家属工作，从招收学员到主持审定教学大纲，他都亲自过问，经过短短几个月的筹备，1950年2月1日，学校正式开学了。

4月中旬，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刚开过，萧劲光便从北京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大连。校址设在一个叫老虎滩的海湾附近。这里，依山傍海，风景秀丽，有几百幢房屋，还有可供教学用的大楼，有可做操场用的大片空地，是很理想的办学场所。萧劲光一下汽车，辽阔无垠的大海立刻展现在眼前，一股微带腥味的海风迎面吹来。他深深地吸了几口，顿觉心清脾爽。他高兴地

对前来迎接的张学思说：

“你选的这个地方太好了！”

张学思告诉他：他和苏联首席专家沿着渤海和黄海岸边勘察校址，跑了好多地方。最后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当时这里驻着苏联的一个炮兵团。他跑到北京，通过中央军委转外交部与莫斯科交涉，又请大连市政府协助找好一座新营房，让苏军炮兵团搬过去，才使这里成为学校校址的。

落座后，张学思和政治部主任李东野向萧劲光详细汇报了建校情况。这所学校的任务是负责培训航海、枪炮、鱼水雷、观通、机电等水面舰艇干部。当时，学员只有200多人，分成速成班和普通班。速成班的学员是从地方大学二年级以上的学生中选拔的，普通班的学员是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全校有协助办学的苏联顾问80多人。教员除由“重庆”舰起义军官16人担任以外，还从大连大学聘请了十几位教授兼任。连续许多天，萧劲光在张学思、李东野的陪同下，召集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召开教员座谈会，就学校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同大家一起商讨，亲自帮助学校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大大促进了学校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开展。

4月21日，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萧劲光讲了话。他在讲完为什么要建立海军和建海军为什么要先办学校的道理以后，对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各类人员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说：“一切以教学为中心应该成为学校工作的基本方针。学校领导，包括我在内，学校机关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教员、职员，都要明确树立为教学服务、为学员服务，就是在为海军建设服务的思想！”最后，他面向几百名学员，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你们将来是要担任部门长、舰长、大队长等领导职务的，海军建设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能早日用现代海军科学知识把自己武装起来，海军建设就能早一日腾飞。我相信你们一定不会辜负党的重托、人民的期望的！”

这年9月初，萧劲光到达青岛，检查了正在筹建的海军航空学校、炮兵学校。他从这所学校跑到那所学校，了解情况，解决困难。在他的关心和过问下，这些学校很快都开学了。同年11月，他又指派干部在青岛开始筹建潜艇学校。1951年1月，他奔赴南京，视察主要负责培训舰艇军士和水兵、拥有4所分校的联合海校。3月，他再次来到大连海校。这时，学校各项建设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并设立了两所分校，教学工作已走上正轨，教学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看到这种蓬勃向上的景象，他满意地笑了。

1952年2月，原二野第10军副政委刘华清调海军工作。萧劲光找他谈话，对他说：“华清同志，欢迎你调来海军工作。我们打算派你到大连海校担任副政委，你看怎么样？”

“我的水平不高，怕胜任不了。”刘华清谦虚地回答。

“你在西南军政大学担任过政治部主任，办过学校，既有战斗经验，又有办学经验，相信一定能够胜任。”停了一下，萧劲光又说：“办学校是当前海军建设的首要工作。大连海校又是海军院校建设中的重点。名义上我是校长，但不住在学校，实际工作做得不多。派你去，正是为了加强学校领导。”

刘华清到达大连海校后，与张学思密切配合，把学校办得更好了。这所学校经过4年的艰苦创业，共修建校舍12万平方米，建立起48个实验室和21个陈列室，编译出一整套教材和讲义，培养了近千名初级指挥干部和专业人员。随后，又增设了指挥、机械两所分校。直到1990年，已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在《怀念萧劲光同志在兼任大连海校校长的日子里》的悼念文章

中，还深情地追忆了萧劲光创建这所学校的光辉业绩。他写道：“萧司令重视海军学校建设，更重视大连海校的建设……他曾在各种场合多次形象地比喻说：大连海校就是海军建设事业中的‘鞍钢’……首先应当办好。”

在萧劲光的关心、支持和亲自过问下，继成立上述学校之后，又陆续建起了政治干部学校、后勤学校，并在隶属军委的军事学院设立了海军系，在军事工程学院设立了海军工程系。在短短几年里，海军就拥有10所正规军事院校和6所预备学校，为海军后来的院校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任快艇学校政委、原海军学院院长朱军在怀念文章中写道：“人民海军是先有鱼雷快艇学校，后有第一个鱼雷快艇中队；先有海军航校，后有海军航空兵部队；先有海军炮校，后有海岸炮兵部队；就是后来的潜艇部队在组建之前，也是先组成潜艇训练队到旅顺口去接受苏军的训练，而后在青岛五码头建立潜艇学校，再建立潜艇部队的。‘治军先治校’，反映了一个新的军种的组织建设首先是干部队伍的建设这一客观规律。萧司令员充分认识了这个客观规律，并牢牢抓住了这一重要环节。”

立体防御体系的形成

创业难，不但难在白手起家，也难在工作千头万绪。无论工作多么繁杂，萧劲光始终把加强海防战斗力的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中的重点，紧紧抓住不放。

1950年9月，萧劲光在青岛视察期间，来到刚刚筹建起来的快艇学校。在同校长邓兆祥、政委朱军交谈时，他说：“海军建设，第一等重要的任务是建设海上战斗力。快艇部队，是海上战斗力的重点之一。我们创办快艇学校，正是为了组建快艇部队。因此，你们担负的任务，除了尽快训练出一批快艇部队的干部、艇员以外，还要以这批学员为基础，组建海军的第一支快艇部队，同时，建设起第一个快艇基地。”

邓兆祥原是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1949年2月25日，率领“重庆”号在上海吴淞口起义后，曾任安东海军学校校长。他年轻时曾在南京水鱼雷枪炮学校学习过，后来又担任过国民党海军水鱼雷营营长，熟悉水鱼雷业务。因此，安东海校解散后，萧劲光便把他调来任快艇学校校长。朱军是一位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调海军前任辽西军区副司令员，曾任安东海校政治委员。

“司令员，目前学校只有从苏联驻旅顺口的海军部队接收过来的6艘6123型鱼雷快艇。别说是组建快艇部队，就是学员观摩、实习也不够用，这问题怎么解决？”邓兆祥提到了装备问题。

“已经考虑到了！”萧劲光回答说，“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曾经与苏方签订了3亿美元的贷款协定。4月中旬，周总理已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提出了我们需要以这笔贷款购买的武器装备清单，其中就有36艘鱼雷快艇，正是为组建第一支快艇部队准备的。”

“货何时能到？”

“周总理在电报中，要求至迟于明年春天运到，大概不会太久了。”

暮春三月，正是桃红柳绿时节。萧劲光接到通知，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18艘鱼雷快艇，已经运抵旅顺。他很开心，立即叫人通知快艇学校派人去接收。不料，由学校教育长田松负责的接收组，到旅顺苏联海军部队一看，这批快艇全都是已使用了四五年的旧艇，其中五艘进厂修理过。艇上的主机全是美国制造，又没有零配件。

田松不敢轻易接收，到北京向萧劲光请示怎么办？

萧劲光通过库兹敏，立即把这一情况向苏联海军部反映，希望能调换新的。苏方却迟迟不作答复。萧劲光想：即使能接到新的，又不知要拖多长时间。这时，朝鲜战场上的形势非常紧张，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大叫大嚷要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台湾国民党军队也在蠢蠢欲动，经常对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破坏。萧劲光心急如焚。他想要尽快把自己的海上战斗力建设起来。他在报经周总理、聂代总长同意后，决定按分类折旧办法，将这 18 艘旧艇接收过来。他说：“这样做，既照顾了友方关系，又解了我燃眉之急。虽非上策，却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

又过了几个月，从苏联进口的第二批新的鱼雷快艇运到了。

1951 年 10 月，快艇学校第一期学员 897 人学完预定课程毕业了。根据萧劲光和海军领导的命令，为这批学员配备了 42 艘鱼雷快艇，成立了 4 个鱼雷快艇大队。在这同时，青岛快艇基地的建设也初具规模。快艇停泊码头、鱼雷检修所、轮机检修所等设施建立起来了，各类器材也逐步齐全。至此，海军第一支鱼雷快艇部队宣告诞生了。

萧劲光懂得，水面舰艇中，光有鱼雷快艇、巡逻艇等小型艇只，是构不成水上坚强战斗力的，还必须逐渐组建起若干支大中型水面舰艇部队。但是，国家穷，造船工业落后，短时期内是无力自己制造这类舰艇的。萧劲光首先想到在邓兆祥舰长率领下起义开到解放区，后来为了防敌空袭自沉在葫芦岛港口的“重庆”号。这是 1948 年英国政府为抵偿二战时期征用中国船只费用，移交给国民党海军的一艘轻型巡洋舰，排水量 5000 余吨。他想：如果能把它打捞上来修复好，必将有力地加强我们的海上战斗力。早在 1950 年 5 月，他便把曾在葫芦岛主持该舰自沉事宜的安东海校政治委员朱军召到北京，并同他一起到中南海去拜见朱德总司令和聂代总长，商定了打捞事宜。随后，在苏联派来的打捞勘测队的指导下，于次年春天终于将该舰打捞出水面，并拖至大连，但由于所需费用太高，零部件困难等原因，难以修复。这艘大型军舰也就只得报废了。

没有巡洋舰，有几艘驱逐舰也好。于是，萧劲光决定利用计划从苏联进口的 4 艘驱逐舰，组建起海军的第一支驱逐舰部队。干部和舰员从哪里来？他想到了华东海军的护卫舰第 6 舰队，便对华东海军司令员陶勇说：“护卫舰武器装备的性能与驱逐舰比较接近，组建驱逐舰部队的干部和技术人员都要从第 6 舰队中挑选。希望你把好关，一定要挑选最好的！”指示传达到第 6 舰队以后，舰队党委顾全大局，提出了“宁肯让第 6 舰队瘫痪、靠码头，也要保证接到驱逐舰”的口号。于是，从 1951 年起，先后从该舰队选调三批共 100 余名优秀干部战士，去苏联海军学院培训，重点学习驱逐舰的装备技术和操作管理。1954 年 10 月，4 艘驱逐舰分两批抵达青岛港，被分别命名为“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太原”号。人民海军的第一个驱逐舰大队诞生了。

在这同时，护卫舰（艇）、猎潜舰（艇）、登陆舰（艇）、布雷扫雷舰（艇）和各种勤务舰船部队，也陆续组建起来。

在组建水面舰艇的同时，萧劲光也把视线投向万里海空。他委派赵汇川任校长、桂绍彬任政治委员，筹建航空学校，并抓紧修建机场、购置飞机，开始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

1950 年 10 月，美国将侵朝战争的火焰烧到鸭绿江边，我志愿军战士整

装待发。萧劲光接到军委的紧急通知：抢建流亭机场。军委要求11月1日开工，25天内完成主体工程。

流亭机场座落在胶东半岛的崂山脚下，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日本侵略军花了一年时间，在这里只修起一条跑道，后因战败投降而停工。

任务十万火急！萧劲光召集海军几位负责人一起商量。共同的想法是：青岛基地和几所学校都刚刚组建起来，又担负着修建海岸炮兵阵地等同样紧迫的任务，光靠海军部队是难以完成这项工程的。

“向地方党委和政府求援！”萧劲光提议。于是，一份要求中央责成山东省，特别是青岛市动员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这项紧急工程的报告，于10月28日送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和聂荣臻代总长。报告当天就得到批准。

以青岛基地第一副司令员赵一萍任主任，包括青岛市委书记兼市长赖可在内的12人机场修建委员会成立了。几千名官兵、几万名民工、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动员起来了。11月8日开始动

工。发电厂架好了电线，自来水厂铺设了水管，铁路局修筑了运输专线。几百辆汽车，几百辆马车、人力车，运送着砂石、水泥、木料。胶州湾寒风凛冽，工地上却是热气腾腾。人民海军在地方大力支持下修筑的第一个机场，终于在短短25天之内完成了！飞机和飞行干部从何而来？除向苏联购买的31架不同型号的飞机已全部交给了航空学校用于教学以外，萧劲光寄希望于人民解放军空军。他说：空军建设在三大战役以前就已开始，现在已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只有争取他们支援，海军航空兵才能以更快的速度起飞！

同年11月29日，萧劲光给周恩来副主席递上一份报告，要求军委从空军给海军至少调拨一个轰炸机团、三个驱逐机团和一批飞行干部。1952年1月8日，他又给毛主席和朱德、周恩来副主席并聂代总长等写了《关于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要求军委从空军调拨更多飞机和飞行干部给海军，以便尽快组建起海军航空兵的领导指挥机构和部队。毛主席、周副主席批示同意从空军陆续抽调几个驱逐机师给海军，并把沿海几个原属空军的固定机场拨给了海军。与此同时，萧劲光还造了向苏联购买343架飞机的预算，周总理批了232架。毛主席批示：“照周批办。”4月，海军航空部成立，顿星云任司令员、曾克林任副司令员。6月，以海军航空学校毕业的第一期空、地勤学员为基础，并接收从空军调拨来的几个飞行大队，组成了海军航空兵第1师。至此，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也正式诞生了。

有了水面舰艇、海空飞机，还必须有水下潜艇，才能形成立体防御体系和坚强的海上战斗力。萧劲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早在1950年8月，他就提出“海军战斗力量建设要以空、潜、快为重点。”这年冬天，他到苏联考察访问时，特意拜访了苏联潜艇部队负责人巴尔图诺夫海军少将，向他请教建设潜艇部队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并向苏联海军部提出，请他们帮助训练潜艇艇员。1951年3月上旬，周总理正式通知海军：友方已决定帮助我们训练4艘潜艇艇员，并要求于4月20日全部到达旅顺。他立即下令从各单位抽调240多人，组成潜艇学习队，由当时任华东海军第6舰队参谋长、后曾任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的傅继泽任队长。

“我最近看到一个材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军被德军击沉的军舰中，20%是被潜水艇打沉的，而被潜艇击沉的运输商船则高达70%；日本被美军击沉的舰船中，60%是被潜艇击沉的；苏联打沉的德国军舰，也差不多都是用潜艇打的。”交代任务时，萧劲光对傅继泽说：“你好好掂量一下这

些数字，就会掂量出潜艇部队在海军建设中的份量。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在抓紧培训潜艇骨干的同时，萧劲光还抓紧了青岛潜艇基地的建设。从勘察、定点，到组织施工班子；从筹措施工经费，到审核、申报施工方案，他事必躬亲。据后勤部长张汉丞回忆：为了建设这个基地，他一次又一次召集有关人员商量，一次又一次亲临现场，解决施工中的问题。指战员们和当地民工日夜奋战，陆续建成了潜艇码头、鱼雷仓库、弹药仓库、修船厂、营房等设施。1954年6月，旅顺潜艇学习队结业，独立操纵着经毛主席直接打电报给斯大林从苏联购买的两艘潜艇，劈波斩浪，驶抵青岛。7月22日，独立潜水艇大队成立。随后，又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买的6艘潜艇。独立潜水艇大队扩编为潜水艇第1支队，为潜艇部队的进一步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

在潜水艇大队成立后的第二天，即1954年7月13日，陈毅元帅在萧劲光陪同下前来视察。他登上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艘潜艇，感慨万端，即兴写下了《潜艇上留题》的诗篇：“人口六万万，立国太平洋。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海底深千尺，潜水亦所长。件件皆掌握，样样是内行。严整陆海空，捍卫我边疆……”这首诗写出了水兵们的豪情，也写出了萧劲光的壮志，直到晚年，他还能背诵出陈毅元帅这首诗中的几行。

在组建上述部队的同时，萧劲光对岸炮、高炮等兵种的建设也没有放松，在四五年之内都打下了一定基础。他来到海边，看到舰艇在水面驰骋，潜艇在下潜上浮；来到机场，仰视战鹰在云海翱翔；来到炮兵阵地，看到炮管正严密地监视着领海、领空。他心醉了。人民海军的第一步啊，迈得刚健，迈得坚实！

没有武器装备形不成战斗力

早在1950年4月就任伊始，萧劲光到威海勘察海防设施时，遇到了这样一件事：他来到港口码头上，想到对面的刘公岛上去察看。码头上停靠着几艘渔船。随行参谋指着他对一位渔民说：“老乡，这是我们海军的萧司令，想借你的船到刘公岛去一趟。”

这位渔民眯缝着眼，朝萧劲光这位魁梧英俊的将军打量了好一会，慢条斯理地说：

“您是海军司令，怎么还向我们借船？”

听了这句话，萧劲光禁不住全身一颤。是啊！我算哪号海军司令？在这样一个有名的军港里，海军竟然哪怕是一条小船板都没有。渔民的这句话，固然叫他难受了一阵，却又是一支强心针，对他起了不小的激励作用。他想：一定要抓紧武器装备的建设。人再多，没有武器装备，也形不成战斗力！

不久，萧劲光接到中央办公厅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李立三同志写给刘少奇同志的。信上说，当时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刘宁一在上海参观江南造船厂时，发现该厂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并提了一些改进工作的意见。少奇同志在刘宁一的书面意见上批示：“萧劲光同志，江南造船厂如果属于你们，你们就应切实负责迅速加以整顿，现状是不容许继续下去的。”接信后，萧劲光立即找华东海军一位处长赴京汇报情况，在基本摸清情况后，1951年1月，萧劲光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华东海军司令员袁也烈等陪同下，亲自来到该厂检查。

全国最大、远东闻名的江南造船厂，坐落在上海黄浦江边，占据着沿江1000多米长的水面和陆地。这个造船厂是1864年由李鸿章主持兴建起来的。

在 80 多年的岁月里，换了一个又一个的主人。到 1949 年上海解放前夕，拥有船坞 3 座、造船台 9 座。造船能力每年达 1 万吨。但在国民党统治下，在 1945 年至 1948 年 3 年间，实际造船仅 7000 吨。国民党军队在溃退前夕，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叫嚷：“只能给共军留下一堆废铁！”他下令将电厂、船坞、闸门等设施一一炸毁，厂内大部分机器劫走，所长、总工程师和 200 多名技术人员被带往台湾。剩下的只是一些破烂不堪的厂房、机器设施和 2000 多名穷困潦倒的工人。华东海军接管后，虽经全厂职工共同努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为海军抢修了 100 多艘大小舰船，但终究是积重难返。

通过实地考察，萧劲光找到了问题的关键是领导力量薄弱，经营管理混乱。他当即和袁也烈等同志商量，将华东海军修造处与该厂合并，调修造处政委黄涛去任该厂党委书记，同时征得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同意，调蓬莱区区委书记去任该厂副书记。领导力量有了加强，各项规章制度逐步健全，经营管理日趋完善，生产面貌也就逐渐改观了。以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该厂成为海军主要的造船厂之一，为修理和建造海军舰艇船只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不久，为了更好地完成海上巡逻任务，萧劲光便向总参报告，提出建造几艘小型巡逻艇的建议。报告得到军委批准和周总理支持后，这项任务最早就是交给江南造船厂的。但由于设计参数不对，稳定性不够，开始造出来的两艘，一下水就翻掉了。但是，萧劲光没有泄气。他说：“科学实验中是允许失败的。好好总结经验，重来！”

1951 年春，刚调海军不久的修造部长林真向萧劲光提出要求，让他亲自监督，到青岛造船厂再试验一次。

“好哇！”萧劲光高兴地说：“调你来就是为了加强对舰船修造工作的领导。”林真来到青岛造船厂，带领一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一起，研究设计图纸，一起攻克技术难关，到今年秋天，便造出了一艘 40 吨的巡逻艇，一次试航成功。萧劲光高兴极了，亲自到厂里视察。根据他的指示，紧接着，又一鼓作气造出了 3 艘。

1952 年 2 月 14 日下午，毛泽东在罗瑞卿、刘亚楼陪同下，在刚刚视察完空军后，突然来到萧劲光的办公室。

毛泽东从当时正在开展的“三反”运动，谈到了海军建设。在谈到海军的武器装备时，毛泽东先是征求萧劲光的意见：抗美援朝需要飞机，中央打算集中外汇解决一下空军的问题。原先已决定拨给海军购买舰艇的几亿卢布，是否可以先让出来给空军买飞机？事关抗美援朝大局，国家财力有限，萧劲光和其他海军领导同志都愉快地表示拥护。

“国内的钱，还有。你们是不是买点材料，自己造几条？听说上海的江南造船厂过去造过一千多吨的船嘛！”毛泽东提议。

“报告主席，早在前年秋天，我们就开始试制了。”萧劲光兴奋地说：“只是开始没有搞成功。去年由青岛造船厂试制，已经搞成了几条！”

“太好了！自力更生嘛！打下个基础，起步就快了。”毛泽东充分肯定。

“是！我们一定认真落实主席的指示，尽量减少国家的外汇开支。”萧劲光和其他海军领导人一齐表态。

于是，从这年开始，江南造船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又重新试制，在几年之内造出了 80 多艘 50 吨的巡逻艇。截止 1955 年，由海军自行设计，各造船厂建造的各型巡逻艇、登陆艇、自动驳船、运水船等，共计 230 多艘。

但是，限于我国造船工业的能力，在海军创建初期，海军武器装备的主

要来源，还是从国外购买。

1952年4月中旬，萧劲光和已升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罗舜初，率领海军修造部部长林真和国家重工业部船舶局副局长罗叔平等，到莫斯科进行工作访问，洽谈购买武器装备问题。这是他任海军司令员后的第二次访苏。他们离开北京时是坐飞机，到达伊尔库次克后，萧劲光感到身体不舒服，于是改乘火车，于22日抵达莫斯科。萧劲光等先后同苏联海军部部长库兹涅佐夫海军大将会谈3次，同苏方派出的首席代表、副总参谋长法金将军会谈6次。通过洽谈，当年的订货定下来了，还对以后几年计划需要购置和要求转让的各种装备、技术，进行了初步磋商。苏方同意我当年增购14架水鱼雷机、12艘鱼雷快艇，以及5个海岸炮兵连的武器装备和一批护航舰、扫雷艇、猎潜艇、远航快艇等。正当代表团准备启程回国时，萧劲光由于过度劳累，直肠突然多处破裂，大出血，心脏也出现病变。他只得让代表团的同志先行回国，自己住进医院检查、治疗。回到北京时，已经是6月中旬了。

1953年初，为了尽快落实双方已初步达成的协议，萧劲光又委派罗舜初访苏。罗舜初在同苏方会谈中遇到困难，于3月12日给萧劲光并周总理来电，向国内请示怎么办。萧劲光出于解决武器装备问题的热切愿望，于3月16日、20日和4月4日，连续三次致电罗舜初，告诉他“目前海上斗争情况日趋严重”，“日本和台湾正在拿了美国那些过龄的东西加强武装，向我封锁袭击。”因此，一定要“争取现成品，哪怕是他们用过的。”“因为要知道，苏联在目前不可能给我们许多新东西。他们最新的最秘密的东西决不会给我们。”“如果因为某些情况必须改变五年计划的话，请你一定要掌握重点。”“就是快艇、飞机、潜艇”。

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在1953年6月4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一项海军协定，简称“六四”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在三年内海军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计有各类战斗舰艇143艘（其中只有10艘为成品，其余均是半成品，由国内船厂加工装制）、辅助舰艇84艘、各类型号的飞机226架、几种口径的海岸炮108门。这是海军创建以来从苏联获得的最大一批武器装备。

从苏联获得的另一批武器装备，是接收苏联驻旅顺海军基地。

旅顺是世界著名的天然良港，隐蔽险要，终年不冻。在从19世纪末到1945年的半个多世纪时间内，它饱受日、俄帝国主义者铁蹄的蹂躏。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根据波茨坦公告，将旅大地区纳入它的管辖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于1950年2月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签订了苏军于1952年底以前从旅大地区撤走的协定。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根据国防斗争形势的需要，苏军撤离旅顺的日期被推迟。朝鲜战争结束后，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又举行了会谈，议定苏军在1955年5月31日以前从旅顺撤走，并将该地区的设施移交我国。

作为中方代表团主席，萧劲光于1951年3月24日，便赴大连与苏方代表团主席、当时驻旅大地区的苏军司令官别洛博罗多夫上将一起，联合主持召开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会议制订了提交两国政府审议的关于交接旅顺问题的措施。1952年9月，双方又草拟了一份《中苏联合委员会章程》。为了处理接收事宜，1955年初，我方还成立了旅大地区接收委员会总会，下设若干个分会。萧劲光和当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邓华为总会负责人。海军分会由海军参谋长周希汉任主任委员。萧劲光主持总会开会，根据军委

提出的“接收好，团结好，学习好”的方针，对整个接收工作，作出了周密的安排。

在接收过程中，凡是对建设海军战斗力有用的东西，他都主张接收过来。苏军当时在旅大地地区有七、八十架水鱼雷机，需要花很大一笔钱。要不要接收过来？当时国防部长彭德怀有些犹豫，派邓华征求他的意见。他说：“海军航空兵正需要飞机，已经在中国领土上，怎能不要！”最后，彭德怀同意了他的意见。接收过来后，他用这批飞机立即组建起了海军航空兵第5师。

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按期完成了各项交接任务。4月5日，中苏海军的双方代表在交接证书上签了字。5月24日，中苏联合军事委员会在他和别洛博罗多夫上将联合主持下，也举行了总签字仪式，圆满结束了全部交接工作。接收的武器装备和战备器材，分为有偿和无偿两部分。有偿部分有护卫艇9艘、各型辅助船18艘、水鱼雷机64架、教练机14架、岸炮54门、铁道炮16门、高射炮122门，以及探照灯、雷达、牵引车等各一部，共付出2.7亿卢布。无偿部分有布雷舰一艘、护卫舰两艘以及码头、阵地、工厂、营房等固定设施。这些武器装备和设施，虽然都比较陈旧，数量也不算多，但在海军创建初期，却也形成了一支可观的战斗力量。

在布置接收工作的同时，萧劲光还抓紧了海军旅顺基地的筹建工作。他呈报军委从中南军区、铁道公安部队调拨了团、营、连等许多个建制单位，又从海军各部队抽调部分兵力，以接收过来的物资和武器装备，组建了海军旅顺基地，由罗华生任司令员、彭林任政治委员。旅顺口的防务终于由中国人自己担负起来了。

建立有海军特点的后勤供应体制

1950年11月，中央军委在《关于海军领导关系的决定》中对后勤供应问题明确规定：“凡经费及作战费用概由军委负责，”“各地海军所需营房、码头、仓库、油池、机场、医院以及步兵武器、弹药等，由大军区负责补充与调整”。在海军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海军领导机构不健全，后勤干部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与陆军并无多大差别，尽管这样的供应系统在一定时期曾经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海军建设的发展，技术兵种逐渐增多，物资供应任务日趋繁重，这种落后的供应体制和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越来越显得不相适应了。1951年夏天，萧劲光在一次会议上就说过：“我们的后勤工作，在很多方面还远不适应海军建设的要求。我们拿山沟里管理手工业生产的方法管理现在的工厂，以管理小米的方法管理油料，以管理步枪的方法管理现代化武器，由此所造成的物资上和工作上的损失，已经是很大的了，不能再照老样子下去了。”但对供应系统的改变，由于他担心影响海军和各大军区的关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没有向军委提出要求。

1952年五六月间，萧劲光在访问苏联时，就我国海军是否需要单独成立各级后勤部门的问题，征询了苏联海军部的意见。对方说，对海上部队的供应，与对陆上部队的供应有许多不同，每个基地要一直负责供应到单舰，而每艘单舰需要供应的物资又各种各样。如果海军本身不设后勤部门，没有一批懂得各类技术的后勤干部，是不可能保证部队战时和平时需要的。他们还说，在苏联，也试行过把海军后勤工作划归人民武装部系统的做法，后来经验证明不适当，才又改过来。萧劲光当时就把苏方的这些意见报告了中央和军委。回国后，他于7月6日，给军委彭德怀副主席，并毛主席、周总理和总参、总后领导正式写了《关于后勤组织问题》的报告。彭德怀看了以后，

于8月2日给毛主席写信，提出意见：“海军后勤建立垂直系统，直属军委联勤，不经大军区，减少层次似适宜。”第二天，毛主席批示：“同意这个意见。”

这个问题的解决，结束了海军后勤工作多头领导、层层管理的局面，开始由海军全部担负起海军部队的经费开支和物资供应任务，逐步建立起适应海军建设需要的“海军—舰队—基地—舰艇”四级制的后勤供应管理体制。

在解决海军后勤工作管理体制的同时，1951年2月，萧劲光主持召开海军后勤工作会议，研究确定海军后勤工作，特别是财政开支的大政方针。当时，国家财政开支第一位的任务仍然是用于支援战争和维持500万军队的开支。在军队开支方面，空军、炮兵、坦克及步兵装备的改善，又处于优先地位，海军建设只能摆在次要位置上。当年分配给海军的经费只有大约6000万元。这笔钱在当时充其量也只能够修建6个机场。这么一点钱怎能保证海军建设的需要呢？后勤部长张汉丞向萧劲光请示说：“司令员，能否向军委申请增拨一点经费？”

“不可能！周副主席明确说过，只能给海军这么多。”萧劲光斩钉截铁地说，“军委对经费的分配是从全局着眼的，我们不仅不能争，而且要自觉地心甘情愿地服从整体的需要。”

“那样的话，海军建设就太困难了！”

“对，就是要在困难中建设我们的力量。”萧劲光继续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钱虽不多，只要我们的指导思想对头，分配得当，还是能办不少事情的。”

经过深思熟虑，萧劲光提出了八个字，即“建设重点，解决必需”。作为海军后勤工作，特别是财政开支的基本方针。他向参加后勤工作会议的同志解释说：“我们的经费有限，不分轻重缓急，平均使用，必然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所以，我们的钱应主要用在重点建设上面，其次才能解决“必需”，什么是重点呢？就是亟需马上建设，又具备了可能条件的那些项目。举例说吧，在某一孤岛上，亟需设置几门海岸炮，这是重点建设。但岛上没有房子住，不能说炮架好了，建设任务就算完成了，必须让战士们有房子住才行。盖房子就是“必需”。同样，舰艇部队也是如此，不能说有了舰艇就行。还必须建造码头和油水补给等必要的生活设施。”

“建设重点，解决必需”，这一指导方针，指引着海军后勤工作，在整个海军创建时期有条不紊、有主有从地开展起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952年11月，萧劲光在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方强、副司令员周仁杰等的陪同下，来到珠江口一带，察看了虎门、沙角等地的海岸炮兵阵地，又来到一个叫新湾的地方。海军组建以来，他这是第二次来到广东了。第一次是在一年前的8月，他与当时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江防部队司令员洪学智等商议筹建了华南海军。现在新湾正在修建鱼雷快艇基地。他站在工地上，放眼望去，但见江面上船只穿梭来往，工地上马达轰鸣，人声鼎沸，一片繁忙景象。方强、周仁杰告诉他，工程任务重，部队人员少，只好把很大一部分工程包给了广州市三家私人营造厂。施工中遇到不少困难，比如港湾内有1万多立方米的淤泥，但却没有挖泥船。后来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雇用一批小木船，采用南方农民用两根竹竿做成一个大夹子挖河泥的上办法，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萧劲光听了，连声说：“好，好！还是群众智慧大，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也能解决大问题。”他一处处察看了正

在建设中的各项设施，亲切慰问施工人员，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到 1953 年春节前，海军的第一个完整配套的鱼雷快艇基地终于建成了。

就这样，海军的后勤工作，在短短的 5 年内，不仅迅速完成了组织机构、供应体制和供应方法方面从陆军到海军的转变，而且实际工作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共建设舰艇基地近 10 处、各种码头 20 余座，新建机场 4 个、扩建机场 10 个，新建岸炮阵地近 100 处、营房近 1000 万平方米，新建、扩建医院、疗养院 10 余所……每当谈到当年取得的这些成绩时，海军第一任后勤部长张汉丞总是满怀深情他说：“海军初创时期的后勤工作，处处凝结着萧司令员的心血和汗水。几乎每件重要事情，他都亲自过问。每项大的工程建设，从审批计划，到勘察、定点、施工，说不清他出了多少主意，跑了多少路。”

打牢政治思想这根桩子

作为海军司令员和海军党委书记，萧劲光历来重视海军建设中的政治思想建设。早在海军创建初期，他就强调：“要奠定海军建设的基础，必须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技术上打好三个桩子，特别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桩子。这个桩子如果不打巩固，就不可能在统一的意志下进行工作，党的建设路线、方针和任务，也就不可能正确的执行，组织建设、技术建设也就没有保证。”

海军领导机关成立以后不久，就如何做好海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曾对海军副政委刘道生说：“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们都刚从陆军调来，对海军部队的思想情况不了解。是不是先派人下去做些调查研究，摸准部队思想脉搏。这样，思想工作的针对性会更强一些。”

刘道生遵照萧劲光的意见，迅速派出工作组，对长沙、济南、广州、临沂、兴国、古田等战斗舰艇部队的思想情况，进行了典型调查。从调查中看出，当时部队的思想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团结问题。各方面的关系都不够融洽，其中尤以从陆军来的“新海军”和原海军人员之间矛盾最为尖锐。当时舰长差不多都是原海军人员担任，政委和副舰长则是来自陆军的干部。有的舰上竟闹到舰长和政委互不讲话，舰长和副舰长动手打架的地步。二是事业心问题。来自陆军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工作不安心。有的人觉得自己不懂技术，提拔慢，没奔头；有的嫌舰艇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在海岛上也是抬头见天，低头见水，加上晕船呕吐，觉得海军生活太苦、太单调了。

听取工作组汇报以后，萧劲光召集海军负责同志一起研究。他要求政治机关切实采取措施，加强我军优良传统教育、时事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党团教育；大讲增强团结、树立革命事业心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并广泛开展立功创模运动，激发部队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他说：“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加强政治工作，必须重视解决现实思想问题。思想障碍不扫除，海军建设事业就无从谈起！”在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就团结问题严肃地提出：“今后，团结出了问题，谁负责？我看上级要对下级负责，党员要向群众负责，军队要向地方负责，老的要向新的负责，中国人要向外国专家负责。当然，每个人自己也要负责，要作自我批评。”为了激发部队树立献身海军建设的事业心，他拟定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口号，要求在部队广泛宣传：

面向海洋，面向岛屿，面向战斗部队，面向群众！以舰艇为家，以海岛为家！

热爱海洋，征服海洋！

把岛屿变成国防堡垒，与岛屿共存亡！

把荒岛变成乐园，军民共一家！
要做海上主人，不做海洋奴隶！
守卫海洋国土，是我们最神圣的任务！

……

这些口号在各部队迅速传播后，海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明显加强。萧劲光又不失时机地提出召开海军政治工作会议。1951年8月，海军在青岛召开首次政治工作会议。这是为海军政治思想建设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会议。会议历时20天，开得热烈而圆满。萧劲光对开好这次会议非常重视，会前听取了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会议期间他作了重要讲话，并致了闭幕词。他还请来了朱德总司令和罗荣桓总政治部主任亲临会议指导。下面是他和朱德总司令在电话中的一段简单对话：“朱老总吗？您好啊！我是萧劲光。”

“劲光同志，你好！”

“这天气热得邪乎，您不想到青岛‘避避暑’么？”“怎么不想啊？忙过这一段再看吧！”

“老总，下个月海军在青岛召开政治工作会议。我想请您到会指导，顺便到海军部队走走，看看。抽得出身来么？”“那好哇！海军组建一年多了，我早就想去看看我们自己的海军。你们的会议哪天开始？”

“下个月6号，预定要开半个多月。”

“好，我把工作安排一下，在你们闭会以前赶到。”

“太好了，我在青岛迎接您。”

“好，青岛见。”

随后，萧劲光又打电话给罗荣桓同志。得知罗主任正在青岛。到青岛后，萧劲光立刻去拜见他，向他汇报会议的议程和开法，邀请他到会讲话。

“这次会议打算着重解决什么问题？”罗荣桓问道。

“除了广泛交流经验外，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明确政治工作在海军建设中的地位、作用 and 任务；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党、团组织建设和问题，确定在舰艇上设立党团支部和政治委员，同时部署整党建党工作；正视海军技术复杂的特点，讨论在建设海上战斗力中如何发挥政治工作的保证作用问题。”

罗荣桓对此表示同意，要求会议就这些问题充分展开讨论。他还强调要通过坚强有力的工作，把海军建设的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他赞赏海军提出的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以解放军为基础，把工农同志、知识分子和原海军人员三种力量团结起来的组织路线。他说，这一提法已得到总政批准，希望很好地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朱德总司令到达青岛后，萧劲光给他送去海军白色礼服，陪同他视察了海军部队。一连几天，朱老总兴致勃勃，看了海军学校，又去看岸炮阵地，看望舰艇部队。在海军炮校，他赞扬教员们自己制作模型作教具，说：“直观教学效果很好。”在炮兵阵地，他指出“你们的阵地有个缺点，就是隐蔽得不好”；登上舰艇，他勉励水兵们要爱护舰艇，以舰艇为家。

8月30日，朱德和罗荣桓亲临会议讲话，朱老总说：“我第一次到海军，看了你们的学校、炮兵和舰艇，虽然现在力量还很小很小，但要知道，一切事物的发展壮大，都是从小开始的。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我看了很高兴，回到北京一定向毛主席报告。”接着，他讲了海军所担负的保卫海防的繁重任务，讲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在讲到政治工作的作用时，着重强调：政治工作一定要起保证作用，要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海军战斗力

建设任务的完成，保证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罗荣桓在讲话中肯定这次会议“讨论得比较充分”，海军政治思想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大体上解决了”。“有了统一的认识，才会有一致的行动。”他还着重讲了团结教育原海军人员、知识青年和发挥工农骨干作用的问题。他说：“陆军来的骨干，从过去在陆地上发挥作用，转到要在海上发挥作用，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海军是高度机械化的技术兵种，而陆军来的同志大都不懂技术，在海上还是个新兵，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从教育、训练他们开始。”

两位领导同志的讲话，使到会同志受到巨大鼓舞。罗荣桓还和代表们一起坐上登陆舰，到风景秀丽的崂山一带游览，一路上同大家亲切交谈，谆谆鼓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会议以后，海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各部队紧密结合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整党、土地改革、镇反、“三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总路线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紧密结合部队执行的各项工作任务，把政治思想工作开展得更活跃、更深入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爱国主义热情和献身海军建设事业的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为完成海军初创时期的建设任务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精通技术才能发挥人的作用

人们普遍称赞萧劲光把海军建设的基础比喻为打桩子，通俗而又形象。可也有人对他把技术桩子同组织桩子、政治思想桩子并列不理解，认为这样对技术强调的有些过分。萧劲光耐心地解释说：“一点都不过分。海军从一艘舰艇、一座海岸炮、一架飞机，到整个军事指挥系统和物资供应系统，都是按照高度的技术分工和业务分工组织起来的。人被技术所组织所分配，人要指挥技术，就必须精通技术。人的力量和作用，政治的力量和作用，都要通过技术业务才能发挥出来。斯大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对今天的海军来说，决定干部的因素又是什么呢？是知识，是技术。这根桩子，不打牢行吗？”

一天，干部部长雷永通向萧劲光汇报说：“现任修造部长，人很可靠，就是文化低，不懂技术，工作开展不起来。”

萧劲光着急地说：“现在修船、造船、打捞沉船，都要靠修造部门计划安排、组织实施，赶快物色个合适的人来当部长，否则会误事的。”

到哪里去物色呢？雷永通说：“东北炮兵部队有位领导干部，名叫林真，是抗战前燕京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懂技术，有水平，有干劲。如能把他调来，肯定合适。就怕调不动。”萧劲光一听，喜出望外，说这件事由他亲自来办。

一个电话打到了军委总政治部罗荣桓主任的办公室。当萧劲光提出要求后，罗荣桓说：

“劲光同志，这件事恐怕不好办啊！那支部队是准备赴朝参战的。军委有规定，不得从参战部队调人。”

“有规定，特殊情况总还可以有个例外吧？”萧劲光反复说明，修造部门对海军建设多么重要，一定要罗主任想办法。

“好吧！我打电话征求一下这个部队的意见。”

过了不长时间，电话里又传来了罗荣桓的声音：“萧司令，那个部队硬是不同意啊！”

萧劲光有点急了：“能打仗的干部，不止他一个。可是，他懂技术，有知识，调来海军，能发挥更大作用。再说，这支部队还没有过鸭绿江，还算不上是已参战的部队嘛！罗主任，请你权衡利弊，下个决心吧！”

罗荣桓为他对海军建设的执著所打动，答应说：“好吧，我们研究一下。”

不久，总政下达调令，林真来到海军，担任了修造部长。在他的领导下，修造工作的局面很快打开了。

那个时候，不止是海军领导机关缺少有文化、懂技术的干部，各个部队，尤其是正在筹建的各所院校，也都在叫喊缺教授、缺讲师、缺翻译、缺工程师、缺技术人员。一时间，一封封电报、一件件信函，像雪片似地飞向海军领导机关，飞到萧劲光的办公桌上。各地催要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电话更是响个不停。面对这种情况，萧劲光没有皱眉头。他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商讨对策。他强调说：

“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满足各部队、各院校提出的要求。办法是：一、向政务院、中央军委写报告，要求帮助解决；二、向各大军区商调；三、向地方有关部门、大专院校求援；四、在海军内部调整。”

萧劲光像指挥打仗一样，派出干部分赴各地，他自己也通过各种渠道，到处物色。几个月后，便开始收到显著效果。从西北、西南、华中、华东等各大军区军政大学选调的一批知识青年来了；从北师大、北洋大学等选调的十几名研究生、本科生来了；通过政务院从各地遴选的几十名翻译来了；从工业部、铁道部、交通部调拨的40多名工程师、技术员来了；萧劲光亲自写信给湖南军区从湖南大学招聘的光学博士曹修懋、数学教授余潜修等十几位教员也来了……1950年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邀请中央组织部、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和军队负责人，商谈决定迅速动员数万名知识青年进军事院校。海军院校当年就招得学员2000人；第二年又招收了一批。技术人员匮乏的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但萧劲光并不满足，他又把目光投向了原海军人员。就在周总理主持开会的同一天，他给聂代总长写了一个报告：“根据海军建军计划，亟需大批专门人才。如开办各类学校，急需解决教员、助教问题，现缺额很多。闻原海军人员流散各地者仍属不少，如能搜罗一些，可部分解决缺少教员和技术人员的困难。请以军委名义，发电至各地，广为搜罗。”

中央军委的电报，迅速飞向各中央分局、各大军区，“责成各地党政军民、学校机关及各战略区，设法清理登记、调选搜罗这些人才。”于是一个招聘原海军人员的活动，在各地迅速展开。用这个办法，很快便招收到六七百人，使原海军人员的总人数达到三四千人。这些人，有的分配到机关，有的被派往学校。在舰艇上，一些优秀的原海军官兵也被破格提拔重用。有段时间，几乎所有的舰艇长和部门长都是委派原海军人员担任。

原海军人员中，除了一大批基层军官和士兵外，还有几十名高级军官。他们大都有较高的学历，在国民党海军中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有的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武官，有的担任过舰队司令，有的担任过海军司令部的参谋长、处长、科长，有的担任过报纸总编辑。他们的年龄大都在四、五十岁以上。萧劲光说：“团结教育改造好这批人员，既是我们贯彻执行党的爱国统一战线政策的一项实际工作，又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在人民海军建设中，发挥一定作用。”他批准在生活上给他们较优厚的待遇，同时，指派干部把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了海军研究委员会，让他们着重研究美英海军的

战略战术问题，翻译、整理外国海军资料。这样，在萧劲光的周围，不仅有了一个由苏联专家组成的军事顾问团，而且有一个由原海军高级将领组成的研究机构，人们把它称为“海军首长的第二顾问团。”这个研究委员会后来翻译、整理、出版了《美国海军学校海军战术教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诸战役》等不少资料。遇到咨询，也能很快回答出来。有一次，毛泽东主席为了分析当时朝鲜战争的形势，打电话给萧劲光，要他在两天之内，提供一份资料，内容是：美国海军从本土运输一个兵团和一个军的兵力到日本横滨、南朝鲜、越南、香港，各需多少舰船？多长时间？还需多少舰船运送补给物资？这样一份资料，当时驻海军的苏联顾问一下子是拿不出来的。萧劲光把这项任务布置给了曾在美国参谋大学学习多年的刘隽等研究委员会委员。他们加班加点，很快就把资料整理出来，萧劲光按时把它送给了毛主席。

萧劲光搜罗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对部队的军事技术训练，特别是军官训练，抓得更紧。除了学校培养和抓紧在职学习外，他还指示各部队举办了数十期短训班。经过短短两三年的突击训练，部队的技术素质便有了明显提高。有的舰艇部队，原先离靠码头都感困难，现在已能在各种条件下进行小编队航行，实行对空、对海、对岸、对潜艇射击了。

正当萧劲光为海军的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队伍不断壮大感到高兴的时候，一天，秘书给他送来一份材料。还没看完，他便生气地大声说：“真是乱弹琴！这样下去，部队的技术基础势必要被搞垮；技术这根桩子永远也别想打牢！”原来材料中反映，有些部队一面叫喊缺专业干部，缺技术人员，一面又将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随意改行，随便调动。有的电工手改行当了赶大车的运输员，有的轮机长改行当了事务长，有的水鱼雷手改行当了会计。据粗略统计，已改行的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已达 240 多人。

“必须坚决制止这种错误做法！”萧劲光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1953 年 5 月，他召集党委开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关于禁止将专业干部和技术人员任意改行、随意调动的决定》。这一决定为稳定海军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起了重要作用。

张云逸与红七军

张广华

张云逸（1892～197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广东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后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中学。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入中国国民党，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世凯）护国战争，在粤军任旅长。1926年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参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广州、香港做党的秘密工作。1929年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军长、参谋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兼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和作战部部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央军委委员。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提起张云逸大将，人们对他那精明的谋略、卓越的指挥、奉献的精神、廉洁的品德和朴素的作风，印象特别的深刻。他赤胆忠心，出生入死，转战南北，鞠躬尽瘁，是我党我军中德高望重的一位著名领导人。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革命、奉献的一生。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军队到地方，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这位共产主义忠诚战士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称颂。本文仅记述他与邓小平等1929年到1931年领导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前后战斗生活的片断。

到广西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同时各军阀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倾轧，混战连年不断。与蒋介石一度联合北伐的桂系势力迅速扩展开来，由广西、湖南、江西、湖北到河南、河北，都为桂系所控制，李宗仁、白崇禧分别坐镇武汉和北平，对新军阀头子蒋介石造成极大威胁。蒋介石决心消灭李白集团，利用金钱收买等手段拉笼了李、白部下李明瑞等三个主力师倒戈，桂系很快在1929年四、五月间土崩瓦解。

李、白失败之后，俞作柏、李明瑞分别当了广西省主席和绥靖司令，成了广西的新统治者。

俞、李得到广西大权后，表示愿意与共产党接近，要求我党派出人员去广西工作，实际是欲利用我党力量去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政权，甚至还企图由我党出面去争取苏联的援助，进而夺取全国的政权。

我们党对于这些新军阀的尖锐矛盾及其混战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早已有所考虑和准备。

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张云逸，根据中央决定正在准备动身去苏联学习。1928年8月的一天，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

“胜之兄，现在国内形势变化很大，原来确定你去苏联学习的事有变化，中央打算另外交给你重大任务。”

他们二位十多年前即已相识，是同乡又是战友，所以杨殷的话开门见山，直入正题。

“杨部长，去年以来的事实表明，我们党就是吃亏在没有掌握住武装力量，我多么想为党和人民搞点武装啊！不知组织上考虑让我干什么？”张云逸直率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

杨殷一听，非常高兴：“你的想法太好了。我们必须抓住时机，继续在各地组织军事斗争，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中央要我到哪里？”

杨殷把蒋桂双方野心不断扩展，矛盾愈来愈尖锐，战争难以避免以及桂系内部矛盾也在不断发展等情况详细说了一遍，然后斩钉截铁地说：

“恩来同志与我们研究认为，如果蒋桂战争一旦爆发，我们可以到广西去积聚革命力量，夺取军事武装，这是一个难得的良机啊！”

张云逸说：“我坚决服从组织上的决定，去后虽不好说有绝对把握，但我一定相机行事，争取做出成绩来。”

“动身时间还要等一等，主要根据蒋桂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决定。中央还考虑派一大批干部去广西。你的任务主要搞兵运，抓军队。”

俞作柏、李明瑞现在果然要中共派出人员相助了。这两个人，在北伐战争中也可是桂系中的佼佼者，不但以国民党的“左派”面目出现，仗也打得相当出色。他们相信共产党会答应其要求的。

1929年5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张云逸由上海乘船去香港。抵港时，已是6月上旬，大海上几天的颠簸生活，使他下船时不免有些疲惫之感。他按照中共南方局的事先安排，径直来到一个小旅馆。

就在张云逸踏进旅馆大门的时候，韩碧迎了上来：“云逸，我因孩子拖身，未能去码头接你。我们又有一年多未见面了，快去看看你的宝贝儿子吧！”

“阿碧，你怎么也在这里，什么时候来香港的啊！”张云逸拉着韩碧的手，显得有些激动。

韩碧说：“我到这里也才四五天，我把儿子也带来了，你们父子还没有见过面呢！快去吧！”

在小旅店休息了一天，张云逸决定先去与党组织接上关系。第二天上午，还没有出门，却来了一位青年找张云逸，互相以暗语联络后，原来此人是一家小报的编辑，名叫叶季壮。他是奉中共南方局之命，专门为张云逸办理会广西手续的，当然也成了张云逸到香港后的第一位接头人。他们两人关起旅馆的房门，让韩碧在门外观察动静，秘密地交谈起来。

叶季壮说：“云逸同志，南宁那里有人向党组织报告，说俞作柏、李明瑞请求派一些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去广西工作。前些时候，南方局已让一些人去了，你去后的责任重大啊！”

“我什么时候动身？”张云逸问。

叶季壮说：“我们把韩碧嫂子从广州接来，就是为了让你们团聚一下，这次见面后，不知又在何时才能‘相会’，过些天你再去广西吧！”

张云逸微微一笑说：“我呆个把星期就走，工作要紧啦！共产党员总不

能把天伦之乐、家庭团聚放在前面，何况来日方长呢！”两天后，叶季壮把一封去广西的组织关系介绍信交给张云逸。张云逸拿到了介绍信以后，觉得还应听听广东省委军委书记聂荣臻的意见，从那里进一步了解一些情况。

聂荣臻向来访的张云逸说，现在陈铭枢当了广东省主席，陈济棠是总司令，陈策是海军司令。接着又谈了广东省委领导海、陆丰惠阳及海南岛等地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情况。“陈济棠、陈策与我都有私交，关系还不错。此次去广西，我还想让他们写个介绍信，取得个合法身分，事情可能就更好办了。”张云逸说。

“那很好，俞作柏、李明瑞与陈济棠、陈策过去都有些关系，如今名义上都在蒋介石的门下，写信还会有作用的。”聂荣臻说，“不过你的真实身份还是要认真保密啊！”

张云逸说：“那是当然。这些人都不了解我的真实身份。即使有的对我半信半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有办法应付的。”

回到住所以后，夫人韩碧抱着刚刚出生几个月的儿子迎了上来：“云逸，这些天你忙忙碌碌，休息不足，不要累病了啊！”他想到1923年与韩碧结婚以来，很少能团聚在一起生活，她以理发谋生，克服许多困难，现在孩子几个月了，真是难为她啦！心中不免一阵惆怅和不安：

“阿碧，我真对不起你啊！为了革命事业，无法照顾你与孩子的生活，刚团聚五六天，我马上又要远行了，你能谅解吧！”

“云逸，革命工作第一，你安心走吧！”韩碧含着泪花说：“不过，孩子现在还没起个名字，你说叫什么好呢？”

张云逸沉思了一会：“祝他健康成长，前程远大，就叫‘远之’，吧！你看如何？”

“好，这个名字还可以表示你在远方对儿子的一片思念之情呢！我和孩子祝你一路平安。”韩碧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说。

6月中旬，张云逸由香港到了广州。触景生情，心情难以平静。广州与他的联系太密切了，反对满清的辛亥革命，反对国民党的广州暴动，其战斗场面仍历历在目，一个个熟悉的牺牲了的战友的容貌，不时在他脑海中出现。他含着眼泪，伫立在珠江岸边，默默地祈求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们安息。

过了两天，张云逸来到广东海军司令部。

陈策听到门卫的报告后，到门外迎接：“胜之兄，久违，久违。那阵风把你请来的啊！这两年一切都好吧！”咧着大嘴，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张云逸与他紧紧握手，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边说边向他办公室走去：“几年未见，你发福了许多，身体更健壮，我这个老乡和同学为你高兴啊！”

在办公室坐下后，陈策急切询问道：“怎么样，这几年你干了些什么，现在情况都好吧！”

“策兄，你春风得意，当了司令，兄弟我却失业了”。张云逸佯装着一付不安的神态。

“怎么回事？难道你没有事干？”陈策说，“那你有什么考虑，就在广东干如何，到海南也行，原来的少将军衔不会少你的。”

“想当初，北伐战争打得轰轰烈烈，如今还是天下大乱，今后还不知又有谁与谁干呢？你说我们怎么办，今天就是与老同学商量这个事的。”张云逸一口气说下去，“说真的，你让我留在广东，我倒想去广西闯闯，你看如何？”

陈策沉思片刻：“去广西？那也好，我赞成。现在广西当权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人，我也认识，可以说也是熟人了。”

“那太好了，你可不可以给他们写个信介绍一下，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你说好吗？”张云逸抬举地说。

“老同学来了，我什么忙也该帮啊！”陈策拿起笔，匆匆写了推荐信。

从陈策办公室出来，张云逸径直到码头买了去梧州的船票。第三天顺利到达梧州。这个也叫苍梧的古城，处于桂江与浔江的会合处，是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也是两广之间的交通要地。张云逸在这个山水相连的城市只呆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改乘汽车直奔广西省会南宁。

改造部队

张云逸到达南宁，是1929年7月。

按照规定，他与中共地下党员、俞作柏的机要秘书陈豪人取得了联系。陈要张云逸今后与他直接单线联系。张云逸让陈看了陈策给他写的介绍信，并商量了如何与俞作柏见面的问题。

陈豪人与张云逸见面之后，向俞作柏的胞弟、中共党员俞作豫讲了，并要他在适当时机在俞作柏面前予以推荐。同时，也向俞作柏报告说：“陈策司令介绍一位广东老乡张云逸来，听说此人乃北伐战争中第25师参谋长，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人。”

俞作柏一听，非常高兴：“我知道此人，是个有才干的人，你安排一下，就在这几天内，我要见见他。”

当天晚上，俞作柏、李明瑞正在商量什么事情，俞作豫匆匆来到他哥哥寓所。

“你来得正好，有些事要研究一下。你先说说有什么事要办的？”俞作柏说。

俞作豫1927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天，根据党的指示到俞作柏、李明瑞部队做秘密工作。他的红色身分，俞作柏是知道的。由于在北伐战争时，兄弟二人观点有些相近，因此俞作柏、李明瑞对他是相当信任的。正因如此，俞作柏执掌广西大权后，常与李明瑞、俞作豫一起研究一些重要事情。俞作柏把表弟李明瑞和弟弟俞作豫视为自己的左右手，几乎是无话不说，相互见面的机会当然也相当多了。

俞作豫开门见山：“听说，蒋介石要给我们广西派来一批黄埔军官，帮助哥哥和表兄。恕我直言，他这是别有用心，你们准备接受吗？”

俞作柏说：“有这事，我还未答复。老蒋这么做，完全拒绝恐怕也不行，如何应付此事还得认真想个办法才好。”

“表兄对此有何高见？”俞作豫指指李明瑞说。

“要我说，一个也不要。他的人来了，会把我们广西搅得鸡犬不宁，天下大乱。”李明瑞态度明朗地说。

俞作豫沉着地说：“表兄之见，与我完全一样。我们可以答复蒋介石：广西地瘠民贫，经济落后，军人来此恐难以安心工作，我们已在筹备办个教导队，培养一些人补充军官队伍。不知是否可以这样回答？”

“好主意，好主意。这样先回答他再说。自己办教导队，培养军事干部，分到基层去，要快点办起来才好。”李明瑞接着表态说。

“对，此事暂议到此。可让徐开先做主任，还想找一个确有军事特长的人协助徐来办为好。你们考虑谁来合适？”俞作柏有点为难似的说。

“陈策介绍来的张云逸，是看得起我们广西、相信你们二位才来的。此人军事的才能、笃厚的品德，你们二位该早有所闻吧！何不让他办教导队？”俞作豫大力做了推荐。

“对，将才就要用嘛！何况，陈策还做了介绍。不过，张云逸初到广西，人生地疏，还是先让他做教导队副主任，由徐开先担任主任，你们以为如何？”俞作柏拿出了主张。

俞作豫知道，徐开先在北伐战争时任过叶挺师的参谋长，1927年8月南昌起义部队打到汕头时，任过汕头公安局长，蒋介石还对他发过通缉令。他略作沉思后，表态说：

“论才干，二人各有所长，论军事水平、为人品德，张明显优于徐。我看先做这样安排可以。不知表兄意见如何？”

李明瑞也表示赞同：“先由徐开先担任主任，以后如有什么情况需要变动，再另行议定吧！”

隔了两天。俞作柏在寓所与张云逸相见。他看了陈策的信后说：

“张将军的大名早有所闻，公务忙乱，未能及早见面，实在抱歉，望予见谅。”

“哪里！哪里！陈司令让我来广西找俞主席，我是广东人，对广西也一样情深，如同故里啊！在军中服务多年，如能为广西父老和军队效力，实乃我之大幸也。”张云逸笑着回答说。

俞作柏说：“张将军在北伐战争中战功赫赫，培养与教育军人尤为有方。由于你刚到广西，情况生疏，我与明瑞有意请你到新近筹办的教导队做副主任，未知愿否屈尊。主任一职，已早任命徐开先担任，不便即作调整，不知你意见如何？”

张云逸说：“本人才疏学浅，担此重任，只有竭尽职责，做出成绩，方不负重托。今后望你和省府多加关照和支持”。

张云逸接受办教导队任务后，便来到南宁西郊的西乡塘。他废寝忘食地抓紧工作，很快把教导队筹建与组织起来。各方面工作进度之快，工作之精细，使俞作柏、李明瑞十分满意，大加赞赏。

不久，教导队新来一位姓许的主任。徐开先离去后，教导队大权，实际为张云逸比较牢固地控制着。

教导队有3个营9个连，开始都是由当时的吕焕炎、杨腾辉、李明瑞的3个师选调来的班、排长。张云逸到教导队以后，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一部分到俞作豫领导的警备第5大队外，都安排到教导队各个连队当干部和学员，各个连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全队共有学员、工作人员1000多人。

按照党的指示和教导队的实际情况，张云逸决定加速改造这支刚组织起来的部队。他把9个连队的干部都以各种不同的理由安排了共产党员来担任，排长也选那些思想进步、有一定政治觉悟的人来担任。同时，安排一些党员到队部工作，如建国以后当过广西省委书记的袁任远，就在队部当过政治教员。

教导队的3个营长，政治上很反动。张云逸建议撤去营一级机构。采取“调虎离山”的办法，一个调到队部当参谋长，升为上校，另外两个调到队部训练处当正、副处长，升为中校。这就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把他们与部队隔离开来，其反动思想也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阻碍我们党去领导和

教育部队。

1929年8月，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又兼任警备第4大队队长。俞作豫在此后则担任第5大队队长。第4大队是李明瑞回到广西后，收编土匪、民团、散兵组成的，成份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北伐战争中国国民革命军第4军有共产党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明显的。李明瑞虽不知张云逸是共产党员，但知道他在教导队做思想政治工作很有成效，所以决定让张云逸来改造这支部队。

8月中旬一天，李明瑞对张云逸说，我们第4大队组建不久，内部工作薄弱，纪律、作风甚为不佳，急需进行整顿。我想请你兼任第4大队队长，把这个大队整理改造一下，不知你是否同意？

张云逸略作沉思后说：“李司令，让我去第4大队可以，要把这个大队搞好，我有两个要求，或者说条件，不知你能否答应？”

李明瑞说：“只要把部队搞好了，什么条件我皆可以同意。”

张云逸说：“我的条件是：第一，要由我提名一位副大队长协助工作，让我跳光杆舞不行嘛；第二，整顿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请你予以支持。”

李明瑞迟疑片刻道：“我同意这两个条件，你就放手去做吧！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再商谈。”

中共广西特委根据张云逸的报告，很快派来李谦担任副大队长，并指示尽快配合张云逸把这个大队领导权夺过来，并加紧改造工作。

第4大队有4个营，一个营已调到百色地区，那里鸦片生意很多，部队的任务是征收税款。那个营的营长是一个反动分子，后来在百色起义时被我们杀掉。另一个营是俞作柏和省政府的卫队。张云逸直接领导的实际是两个营。这两个营的营长、连长，大多是贪污成性的反动分子。从这些情况考虑，张云逸与李谦研究，主要采取了下列措施来改造部队：

第一，动员和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把那些反动的旧军官搞臭。那两个营长，很快受到严办。如第三营营长黄王宝，残害妇女，抽鸦片烟，贪污公款、欺压士兵，干了大量的坏事，他的“独立营”被李明瑞收编后，把队伍拉到南宁，由于升官发财的美梦不能实现，就想把队伍拉到柳州去占地为王。张云逸严办了这些反动军官后，士兵群众拍手称快，大声叫好。连长以下军官，除一部分罪行较大被撤职外，大多调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同时，从教导队调来100多名共产党员，让何莽与符录二人当营长，连、排长亦安排共产党员担任，很快把大队领导权夺到我们手中。

第二，建立党组织与发展新党员。同在教导队一样，张云逸在各个连队建立党支部（有的人少，建立党小组），成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的秘密组织，经常了解部队人员的思想动态，以各种方式宣传革命道理，提高部队人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并适时吸收新的党员。这就保证与巩固了党对第4大队的领导。

第三，改变部队成分。由于部队原来成分复杂，基础很差，张云逸非常重视吸收工农分子和进步学生到第4大队来。在俞作豫领导的第5大队同样也很重视这个问题。这一条对巩固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1960年3月，张云逸在回忆广西红七军工作时，曾清楚地谈到这个问题：“我们插进俞、李政权，把一支旧式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所

进行的一系列的工作可以总结如下几句话，即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掌握领导权，分化撤换反动分子，加强士兵群众工作，增加工农成分比例。”

就在张云逸与李谦大刀阔斧地整顿、改造第4大队时，有一天李明瑞找到张云逸：

“张将军，下面有些反映，说原有军官快换光了，新调来的军官提得太快了，人心不稳，你看能不能把步子放慢一些？”

“李司令，干事情不果断，不下决心不行，要想成就你们的大事业，就得有一支战斗力强的队伍，就得大胆使用新生力量。如果你认为不妥，那我就只好再干下去了。”张云逸慷慨直言。

“不要误会嘛！我答应了的条件决不改变。还是按你的计划办。我的话只当是一个建议吧！”李明瑞退了一步，大概是“成就事业”的话把他说服了。

张云逸说：“方式方法我当然会注意，不过原则必须坚持，广大士兵群众拥护，得罪了少数思想品德不纯的军官，有什么可怕的呢？少数从个人出发、维护个人利益的反映，希望李司令帮助我们做工作。”

告别时，李明瑞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张将军，你到广西两个多月，大胆泼辣，干事精练，谋略过人，治军有方，见解高明，忠于职责，我自愧不如、自愧不如……”。说完之后，一阵哈哈大笑。

张云逸略作思量：“李司令，过奖、过奖。兄弟有个习惯，不论在哪里，做一件事就要把那件事做好，如果敷衍塞责，应付了事，良心不安呢！”说后也哈哈一笑，握手告别。

党对教导队、第4大队、第5大队领导权的掌握及对这三支部队的初步改造，为后来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红7军、红8军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撤离南宁

在张云逸到达南宁前后，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又陆续派来一批共产党员进入广西。九月间，中央代表邓斌（即邓小平）来了。龚鹤村（即龚楚）、冯达飞、叶季壮、李干辉、袁任远、余惠、李朴、许进、许卓、何世昌、宛照平、袁振武（即袁也烈）、史遽然等等也先后到广西了。

在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历史条件下，广西却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难怪当时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等说，俞、李“为虎附翼，广西已成为共产党之根据地了。”而蒋介石对广西政局之监视当然不会一刻放松，他坚持派了一个黄埔第4期生、高级特工郑介民，担任李明瑞的第15师政治部主任，随时向他反映俞、李在广西的一切情况。

1929年10月1日，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们党的劝告，在汪精卫派薛岳游说之后，决定与张发奎联合反蒋，在南宁举行了反蒋誓师大会，并发出通电，宣布俞作柏为讨蒋南路军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当时，李明瑞只有3个师，内部也不一致，南来广西时间只三、四个月，政治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所以我们党估计一定会失败。正在这时，李明瑞要张云逸把教导总队、第4大队和俞作豫的第5大队开到前线作战。张云逸根据党的利用军阀混战机会，竭力保存并发展我们力量的指示精神，向李明瑞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

“这些部队都是新组建起来的，战术技术训练不足，配合部队作战比较困难；同时，保持后方的治安和秩序也十分重要，建议不要把它们拉到前方

去作战。”

李明瑞说：“大部队不去，留在后方也是一个办法，不过要抽一些骨干去，你看如何？”

张云逸说：“当然可以，抽 300 人左右，不会影响这几支部队保卫后方安全的任务。”

按照这个考虑，张云逸把原从部队抽来的人员，调出 300 人左右补充到李明瑞的部队中去。李明瑞马不停蹄地前往桂平前线指挥作战去了。

就在李明瑞到达前线的黄权旅部，正准备督促部队前进时，吕焕炎等桂系旧部，以及杨腾辉和黄权在蒋介石收买下倒戈了，发出了拥护蒋介石的通电。由于 3 个主力师和 1 个旅的倒戈，李明瑞的军事实力一下子就丧失殆尽，不到 10 天时间，反蒋完全失败，李明瑞带着少数随从人员，黯然地回到南宁。

在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以后，教导大队的许多学员一时情绪激动，纷纷提出要返回部队，风潮闹得越来越大。10 月中旬的一天夜里，由于少数反动分子的煽动，主要是新来教导队的那个姓许的主任从中挑动，有些人突然嚷着集合回部队，情况异常紧张。就在这时，共产党员李朴突然大喊一声：“赞成革命的跟着我，有的反革命想拉队伍逃跑，抓住他。”说着开了几枪，一时间乱作一团。少数反动分子趁着混乱之机逃跑了。这时，张云逸赶到现场，严厉申斥了少数反动分子的叛变行为，鼓励大家坚决走革命道路，稳住了局面。

张云逸随即召集各连队的党员骨干会议，决定第二天各个连队分成几个小组开会，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思想觉悟低、仍企图返回部队的人员开展工作，进行斗争，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争取大多数人站到我们方面来。为什么采取这个办法呢？张云逸 1960 年回忆说：

“我们当时考虑采取分散的小组会形式，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有效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便于为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型会议，便于我们进行说理斗争，来教育群众。这样，经过一天反复争论，大部分人认清了是非，解除了顾虑，愿意跟着我们干革命。”

在小组会基础上，第三天，张云逸又把全体学员集中起来开会。他在大会上讲话说：

“革命是光荣的，革命队伍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反革命是可耻的，有些同学一定要走，我们也不勉强。现在进行站队，根据各人志愿，要革命的站在这边，不愿革命的站在那一边。”他有力地向左右两边指了一下。

队伍立刻乱了，大部分人站到左边，有少数反动军官、兵痞等，就往右边站。这时不少人在中间犹豫不定，东张西望，许多学员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可不能去当反动派啊！”有些犹豫不定的人，甚至已经站到右边的人，又陆陆续续走到左边，最后查点人数，愿意革命的有 500 多人，坚决要走的有 100 人左右。

张云逸宣布：“明天，要走的人可以离开，不过枪支要留下，路费由我们负责。”第二天上午，教导总队特地为那些要走的人举行了欢送会，对这些人再作一次最后争取的工作。根据事先安排，有几个学员上台讲话说：

“我们是同学，我们在这边干，你们到那边干，都应该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不应该替那些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

由于张云逸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做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站到革命队伍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

大群众，对那些要走的人来说，也受到了一次很深的教育。

在李明瑞率领部队开赴前线时，张云逸把第4大队一个营派往右江地区，第5大队同时也有1个营派往左江地区，为今后的工作做准备，并协同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其余的在南宁继续整顿与补充，进行认真的教育与训练。同时，通过党的活动，张云逸在10月1日被任命为南宁警备司令。此时的俞作柏、李明瑞对张云逸是否是共产党员，仍是半信半疑，心中无底的。

在教导大队取得斗争胜利之后，10月15日，张云逸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工，利用警备司令的身分，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大批的弹药物资，搬到了在邕江等待开动的几十艘船上。10月17日，邓小平率领装满武器弹药的船队、警卫部队和地方秘密工作的许多同志，乘船溯右江上驶；张云逸带着教导大队、警备第4大队数千人队伍，从陆路掩护前进。此前两天，即10月14日，张云逸让符录带一个连队“护送”俞作柏、李明瑞随同俞作豫的第5大队向左江地区撤退了。张云逸与教导总队、第4大队等是最后一批撤离南宁的。

10月20日，张云逸率领部队到达平马。船队也一路顺风，很快到达平马岸边。军械船到达不一会儿，叶季壮陪着一位中等身材、二十多岁的同志向张云逸走来：“这位是邓小平同志，这位是张云逸同志。”一声介绍，两位相互配合、协同工作两个月的战友见面了。

“啊！你就是邓小平同志，几个月来一直得到你的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上的疑难，却一直没有见面呀！”张云逸激动地说。

“云逸同志，几个月来我们虽未谋面，那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实际上我们早就心心相印了。军事工作上你抓得蛮好啊！”邓小平也激动地说。

说话间，雷经天和广西特委的一些同志也到了，大家热情地互相介绍，高兴地谈谈笑笑。落座以后，张云逸提出问题说：

“小平同志，现在许多山炮等重型武器，一时用不上，搬运起来还比较困难，你看如何处理好呢？”

邓小平略作沉思：“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可以尽快输送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那里可说是我们的后方啊！”大家都表示赞同。

张云逸说：“现在我们已进入右江地区，部队不能都去百色，我的意见是第4大队第一营留驻恩隆，另外两个营前往恩阳那坡和果德地区，领导机关及直属队去百色。小平同志你看如何？”邓小平说：“这个部署可以，我完全赞同，我们明天就出发，前往百色城。”

然后，大家参加了右江农协办事处召开的欢迎大会。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同志与部队领导机关胜利进驻百色，立即开始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百色起义

右江地区是桂、滇、黔三省交界之地，那里聚居着壮、汉、瑶等不同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韦拔群在东兰、凤山等山区早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农民武装力量比较强大。俞作柏、李明瑞一度对这支农民武装给予不小的支持，让这支武装以“右江护商大队”的名义积极开展活动，把他们接到南宁，并发给他们几百支枪，加以训练提高。由于右江地区在我们党领导下，群众斗争、政权建设已有相当深厚的基础，这就为迎接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革命武装的到来，以及百色起义的各方面准备，打下了相当好的基础。

不但如此。在1929年6月，中共南方局就已派雷经天同志到右江，建立

了党的右江特委，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与韦拔群一起大力开展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同年9月初，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共广西代表大会在南宁举行，就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武装、职工运动等各方面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决议，雷经天、韦拔群等进一步加强了这些方面的实际工作。声势浩大的右江地区的农民群众的武装斗争，给进驻右江的教导总队、第4大队广大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10月23日，邓小平召开了部队党的委员会（红7军成立后改称前敌委员会）会议。会上明确作出了4项决议：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

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大力组织与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大力继续清理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在那次党委会议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第4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名义，方可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费用。会议决定利用刘日福曾使用过的右江督办的名称，宣布张云逸

为右江督办。会后，张云逸即以右江督办名义发出通告，规定各县县长必须听从命令与指挥，各税务局长要将全部税款上交督办府。

在各县县长会议上，张云逸公开宣布要在右江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对旧政权人员的生命财产予以保护，并欢迎参加革命，不愿者护送出境，但不得破坏任何公家财产，一切金钱、武器、物资等必须交待清楚，否则将给予严厉惩治。在张云逸指挥下，各县警卫队的许多枪支被收缴上来，并征得税款几万元，解决了起义的经费问题。百色县暂由第4大队政治部代行政权机构的职能，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县均把农民协会改为革命委员会，作为临时政权机关。

张云逸根据党委的决议，在部队中迅速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向部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讲解阶级关系、政治形势、民主生活、官兵平等问题，大力宣传反对军阀主义、反对贪污和虐待士兵，并广泛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组织。第4大队第3营营长梁祝南，由于平时克扣军饷、打骂士兵，深为士兵群众所憎恨，张云逸下令予以严办。对那些通过教育仍不悔改的旧军官和兵痞，张云逸下令撤去他们的职务，或者“礼送出境”，有的则调到教导队予以改造。张云逸还在部队中广泛宣讲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等。这样就使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部队在组织上、政治上进一步巩固。

革命活动的开展，引起了地主豪绅的刻骨仇恨，他们一方面纠集反动民团固守据点，一方面勾结驻恩隆、思阳的警备第3大队，企图对抗革命势力。张云逸与邓小平研究决定，消灭这支反动武装，为起义扫除障碍。

11月下旬，反动的第3大队队长熊镐由平马派人来到百色，借口与第4大队商谈防务问题，企图抢占百色山城。张云逸佯作热情接待，在公兴当铺设宴欢迎。张云逸力劝熊镐等人放弃反动立场，支持或参加工农革命斗争，但该代表不听劝告，并以势相威胁。按照张云逸的事先指示与安排，预有准备的教导大队的一些学员，绕道由百胜街至公兴当铺，突然冲入，将熊镐派来的人员缴械扣押。与此同时，中共右江特委召集奉议、恩隆等县的数百名

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第3大队驻地平马集结，在雷经天的统一指挥下，配合第4大队第1营，只用了几十分钟，就把第3大队驻平马的部队全部缴械。大队长熊镐被枪决。在恩阳县城那坡镇也驻有第3大队一个营，由于驻那坡的第4大队第2营长黄健华执行命令不坚决，贻误战机，这个营不但未被同时消灭，还加紧构筑工事准备对抗。

得悉这一情况后，张云逸由百色带着教导队两个连，当夜乘火轮直下那坡。到那坡以后，立即将黄健华撤职查办，并迅速指挥部队猛攻那坡敌营。在教导队和第2营部队有力打击下，敌人大部缴枪投降，只有少数人员乘夜暗逃跑了。此次解决第3大队的作战，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多支。

在解决第3大队的同时，根据张云逸的指示，东兰、凤山、向都、奉议等右江各县的农民武装，在地方党委领导下，迅即向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发起进攻，很快占领了东兰、凤山、向都、奉议等县城，许多“地头蛇”、血债累累的“土皇帝”被农民武装击毙，广大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有的县长，例如凤山县县长罗少杰，不执行张云逸关于收缴民团枪支的命令，张云逸即以“右江督办”名义撤销了他的职务，并予以扣押，任命新的县长。此类情况还不只是发生在凤山一个县。

1929年11月上旬，中共广西部队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龚饮冰传达的中央指示说，中央对党委在俞、李反蒋以后的行动计划和采取的措施表示赞同，同意邓斌、张云逸等在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给的部队番号是：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进驻左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8军。任命张云逸为红7军军长，俞作豫为红8军军长，邓斌为红7、8军总政委，并且指示：如果在当地不能坚持，则北上江西，会合朱、毛红军。邓小平当即召开部队党委会议，传达中央指示。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加紧准备起义的各项工作。龚饮冰在会后再次被派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龚饮冰临行前，询问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何时可以完成，并举行起义。邓小平与张云逸回答说：

“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一些，还有不少工作要进一步抓紧去做，大体还需要40天左右时间，我们准备在广州起义两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7军。”

邓小平还说：“一俟红7军创建的准备工作大体完成，我即去左江组织安排第5大队的龙州起义，准备建立红8军的工作。”

部队党委会议结束不久，接到中共中央来电，要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邓小平立即与张云逸等人对工作问题做了具体研究和安排，然后在11月下旬动身去龙州布置检查工作，为龙州起义和红8军成立做准备，并由龙州经越南海防和香港去上海。

在邓小平、张云逸和右江特委领导下，右江地区在很短时间内被进一步染红了。张云逸把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任命了李谦等人为3个纵队的负责人。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2月10日晚，按照张云逸指示，为了防止起义时反动分子搞鬼，教导大队第8连的学员，冲进百色的警察局，把他们全部缴了械。与此同时，根据张云逸指示，以“右江督办”名义，把奉议等几个县的县长（事先认为可能捣乱的分子）及百色市区绅商领袖“请”到百色商会俱乐部，设宴款待。在酒醉饭饱之后，时间已近半夜，第4大队一位负责人宣布说：

“今天，我代表张督办与全体官兵酬谢各位两个月来的热诚帮助。同时，向各位说明，本军是革命武装，明天要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并要在右江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今后仍请各位继续协助与合作，今晚则请各位屈驾留在俱乐部内，以保证各位的安全”。他们听后，始则惊愕惶惑，旋即恢复镇定，转而表示祝贺，请我们多加关照。两天之后，予以恢复自由，个别思想反动、顽固对抗的县长予以扣留。

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的日子来到了。山城百色充满了热烈而紧张的革命气氛。

在红7军军部大门前，红7军成立典礼隆重举行。上午8时召开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军直属队共有5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一排排军人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会场。一幅鲜艳的红旗在空中迎风招展，旗上绣着黄色的镰刀锤子图案，边上用隶书体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此时的百色街头巷尾，已张贴了许多盖有红军第7军大印的布告。布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诞生；红7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7军的宗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势力的压迫，拥护工农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解放广大劳苦群众。

按照张云逸和部队前委的决定，大会由袁任远主持，红7军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此人1935年在中央苏区叛变革命）宣布了红7军领导机构的组织编制与3个纵队的编制。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在会上讲话。大会号召广大官兵要在艰苦的战争中经受锻炼与考验，为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而奋斗。

参加大会的军人，这一天显得特别威武雄壮、精神振奋。他们身着新发的军衣，撕掉了国民党的帽徽，换上崭新的红领带。上至军长张云逸，下至每个士兵，都领到了一个月的20块大洋的薪饷（后来实际只发了两个月）。指战员们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和扩大胜利，让革命红旗插遍全中国。大会结束时，在袁任远带领下，高呼“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

在同一天，百色县工农政府成立大会也在百色东门外广场举行。工人、农民、学生、市民5000多人参加了大会。他们举着大刀、长矛、锄头，敲锣打鼓，秩序井然地进入会场。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山城百色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人们喜气洋洋、兴高采烈地欢呼着自己的解放，也热烈庆祝红7军的光荣诞生。

也在这一天，张云逸带领少数随行人员，乘小火轮抵达平马，参加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出席那天大会的，有百色、平马、田州、果化等11个城镇选出的工人代表和11个县选出的农民代表，还有红7军士兵委员会选出的代表，共80多人。中共红7军前委代表、军长张云逸专程抵达平马指导大会的召开，更使与会人员十分激动。张云逸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的诞生。这一喜讯给到会代表和右江人民以极大鼓舞。大会讨论了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具体的实施纲领。

12月12日下午，平马镇的工人、学生、居民以及来自附近农村甚至数十里外的思林等地的农民和驻在平马的部队指战员，聚集在镇北广场上，举行庆祝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打倒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打倒贪官污吏”、“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革命口

号声响彻云霄。张云逸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参加了大会，当右江民主政府主席雷经天宣布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已经胜利诞生时，全场欢声雷动，口号声、锣鼓声经久不息。

张云逸应邀在庆祝大会上讲话说：“红7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是右江也是广西人民的一件大喜事。红7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自己的队伍，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选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红7军。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红7军一定能迅速壮大，革命一定会胜利。”他挥动一下右手，继续强调指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是工人、农民群众自己的政府，任务就是领导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最后，他提高声调说：“但是，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反动派是不会甘心自己失败的，要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保护我们的根据地”。讲完话以后，张云逸代表上级党委把用红布包着的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一颗大印授给雷经天主席。工人、农民和红7军代表也在大会上发了言。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平马和右江地区军民沉浸在欢乐之中。

当天，张云逸乘坐一艘挂着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返回百色。

巩固胜利

以张云逸、邓小平为首的红7军成立时，下辖3个纵队。第1纵队由原警备第4大队改编而成，纵队司令李谦，约1500人；第2纵队由原第4大队一部分、原教导总队一部分和百色工人营、右江沿岸的农军组成，纵队司令胡斌，约1200人；第3纵队由原东兰、风山的农军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约1200人。每个纵队辖3个营，每个营辖3个或4个连。军部设有参谋部，参谋长为龚鹤村；政治部，主任为陈豪人；经理处，处长为叶季壮。军直属队有炮兵营、特务营等，约800多人。建军初期，全军有5000人左右。连队中一般都配备正、副连长，正、副指导员，军事教官和宣传员。为了培养干部，军部还设有教导队。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韦国清等人，就是当时由第3纵队抽到教导队来学习的。

红7军和右江工农革命政府成立之初，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肃清反革命势力，广泛建立革命政权，巩固胜利成果。右江军民在张云逸等人领导下，为实现这一光荣任务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百色的反动势力对新生的革命政权和红7军怀有刻骨的仇恨。在百色起义不到十天的一个早上，红军的起床号还没有吹响，城西北山头上忽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随之城里也枪声四起，匪徒们凭着熟悉地形地物，半个小时左右就进入市区。他们知道红军主力皆分驻在别的地方，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当时城内只有教导队100多人、军直属队一个机枪连、小半个特务连及军部机关人员，总共不到500人。可是，土匪队伍却有2000人左右，情况异常紧急和危险。

在这紧急关头，机关参谋、副官、政工人员、经理人员立即分头组织武装起来，自动投入到反击土匪的战斗。许卓指挥教导队，冯达飞指挥机枪连，机关人员在军部参谋莫文骅等人率领下把守几个城门，互相配合，协力作战。经理处处长叶季壮带头用驳壳枪冲击进入街区的敌人。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土匪不支，狼狈溃去。部队随即杀出城去，又有不少匪徒被击毙。

张云逸估计到敌人还会卷土重来，便很快下令从平马调一个营进驻百色，随时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

果然未出所料。不到半个月时间，土匪又来了，人数比第一次更多。显

然，这不是一般的土匪，完全是当地反动势力勾结外部反革命力量，有计划的反扑活动。但是，这一次红军已按张云逸指示，在城外布下了防守阵地，和土匪展开了山地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就被打垮了，在战斗中又有大量敌人被杀伤。

在粉碎了敌人对百色城的两次进攻以后，遵照中共红7军前委和张云逸指示，红7军各部队和各县农民武装相配合，进一步向地主武装开展进攻，逐步清除了红色区域内的反动据点。

1930年1月中旬，恩隆县大上豪谭典章、邓恩高、黄贵朝的反动地主武装，被韦拔群领导的农民武装消灭，谭典章及其主力连长韦景清被击毙，恩隆七里区10多个县遂告解放，由恩隆到东兰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0年1月22日，红7军对东兰、河池交界处的匪营长韦锦城的1000多名匪徒发起进攻，迅速占领了敌人的巢穴那地，击毙、击伤了大量敌人，只有少数匪徒向河池、南丹逃去。

恶霸地主罗肇修、罗肇高盘踞在百色大所一带，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东兰武篆区民团团团长韦靺邦、盘阳大地主黄家驹等也均逃往大所。韦拔群应群众要求，早在1929年就将罗匪击溃，活捉黄家驹，击毙韦靺邦……

这些反动据点扫除后，整个右江十多个县的根据地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为区、乡工农民主政府的普遍建立创造了条件，使根据地基本上得到巩固。红7军主力也在斗争中发展到1万多人，赤卫队和农民自卫军也达9000多人。

1930年1月中旬，正当红7军横扫根据地内的反动民团武装、拔除各地反动据点，根据地开始得以巩固的时候，红7军代理前委书记陈豪人（此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在平马召开前委会议，决定调动红7军主力向右江下游移动，待红8军成立后，请李明瑞到右江统一指挥两军攻打南宁。会后，张云逸将前委的决定电告在龙州的李明瑞。

攻打南宁的这个错误决定是怎么来的呢？

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随同俞作豫第5大队到达龙州以后，俞作柏即出越南转赴香港。李明瑞由于没有护照，法越当局又疑其“通共”，拒绝让他过境，只得留在龙州。到了11月中旬，李明瑞看到当时吕焕炎师屈居梧州一带；刚刚返回广西的李宗仁、黄绍竑指挥黄权等部驻在桂东南，与蒋介石系统的粤军相持，无力后顾，南宁兵力空虚，只有一些收编不久的杂牌队伍，便想打回南宁，以图东山再起。李明瑞把这一打算先与俞作豫商量，得到俞的同意，随之由俞作豫集中第5大队，进至崇、左一带，待命向南宁进攻。李明瑞又立即赶赴右江找张云逸，计划联络第4大队、教导总队共同去攻打南宁。

11月下旬，李明瑞到达百色，张云逸与之在“督办”府热情相见，两人略作寒暄后，李明瑞开门见山地说：

“张将军，不，我们是兄弟，你长我6岁，应称你为胜之兄吧！我由龙州来此，主要是想与你商量一件大事，就是南宁兵力空虚，我们可以乘这一良机，一举攻占南宁。实现这一目的，后面的事情就大有可为了。”

张云逸沉思良久，答道：“李司令，这事关重大，要三思而行，慎而又慎啊！我的看法是，应该发动群众，建立农村根据地，才真正有发展前途”。

“我们为什么不能抓住机会，一举把南宁打下，这对我们的事业不是更有利吗？”李明瑞说。

张云逸拿起茶杯，缓慢喝了一口：“不只是南宁，柳州、桂林等等城市，我们都想向那里发展嘛！不过，这要在根据地建立和巩固，条件成熟的时候。现在就去攻打南宁，不很妥当，如果攻打不下，下一步棋怎么走呢？”

李明瑞认为，打下南宁还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打不下，我们可把部队拉到十万大山去，打下钦州是有把握的。

然后他沉思说：“万一迫不得已，还可再利用一次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去取得老蒋的支持嘛！”

张云逸一听，面有愠色地说：“绝对不可以那么办，一个人应当讲道德、讲信义；作为在一起共事、合作得不错的朋友，我劝你坚决放弃那样想法。”

李明瑞用低沉的声调说：“要老蒋支持，只是一时的想法，我听你的劝告，不会去走那条路的。”

“我们希望你走的是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道路，红7军、红8军就要成立了，我们还请你担起统一指挥的重任呢！”张云逸进一步摆出了自己的希望和想法。

“现在我是普通战士，怎能担此重任呢？还是你来担当吧！”李明瑞说。

张云逸认真地说：“在北伐战争中，你屡立战功，有许多指挥作战的经验，治军也有方，红7、8军总指挥的担子，你来挑最合适。”

会谈结束的当晚，张云逸把情况详细向邓小平做了汇报，并研究了处理办法。张云逸认为，李明瑞既然已答应不再走靠蒋介石那条路了，说明还有争取其革命的可能，应继续对他做工作；目前还是让他回龙州为宜。如果他到龙州以后还想去香港，可让俞作豫继续为他办理手续，不必阻拦。邓小平表示同意这样的处理办法。

在百色的几天时间里，李明瑞也得到邓小平的耐心帮助。邓小平反复向他宣传革命的道理，指出军阀混战的危害，说明党的计划是建立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并正在积极准备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7军、红8军。

“我们真诚希望你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道路，红7军、红8军成立后，我们还要请你当总指挥，相信你一定能担负起这一艰巨的重大任务”。邓小平说。

11月下旬，邓小平率领何世昌、严敏、袁振武等一批干部向左江出发，计划由那里转道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李明瑞与邓小平同行返回左江地区。抵达左江地区后，邓小平决定以一个连给他作保护，随其行动保证安全，并再次向李明瑞做思想工作，终于使他同意打起革命的红旗，走革命的道路。同时，邓小平又向俞作豫作指示，介绍第4大队发动群众、改造部队的经验，还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建立红7、红8军的指示。在对准备起义的工作做了部署后，邓小平留下何世昌、严敏等人，以加强党对左江地区工作的领导，便离开左江地区。

回到左江以后，李明瑞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蒋介石拉拢他的野心不死，让特务带着广西省主席等高官的委任状和巨款到达龙州、香港等地，向其本人及其亲属进行游说和引诱。杨腾辉、岑建英等也以老同学、老同事身分，写信劝他不要参加革命，李明瑞断然拒绝：“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同那些老军阀一样，对部下要利用就捧，不利用就一脚踢开，我尝够这个味道了。”

他穿起草鞋，走到战士们中间，给战士们讲课。告诉战士们说：“革命是我们唯一能走的路了，我们要准备起义，像红7军那样走共产党指引的光

明大道”。在龙州起义准备工作就绪后，于1930年1月底动身去右江，就任红7军、红8军总指挥（红8军2月1日在龙州宣告成立）。中共红7军前委在平马召开干部战士大会，对李明瑞参加革命和接受红7、8军总指挥的重任，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

李明瑞来到百色，使红7军一些领导人打南宁的劲头更加膨胀起来。龚楚、陈豪人等主张大张旗鼓地向部队宣传攻打南宁的计划，在他们看来，南宁是指日可下了。张云逸认为，应在巩固了根据地、有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再去攻打南宁。他明确反对“公开宣布打南宁，”“就是打，军事上的秘密也应予以保守，也不应那样去大肆宣传”。遗憾的是，他的这个主张并未被前委领导人所接受。

1930年1月底，桂系头子李宗仁得到红7军和右江工农赤卫军声势浩大，有进取南宁之势的情报后，急忙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偷袭隆安城。此时，计划攻打南宁的红7军3个纵队还没有集中，仍分散在好几个地方。

2月4日，敌军渡过右江由城东、城南同时向隆安城发动攻击，反动县长及豪绅纠集民团配合敌军行动。守城的红7军只有第1纵队部队和一个营的兵力，另有近百名赤卫队员，总共500人左右。围攻隆安城的敌军则有3个团以上，由对桂西地形十分熟悉的李宗仁的亲信、师长李画新指挥。战斗突然打响后，第1纵队司令李谦负伤，守城部队由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第1营营长何莽指挥。2月6日中午，第1纵队迫击炮队队长乔松等掩护一艘电船为隆安守城部队补充弹药，不幸在城西为反动县长率领的民团阻击，弹药未能运进城内，守城部队处于更为困难的境地。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第1纵队第3营和思林、果德两县的赤卫队，日夜兼程赶到前线参加战斗。增援部队的到来，使守城部队得以逐步突破敌军的重围。在城西一带高地，战斗十分激烈。由雁江方面来的援军要占领高地，以掩护守城部队的安全撤退，而敌军则企图夺取高地，以截断守城部队的退路。7日凌晨，红军以手榴弹击退了敌军的多次冲锋，敌军伤亡惨重。敌军后来从左面绕道先行占领了山头，后续部队也纷纷投入战斗。到上午9时，红7军参战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开始全线撤退。

隆安战斗中，红7军以劣势兵力抵抗了3个团零1个加强营敌军的进攻，毙伤敌500多人，我军也伤亡300多人。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英勇牺牲，营长王展、何莽负伤。

红7军由隆安退向平马一带山地，敌军一路尾追，趁机占领了平马镇。2月22日，红7军以教导队为主攻，向平马实行反击。当红军打垮了敌人防守马鞍山的一个营，冲到城边牛行街时，张云逸发现敌军杨骏昌团从南岸渡河向平马包抄过来，红军有被夹击之危险，遂果断命令部队向七里区撤退。

不久，红7军在恩隆县的亭泗与敌人遭遇。张云逸指挥部队，予敌重创，大量杀伤了敌人，使部队化险为夷，可是部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经理处的辎重、物资损失最为严重。红7军为保存有生力量，根据张云逸和李明瑞指示，转移到东兰、凤山一带山区休整。受到几次沉重打击的敌军，在重新占领右江沿岸各县城后，也不敢深入追赶红军了。

1960年3月，张云逸在南宁对中共广西省委同志说：“自1929年12月11日红7军正式成立到1930年10月北上江西，是红7军发展、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开始时，红7军、红8军准备攻打南宁，未遂，红8军遭到了失败，余部退入右江，成为红7军的一部分。红7军也被迫撤到东兰、凤山等

山区根据地去，革命暂时受到了一些挫折。”

在红7军遭到一时挫折之后，张云逸与前委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走出了一步重要的好棋，把红7军引上了新的胜利发展道路。

进军苗山

红7军由亭泗撤退两天之后，到达凤山县的盘阳区赐福乡（今属巴马县）。这里是群众基础比较好的革命根据地，山势陡峭，道路崎岖，地形甚为险要。张云逸与李明瑞决定在这里对部队进行必要的休整，总结经验教训。

3月初，中共红7军前委在盘阳举行会议，一方面回顾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研究以后的行动方案。2月间隆安战斗后由张云逸、陈豪人介绍入党的李明瑞参加了会议，并增补为前委委员。邓小平2月7日由上海返抵龙州，此时正在前往东兰途中，因此会议仍由陈豪人主持进行。

会议认为，根据右江地区形势的变化，红7军应该转入游击战争，以游击战打击敌人，不应再与敌人打运动战或阵地战。但是，对开展游击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存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应当到白区去寻求机会打几个胜仗，补充自己，解决红军给养与弹药的需要，以保证长期斗争和作战。这样做既可以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又可分散桂系对右江的注意力，便于我军相机收复右江地区。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不宜远离根据地，可以在根据地周围开展游击战，这样可以扩大根据地，给养问题可通过打土豪的办法来解决，并建议向贵州、云南边境发展。

张云逸根据大家讨论的情况，发表了自己的总结性意见：第一，红7军应到外线去打游击，外线作战方向为黔桂边境地区，那里是山区，适合我们进行游击作战；第二，军部率领第1、第2两个纵队执行外线游击作战任务，根据地斗争也不能放松，更不能放弃，由第3纵队来执行此项任务，实际上也是保卫后方；第三，各纵队立即着手有关的准备工作，争取尽快进行外线游击作战。此方案得到了与会人员广泛的赞同，形成为会议决议。

会议结束时，张云逸又站起来说：“后方工作由雷经天、陈洪涛和第3纵队司令韦拔群三同志共同负责领导，第3纵队第3营营长黄治峰同志，暂时到地方，加强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工作，调第3纵队营长黄世新到第2纵队任第3营营长职务”。

大家也对此建议表示赞同。韦拔群说：我非常拥护张军长意见，还可研究由第3纵队抽出一部分战士补充到第1、2纵队去，以加强我军外线作战的力量。

张云逸可能有些激动，站了起来，微笑着扫视了一下会场：“同志们！拔群同志在这一关键时候，表现了顾大体、识大局、完全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的优秀品德，值得我们学习，我看具体抽多少人，就请拔群同志考虑决定。坚守根据地、保卫后方的任务也很重，还请你们几位在会后好好进行研究。”

部队紧张地为进军到外线作战准备着。

除军事上的准备外，张云逸特别强调要加强部队政策与纪律教育，要各部队重申红7军的宗旨，明确规定到外线作战，不准借端滋扰良民，不准奸淫掳掠，不准拉夫，要公平交易等等。他还让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发出布告，每到一地方广为张贴，宣传红军的主张，教育与团结广大群众。

3月下旬，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第1、第2纵队3000多人，由凤山地区东进，越过红水河，向河池进发。4月初，由河池向东，第2天便占领了怀

远镇。

怀远是一个有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比较繁荣。红7军在怀远住了3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揭露军阀的罪行，并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筹措了几万元现洋，部队给养得到了必要的补充。随后，即向思恩县（今环江县）进发，行进在崎岖的丘陵地带。

有一天早上，天刚麻麻亮，起床号还未吹响，驻地不远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桂系杨腾辉师突然袭来，情况甚为紧急。部队立即集合投入战斗，抗击来犯的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一颗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敌情，发现敌后续部队源源而来，不断增加。我们的两个纵队已被敌人隔开。在这紧急关头，张云逸决定两个纵队按不同方向行动。他让号兵以号音指挥第1纵队向西撤去，他与李明瑞则随第2纵队北进。为避免部队伤亡，保存实力，执行既定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甩开敌军后，张云逸等率领第2纵队经过艰苦行军，到达宜北县（今属环江县）。在那里休整两天，又踏上崎岖的山路和丛林，进入贵州境内，在荔波县与第1纵队会合。这时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可是此时此地上午却白雾弥漫，下午有时又下起毛毛细雨，战士们艰难地在蜿蜒的山坡上行进。

两个纵队会合以后，指战员们无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连成一片。张云逸与前委决定，部队秘密进入苗山，奇袭榕江城。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长期以来，由于汉族的官僚、地主歧视少数民族，造成苗、汉之间的严重隔阂，苗民一般是不愿与汉人往来的。红7军初进苗山时，苗胞们走光了。部队派一些懂苗语的同志，沿途主动地向苗胞打招呼，高喊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胞的军队”，“红军是打压迫苗胞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不断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这样一来，他们虽然不公开与我们对立了，却仍然持枪站在山顶上，监视着我们的行动。

在见不到苗胞的情况下，军政治部通知各部队，到驻地之后由各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蔬菜和猪，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就把大洋放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下的款项数目，同时还贴上宣传我军宗旨、纪律和民族政策的布告、宣传品，希望他们与我军合作，共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治部还另外发出布告，说明如果苗胞有少了东西没有拿到钱的，可以再来部队领取。

采取这些措施以后，苗胞与红7军指战员的隔阂很快打消了，认识到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本质的不同。此后，红7军每到一处，苗胞都表示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红军则以大洋和他们进行交易。粮食、肉、菜等等措不困难了，酋长登高一呼，四周山谷都听到，各家不一会就用背篓把粮食等给养品送来，交给酋长。不仅如此，苗胞还主动帮助红军架桥、修路、做向导，使部队顺利通过了苗山。

红7军是4月30日出苗山的，中午到达榕江城下，决定立即突然袭击榕江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一个后方，很多军需物资屯集在这里，只有王家烈的第25军副军长毛光祥率一个团守备。红7军部队一到，立即向城外山上的敌人猛烈攻击，敌军难以抵挡，纷纷向城内溃退，扫清外围后，红军紧接着开始攻城。

激烈的攻城战开始了。黔军开头还以为是土匪来攻，自恃城防坚固，不

以为然。后来得知红7军攻城，战斗力强，才知不妙，只好仓皇应战。

由于我军当时是企图乘敌人没有准备情况下一鼓作气袭占榕江的，战斗一打响就向城南缺口攻击。一霎间，双方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城内外。红军没有攻城火器，弹药又缺，运来几门迫击炮筒，却没有炮座，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射击，轰隆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难以起到歼敌的作用。加之部队陆续赶到，随到随参战，所以连续攻打3个多小时，也未攻入城内，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前线指挥、第1纵队司令李谦，迅速赶到前沿阵地。他发现敌军力量并不强大，红军斗志却十分旺盛，攻下榕江的信心很足。正在此时，张云逸也赶到前线，李谦向他报告说：

“现在奇袭已不可能，敌方有了相当的准备。但是，我们必须攻下榕江。否则，我们一、二百伤员无法处理，弹药难以补充，部队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以后作战就会更加困难。”

张云逸听完报告，沉思片刻，果断他说：“打！坚决地打！各单位要进一步做思想动员，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枪、步枪等，要稳妥地安放到距离攻击目标最近的位置上。下午5时，准时发起攻击，我们的口号是‘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

各部队按照张云逸指示，紧张地进行各项准备工作，指挥员们又共同研究确定了几个攻击点。

下午5时，一连3发迫击炮弹向城里射击，这是重新开始攻击的信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猛烈射击，攻击部队如同猛虎，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扑向城墙缺口，利用云梯、竹钉强行登城，第一次因敌火力太猛、城墙高，未能成功。紧接着，再次发起攻城，战士们奋不顾身，前边倒下后面立即跟上去，不到一个小时，终于有几名战士登上城墙，连长杨光也接着爬上城去，使劲挥动着手中的红旗，城下的战士在红旗鼓舞下，又有不少人登上城头。登城指战员与黔军在城上展开肉搏，敌人不支，开始溃退下去。攻城部队乘机打开城门，主力部队立即涌进城内，追歼残敌。战至下午6时20分，红7军胜利占领榕江城。

榕江之战，红7军缴获两门大炮、600多支步枪、10多万发子弹、一座无线电台和其他大量军事物资。黔军伤亡惨重，被歼500多人。红7军也伤亡200多人，连长杨光在与敌白刃战中牺牲，特务连长李天佑也负了伤。

5月1日上午10时，军政治部召开的榕江军民纪念“五一”节大会开始了，到会群众有1万多人。会上，宣传了“五一”节的重大意义，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宣传了工农红军的宗旨和任务、纪律。群众齐声称赞“红军真是穷人的队伍。”直到下午1时，与会群众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攻占榕江的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部队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不少新战士，筹得10多万元的款。这一胜利，不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红7军军用物资、经费上的困难，也使部队在战斗中得到了很多锻炼。

新中国成立之后，张云逸回顾红7军这段历史时是这样说的：“在当时敌人主力侵犯右江根据地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红7军主力拉出去，向贵州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是完全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留下一个纵队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也是必要的。”“这一时期，红7军不论在政治、军事、宣传与发动群众等工作上，都经受了很大的锻炼与提高，逐渐地成长为一支既

能打仗又能密切联系群众的人民的军队。”

1930年5月上旬，张云逸和李明瑞等认为，桂黔边境游击作战的目的基本达到，也考虑到榕江乃是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后方供应点，绝不会轻易让给别人，我军久驻榕江不是良策，决定迅速撤出榕江，回师右江地区。

当红7军带着大炮、电台及许多军用物资返至广西边境的福禄镇时，王家烈率领部队跟踪而来。他派人送信给红7军说，“这些东西贵省甚多，敝省甚缺，请把火炮、电台等归还，免伤和气”。红7军一时担心黔军为此与我决战，乃将计就计，答应次日归还大炮、电台。在黔军代表返回后，张云逸命令部队连夜过河，并把带不走的大炮等笨重物资沉入河中。拂晓，红7军已全部渡到南岸。当王家烈部队赶到河边时，红军已走远，黔军无渡河船只，只好望河兴叹。

红7军渡河后，即经宜北向思恩挺进。在那里击溃桂军主力的攻击，而后向河池进发。在河池与分别半年的邓小平政委相会。邓小平4月初由左江回到东兰，即与韦拔群、雷经天在东兰、凤山进行土改试点。5月初率领卫士班去贵州寻找红7军主力，得知河池到了许多打红旗的部队，判断即为红7军，果然与第1、第2纵队在河池会合。在那里休息两天，邓小平向红7军领导同志扼要讲了中央的指示精神，然后即与张云逸等率领部队经金洞、安娄返回东兰地区。

回师百色

1930年5月中旬，在东兰武篆区魁星楼，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共红7军前委扩大会议。

会议的首要议程是邓小平汇报他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的情况，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和3月2日《中共中央给广东省委转红7军前委的指示》。“指示”总结了红7军前一阶段工作的优缺点，指明今后工作的主要路线是：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彻底摧毁封建势力，建立在广大群众信任之上的苏维埃政权。红7军发展的前途“是向湘、粤边、广东的中心推进，与朱毛红军以及北江地方暴动取得联络，以争取广东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指示”还批准红7军前委名单，指定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李谦、韦拔群、雷经天、何世昌七人组成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政委，张云逸为军长。“指示”为红7军指明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群众、加紧反对帝国主义等任务，但其中也充满了“左”倾冒险主义的精神，如提出攻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以及一些“左”的政策措施等等。与会人员对中央指示进行了讨论后，即转入下一步红7军工作任务与行动问题的研究。

为了顺利讨论今后红7军的任务和行动方向，军首长要韦拔群先向与会人员报告了右江地区的敌情：“李宗仁主力部队四、五月已由右江撤走，拉到广西北部，进到湖南，参加军阀大战，去打蒋介石了；右江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百色只有桂系警卫第40团岑建英部400多人和税警民团300多人，右江沿岸其他各县执行守备任务的，都是收编的杂牌部队。”

邓小平抬头望望张云逸，看来是示意让他发言。虽然，李明瑞名义上是红7军、红8军总指挥，但是，邓小平清楚，有关部队行动和作战的决策性意见，主要仍由张云逸提出和决定。从计划攻打南宁开始，使红7军、红8军遭受比较严重的挫折以后，李明瑞发言谨慎多了，一般也不愿先拿出自己的看法。

张云逸谦虚地转向李明瑞：“总指挥，请你先说说吧！看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张军长还是你先说，我真还没有考虑出什么主意。你提出个方案后，我们再一起议论议论，做出一个好的决策来。”李明瑞轻声地说。

“好，我听总指挥的。根据目前敌人在右江兵力薄弱、我军士气旺盛、武器弹药也在榕江战斗中得到相当补充的情况，我主张红7军要抓紧时间做好准备，迅速进攻百色，解放右江沿岸各县。具体作战部署，可另行研究。如果百色守敌力量不强，我认为应集中力量，先去攻打百色，然后视情况收复右江沿岸各县。”

李明瑞表示完全同意：“这个行动方案好，先打下百色，其他各县的杂牌部队，很可能就望风而逃了。”

邓小平说：“定下来，我们就先攻打百色城，显示一下我们红7军的威力，打仗一般是先打分散之弱敌，这次我们破个例，先打右江之强敌。作战的具体部署，请司令部尽快研究，报我们批准，争取6月初开始行动。”

对于邓小平果断、干脆做出决策的习惯，张云逸十分欣赏，进一步提醒与会者说：“按小平同志指示办，还有两周时间，各部队领导回去后，要抓紧进行战前的准备工作。”

6月初，张云逸与李明瑞率领红7军第1、第2纵两个纵队向百色开进。

部队出发的那天早上，阴云密布，雷声隆隆，不久就狂风大作，瓢泼大雨从天而降，战士们冒着狂风大雨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地行进。

张云逸扛着一颗迫击炮弹，和战士们一起在山路上走着，身上未穿雨衣，头上只戴一顶半旧的军帽，浑身已经湿透了。

“军长，炮弹快给我扛吧！”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战士、干部向张云逸提出要求了。可是，他执意不让。“走吧！同志们，扛一颗炮弹算不了什么。”

在一个山腰中间小息时，好些个战士又围上来要抢拿张云逸扛的那颗炮弹。张云逸用脚紧紧踩住炮弹，站起身来对大家说：“同志们的好意我理解，也很感谢。可是你们的负担也很重啊！这颗炮弹等我到百色后，一定给你们去狠狠打击敌人。”

雨过天晴，部队翻过几座大山，加快前进的步伐，快要到百色城了。张云逸和李明瑞按照预定部署，指挥部队分三路开进，从东、南、西、北各个方向把百色城紧紧包围起来，切断敌人的退路，随之开始攻城战斗。

6月8日，张云逸一声令下，攻城开始了。

顿时，山炮、迫击炮、机枪、步枪齐向敌人的阵地射去。红7军战士们在火力掩护下向敌人猛烈冲杀过去。第1纵队由东面和东南方向同时攻击敌人，守敌税警团不堪一击，狼狈逃往城内，观音堂一带迅速为我军占领；与此同时，第2纵队由东北方向进攻敌人，很快把敌人城外的据点占领了。在第2纵队第1营继续攻击前进时，蛇岭西山上敌军一个大碉堡射出密集的火舌，前进道路被封锁了。这是一座居高临下的核心守备工事，可以俯瞰与控制百色城内及附近的几个山头，不把这个核心工事打掉，就难以攻下山城百色。

敌军团长岑建英的城外指挥部正是设在这里。由于敌人占据有利地形，并不时向这里增调兵力，核心工事及其周围人多弹足，我军虽多次猛攻，直到第二天下午仍未奏效，碉堡里的敌人，仍疯狂向我军射击。如果天黑前不攻下大碉堡，敌人可在夜里加修工事，进一步部署兵力，我军再去发动攻击

就更加困难了。

在这十分关键的时刻，张云逸来到作战现场，对指战员们说：“一定要在夜暗之前拿下这个大碉堡，扫清我们进入百色城的外围工事，打掉这个大障碍。”

随后，张云逸由敌人碉堡的一侧爬上蛇岭，仔细进行观察，与随行的几个人进行了一番商谈，就在现场召开了军事会议，命令部队：第一、第2纵队第2营到第一线参加攻打大碉堡作战；第二，在敌人大碉堡200多米的死角处隐蔽进入一个排，准备适时发起攻击；第三，把一门山炮秘密移至距敌人500米左右的一个山头上，实行抵近的水平射击。

第2营营长冯达飞，按照张云逸的命令，立即行动起来。战士们克服重重困难，沿着陡峭的山坡把大炮搬到了山头。攻击部队也悄悄地跃进到埋伏地点，不到一个半小时，准备工作顺利完成。

张云逸、李明瑞走到山炮前做发射前的最后检查。李明瑞俯下身子测定距离，核对了瞄准器，下达开炮的命令。一声巨响，只见敌碉堡上出现一个火团，烟雾升入空中，碉堡张开了一个大口子，紧接着又是两发炮弹打去，残存的几个敌人跃出碉堡，向山后逃去，我埋伏人员冲进碉堡时，10多具敌尸横七竖八地躺在里边。

攻城的障碍打掉了，城里的守敌犹作困兽斗。红7军指战员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残敌在红军的勇猛拼杀下，终于纷纷退缩下去，一部分逃过河去，一部分做了俘虏。岑建英在大碉堡打掉时，即乔装老百姓，坐了小船，只身溜走，向恩阳逃命去了。

收复百色之战，红7军歼敌600多人，缴获迫击炮二门、枪500多支、子弹4万多发，其他军用物资也缴获不少。我军亦有些伤亡，军政治部组织科长罗少彦受伤。

6月10日，百色城里红旗如林，市民群众热烈庆祝收复百色的胜利，锣鼓声、鞭炮声响成一片。果然不出所料，思林、奉议、恩隆、向都、恩阳等各县的守敌，在红7军的巨大声威震撼下，犹如丧家之犬，红军还未到达，就迅即遁去。右江地区很快重新得到解放。

在收复百色和右江地区之后，准备整训部队的时候，红7军又紧接着与滇军打了一仗。这是怎么回事呢？

1930年6月，第二次蒋桂战争爆发，桂系主力部队大多由李宗仁、自崇禧、黄绍竑亲自率领到湖南，协同粤军张发奎、湘军唐生明部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去了。到了7月初，在中原战局变得对蒋介石比较有利的时候，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命令云南滇军龙云，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两江进攻南宁。蒋介石的目的是，在桂系军队北上之际，让滇军抄打桂军的后方，牵制桂军的讨蒋行动，同时也可打击右江地区的红色政权。此乃蒋介石一石二鸟的毒计。

7月上旬，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张冲为前线指挥的3个师，2万人左右，由滇桂边界的旧州进入广西，抵达百色地区时被我军拦住。卢汉派出两个代表与红7军谈判。向红7军提出三个条件：第一，让滇军通过百色地区；第二，接济滇军的粮草与装备也要准予通过；第三，红军退出右江右岸，让其驻兵。如果不答允他们的条件，就要以武力相见。在谈判尚未结束时，滇军即已逼近百色，摆出一副气势汹汹，不可一世的架势。张云逸等红7军领导人研究了滇军提出的要求和条件，认为滇军要去南宁攻打桂系老巢，此乃军

阀之间的互相残杀，与我军无损，因此可以同意让其军队通过和补助部分军用物资，但右江是我军根据地，滇军不能居住下来。可是滇军坚持要我军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否则就要强行通过百色等地。

张云逸等再次做了研究，决定：一是让其通过百色和右江沿岸地区，我军可以暂时离开百色；二是要在政治上、军事上给滇军以打击，在滇军大队人马过去之后，我军伏击其后尾部队，收缴其一部分辎重，让其知道红7军不是好惹的。要红7军谈判代表向滇军代表只转达第一条决定。

随后，张云逸等率领红7军第1、2纵队由百色转移到果化、思林一带公路两旁的高山上，重点是埋伏在果化鹧鸪坳山区。那里形势险要，居高临下，有一夫拦守、万夫莫敌之势，红7军战士静悄悄地埋伏、等候在那里。滇军也一路经过百色向东开来。在滇军大队人马已渡过右江向南宁前进时，红7军埋伏了好几天的部队一齐向滇军后尾部队开火，并迅即冲下山来，敌人遗弃在公路上的辎重、弹药、烟土、被装等物资迅速被红军缴获。滇军也立即离开公路，退聚在山脚下，开始组织反击，向我阵地展开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这一仗打了两天两夜，滇军伤亡600多人，红军也伤亡400多人。滇军急于向南宁进军，不敢恋战，红军也没有进行追击。张云逸在建国以后回顾说，当时针对滇军欺人大甚的情况，打他一下后尾，使他正视红军，当然有一些好处。但是，若把眼光放远一点，不去打他，忍耐一下，让他们与李、白互相残杀（当时南宁没有打下），可能对我们则更为有利。因为如果李、白打胜卢汉、张冲，需要付出更大代价，此时我们再去截击滇军溃败的人马，将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滇军打下南宁，外省军阀统治广西，则更有利于我们发动群众，消灭地主武装，巩固和扩大红军及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也认识到军阀之间的争斗对于革命力量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但遇到什么事情时，总有点沉不住气，考虑就不那么周密。在贵州撤出时，那几门搬不动的火炮，可以不丢到河里，留给黔军去与湘军斗嘛！打滇军后尾部队，也有这个问题。这说明当时我们的认识水平不高，对如何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还缺少实际的经验，因此有些问题处理得就不是很适当。”张云逸30年以后对来访者这样说。

百色、果化两次作战，红7军第1、2纵队取得很大胜利，当然也有相当伤亡，受到一些创伤。张云逸和李明瑞决定在右江地区一时没有敌人重兵的时机，把部队拉到平马进行整训。在整训部队的同时，还在平马举办了一期为时3个月的教导队，对排、连干部进一步予以培养教育。该期教导队参加者达100多人。邓小平和张云逸等亲自力教导队上课。8月间，红7军军部，把右江赤卫队改编成第4纵队，由黄治峰任纵队长，罗少彦任政治部主任。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都有了新的提高。

与此同时，红7军前委、右江特委在邓小平的统一领导下，也加紧进行土地革命，颁发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广泛开展对反动残余势力的进攻，大力加强苏维埃政权建设。广大贫苦青年农民积极参加红军。此时的红7军发展到1万多人，赤卫军也有数千人，兵强马壮，红7军为迎接新的斗争任务做了充分的准备。

开始北上

1930年5月后，由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展开中原大战，红7军同中央苏区等地的红军一样，打了一些胜仗，党内由此产生了骄傲情绪。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

《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条错误路线要求立即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并制定了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武汉、长沙、南昌、九江等大城市，幻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所谓“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目标。

9月30日，中央代表邓岗（即邓拔奇）来到右江。10月2日，红7军前委在平马召开会议。邓岗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11日的决议案和中央给予红7军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在广东的小北江建立根据地，阻止两广军阀北上增援，保证全国红军夺取武汉，然后红7军南下夺取广州，以实现“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红7军前委领导人对中央的指示，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以前委书记、政委邓小平、军长张云逸为代表，认为红7军不过万人，力量不强，根据地也不很巩固，不赞成现在去攻打大城市，而主张先进一步扩大红军力量、巩固根据地；第二种意见以右江特委书记雷经天为代表，根本反对中央交给的任务，主张固守右江；第三种意见以中央代表邓岗和军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为代表，认为右江地瘠民穷，发展前途不大，坚决主张按中央指示办，离开根据地，去攻打大城市，并一再扬言：“谁不执行中央交与的任务，谁就是反对中央。”会场气氛一时有点紧张，邓小平宣布先休息一下再议。

在休息过程中，张云逸个别与邓小平进行交谈：“小平同志，邓岗是代表中央来传达指示的，此事不大好办啊！邓岗与陈、龚等人，我看有借口执行中央决定和指示不让你当政委的架势，如果我们坚持下去，可能引起分裂局面，为了照顾大局，是不是不去同他们展开争论，先按中央指示去办，待路子走不通时，再设法予以改变。”

邓小平沉思了一下，表示同意，认为从全局考虑，这样可避免红7军的分裂，对革命事业的损失可能小一些。

会议继续进行。邓小平说：“我们有些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先执行中央的指示，有什么问题以后适时解决吧！下一步讨论红7军的准备工作与行动安排问题。”

雷经天站起来说：“我反对红7军北上去攻打柳州、桂林，我认为那样做会给红7军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邓岗、陈豪人、龚鹤村立即表态说：“雷经天公然反对中央指示，在组织上不能允许他再担任右江特委书记，建议立即免除，由陈洪涛同志担任特委书记和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主席。”由于邓岗的把持，这个提议在会上被多数人通过了。

这次前委会议还决定，把红7军的4个纵队改编为3个师，即第19、20、21师，第一步北上河池集中，到河池后举行阅兵典礼，并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进行完成北上任务的动员，宣布新的编制。会后，由韦拔群率领第21师返回右江地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

张云逸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说：“考虑到红7军干部战士大多为右江地区的农民，乡土观念一下子难以消除，在进到河池深入动员以前，可不向广大士兵与基层干部宣布北上的决定，现在只说去执行新的作战任务。”

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接着，红7军前委和右江特委在平马又联合召开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县工农政府主席、部队营以上干部参加会议，主要是在这些领导干部中进行北上执行新的作战任务的动员。张云逸和邓小平就加强赤卫军、抓紧秋

收、整顿党的组织等各方面工作做了具体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会上改选了右江特委，以陈洪涛为书记，韦拔群、黄明春、陆浩江、李绍础等为委员。

10月4日，红7军的各个纵队分别从平马、田州、东兰等地向河池集结。那天早上，驻平马附近的部队在镇北大草坪上集合，平马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居民，也由四面八方来到大草坪，欢送自己的子弟兵，群众有的送鞋子，有的送水果，还有的把一、二块大洋硬塞到战士的手中，勉励战士们为人民杀敌立功。

张云逸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击敌人，我们日后一定还会回来的。

“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把我们劳苦大众害苦了，只有消灭他们，方可过上好日子。只要我们坚持斗争，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他最后高举拳头，高声说道：“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们！红军暂时离开以后，你们将会面临更为艰难、紧张的斗争局面，希望你们永远听共产党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继续为保卫右江根据地、夺取新的胜利而斗争”！

欢送大会结束后，红7军指战员在洪亮的军号声中向河池进发。

张云逸等率领军部人员于10月6日离开平马，前往河池。

部队经过南丹时，军部得知红8军有一支部队在贵州边界黄草坝一带行动。张云逸到达河池后，让第1纵队第1营营长何莽、指导员黄一平率部前往迎接。何、黄在南丹附近与袁振武率领的红8军第1纵队400多人相会，便一同开往河池。随后，这400多人就编入红7军的序列。

10月下旬，红7军到达河池后，决定召开红7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以加强和巩固部队，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各项措施。

11月初，在河池举行的红7军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1）执行中央命令，部队去打柳州、桂林，最后夺取广州；（2）红7军整编为第19、20、21个师，分别由龚鹤村（兼）、李谦、韦拔群任师长；（3）改选中共红7军前委，陈豪人为书记，邓岗、邓小平、张云逸、龚鹤村、李谦、黄一平、许卓、袁任远、李绍康（战士）、胡××（战士）为委员。前委在中央代表邓岗领导下工作；（4）开除雷经天的党籍。

邓岗和陈豪人、龚鹤村联成一气，强加到雷经天头上的罪名是，对政权工作搞得不深入；不愿把赤卫军集中到红军去；反对执行中央的指示等等。当时不许雷经天到会诉。此后，即不让他参加任何领导工作，只随政治部行动，但他对党和革命事业的信念一直没有任何动摇。

李明瑞作为部队首长应邀列席了党代会，也没有被选为前委委员。会中有人提出前委候选人为什么没有李总指挥？陈豪人说，他是候补党员，没有被选举权。

前委认为，韦拔群、陈洪涛是本地人，群众基础好，坚持根据地斗争比较合适。所以决定留韦拔群、陈洪涛（未参加党代会）在右江地区，并给一个师的番号，由他们在右江组织部队，原第3纵队部队编到第19、20师，参加北上。韦拔群从大局出发，愉快地服从了前委的决定。

11月5日，红7军开始整编部队。7日，全体官兵集合在河池西南边的三里亭前大草坪上，举行全军阅兵式，也是整编大会。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李明瑞总指挥等和中央代表邓岗出席了大会，附近数千名群众也参加

了大会。邓、张、李三人在大会上都发表了讲话。会场上红旗招展，群情振奋。“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举行授旗仪式后，张云逸等骑马检阅了部队。

鉴于红7军的许多干部战士在动员北上以后，一时思想上产生了动荡，韦拔群也在整编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要无条件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全国处处是我们革命者的家乡，劳动人民都是我们的亲人。现在你们暂时离开家乡，将来还会胜利地返回家乡来。”他要求部队“在邓小平政委、张云逸军长领导下，像创建右江根据地那样不畏艰险，不怕困难，英勇战斗，战胜敌人。我们留下的同志，一定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用战斗欢迎大家凯旋归来。”

韦拔群把原第3纵队的好枪和体格健壮的战士交给了北上的主力部队，只留下百余人编成一个特务连。

当天晚上，韦拔群带这个连队返回右江根据地。张云逸特地为他送行。两个人边走边谈，从右江农民运动、百色起义谈到全国革命斗争、右江今后的艰苦奋斗。张云逸说：

“主力部队走后，右江斗争任务必然更艰苦、更困难、更残酷，但军阀之间矛盾很多，右江群众觉悟很高，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干部，搞好内部团结，政策正确，革命力量仍会不断发展壮大，革命事业一定会胜利的。”

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走了20多里，可是要说的话还很多。韦拔群说：“军长，这一段路，恐怕你已走累了，请你最后再对我提点批评意见，就上马回去吧！”

“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长，看得出你是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光明磊落，不怕困难，党性很强，优点一下子是说不完的。但是，我感到你似乎有一个弱点，就是有些重私人感情，这一点要认真注意呀！我们干革命，要依靠党，依靠真诚革命的、有觉悟水平的同志。要知道在复杂的阶级斗争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韦拔群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军长，你讲得对！今后我一定好好克服，认真纠正这一缺点。”

韦拔群抬眼一看，张云逸身后只有两个警卫人员：“此地已是游击区，这样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于是他又带了一些人回送十多里路，两个人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想不到这一别，却成了两位战友的诀别。韦拔群在1932年10月19日于东兰县被叛徒杀害，时年38岁。

11月10日，红7军军部率第19师、20师1万人左右，从河池出发，开始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第二天占领怀远。在怀远没收了不少地主的粮食，筹措了一批费用之后，向庆远前进。原想经庆远去攻打柳州，由于庆远守敌已有戒备，就改道向天河县前进，计划由天河攻打罗城。14日，部队在罗城附近的四把与桂军遭遇，激战两天，敌援兵赶到，红军遂撤出战斗。四把一战，红7军损失300多人。然后，连夜绕过敌人的据点，迂回到天河县境，转上龙岸到达三防，稍作休整，经六甲抵达融县的长安镇，决定攻克长安后出击柳州。

攻打长安的战斗打了四天三夜，未能攻克。原因是敌人有4个团的主力部队守城，兵力相当强；我们虽有大炮，但攻坚作战缺少经验，红军脱离根据地，没有后方支援，伤员都要自己来抬，给养也困难。但最主要的是由于

我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对立三路线攻打城市的错误还认识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前委并没有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在部队渡过福祿河到达福祿镇（今富祿镇）以后，前委开会，决定绕道古宜去打桂林和柳州。攻打桂林前，先派第 55 团政委黄一平到桂林秘密了解情况。由于去桂林的山路很不好走，且得悉原在柳州的桂军已到桂林作了防守的准备，红 7 军便离开古宜，进入湖南边界，经绥宁去打武岗，目的是解决部队的军饱和被服等问题。计划在打下武岗后，在湘、桂、黔三省交界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

武岗的城墙很高，比较坚固，过去曾是曾国藩办团练的地方，历史上有“铁打武岗城”之称。守城的湖南民团又有防守作战经验，经过一场激烈战斗，难有进展。又连攻几天，湘军何键率几个团赶来增援，并派来飞机助战，红军被围于城下，处境十分不利，便连夜紧急突围，过河时浮桥截断，人员伤亡较大。第 55 团团团长何莽在突围时牺牲。在这次作战中部队损失 500 多人。

部队撤出武岗向新宁方向前进，走了三天，已十分疲劳，亟需休息，因警惕性不高，又被敌人特务引入敌之包围圈。发觉之后，便连夜突围，敌军跟踪追击，部队急行军摆脱敌人，进入东安县境。原想在零陵东渡湘江，进入湘南，因零陵有敌军严密防守，难以通过，前委决定回师广西，攻打全州。

经过一天多的急行军，部队于 1931 年 1 月 1 日进入全州县境，驻在会龙铺、千户所、松山等村镇。1 月 2 日攻全州城，该城守敌不多，没有多少防备，故一击即溃，红 7 军顺利进驻全州，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横渡武水

红 7 军在桂、黔、湘近两个月的艰苦转战，没能打下一座城市，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指战员们开始怀疑这样到处攻打城市的行动对不对。士兵的情绪不好，逃兵也多了起来。张云逸、邓小平等早已认识到让红 7 军这样一支部队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是不正确的，只能给部队带来巨大的危害。现在看到部队这个情况，听到部队指战员的呼声，决心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在他们的建议和坚持下，陈豪人与邓岗只得同意在全州开一次前委会议，研究一下今后红 7 军的行动问题。

邓小平在会上说：“两个月的转战，部队由万人左右减员到不足 4000 人，再这样打下去，要不了多久，就把部队损失殆尽了。现在，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沉痛教训，柳州、桂林不能再去打了，如果那样，我们将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成为历史的罪人。”

张云逸说：“我完全赞同小平同志的看法，现在是冬季，部队衣食困难，北有湘军盯住我们，南方桂军严阵以待，两个月来部队已遭到巨大损失，如再去攻打柳州、桂林，等于是自投死路，该回过头来另想办法了。”

邓岗、陈豪人、龚鹤村三人沉默了一阵，拿不出什么主张，但似乎又不甘心承认自己的错误。

“我在会议之后，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岗对与会者咕哝了一句。

“执行中央的指示没有错，桂林、柳州暂时不去打，以后我们还是要去打的。我们下一步行动目标是哪里？我看还是到江西去，与朱德、毛泽东的红军会师。”陈豪人有气无力地说。

邓岗乃广西怀集人，1926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度任广西特委书记。1931 年 1 月化装成商人离开红 7 军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途中，被留在广东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后又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被国民党逮捕，牺牲时年仅 28 岁。

陈豪人，福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福州地委书记。1929年夏天被派往南宁，在俞作柏的广西省政府中任机要秘书，从事兵运工作，参与领导百色起义。1931年1月也乔扮商人离开红7军，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1940年在福建崇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33岁。

邓岗、陈豪人在红7军的工作上有过错误，从他们一生来说，仍是有功干党的事业的革命的一生，且最终都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危害的立三路线，实际上在1930年9月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已被纠正了，不过当时交通阻塞，红7军领导根本不知道这一情况。全州会议之后，立三路线对红7军失去了指导作用，部队指挥大权又重新回到邓小平、张云逸和李明瑞的手中。

在全州休息三天，红7军筹了几万元经费，给全体官兵发了点零用钱。原打算添置被服，因桂军正在向全州压来，被服未能做成，便在1931年1月4日离开全州。红7军决定向东南越过桂湘边界，往湘西南的道州开进。前委在道州开了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全州会议的决定，以教育群众，并鼓舞部队情绪。此时，部队向商人筹款，商人狡猾地假意热情应承，却同时向湖南军阀通风报信，刚驻了两天，便得知湘军从三个方向朝道州袭来。张云逸命令部队拂晓前离开道州，向南面的江华前进。此时正值隆冬季节，北风呼啸，天气很冷，有些战士还穿着单衣、草鞋，一天中竟有多名战士被严寒夺去了生命。山炮连也在半路停下没能赶上来。

部队到达江华，已疲惫得很，军部决定以战备姿态休息两天。城里的官僚与商人跑光了，为了解决被服这个迫切问题，前委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决定休息几天，接收敌人的仓库，没收反动官僚的财产，征用大商人的部分布疋、棉胎，购买一些衣物。由于时间

紧急，来不及把棉花布疋做成衣服，也顾不得衣着的颜色了。部队领到这些东西总可以御寒了。第三天，敌人打来，部队边走边撤，担任警戒的一个连未及跟上部队。

部队翻越过湘桂粤三省交界的老苗山，又返回广西贺县的桂岭圩。桂岭圩的一些青年自动参加了红7军。

从离开右江根据地以来，部队经过艰苦行军和多次大小战斗，到桂岭圩时只剩下3500人左右。前委决定在桂岭圩休整几天，并将部队缩编为两个团，干部也降级使用。缩编后的第55团，团长龚鹤村，第1营营长章健、政委袁任远，第2营营长张翼，政委陈漫远；第58团，团长李明瑞（兼），副团长兼第1营营长李谦、政委麦

农本，第2营营长李显、政委黎心诚。部队缩编后，经过教育与鼓动宣传，又得到休整和补充，士气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

红7军在桂岭圩休整5天后，即出英杨关，绕道东坡，到广东连县的星子，随即攻下连县城。部队在连县城驻下的第7天，广东军阀纠集8个团来袭，部队与敌激战两天，终因寡不敌众，回到星子，然后由那里东进到乐昌县的梅花村。

到达梅花村时已是1931年2月上旬。中共乐昌县委宣传部长谷子元前来与红7军联系，带来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紧急通告等文件。邓小平、张云逸看了这些文件，方知去年9月，即他们在河池之时，党中央就已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结束了立三路线，而红7军却在这几个月内转战数千里，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力量。令人十分遗憾。

红7军在梅花村住下没几天，2月3日，得悉粤军有一个团从星子方向追来。前委认为，一个团来攻，乃是歼灭敌人的良机。可是战斗打响后，发现敌人有三、四个团，其中两个团是由乐昌方向来的。敌情搞错，导致战斗的失利。打了5个多小时的恶仗，歼敌1000多人。红7军也损失700多人，原师长、新编第58团团长李谦，原团长、新编第55团第1营营长章健等优秀干部于战斗中英勇牺牲。龚鹤村、袁振武、李显等负伤。营、连干部伤亡三分之一以上。

张云逸对于梅花村一仗记忆深刻。他在全中国解放后一次谈话中回忆说：“这一仗，我们损失很大，特别是干部的伤亡大。李谦同志牺牲前，他的警卫员向我报告说，‘李师长要见张军长’，我立即到他那里去，只见一个同志背他迎面走过来，我赶上去与他握手，慰向负伤的情况。他向我告别说，‘我不行了，你们继续前进吧！我不能同军长一起走了，你要保重、保重’。说完这句话就断气了。李谦同志的牺牲，使我失去了一位有力的助手。当即埋葬于梅花村山地。”

梅花村一战，红7军损失严重，前委决定放弃在粤北湘南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出乐昌向江西前进。

2月5日中午，张云逸等率领红7军从梅花村到达杨溪渡口，准备由这里横渡武水（即乐昌河），然后前往江西，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

渡口河宽浪急水又深，可供部队渡河的工具只有两条破旧的小船。每次只能乘几十个人，往返要十多分钟。半天多时间，才渡过第55团和第58团一部分指战员。邓小平、李明瑞随第55团渡河去。在太阳快要落山时，敌人由乐昌、韶关两处用汽车运来大批部队，阻止我军过河，并向我过了河的部队展开攻击。我军指战员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掩护部队继续过河。最后，敌人占领了河对岸，已渡河的部队被迫向北转移。红7军被截为两个部分。

敌人由河对岸向河西我军开枪开炮猛打，我军未渡河的多是非战斗人员，面对这突然情况，大家茫然不知所措。此时，一个同志高声叫道：军长来了。张云逸原来是乘敌人开始封锁渡口时去另行探寻渡河路径的。他跳下战马，与经理处长叶季壮等负责同志商量了一下，便站到一个高地上说：“同志们！现在我们过不了河，暂时后退几十里休息。敌人再凶恶也不可能阻挡我们前进。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渡过武水，到中央红军那里去……”

大家深信，跟着张军长就能走到中央红军那里去。天渐渐黑下来了，部队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行进，走了三、四十里，在一座高山附近停了下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山村，有不少战士累得连饭也未吃就躺下休息，在山坡上打起呼噜来。张云逸顾不上休息，组织共产党员和一些干部在山坡周围站岗放哨，以防止敌人跟踪追来和当地地主恶霸的袭击。

第二天早上，部队集合起来后，张云逸走到队前，大声讲道：“我们未过河的只有三个战斗连队，大部分是后勤机关人员，还有伤病员，为了粉碎敌人围追堵截，第一要把机关人员组织起来，第二，要轻装前进。”他按照事先的考虑，将机关人员编成战斗连队，宣布了干部名单，提出了轻装的具体要求。

接着，张云逸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被敌人消灭，二是战胜敌人，杀出一条血路，去找中央红军。大家说该走哪条路啊！”

六、七百个人齐声回答：“冲出去，找中央红军去！”

张云逸说：“对！这是唯一的正确出路！现在我们三个战斗连，当然力

量不足，所以要把机关人员也组织和武装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大的战斗集体。我希望并要求每个党员、每一个指战员，坚决用实际行动告诉敌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打不垮拖不烂的，是真正铁打的队伍。”

部队离开了小山村，几天之后，六个连队到达乐昌河上游的坪石一带。张云逸与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商定在这里渡河。他让人化装成商人去坪石镇雇了几只船，谎称在乐昌城买了一些粮食要船主连夜起运。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天空漆黑。因为路滑，许多同志摔了跤，弄得满身污泥，张云逸也摔了好几跤。大家都盼望着这次偷渡能够成功。此时随部队行动的还有20多个小孩，原想把他们留下来，由当地党组织安排照顾。可是，他们不愿离队，又偷偷地追上了部队。

正在这时，发现有几只为我们“雇”的船开来了。张云逸亲自向船老板做工作，让他们载红军过河。由于河道狭窄，临时决定把几只船首尾相连，搭成一个舟桥，队伍过得很快，不到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兴国会师

张云逸率领第58团渡过武水以后，便向湘赣边区前进，并立即派人寻找第55团，一时却没有找到。

2月15日，第58团到达湖南酃县黄泥潭。这里属于湘赣边区根据地范围。群众听到红7军开来的消息，奔走相告，情绪异常高涨，纷纷拿着食品和用品赶来慰问。指战员们为群众担水、扫院子，帮助群众生产劳动，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感到十分亲切和温暖。

红7军第58团到黄泥潭不几天，民团头目胡凤璋就带着一团地主武装向黄泥潭扑来。接到情报的当天晚上，张云逸军长召开大会进行战斗动员。他说：

“反动派是人民的死敌，不愿让劳动人民得到自由和解放，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觉悟很高，汝城匪首胡凤璋的反动武装很快要来进攻，我们一定要坚决保卫根据地，保卫这里的人民群众，狠狠地教训这些反动派。”

第二天早上，张云逸率领第58团指战员，在酃县赤卫队和当地群众的配合支援下，迎头痛击来犯的敌人。他指挥部队隐蔽于半山腰中，当敌人走进山沟、准备停下做饭时，张云逸一声喊打，枪声响成一片，战士们随即如猛虎下山般冲了下去。在我军猛烈冲击下，敌人死的死，伤的伤，溃不成军。敌人逃到山坡下时又遭到我迂回部队的一阵猛打。在不到一个小时战斗中，歼敌100多人，缴枪100多支，而我军无一伤亡。这是红7军北上以来的一个光辉战例。

按照张云逸指示，部队把缴获的枪弹大部分送给了当地赤卫队，使赤卫队的战斗力有了进一步的增强。

部队在黄泥潭欢度了春节。节后向宁岗前进。2月下旬的一天，部队在酃县水口镇宿营，湘赣边区根据地的红军独立第1师第3团政委王震率领部队赶来接应，两支革命军队会合了。在会合时还发生一点小误会，那时红7军部队的军旗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已很破旧，颜色也不红了。王震部队见到红7军部队那很不整齐的样子，还以为是国民党的民团，攻打了一下，但没有攻动。红7军突然遇到这么一支部队，也很惊诧，于是问他们是什么部队，并说明自己是红7军，这样才消除了误会。

3月中旬，在部队抵达茶陵县李家村游击区时，湖南军阀何键派师长陶广带两个团尾追而来。当时独立第1师第3团只有3个连，红7军第58团有

6 个连。两支部队研究了情况后，决定由张云逸统一指挥作战。不久，敌军赶到，并凭借兵力的优势，很快占领了两个山头，随之向我军发动攻击。

张云逸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命令红 7 军第 4 连担任警戒，特务连做预备队，其余 3 个连队正面向敌人占据的山头发动进攻，命令独立第 1 师第 3 团从左侧对敌人展开攻击。敌人拼命顽抗，我军进展极为缓慢。

在敌人占领的山头左侧一个村庄里，有小股敌人防守。张云逸让第 4 连连长曹振亚和指导员莫文骅带领战士攻下那个村庄，然后由那里迂回攻击敌人山头的阵地。张云逸从望远镜中看到第 4 连胜利攻占了那个村子，消灭小股敌人，并迅速从敌人后面向山头发起攻击，便立即命令正面、侧面的部队猛烈进攻。

敌人在我军的多面夹击下，阵脚大乱，迅速败退下来，夺路逃命。红军乘胜追击 30 多里。这一仗，歼敌 400 多人，俘敌团长 1 名，缴获军用品无数。

一鼓作气，乘胜前进。张云逸指挥独立第 1 师第 3 团与红 7 军第 58 团，迅即向茶陵、攸县开进，很快占领了这两个县城；接着，他又率领第 58 团向酃县进击，并占领了该县。一系列的胜利，使红 7 军在湘赣边区的声威大振。

3 月下旬，红 7 军第 58 团和独立第 1 师第 3 团到达永新城。这里是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中共湘赣省委设于此处。当地党组织、政府和人民群众对部队表示热烈的欢迎，慰问活动一浪高过一浪，指战员们感到特别的高兴，情绪也非常高涨。

到达永新不久，即 1931 年 4 月上旬，蒋介石纠集 20 万兵力，向我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为了牵制敌人兵力，配合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张云逸按照湘赣省委的决定，任河西总指挥部的总指挥，指挥红 7 军、独立第 1 师和红 20 军，进攻吉安县的永阳镇。

按照战斗方案，红 20 军为左路，从左面攻击，独立第 1 师为右路，突击永阳中心区，红 7 军第 58 团为预备队。独立第 1 师打得很勇敢，很快攻入镇中心，与敌人在街道上拼杀。左路的红 20 军在敌人反击下退了下来。红 7 军第 58 团正准备反攻，后退的红 20 军却挡住了前进道路。这时，敌人向张云逸的指挥部打了过来，身边的警卫排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张云逸带两个警卫员冲上山头，继续指挥战斗。与警卫排战士一起，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

已攻入镇内的独立第 1 师两个团，与敌军展开激战，情况也很紧急。就在此时，红 7 军第 58 团第 4 连政委（后改称指导员）莫文骅带领 30 多名战士从侧面攻打过去，击溃了敌人一个营，并与独立第 1 师部队紧密配合，打垮了镇里的敌人。向我山头警卫排猛攻的敌军，见其镇内主力已被打垮，就慌忙撤退。永阳镇遂被我军占领。

永阳战斗后，红 7 军第 58 团回到永新，继而，与第 55 团在天河重新会合。红 7 军第 55 团渡过乐昌河之后，战胜敌人的围追，到达江西省崇义。邓小平去上海汇报工作。部队由李明瑞、许卓等负责领导。会师后，张云逸得了重病，随军治疗与休息，赣江以西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职务，由李明瑞接任。

4 月底，中共红 7 军党组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批判了立三路线，总结了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改选了前委，并恢复了雷经天的党籍。会上还宣布到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的任务

是为保卫和扩大中央苏区而斗争。

5月中旬，红7军、红20军和独立第1师在张云逸、李明瑞的领导下，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活捉敌人800多人、缴枪近1000支的重大胜利。6月初，红7军又配合兄弟部队，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遂川、莲花、袁州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保卫和发展了湘赣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红7军接到中共中央来信，信中指示：将“红20军编为第7军，充实第7军的力量，以统一军事指挥”，中央决定第7军军长为李明瑞，葛跃山为政治委员，叶季壮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参谋长。信中还说：“中央复派葛跃山为前委书记，张云逸、李明瑞、葛跃山三同志为常务委员”。中央规定红7军的任务是“恢复赣西南的根据地，与一、三军团会合”。7月，李明瑞接任红7军军长职务。据此指示信，红7军7月上旬开到赣县沙地。在沙地召开前委会议，研究行动计划。张云逸提出应尽快过赣江，与中央红军汇合，但许卓与李明瑞、许进、余惠、张翼等多数委员不同意，而主张到粤赣边界去打游击。叶季壮、魏伯刚等支持张云逸意见。双方争论比较激烈。

鉴于前委多数同志不大同意过河，张云逸建议召开红7军营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张云逸在会上做了长篇发言，与会的营以上干部大多数赞成过河，许卓、李明瑞等仍坚持自己的主张。

正在此时，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从中央根据地开会回来，向红7军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说中央欢迎红7军过河，并且已派了警卫部队在赣江东岸等待与掩护红7军过河。张云逸还请王首道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话。这样才统一了思想，决定过河。

7月11日，红7军渡过赣江进驻良口，12日到达赣县白露圩，13日到兴国县城，受到根据地群众的热烈欢迎。7月22日，红7军在兴国县的桥头镇与中央红军第3军团会师。从此，红7军归属第3军团指挥，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

红7军在1930年11月离开河池时，号称万人（实际兵力7000多人），经过桂、黔、粤、湘、赣5省边境的艰苦转战，行程1.2万余里，大、小百余战，在与中央红军会合时，只剩下2000多人。与中央红军会师不久，张云逸与李明瑞在瑞金北面的王田镇，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亲切接见。中央军委对红7军的光辉战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特授予“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1931年10月，红7军新上任的政委葛跃山积极推行“左”倾肃反路线，李明瑞惨遭杀害。带领一些干部在地方上执行打土豪、分田地任务的张云逸，得知这一情况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为其辩护，与“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931年11月，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张云逸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随后不久，被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任副参谋长兼红军总部作战局长。

罗瑞卿与大比武

张明哲 黄瑶

罗瑞卿(1906~197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西游击大队队长,红4军团参谋长、纵队参谋主任、支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委,红1军团保卫局局长,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2纵队政治部主任,红1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红军大学教育长。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团政委,第19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兼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身体致残。粉碎“四人帮”后,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964年,人民解放军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比武热潮。这一热潮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空前的。它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和军政素质,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就是人们称之为的大比武。大比武当年就叫比武,并无“大”字。“大”字是林彪为诬陷罗瑞卿突出军事、不突出政治而加上去的。今天这一称谓虽然没有变,但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贬义而完全成为一种褒义了。下面记述的,就是罗瑞卿在大比武热潮中的那一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学习郭兴福教学法

1963年12月下旬,北京已是隆冬季节。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接到负责全军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发来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是叶剑英在镇江参观了郭兴福及南京军区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军事技术表演后,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来的。电报指

出:“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一教学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叶剑英建议,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事训练高潮。

郭兴福是山东邹平县人,1930年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幼年丧父,家中生活困苦,只读过3个月书。14岁时到吴化文部队当勤务员。1948年济南战役时随吴部起义,参加过淮海、渡江、淞沪、漳厦等战役。1951年进陆军第十四步兵学校(后改为第四步兵学校)学习,1955年毕业,1960年时是解放军某部第2连副连长。1961年,某部军长李德生带了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到第2连蹲点,发现并着手培养郭兴福这个典型。1961年8月,总参军训部副主编郝云虹到某部看了郭兴福教学法的演练,并于10月2日在《军训通讯》专门出增刊介绍郭兴福的教学经验。1962年3月12日,南京军区司令

部和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在军区部队中广泛宣传和认真学习郭兴福在单兵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的教学方法。1962年11月19日至30日，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战术训练现场汇报会，检验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成果，交流经验。会议指出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是：一、带着敌情、带着仇恨、带着问题练兵；二、把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动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三、从难从严，多学几手；四、民主教学，因人施教；五、重视训练场上的思想工作。1963年10月10日至19日，南京军区在镇江组织战术技术现场会，进一步普及郭兴福教学法。总参的《军训简报》作了报导，由此引起了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会主任、负责全军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元帅的关注。

罗瑞卿收到叶剑英的电报后，立即呈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叶剑英的报告，当看到“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时，他在下面划了一道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他还说，郭兴福教学法对传统的练兵方法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他还指出：总参镇江现场会“到会的多是‘后排议员’，难以推广，必须让‘前排议员’（指主官）到会，一把手亲自抓。”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开展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运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组织了报告会，听取了石油工业部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报告，全国工业交通系统掀起了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分管国防工业的罗瑞卿立即将学大庆和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结合了起来。1月9日，他在国防工业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号召国防工业系统的五个部学习石油部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工作方法和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认为，只要认真学习，大庆的经验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说：“大庆1960年搞上去了，好像余秋里有三头六臂。其实他的手比我少一只，个子也比我矮一点，在座的都同他差不多高。他的文化程度也不一定比在座的高。大庆不是他一个人搞的，而是依靠党的领导，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和集体的力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在发言中，他也介绍了郭兴福教学法。

随后，经韩先楚介绍，他又看了介绍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感到很好。他认为，要提高部队战斗力，在平时除逐步改善装备外，主要还是依靠练兵，而军事训练是四好的内容之一。他考虑：“政治上个人的模范有雷锋，四好连队的典型有好八连，还有其他连队……在军事教学法方面树立一个典型，来推动一下，会是有好处的。”于是，他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遵照毛泽东关于让“前排议员”参加现场会的指示，1月25日，他在南京主持召开了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的现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陆、海、空军军以上单位的首长、高等军事院校首长和各总部业务部门的负责干部共124人。

会议由罗瑞卿主持。会议采用了边看边议的方法，首先看了郭兴福及郭兴福式的教练员的军事演练。

郭兴福带领第2连第3班战士表演的那两天正是数九寒天，加上阴雨连绵，更是冷得彻骨。在演练小组进攻作业时，雨一连下了几小时，训练场上泥泞不堪。郭兴福带着第2连第3班战士冒雨在泥水中摸爬滚打，不一会都成了泥人，可一个个动作非常认真，都像是小老虎一般。将军们冒雨观看，为他们的精彩表演所吸引，不时发出啧啧称赞声。

从训练场出来，在汽车上、在餐厅里、在小组会上，将军们议论的话题

都集中在郭兴福教学法上。第一次看的说：“大开眼界”、“百闻不如一见”。看过几次的也说：“一次比一次有进步。”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一看完，在路上赞不绝口地说：郭兴福真把兵练活了。在小组会上，他又第一个发言，说：“过去我们也当过基层干部，也教过战士，但是没有郭兴福搞得好，他教得严、教得细、教得活。战士稍有一点差错，他能及时发现，耐心纠正。他训练出来的战士，脑子反映很快，能在紧张、复杂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处置和动作。我们的部队如果都能训练成这样，那就什么敌人都不怕。”军事学院院长张震说：“今后打过仗的老干部越来越少，缺乏实战经验的干部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做才能使新干部把我军优良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传下去呢？现在郭兴福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采用多流汗，多用脑的办法，就一定能够把我军多年用鲜血凝结起来的宝贵经验传下去，并且大大发扬起来。

与会人员还参观了一些郭兴福式的教练员演练，在看了一个班防御的表演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在表演中，特别引起大家注意的是有两位政治工作干部，一位是随侦察兵进行攀登作业的指导员侯书信，另一位是随通信兵进行架线作业的副指导员商顺富。侯书信已30多岁，但同战士们一样全副武装爬上峭壁。商顺富同战士们一样爬高竿、上房檐。大家看了都说：“这是郭兴福教学方法在政治工作干部身上开出的鲜艳花朵。”

1月30日，现场会圆满结束。罗瑞卿作了总结讲话。他首先反复强调了搞好军事训练的意义。他说，过去主要靠打仗来训练，现在主要靠训练学会打仗。搞好军事训练，乃是最重要、最具体的战备。他指出：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我军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是编写条令教材的指针。我们已经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和原则，还必须有正确的训练方法。而郭兴福教学法就是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成熟的教学方法。他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的特点是红、活、硬、细、实。红指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是政治上好；活就是教得活、学得活，练得活、用得活；硬就是战术过硬、技术过硬；细就是教得细致具体；实就是实实在在、扎扎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实战需要出发。他指出：郭兴福教学方法着重在一个“练”字。只有下苦功夫练，才能真正练出硬功夫。

最后，罗瑞卿号召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超过郭兴福，掀起军事训练的热潮，把我军训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此时，遭受三年困难的国民经济已经好转。在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比学赶帮超成为风行的口号。树典型、抓标兵成为常用的工作方法。这是中国人又一次向富强之路的冲击，它强调政治挂帅，强调三老、四严（三老：指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指对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而摈弃了1958年“大跃进”的浮夸。尽管这一冲击后来因为大抓阶级斗争，因为“四清”、“文革”又一次遭到挫折，但在当时却颇见成效。

在这一形势下，罗瑞卿提出了“比武”，也就是比郭兴福教学法。这一年是建国15周年，中共中央已决定10月1日不举行国庆阅兵。罗瑞卿考虑，这正好腾出手来搞比武。南京现场会议结束后，罗瑞卿赴广州看地形。在广州，他向毛泽东、林彪和其他各位军委副主席报告，建议国庆节搞一次全军比武。毛泽东、林彪和其他军委副主席都表示同意。为此组成了以叶剑英为

主任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

叶剑英倡导郭兴福教学法，罗瑞卿便提出“比武”，称病不出的林彪尽管也在罗瑞卿的报告上划了圈，但他认为罗瑞卿又在“大跟别人”了。林彪准备另搞一套，他也要树一个典型。

2月1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和政委吴法宪到毛家湾向林彪汇报了空军大院的工作。林彪称赞空军机关三八作风好，内务卫生好，应该好好宣传一下空军机关这个典型，树立一个榜样。刘、吴走后，林彪吩咐秘书通知总政，立即派人去空军进行调查研究。要报纸把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宣传告一段落，抓一下机关。

罗瑞卿在肯定空军工作很有成绩的同时，也发现他们的做法有形式主义的倾向，便给他们讲了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感到，空军固然要学，但刚刚兴起的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群众练兵热潮也不能冷却下来。他认为，学空军的对象是机关，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对象是连队，二者并不矛盾。2月26日，他在军委办公会议上提出：“郭兴福教学法还要宣传一下，各单位要把这件事和大抓机关的工作穿插进行。石油工业部的经验说：国家讲民气，部队讲士气，个人讲志气。三气合一就是革命。毛主席常说：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

林彪对于已被毛泽东充分肯定的郭兴福教学法一时还不好提什么反对意见。但是这一教学法是由另一位元帅叶剑英所提倡的，而不是他林彪，他感到不快，需要另树一帜，于是就开始了大学空军。而罗瑞卿则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学空军这二者都要抓。

3月4日，罗瑞卿在北京召开的总部学习空军经验现场会议上作完总结报告，第二天便赴北京南苑观看了北京军区几个分队的军事表演，在参观侦察分队捕俘训练中徒手夺枪和徒手对匕首格斗的扣人心弦的表演后，罗瑞卿激动地说：“全军所有侦察分队都要像你们这样练，都要练出你们这套本领来。艺高人胆大，勇敢加技术，什么敌人都不在话下。”

随后，他又到成都军区检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4月22日听取了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和副司令员何正文的汇报。当黄新廷汇报到有一个师拼凑尖子时，罗瑞卿立即说：“这就是弄虚作假，就像1958年搞‘卫星田’并秧的办法，搞上去了也不算数。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这是投机取巧，欺骗上级，这样于是要打败仗的！”他发现某连指战员全是五大三粗的壮汉，便责问：“这个连矮的、体重轻的战士都到哪里去了？今后一定要三老四严，如果不改，这个部队的政委、主任就不能再让他们当下去。搞客里空12300470_0382_0是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破坏。”

后来，在林彪整罗瑞卿时，把在比武中拼凑尖子、弄虚作假作为一条重要罪状。其实，早在1964年4月，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在全军刚刚兴起，罗瑞卿已经在坚决反对这种偏向了。

罗瑞卿批评了客里空之后，黄新廷又汇报了成都军区比武大会还准备比赛学毛主席著作，罗瑞卿不以为然。他说：“政治怎么个比法？光讲革命化，没有成果不行，不能服人。四好中政治思想好同其他三好不能分离。学毛著好自然不等同于军事训练好，但是毛著学习应当是苦练军事技术的思想基础。”

既然对政治、对学毛著不好孤立地去比，当然更不好孤立地去树立学毛著的标兵了。然而，1964年4月下旬，就在大学空军大搞卫生难以维持下去

的时候，林彪又提出，要树立廖初江为学毛著的标兵，总政建议增加丰福生、黄祖示，林彪同意，并提出要像军事方面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那样，在政治方面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4月27日罗瑞卿在办公会议上传达了林彪的“指示”，提出：“武的宣传郭兴福，文的宣传廖丰黄，到一定时候，再把这二者结合起来。”

5月上旬，罗瑞卿接见了丰福生和黄祖示，对他们说：“凡是毛主席著作学得好的单位和个人工作就做得好。大庆油田是这样，好八连和雷锋、郭兴福也是这样。郭兴福不仅是教学方法好，而且带兵也很好。他的成长也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我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就是为了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不仅为了认识世界，而且为了改造世界。”

罗瑞卿这一番话的主题仍然是强调学毛著要有实际成果，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后来，这也成为他的一条重要“罪状。”

1964年5月20日到21日，罗瑞卿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一道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等在杨村观看了北京军区各尖子分队的军事技术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杨勇说：“好！兵就是应当这样练。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陈毅也说：“打得准，有成绩，这是军事历史上破天荒的，世界训练史上也是破天荒的。”贺龙要求杨勇等好好总结一下，一方面推广郭兴福，一方面找出自己的郭兴福。5月24日上午，罗瑞卿在天津俱乐部召开的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交流夜间训练经验现场会上，称赞北京军区是后来居上，比南京现场会议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尤其是在夜战近战和打得准方面。他又将在南京提出的“红、活、硬、细、实”精炼为“红、活、硬”。

“红”指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和发扬军事民主；“活”指教得活，学得活；“硬”就是思想、作风、战术、技术过硬。

在这次讲话中，罗瑞卿再一次批评了个别单位在军训中的锦标主义倾向。他说：

“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张翼翔同志向我反映，说是现在因为全军要比武，有些部队发生了一些偏向，搞锦标主义。有些班，长期集合起来不让回去。有的长期搞单打一。据说有个工兵班，搞了九个月，专门演练一个排除障碍，别的东西都不搞。有的领导把时间、精力全都放在几个班上面，为比武而比武，为培养尖子而培养尖子。还有，我们发现福建有一个部队，就是采取过去大跃进时放假卫星的办法，把所有的好尖子、老兵调出来，拼凑一个班，用这个班来演习。这样搞法，就是为比武而比武，为表演得好看，为了争夺锦标，不是为了把我们的部队都练得过硬，都训练好了来准备打仗。这是根本违背了我们训练方针的。这样搞法，也势必使我们领导和培养出来的尖子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因此，必须防止。”

6月7日，罗瑞卿去济南参加了济南军区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观摩评比大会，有336个班、331名个人演练了790个项目，并进行了评比。6月10日上午，罗瑞卿讲了话，他说：“我看过南京的、广州的，前不久看过北京的，这次又看了你们的，都有很多好的东西，都有很多特点，都有创造，都有发展。你们山东省东边有个蓬莱县，听说有八仙过海。中国有句老话，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也显了点神通。”

在演练者中还有民兵代表，有姐妹炮手、夫妻炮手和祖孙三代射手的射

击表演。罗瑞卿对此十分赞赏。他在讲话中特地提出表扬。他说：“民兵同志的各项表演，同解放军比较并不逊色。昨天夫妻炮手中的女同志，听说是个老炮手，而她的丈夫是跟她学的……妻子是连长，丈夫是排长。丈夫开始有点大男子主义，有点不服气，说我受你指挥还行？妻子说：那有什么关系呢？我回家给你做饭，下海打鱼也归你指挥，只是打炮时你归我指挥。为什么你可以指挥我，我就不能指挥你呀？她的丈夫最后被说服了。祖孙三代的射手也很了不起，爷爷61了，孙子才14岁，你们一定把这种硬功夫一代一代传下去。”

他在表扬了济南军区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再一次讲了防止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对形式主义、锦标主义我们要反对呢？因为这样做，就会使我们领导脱离群众，也使尖子脱离群众。最近这种苗头，这种倾向的萌芽某些地方已经有了。我听说就在你们这个地方也有，确实不确实，我没有调查。有人讲，一个干部顾了一两个班，丢了两三千。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不好。……我们还发现，人为地用拼凑方法，把尖子拼凑起来，偷偷调进党员、五好战士，搞那么一个班。那样的尖子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们普遍的不是这个样子，每年都要补充新战士，这个拼凑起来的東西是假的，这个叫耍花枪，叫弄虚作假，叫浮夸。这样培养出来的尖子不是尖子，是假的。不仅没有用处，而且有害处。他语重心长地说：“打仗是最过硬的事情。谁要是在这里掺假、马虎，那么，将来万一有事情是要吃亏的。要吃大亏，要误大事，要误国。”

济南军区党委对罗瑞卿这一讲话非常重视。七月间，他们批转了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关于进一步贯彻罗总长指示，彻底杜绝军事训练中的形式主义、锦标主义的报告》，要求团以上党委认真学习和贯彻，使军区的军事训练工作沿着健康的道路前进。

十三陵军事汇报表演和全军“比武”

从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军区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贺龙立即通知北京军区准备迎接毛泽东的检阅，同时通知在济南的罗瑞卿，让罗回京筹备。罗瑞卿建议增调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贺龙同意。6月10日下午罗瑞卿返回北京并立即投入筹备工作。

6月15日下午4时，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萧劲光、许光达以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云集西郊射击场。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蔡畅、邓颖超、康克清几位大姐和郝治平、王光美也来观看表演。毛泽东同参加汇报表演的分队合影后，在罗瑞卿、杨勇等陪同下巡视了训练场。当他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漫画像时，用拳头打了几下，诙谐地说：“啊，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来打你几拳。”

在观看济南军区半自动步枪速射后，罗瑞卿走下主席台，拿过射手宋世哲的半自动步枪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看，并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很好。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枪。”半个世纪前，在辛亥革命时期当兵扛过大枪的毛泽东站起身接过枪，端起来作了几个瞄准的姿势。当看到山东省两位女民兵打50发子弹分别

命中 49 发和 47 发时，罗瑞卿又走下主席台把弹孔密如蜂窝的靶子拿上来给毛泽东和刘少奇看。毛、刘都十分高兴地回过身来，向看台上的观众鼓掌。当济南军区双（手）枪表演时，罗瑞卿向毛、刘解说：“这都是些侦察兵，用的是我们自己造的手枪。”又吩咐人下去拿来几支手枪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看。在冲锋枪、机枪射击后，是八二迫击炮无炮盘、无瞄准具简便射击。罗瑞卿告诉毛泽东：“这是赵章成的发明，红军过大渡河，他就是用这个办法打了三发炮弹，掩护十七勇士过了大渡河。”

6 月 16 日下午，毛泽东等来到十三陵水库。毛泽东首先在大坝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内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还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在十三陵观看了迫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后，又转到羊坊观看炮兵和坦克兵表演。

在观看表演期间，毛泽东在所到之处，多次即兴插活，妙语连珠，引起阵阵欢笑。他说：“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在很黑的夜间搞，什么也看不见，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他还说：“敌人越凶越不要怕它。蒋介石过去不凶？美国不凶？具体到每个战斗的打法就不同了，就要重视它。军队无非是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打就吃它一口，吃不了大的吃小的。吃了一口再吃一口。”

两天表演，两个军区 7 个军的一些分队和民兵代表参加，枪炮都是实弹射击，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罗瑞卿尽管很劳累，但心情很愉快。

1964 年 7 月 2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康生等谈话时又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多久？（贺龙插话：要两年。）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号召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毛泽东还应罗瑞卿的要求，再一次对战备问题作了详细阐述。

在毛泽东检阅军事表演前后，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元帅先后发表了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以及比武的看法。

1964 年 5 月 14 日，刘伯承在听取总参汇报全军比武问题后指出：“全军比武我同意。这是比学赶帮的好形式。”“部队训练要狠抓基础训练，要练硬功夫。技术搞不好，基础打不牢，功夫不过硬，战术是空的。”

1964 年 8 月 9 日，陈毅在观看全军通信兵比武汇报表演后说：“最近，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观看了许多比武表演，今天又看了你们横渡黄河、摩托车收放线等表演。这些表演，叫我来评判，那是达到了我军历史上的最高点。”他希望：“解放军一定要训练好，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任何挑衅和侵犯。”

1964 年 7、8 月间，叶剑英在观看了一些部队的表演后，号召部队“要切实把战备工作搞好，大抓军事训练的普及工作，争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使全军达到‘尖子’的水平，做到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合得成，指挥好，协同好。一旦有事，军队拉出去就能打，打就一定能打赢。”

与此同时，贺龙提出：“我已向主席说了，两年可以把‘尖子’经验普及全军。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住尖子不放，各级领导要亲自抓，要严格督促，定期检查。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象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和抓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快搞出成绩来。”

在毛泽东倡导和贺龙、刘伯承、陈毅、叶剑英等元帅支持下，以普及尖子为目标的练兵热潮进一步在全军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从7月16日到8月23日，全军分北京怀柔、河南信阳、甘肃天水等18个地区在陆地、天空和海洋进行了比武，参加比武的部队指战员和民兵共1.37万人，参观者共8.7万人。通过比武，在陆海空三军普遍开展了比学赶帮活动，掀起军事训练热潮，提高了部队军事素质，增强了战备观念。据统计，1964年全军在步兵武器训练中获得优秀成绩的师比1963年增长了4倍，投弹平均达40米以上的师比1963年增长6倍。在各个军区都涌现了许多“夜老虎”、“铁脚板”、“翻江龙”、“爬山虎”，指战员的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参加比武的指战员有许多人日后都成为部队建设的骨干。

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连续两天检阅军事表演，林彪却没有露面。对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林彪几乎可以说是局外人。检阅期间，他还在昆明，正冷眼旁观北京发生的一切。

7月9日，周恩来、陈毅、伍修权等在访问缅甸之前，和杨成武一道去看望了林彪。周恩来一行赴缅甸后，杨成武又按周恩来、罗瑞卿的嘱咐分两天向林彪汇报了军事检阅的情况、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军事工作特别是战略防御设想的讲话。

林彪接受了这犹如倾盆大雨般的一大堆信息，很需要进行一番消化，并研究对策。

他得知：为毛泽东所充分肯定的军事检阅，中央大部分领导人都出席了，罗瑞卿作为组织者忙前忙后，非常惹人注目。

最使他震惊的是毛泽东竟然反对他上台后提出的战略方针，而且这一点又是他必须马上表态，不允许有半点延宕的。于是，他立即对杨成武说：“主席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是根据最新的情况，经过最周密、最深刻的考虑的，看得最高、最远，因此，应当作为最后的决定意见，必须坚决贯彻执行。”7月20日，林彪又亲自打电话给正在黑龙江省琿春县视察部队的罗瑞卿，重申了上述表态。

毛泽东和林彪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内容都是关于战略防御的设想，即一旦战争爆发，敌国军队将可能从哪一个方向侵入我国领土，针对这一情况，如何部署兵力、构筑工事，在何处重点设防，怎样消灭入侵之敌，等等。但两人的设想完全不同。毛泽东的设想更符合现代战争的条件。林彪为毛泽东否定了他提出的战略方针而感到不安，他的表态既要拥护毛泽东的主张，又不能自认错误，于是给毛泽东的设想以五个“最”的评价。这五个“最”中关键的一“最”是“根据最新的情况”。他暗含的意思是林彪的方针是根据过去的情况提出的，也不见得就错。7月中旬，杨成武回京后和罗瑞卿一道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五个“最”的言论。毛泽东听了十分不悦，说：“不管是五个最还是几个最，总之不能按林彪的意见办。”当毛泽东说这一番话时，林彪又转移到兰州继续养病。

7 月间，罗瑞卿仍然继续对各军区各军兵种比武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继续纠正个别单位出现的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的倾向。他得悉，学习毛泽东著作标兵廖初江所在的某部机械化团步兵第 3 连进行实弹射击时违反教程，降低条件，打好了算成绩，打不好重打等弄虚作假问题后，批示：“廖初江所在连队，军事训练不过硬，作风上这样不健康，公然弄虚作假，自欺欺人，证明对毛泽东著作没有真正学好，并不是毛泽东思想真正挂了帅，请沈阳军区党委检查整顿此事。廖初江也不能总是不在家，外出作报告要有一个限度。”

遵照罗瑞卿的批示，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指示军区装甲兵党委对该连进行了认真的检查整顿，并在全区装甲兵部队中开展了坚决纠正训练中弄虚作假问题的活动。

林彪全盘否定“比武”

1964 年 8 月间，毛泽东吩咐贺龙、罗瑞卿一道到北戴河，向他汇报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作为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的一项措施。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回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请他报告此事并请林彪指示。经几次催问，秘书均说：“已报告了，林总未说什么。”罗瑞卿预感到林彪可能又不满意了，仍硬着头皮请秘书去请示，并对秘书说：“如果林总没有指示，我们不好执行。”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

林彪所以迟迟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何异议，而是不满于贺龙、罗瑞卿又“越位”直接去见毛泽东，而把他撇到了一边，他打算向不跟他、不捧他的罗瑞卿动手了，并开始寻找整罗瑞卿的突破口。

1964 年 8、9 月间，军委召开扩大的办公会议，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工作进行小结。9 月 1 日和 7 日，罗瑞卿作了发言。他说：“比武，成绩是主要的，发动了群众，有发明创造。但也有副作用，弄虚作假是我们反对的。锦标主义一定要反对，但按照主席的指示，把‘尖子’这一套加以普及一定要搞。如果不普及，就成了练为看而不是练为战，就毫无用处。”对今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工作，他提出了 24 个字：巩固起来，坚持下去，集中起来，成龙配套，逐步推广，不断提高。

9 月 30 日，以叶剑英为主任的全军比武筹备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全军比武大会的情况报告》，总结了 18 个比武区比武的成绩和经验，指出：“通过比武，检阅了成绩，树立了标兵，交流了经验，为今后普及推广工作树立了样板。”军委在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呈送这一报告时，指出：“从这次比武的情况看，部队的军事训练是有很大进步的，特别是今年一月军委号召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以后，进步较为显著。这对今后进一步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和军事训练水平，提供了活的经验，为今后的普及工作树立了活的样板。”

10 月间，在叶剑英主持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讨论普及尖子的标准。军训部提出了两类尖子的标准，一类要求较高，二类要求较低。与会人员认为，一类尖子不可能在两年内达到普及，都倾向于普及二类尖子。散会时，叶剑英对林彪派来听会的林彪住地的秘书周衍盛说：“你赶快回去向林总报告会议讨论的情况，看他有什么指示。我在这里等你的回话。”周秘书回去立即向林彪报告，林彪同意普及二类尖子的方案，周秘书当即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

到这时为止，林彪尽管心中不悦，但并未对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比武提出任何异议。但到了这一天下午，事情便起了变化。原来在这一天，林彪在派周秘书去旁听军事训练会议的同时，还派叶群去参加了总政主持的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有些干部反映，在少数单位的军训中有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现象，叶群听后怦然心动，感到奇货可居，下午向林彪一汇报，林彪便决定以比武为整罗瑞卿的突破口，手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即抓住已为罗瑞卿多次指出并正在纠正的比武中个别单位存在的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问题，给罗瑞卿倡导的“比武”扣上单纯军事观点、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帽子。为此，11月下旬，他派叶群到广东省韶关去搜罗和编造材料。

此前，在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罗瑞卿建议总政派工作组到部队检查工作。工作组在总政刘志坚副主任率领下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调查，然后在武汉会合，研究起草调查报告。由于材料还不够充实，罗瑞卿又建议他们到广州军区再做一些调查研究。他们赴广州后，在黄水胜的建议下又来到驻在英德县的解放军某部某团，该团第1营第1连是参加了比武的连队，第2连则是南昌起义后林彪曾任过连长的老红军连队。工作组在第1、4、7连蹲点。当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打电话给刘说要来。刘志坚对她说：部队所在地比较偏僻，生活条件差，同时调查也快结束了，劝她不要来。但叶群执意要来，并于11月23日带了3个秘书来到了这个团。第二天便到第1连，在支委会上说明来意。她说：“这次大比武林副主席是不知道的，是背着林彪同志搞的。”“林副主席被架空了，说话不灵了。”她还说：“现在部队是军事冒尖、政治不浓，脱离了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是很危险的。”

叶群给定下调子后，又派她带来的3个秘书分别到1、4、7连投入挑刺的活动。当团、营、连各级向叶群等人汇报工作时，一谈成绩，叶群等人便把笔一搁，接连插话，使汇报者无法说话。一谈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叶群等人便口问手记、忙个不停。叶群每天找她带来的秘书兜材料，搞了3天，感到材料尚未凑够，便一面号召从团到连各级都要“揭盖子”，一面派人下去暗查暗访，专找那些平时训练怕苦怕累的，受过干部批评的，让他们大胆揭发问题，对他们说：“不要怕报复，有我们撑腰。”在这一基础上，他们又召开“民主会”，煽动战士批斗干部。在全团被重点批判的干部共12人，第1、4、7连所有干部都挨了整。他们或被迫反复检讨，或挨批斗，或被排斥调走。第1营营长马友积极抓军事训练，对战士严格管理，叶群便说他“什么政治报告也不参加，就讲究三个一条线”，将他定为单纯军事观点和军阀残余的典型，喊出了“打倒马友”的口号，并把马友在团教导队培训的十来名班长都打成“小马友”。他们无中生有地说，一次山地演练，一位战士跑不动了，马友便在背后捅刺刀，把战士背的背包都捅破了。第1连尖子班长邓泽生鼓励战士撑竿跳外壕，叶群便责问他：“战士摔死你能负责吗？”骂他是小军阀。第1连指导员王长义生理上有斜眼病，叶群便说他老斜着眼看战士。叶群对军训比武百般挑剔，打靶投弹后，连队对成绩优秀者予以鼓励，被说成是“只要环数米数，不要思想革命化”；战士自愿开展业余“瞄三五枪”、“投三五弹”的活动，被说成是“不让战士休息”；有的战士在单杠上练大回环，被说成是“演杂技”。由此，叶群等便说这个连队是“两头冒尖，军事技术冒了尖，思想问题也冒了尖”，并写出了《关于第1连单纯军

事观点的调查报告》。叶群还罗列了第7连军训订指标、搞竞赛，为了培养尖子给尖子吃小灶、让他们多打子弹等现象，写出了《关于第7连锦标主义、弄虚作假的调查报告》。

与在几个连队蹲点同时，叶群还派了一些人对团党委和机关进行了调查，叶群逼迫党委承认“转向”。团里有些干部解释说，他们还是注意政治挂帅的，政治工作对军训起到了保证作用。叶群等人便说，这仅仅是“小保证”，同锦标主义是一致的。

在解放军中是历来讲政治工作对业务、军事的保证作用的。到了60年代，毛泽东提出要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叶群等人蹲点时便把政治工作对业务、军事的保证称为“小保证”，而把政治工作对防修反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保证称为“大保证”。工作组所以指责政治工作保证军训是锦标主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大保证”、“小保证”之论一出，政治工作落实到业务便成为罪名。

12月24日，四篇调查报告都写好了，叶群来到广州，叶群见到林彪后，立即告诉他，此次下部队已完全达到了预期目的。叶又将四份调查报告交给林彪过目。林彪看了这几份以总政工作组名义起草的调查报告，非常满意。

12月28日晚，林彪在广州召见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对他们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其时，毛泽东正不遗余力地提倡政治挂帅，林彪这一指责不啻是将一顶千斤重的铁帽子扣到了罗瑞卿头上。当晚，刘志坚便打电话给罗瑞卿，通报了林彪“指示”的内容。罗瑞卿听了感到很不安，他当即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岂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12月29日晚，在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并讲了他自己的理解，他说：“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

同日，在广州的林彪再次接见刘志坚和唐平铸，由林彪审定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这就是在“文革”史中赫赫有名的林彪关于突出政治指示的第一稿。

这一“指示”说：“我们是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在引证了毛泽东的论述后，“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这时林彪改变了腔调。以前他说的，在时间上，“军事应该占百分之六十，七十以至八十”的话收起来了。

罗瑞卿和许多将领不赞成否定“比武”

当林彪、叶群在广州炮制林彪的“突出政治”指示时，罗瑞卿正忙于审定《解放军报》社起草的1965年元旦社论。

从1960年起，《解放军报》每年都要发一篇元旦社论，总结上一年的工

作，提出新的一年的任务。这些社论在对当时军队工作起到一些鼓舞作用的同时，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对于“左”的一套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65年元旦社论的标题是《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这篇社论同当时许多文件一样，提出了“三面红旗”、“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左”的口号，同时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成绩，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罗瑞卿对此稿进行精心修改后，又将其送往广州。林彪看后，提出要写上他的“突出政治”指示的内容。于是，在广州的总政工作组便按林彪的意图，对此稿进行修改。修改稿在回顾1964年工作的第三段，删去了“推广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法”等内容。这样，便出现了两个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便称由罗瑞卿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起草的稿子为“北稿”，而称由林彪授意，由《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等人修改过的稿子为“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如何修改，大家都感到两稿差距太大，无法合为一稿。罗瑞卿便打电话给刘志坚和起草“南稿”的唐平铸等人，叫他们回来，对他们说：“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12月30日，刘志坚等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会合在人民大会堂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因第二天就要见报了，不允许久议不决，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肯定1964年军训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这样的文字。

1965年1月3日至5日，在北京连续召开第228、第229、第230次军委办公会议，出席者有罗瑞卿、邱会作、萧华、杨成武；列席者有彭绍辉、李天佑、王新亭、刘志坚、徐立清、梁必业、李聚奎、刘西尧及总政的一些部长，《解放军报》负责人和总参军训部部长。从1月6日至8日，召开第8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出席者除上述人员外，还有各军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这六天会议的内容是一致的，即传达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驻英德的解放军某团蹲点的情况，讨论《1965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草案）》。

工作组在汇报时首先肯定了该团有六个好处，即：一、绝大多数指战员想把工作做好，干劲足，勤学苦练，模范作用好；二、作风紧张、快；三、抓了毛著学习、四好、一帮一、一对红；四、训练有成绩；五、机关干部下连队多；六、宣讲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搞得很好。

随后，工作组指出：该团存在不少问题，最根本的是毛泽东思想没有扎根，四个第一不落实。不是四个第一，而是四个第二；不是四好，只有军事好。政治工作主要是搞保证军事训练，和锦标主义是一致的。

工作组在指责该团四个第一不落实后，又罗列了军训中存在的12个问题，即：1.训练时间大大超过计划；2.增加了许多训练课目；3.提高了训练难度；4.比武考核多；5.每天训练八小时，排得满满的；6.挤掉了政治；7.挤掉了生产；8.对新兵老兵一样要求，新兵做不到；9.集训年年重搞；10.练为看，搞花架子；11.要求整齐划一，规定每周一、三、五一律穿短袖衬衣；12.拉练硬性规定“人走房空”。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对林彪指示和工作组的汇报，进行了热烈讨

论。讨论的题目集中在如何评价 1964 年军训的成绩、如何看待比武上。他们在发言时虽然一开始都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但从内容看，大多数人都赞成否定 1964 年军训和比武的成绩。下面我们摘录几位将领的发言。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我抓了两年军训，确实搞出成绩的是去年一年。成绩是主要的。当然也有缺点、错误，但有几个问题要弄明白：第一、四个第一不落实是不是就是因为军事训练搞多了？第二、郭兴福教学法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培养典型、推广

经验是对的，但后来典型是不是搞多了？ 12300470_0397_0 第三、部队紧张一点是必要的，松松垮垮不行。当然过分了也不对。第四、训练指标是高了，在向主席汇报表演时，贺总向主席保证过两年普及尖子经验，我们不能不执行。现在部队训练热火朝天，但“纲要”中连“普及”两个字怎么也不提了？济南军区政委袁升平中将：象去年这样的军事技术训练是以往哪一年也没有过的。我同意王必成同志的发言，成绩是巨大的，当然有缺点，但那是次要的。 1964 年的四好连队数量上升，质量也有提高。（王必成、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郭鹏中将插话：四好连队总的说是上升的。）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我同意袁升平同志的意见。在尖子表演时，我们曾发现过调人的现象，但发现后立即纠正了。也可能还有因官僚主义而未发现的。就全军说，去年济南军区进步不算快；但就济南军区本身说，这一年却是进步比较快的一年。这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结果。这个方法好的，早在南京军区介绍经验中以及总长的讲话中就指出，不准拼凑“尖子”分队，不准搞形式主义。至于后来的执行中又出现了形式主义，那是下面执行的问题。

多年没有搞比赛，去年搞一次很必要、把军、师、团的干部都推动起来了，很好。没有干劲怎么行？今年内不搞大的比赛，赞成，但小规模的搞一搞，还是必要的。

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钧中将：郭兴福教学法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真正群众路线的东西。对部队的要求就是要严。我主张必须要有一定的队列教练，要以纪律性、组织性和统一性来整掉农民的散漫性和学生的小资产阶级性，不然不象个军队。今后搞军训应当再搞细一点，比如训练一个特等射手需要多长时间，用多少子弹，等等。一个一个问题解决。

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培善中将：比武还是必要的，方向是对的。当然有缺点，但不要大张旗鼓地去纠正，那样做影响不好。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上将：比武成绩是主要的，要说打破教条主义，这次看来才是真正打破了。也有不好的苗头，比武会带来锦标主义。尖子大部分是真的，也有少数是假的，有的已经发现了，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发现。普及还是要提。主席、各元帅、总长都讲了，现在不提不好。

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中将：普及应该提，部队确实需要。经过努力，方法上改进，标准也是可以达到的。

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上将：去年军训成绩是巨大的。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因为政治思想工作搞得好，调动了部队的积极性。普及尖子主要问题是时间问题，要区别新老战士，提出不同的时间要求。四好要落实于军事，不然就是单打一。

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要肯定去年军训成绩很大，郭兴福教学法

是好方法。尖子普及要写进纲要，武装泅渡要说几句，要有正课时间训练。这几天我和家里联系了一下，现在军政训练都超过了规定时间，而且政治课超过的更多。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总政工作组的报告讲的问题，在别的部队中可能有，但不见得所有部队都有。林总提出的苗头，如果不抓就成问题。去年的比武还是有成绩的，像真打仗一样，看问题要防止片面性。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去年成绩很大，学毛著，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使工作真正达到了新的阶段。

在会议上，也有人对1964年军训应如何评价采取回避态度。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中将认为：“四个第一还未落实，特别是在中高级干部中”。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中将反映：“在海军中有人认为四个第一可以转换为四个第二，有人认为政治挂帅后，工作一年不如一年，有人曲解林总关于军事是彻头彻尾的政治的指示，说什么我干军事就是搞政治。”

然而，这种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只占少数。带领工作组到解放军驻英德某团蹲点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中将认真倾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声明：“我们只蹲了一点，可能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不下去什么也看不见，一蹲下去又到处是蚂蚁。已再三说明，我们反映的只是一点，不能说所有连队都是这样，也有很好的连队。就是这一点，也要一分为二，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连有六个好处。”

听了大家几天的发言，罗瑞卿看到那么多高级将领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的成绩，几天来的不安心情有所缓解。他心里已经十分清楚，林彪的指示，有不妥之处。他对林彪这位老上级是十分尊重的，但在他心目中，林彪和毛泽东并不处于同一地位。毛泽东是英明的领袖，罗瑞卿打心里崇拜他，把他的思想奉为是非的准绳、行动的指南。林彪则是直接的上级，罗瑞卿尊敬他，但并不认为他的话说得都对。对于他这个“突出政治”的指示，罗瑞卿便感到不妥，需要澄清由它而引起的思想混乱，但又要注意不能触犯了林彪的尊严。罗瑞卿在做这个会议的总结发言时就要掌握这个分寸。

罗瑞卿的总结发言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他解释说：“所谓全面的理解，就是辩证的理解，而不是片面的理解，不要一下偏到这边，一下又偏到那边。就是说，要在政治统率军事、统率一切工作的原则下，把政治思想工作同军事技术，同各项具体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必须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不要犯单纯军事观点和单纯技术观点的错误，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军事训练和其他各项工作之中，使各项工作都过得硬，不要搞空头政治。”对林彪所说“时间上谁让谁的问题，基本上要确定一个原则：让给政治”，他解释说：“对于整个工作的安排，必须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首要位置，军事服从政治，但是，在工作时间的分配上，军事训练时间又要多于政治训练时间。”他还引证了林彪过去说过的“军事训练时间可以多一些，政治工作时间少一些”，并把林彪前后矛盾的话说成是“一致的，并不矛盾的”，以达到用林彪过去的话来抵制他的“让路”论的目的。

罗瑞卿总结发言的第二部分标题是“对于1964年的工作要有正确的估价”。他说：“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去年的工作是全面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学毛主席著作，一是军事训练，一是整顿机关。”“去年的军事训练，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认真落实了主席

和军委、林总的指示，进一步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框框，成绩是显著的。尽管还有许多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

对于林彪提出的关于比武冲击了政治的无理指责，罗瑞卿不好正面抵制，而是尽力向正确的方向解释和引导。他说，林彪的指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预见性，毛泽东思想的预见性”。对于林彪的所谓“预见性”，他具体解释道：“林总讲的是苗头，如果对这些苗头不加克服，不加制止，不及时敲警钟，让它发展下去就可能成为偏向。”“军事训练是不是冲击了政治，冲击了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呢？有一些部队是冲击了，但总的来讲还是好的，这一点也要肯定。”

对弄虚作假、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罗瑞卿指出：“这些毛病，我们历来都是反对的。这些问题，也不是现在才发现的，过去我们就发现过，也作过批评，作过纠正，总参、总政都为此发过指示、发过通报。我们在去年8月的军委办公会议第7次扩大会议上，也指出过这个问题，我最近对海军同志讲话也讲了这个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认为，“有些是由于为了搞比武要求太急，搞高指标和瞎指挥压出来的”，“但是，把一切问题都推到比武上头，也是不对的。因为，有些缺点和错误，不搞比武也可能发生，事实上也发生过。”

罗瑞卿在总结发言的最后说：“总之，去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都是巨大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当然，对于去年的工作也要‘一分为二’，说它是‘一片黑暗，毫无光明，是不对的，说它是‘一片光明，毫无缺点错误’更是不对的。……正是因为去年的成绩比较大、比较显著，那么就更要着重地重视缺点和错误。这是主席的思想方法、林总的思想方法。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成绩。”

第8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的信息，包括各大军区、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发言和罗瑞卿进行总结的情况，很快便传到林彪那里。林彪没有料到，在他讲了“突出政治”以后，还会有那么多人肯定1964年的军训和比武。他把这看成是对罗瑞卿的支持。他权衡利弊，感到靠指责比武来整罗瑞卿，未必能整倒。他决定暂且收兵。于是，在1月9日向罗瑞卿表示：1964年的军训发动了群众，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成绩是主要的。他提出，由罗瑞卿组织一个班子，广泛收集下面对林彪指示的意见，对这一指示作进一步修改。

罗瑞卿接手这一任务后，叶群几乎每天都要给罗打两三次电话，翻来复去他说：“林彪同志说了，一定要突出政治。但他又不放心，怕搞上去了的军训成绩又垮下来，要你在修改时注意掌握这一点。”

在修改过程中，每修改一处，罗瑞卿都要打电话给叶群由叶去请示林彪，叶群回电话，说林同意后落笔。有时一处修改需反复打多次电话，才能定稿。1月间，整个稿子修改完毕。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召开全军整顿机关动员大会。在会上，罗瑞卿看到叶群，便告诉她，文件已定稿，要送给林审批。叶群摇摇头说：“不必了。”罗瑞卿坚持要送。叶群微笑着说：“修改的地方林彪同志都已同意了，不必再走这个形式了。你是总长，最后决定。印发到会同志就可以了。”罗瑞卿此时对同叶群打交道已经有所警惕，他怕将来节外生枝，又追问叶群：“最后稿你看过没有？”叶群看罗瑞卿挺认真，也收起笑容，连连点头说：“看过，没有意见。”罗瑞卿为了把此事砸实，当着叶群的面，吩咐刘志坚将此稿印发大会。三天后未见下文，在会上罗瑞

卿又当着叶群的面问刘志坚，是否已经印好，刘尚未作答，叶群忙说：“哦，我又考虑，这样重要的文件，还是送给本人过过目好，现在还没有退回呢。”罗瑞卿对叶群的出尔反尔很不满，但强忍着一言未发。

后来，在整罗瑞卿时，有人揭发，罗瑞卿对此稿修改了有78处之多。按揭发者的意思，似乎可以不同修改得对不对，改得越多，“罪行”便越大。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必要考证究竟是否改了78处。从现有材料看，后来的定稿同第一次稿相比较，是有多处改动，其中有的是按照林彪意见删改的，有的属于文字上的修饰，而确实是由罗瑞卿提出修改意见，经林彪同意而作出的重大修改主要有以下几处：

一、在“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当然，这里指的是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

二、在提出1965年任务时，罗瑞卿添加了“1965年的工作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一切正确的东西，真正的成绩，一定要巩固，一定要发扬。一切错误的倾向和虚假的东西，就一定要克服，一定要去掉。”

三、在军训时间上，把林彪提出的“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

从这几处重大修改可以看出，罗瑞卿的着眼点在1965年。此时，林彪正受到毛泽东的信用，而罗瑞卿已经意识到林彪不知为什么正在不断地给自己颜色看。在这一形势下，罗瑞卿如果打算明哲

保身，对林彪这一“指示”可以一字不动。但是他考虑的是军队建设，他担心贯彻林彪突出政治的指示后，政治会“乱冲击一气”，担心1964年军训成绩退下来，完不成毛泽东交代的两年普及尖子的任务。显然，罗瑞卿这几处修改都是十分恰当的，把林彪那个“左”得出奇的指示往正确方面扳回了几度。但是，这些修改并不能根本改变林彪指示“左”的实质。罗瑞卿非但无力阻挡当时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政治冲击一切的洪流，而且他自己也在此后不到

一年的时间就首当其冲地被冲倒了。

1965年3月间，罗瑞卿赴广州，黄永胜对罗瑞卿诉说了对总政工作组的意见。他说：“生产部队到插秧季节了，如果上课时间不去上政治课，就说不突出政治。如果你抢时间插秧，就说是生产冲击了政治。”罗瑞卿立即对他说：“毛主席也说过，要不违农时。像你反映的那样理解突出政治，恐怕不妥。”黄永胜没有参加第8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看来林彪、叶群也还没有来得及对他打招呼。当他还未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死党，而从一个军区司令员的角度来看问题时，看来也还是比较客观的。

4月3日，罗瑞卿应解放军某部邀请，为团以上干部作了题为《什么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的讲话。讲话在对突出政治作了具体解释后提出：“怎样才叫突出政治，如何突出政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同志中理解是不一样的。有林彪同志的理解，有我们的理解，还有另外一些同志的理解。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因为对于任何事物、任何一种思想，要正确地认识、全面深刻地理解，需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自己实践，逐渐认识它。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达到思想上的深化。”

在这次讲话中，罗瑞卿还传达了林彪1月9日的指示，并作了具体解释。

他说：“不久以前，我向林彪同志汇报工作时，他说，去年军事训练的成绩至少有四好：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用心好，就是想把部队搞得好一点，做到打得准，开得动，联得上。内容好，就是去年搞的不是教条主义的东西，而是近战、夜战，单兵、小组，最多搞到班、小分队，而且着重搞技术战术，搞基础训练。方法好，就是提倡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方法，郭兴福和郭兴福式的教学方法，大破教条主义的框框。效果好，就是去年的军事训练取得了比较显著的进步，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但是，也有缺点，出现了一些冲击政治的不好的苗头，如果不纠正，发展下去就可能变成偏向。去年全军比武，有些弄虚作假，锦标主义的现象，这是缺点。但是，林彪同志指出比武的成绩还是主要的。”

罗瑞卿这一讲话同他在第8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是一致的。后来，在整罗瑞卿时，这个讲话也成为“罪证”之当罗瑞卿仍在外地时，听到总政反映，有许多单位建议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印成大张，张贴到连队。林彪已同意。罗瑞卿考虑再三，感到这个“指示”第一段提到叶群的名字不妥。因为叶只不过是林彪办公室的主任，在军内并无重要职务，不宜过分突出。但这又不好明讲，罗瑞卿便建议将她和另一人的名字都去掉，只写总政工作组。罗瑞卿明知提这个建议可能会得罪林彪，但仍然提

了出来。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将这一建议反映给林彪后，林果然很不高兴，决定不印大张了。

1965年4月上旬，罗瑞卿从广州打电话给住在武昌的毛泽东的秘书，请他向主席报告，作战会议于4月上旬在北京召开，为了开好这个会，他拟先向主席请示，然后再到上海向林彪请示。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到武汉来，也不要到上海去，先回北京开会，会后再分别向主席和林彪请示报告。

4月23日，林彪写信给贺龙、聂荣臻、罗瑞卿，并报军委、中央，信中说：“4月22日，我见到了毛主席，谈到了两个问题，都得到了主席的同意和指示。”这封信的第一个问题涉及为了备战而学游泳和修工事。第二个问题是：“由于战争威胁的加重，主持军委经常工作的力量应当加强。军委原来有三个副秘书长，其中萧华同志患病短期不能痊愈，决定增加杨成武同志为军委副秘书长之一，同时担任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样就能使瑞卿同志有时不在时、病时和太忙时，能代理主持办公会议。且由于担任副秘书长的的工作，还可以加强直接向中央报告、请示；联系军政两方面的工作；和与各军兵种、各大军区直接联系，以加强上、中、下的通气和商量问题的便利。”

4月28日，贺龙、罗瑞卿和杨成武赴武昌，向毛泽东请示作战会议需决定的重大方针问题并请毛泽东批准了军队服装、帽徽、领章的样式。随后，罗瑞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报告，已去主席处汇报，并问林，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立即回答：“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现在亚楼同志病况也不好，应该去看看，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月2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达上海，罗瑞卿刚到，即打电话向林彪报告。林提出，先见罗、后见杨。罗瑞卿立即到林彪处，只见室内桌上摆了毛泽东著作和党章。林彪让罗瑞卿坐下后，立即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说完后，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有关加强请示报告的章节，接着又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章节。林彪的

口气比较缓和，但神色十分诡秘。

林彪读完党章，把书放到桌上，接着说：“我这也是唯物主义，要了解情况，才能出主意。你过去通气是有的，但还不够。比如说，今年一月你来了，二月又来了，这两次距离太近。二月以后两个月没有来，距离又太长了。现在给你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接着，他便口授五条：“1.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我在北京时，×日通气一次；3.我不在北京时，×日通气一次；4.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将这五条记在本子上，并立即表示：“我一定照办，一定办到。”林彪立即说：“你办得到，那好。”说着便站起身，伸出手来。清代官场讲究端茶送客，林彪搞的是伸手送客。罗瑞卿立即拉了拉他的手，起身告辞。这时，罗瑞卿已经预感到林彪还会用更严厉的手段来对付他。

林彪对罗瑞卿的迂回包围

1964年5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工作。一次，他告诉林彪，与会人员希望毛主席接见，但主席不在京，他建议请在京的中央常委接见一次。林彪同意。罗问林能不能去，林彪摇摇头说：“身体不好，不见了。”但是，5月19日接见前林彪却突然到场。接见会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常委们听取了会议的三个组长的发言，其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和罗瑞卿在发言中批评了作战部印发给会议也呈报给中央常委的一份敌情材料，认为这份材料判断明显错误，违背了毛主席去年关于战略方针的指示。

接见即将结束，刘少奇已经宣布散会，林彪突然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接着便讲了一通，批驳了那三位组长的发言，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让杨成武他们去讲。”罗瑞卿讲不讲，他只字未提。

作战会议定于5月底结束，结束前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作总结发言，这一信息已登载在会议简报第63期上。5月25日，林彪看到这期简报后立即指示：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宣布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

林彪的秘书立即将此指示用电话通知罗瑞卿的秘书。当晚，罗瑞卿一回到家就看到林的“指示”。他知道，更严厉的手段来了。他正在考虑如何传达林这个指示，叶群来电话了。她在电话中说：

“总长，今天下午我有事去总后，就出了这个事。——12300470_0407_0发了大脾气，现在，他已经睡了，我又不能出去，请你到我这儿来谈谈。”

罗瑞卿回答了一句“马上去”，放下电话，便又上了汽车。车到毛家湾，罗瑞卿刚坐下，叶群便说：“下午他可是大发脾气呵！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我是不在家，我要在家，就可能不出这个事。我回来后，一听说这事，连忙向他解释，并不

是你自己要作总结发言，那天我在场嘛。大家推了半天，是大家要你作的……”

叶群知道，罗瑞卿可能会想，既然你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回来怎么可能不向他报告？他既然早就知道，为什么要等看到简报才发脾气？于是，接着说：

“简报只是今天大发脾气的导火线。其实，他早就有一肚子气。这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呀！4月份你说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5月份，亚楼同志刚死，刚刚作了通气的规定，又出了干部评级定薪的问题。干部的事情，他林彪要负责呀！”

所谓干部评级定薪，是指高干的评级定薪，总政搞了文件和一个名单，已呈送给林彪和罗瑞卿。罗已阅，让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徐打电话给林彪办公室，提出要向林汇报。催问林彪办公室几次，叶群的答复是：因为一身体不好，名单不着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即可。得知叶群这一答复后，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在办公会议讨论后即将文件和名单上报中央，邓小平将此文件批送主席和常委。叶群收到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文件后立即打电话责问罗瑞卿：“刚刚规定的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这样重要的事，为什么不经过林就送中央？”后来，在6月3日召开的军委办公会议上，罗瑞卿承担了责任。徐立清在作自我批评的同时，也说明了叶电话答复的情况，但叶群却不认帐了。“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林彪、叶群要整罗瑞卿，徐立清却被陷入了有口难辩的境地。

罗瑞卿见叶群提起高于评级定薪的事，感到没有必要同她争辩，于是，便保持沉默。

叶群停了一会，见罗瑞卿不吭声，又接着说：“今天这件事不要扩大，公开是不利的。我已把所有电话记录追回了，并交代秘书任何人都不准讲。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俗话说：“泼水难收。”罗瑞卿知道，叶群这番话连孩子也胡弄不过去。因此仍不接这个话茬，而是问她：

“我怎么过关？”

叶：“由我来转弯，说服他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

罗瑞卿点点头，答应照办，便起身告辞。

第二天早饭后，罗瑞卿夫妇到了林家，林彪和叶群都出来迎接，然后叶群把郝治平领走。林彪脸色很不好看，态度也不如平时自然。他同罗瑞卿握了握手，便招呼罗坐下，罗瑞卿即按叶群昨晚所说，只谈要到作战会议作一个发言的事。最后，罗瑞卿请他指示，他说：“去讲一次好，就照这样讲。”随后两人随意寒暄了一会，罗瑞卿便告辞出来。

当天下午，作战会议召开中心小组会，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我负责。”罗瑞卿讲的第一点事实上是贯彻了叶群让收回的林彪的指示，第二点则是为

了防止今后再发生类似林彪、叶群在高干评级定薪问题上出尔反尔的情况，采取的补救措施。

为了搞好同林彪的关系，罗瑞卿又作出了几项决定。6月3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6月10日，罗瑞卿告诉萧向荣，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使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都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6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代，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林彪、叶群此时整罗瑞卿的决心看来已经下定了。早在5月20日，他们就授意自己的几个秘书联名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6月间，叶群又授意海军政治部负责人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这个材料涉及到了罗瑞卿在第8次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和在解放军某部的讲话。这些材料暂时都放进了叶群的保险柜，时候一到，就会拿出来。对此，罗瑞卿却还蒙在鼓里。

林彪叶群为整罗瑞卿搜罗炮弹

挨了林彪几闷棍以后，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上更是如履薄冰，极端的谨慎。然而，由于林彪时时处处蓄意找茬，罗瑞卿仍然是动辄得咎。这种处境又由于下述原因而日益加剧。这就是：他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实事求是，比如政治与业务相结合，等等，因而很自然地要同林彪那套违背了这些基本原则的“左”得出奇的提法产生碰撞。有时，他情不自禁总要对林彪那些离谱的提法作一点修改，而这最后都成了攥在林彪手里的“辫子”。

1965年，《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在主持修改这个社论时，指着“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问社论的起草人：“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罗瑞卿记不起曾经见林彪在什么地方讲过这样的话，又很怀疑林彪会有这种绝对化的提法。他感到这个问题牵涉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错了，提得跟中央、毛主席的提法不一致，不好，便给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打了一个电话。

康生，因在1942年整风中搞“抢救失足者”和在1947年土改中大搞“搬石头”，而“左”名远扬，建国以后颇不得志，便称病不出。到1956年，他看到毛泽东重视理论研究，便企图掌握理论工作大权，骗取毛泽东信用，以图东山再起。“八大”以后，他主动把自己的办公室设在中央政治研究室，表示了对理论工作的强烈兴趣，1957年后先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编委会副主任，接着又分管中央党校，在逐步取得理论工作领导权后，便大力提倡“个人崇拜”、“反修防修”，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到了1965年，已俨然成为反修战士、理论权威。他接到罗

瑞卿的电话后，由于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同时也由于他尚未开始同林彪的勾结，于是表示：这是新的提法，如果要这样提，恐怕应问问中央常委，甚至恐怕还要问问主席自己。罗瑞卿问他个人意见如何，康生未正面回答，他认为，还是按中共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于是，罗瑞卿便将“最高最活”删去了。

6月29日，在罗瑞卿家讨论总政为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在“前言”中也写上了“最高最活”。还是因为对“最高最活”的提法没把握，罗瑞卿又立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很高的田家英，回来后对大家传达田家英的话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他表示，他同田家英的看法一致。

由于罗瑞卿征求了田家英的意见，“最高最活”的提法又被从“前言”中删去了。罗瑞卿万万没有想到，在后来这便成为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证。而在用这一条整罗瑞卿时，康生保持着深不可测的沉默，田家英则含冤自杀。

10月间，罗瑞卿参加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也想同去。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他想去向林彪“通气”。罗打电话到苏州请示，林彪的回复是身体不好，不要来。于是罗瑞卿便径直去广东看地形。在广州，他听到部队反映，有些战士因戴上落后或后进战士的帽子而背上思想包袱，于是打电话给总政，建议今后不要在战士中再提先进、中间和后进。此事被到总政组织部干部家串门的张秀川打听到了。于是一份小报告又飞到了林彪手中，张认为罗这样讲违背了毛主席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张在这份报告中还揭发罗瑞卿在1963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关于海军主要的矛盾既不是人和技术的矛盾，也不是阶级矛盾，而是正确和错误的矛盾的提法。罪名显然也是否认海军内部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罗瑞卿在琢磨工作，可林彪却在琢磨罗瑞卿。显然罗瑞卿的工作已难以维持下去了。

当罗瑞卿到达广州时，整个神州大陆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正在孕育、酝酿之中。

11月10日，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密谋，并征得就住在上海的毛泽东同意，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同一天，杨尚昆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汪东兴接任此职。

11月18日，住在离上海只有80公里的古城苏州的林彪发出了《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这五项一是学毛著，二是坚持四个第一，三是抓基层，四是提拔干部，五是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这些都没有什么新意。值得注意的是解释何谓突出政治的一段话。他说：“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

在这里林彪又把政治从灵魂、统帅变成包括军事及其他更多更多东西的几乎无所不包的东西。

林彪接着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林彪1960年提出的“精

神原子弹”的重复。

11月中旬，罗瑞卿看了珠江三角洲及万山群岛地形后，又西行，经高要、梧州，一路看到南宁。11月20日，返回北京。

11月25日，罗瑞卿陪同周恩来到达上海。这时，上海报纸正围绕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展开热烈的争论。上海市委负责人陈丕显悄悄告诉罗瑞卿，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十分不满。毛泽东说：“他们不登，你们就出小册子。”毛泽东还关照此事对谁也不要讲。陈对罗瑞卿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于是，罗瑞卿便要来一本刊登姚文的小册子。

11月2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泽东接见了柬埔寨副首相朗诺。这是罗瑞卿在“文革”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在朗诺来到之前，罗瑞卿对毛泽东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来了一本，还没有来得及看。毛泽东一笑，未说什么。接见朗诺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周恩来汇报完后，罗瑞卿提出，准备第二天去苏州看林彪。毛泽东点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对林彪期望之殷切，溢于言表。周恩来也要求罗瑞卿把他向主席的汇报向林报告一下。当罗瑞卿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习惯性地朝他挥了挥手。罗瑞卿没有料到，这就是他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

罗瑞卿一到苏州便向林彪报到。林彪秘书马上回电话说：“林总要你马上就来。”

罗瑞卿到林的住处，一进门秘书就告诉他，林还未吃午饭。罗点点头，便来到林彪的会客室，林彪照例拉手、让座，又拿出糖盒请罗瑞卿吃糖。叶群未露面，而是在附近一间屋子里偷听。罗瑞卿知道林尚未吃午饭，谈话中几次声明，明天还可以留一天，再谈一次。林彪要求他一次谈完。罗瑞卿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嘱咐，汇报了在两广看地形及沿途部队等情况。

罗瑞卿汇报完后问林彪还有什么指示没有，林彪说：“没有了，谈完了。”罗站起身要走，林彪又问罗瑞卿身体如何，罗说：“还好，只是最近牙经常疼。”林彪说：“牙疼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就是林彪最后一次见罗瑞卿的临别赠言。

从上海会议到“三一八”

罗瑞卿从苏州回上海后立即飞往南宁，继续他看地形的行程。在南宁，郝治平从北京打电话问罗到苏州见林的情况，谈得怎样。罗告诉她，谈得很好。两人心情都稍稍放松。罗瑞卿告诉郝治平，他从广西还要到云南去。此时，军委办公厅正秉承林彪、叶群的旨意，组织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并通知郝参加。郝不愿参加这种会，便对罗说也想同去西双版纳看看，罗瑞卿答应到云南后再通知郝去。

罗瑞卿以为这次同林彪谈得很好，然而这只是一个错觉。林彪夫妇在给罗瑞卿以平安无事的错觉后便要开始动手了。

此前，在11月18日，林彪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提出“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同时，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其目的是配合毛泽东大抓阶级斗争的需要，同时通过对突出政治的强调，加深同罗瑞卿的观点之间的反差，为告罗瑞卿的状作好铺垫。但是未见毛泽东有何反映。罗瑞

卿走后的第三天，11月30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这封信从头到尾一个字没有提到罗瑞卿的“罪行”，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写上，但是，随信附去的11份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其中大部分前面已经述及。

11月29日，在苏州的叶群打电话给在北京的吴法宪，要吴派一架飞机送她去杭州向毛主席汇报工作。叶关照吴，就从上海派，不要从北京派。她特别向吴交代，“此事绝对不能报告罗总长。”

11月30日，叶群携带了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11份材料乘里二飞机秘密赶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这一汇报内容已无从知晓。不过，在随后召开的上海会议上，叶群曾作了长达10个小时的发言。从这个发言，我们可以分析，叶群向毛泽东讲的大体也就是这些内容，后面我们还要再讲。

叶群汇报完后，毛泽东收下了她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以防“不测”。这时，强调对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毛泽东，阶级斗争的弦已绷得很紧了。

为了整罗瑞卿，1965年下半年，叶群已在她认为同林彪比较接近的不少人中打了招呼。与此同时，她也开始派人向同林彪关系不算融洽的一些负责人进行试探。就在她到杭州的同一天，总参党委一位负责人去找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贺龙，反映萧向荣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何在，这位负责人说：“有一次，罗总长听说有一来访的某国防部长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的镜头，罗便说：‘怕见流血镜头，还当国防部长呢！’这是影射林总的。”贺问：“还有什么根据没有？”答：“没有了。”贺龙立即说：“如果没有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瑞卿是扛大旗的，是拥护毛主席、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这样想。”这位负责人过两天又来了，一坐下就哭。贺龙不耐烦地问他：“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说嘛！”这位负责人说：“仍然是上次谈的，最近要出简报，要写上罗总长是萧向荣的后台。”贺大声说：“我不是说了吗？你们不要这样想。”这位负责人说：“那不解决问题。现在你能不能担保罗总长没

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不会反党。”这位负责人问贺龙：“您这个话能不能传达？”贺龙答：“我既然说了当然可以传达。”后来，当贺龙挨整时，贺龙这句话便成为“包庇”罗瑞卿的罪证。

12月2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进行了批复：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区，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毛泽东 1965年12月2日

毛泽东信中的“人们”，既包括了罗瑞卿，又不仅仅指罗瑞卿。这说明毛泽东听信了叶群的汇报，林彪的状告准了。12月8日，整罗瑞卿的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毛泽东依据林彪、叶群提供的材料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但是，他又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后来，到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曾作自我批评说，他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罗瑞卿。

上海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于12月8日在上海召开，这个会议有许多不正常之处：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会议给与会者每人发了一袋“文件”，也就是叶群送来的那11份材料。这些材料只准在会上看，不能拿到宿舍去。会议上最活跃的人物是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她作了3次，共约10小时的发言，现还存有记录，在这里我们删其繁杂，摘其大要，有些地方略加诠释。

过去（我）对罗是毕恭毕敬，没有想到罗和林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发现一些问题，不敢轻易上报，一怕看不准，二怕材料不够不过硬，三怕给中央、军委常委出难题，四怕转移工作重点。

叶群这个讲话充满了谎言，但这“四怕”中的第二怕是真话。从林彪送给毛泽东的11份材料看，用以打倒罗瑞卿，确实“不够不过硬”，需要叶群在这一讲话中来编造。叶群讲的第四怕也不成问题了，因为整罗已被纳入“文化大革命”这个毛泽东心目中最重要的事了。叶群在叙述了5月间林彪不让罗作总结发言后说。

罗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

罗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把国防部长的位置让给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帽子有了，证据呢？叶群在喋喋不休地叙述了林彪对罗几次发脾气过程后说：

1964年罗即逼林退位。林从包头回来时，刘亚楼来说：罗曾听主席说，希望林多活20年，因为林有马列主义。林约罗来，罗只待了十几分钟又走了，并说明天即出发去看地形，在林问到主席有何指示时罗才说，主席是说了希林多活20年，因有点马列主义。

这是借揭发罗瑞卿来抬高林彪。叶群接着说：

国庆节后罗见林，大声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讲的这些话。林对我说：“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得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就不能让给他。”

这一条揭发人是林彪，证明人便是叶群，或者说揭发人是叶群，证明人

便是林彪。至于林彪家里的人，后来未听说谁就此写过证明材料。看来，罗瑞卿反正已经倒了，叶群连伪证也用不着做了。叶群这一讲话中最耸人听闻的是下一段：

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工作了。

四、放手要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的不对，你答的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的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要出政治舞台”，叶群用的这个“出”字有歧义。“出政治舞台”如果同“进政治舞台”相对而言，是下台的意思。从后台“出”政治舞台，又是上台的意思。从叶群所讲的第一条“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似乎是说林彪要下台。但是叶群又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又是说林彪要上，要升官。

一会儿是上，一会儿又是下，这反映了叶群当时的心态。既要告罗瑞卿逼林彪下台，又要给林彪再上造舆论，因此说起来便忽上忽下，语无伦次。

不过，从全文看意思很清楚，即是说林彪要到中央工作。既然如此，“总长不会亏待你”这句话又没有着落了。难道林彪当了中央领导人，叶群还怕被人“亏待”吗？

叶群接着说：

2月19日，刘要见林，刘又谈四条。说要团结罗、尊重罗。林说：够放手了。罗没人缘，政治不挂帅，封锁我，对罗要一分为二。林无意中說罗看人不准，六二年罗要×××当总长。刘听后大惊说：“唉呀，原来总长不是我！我上当了，被玩弄了。……”

这时刘亚楼又对叶群说：“……我一夜未睡，罗不好，请林警惕，还要通知几个人：杨成武、黄永胜、吴法宪注意，不要上当。我收回四条。我坦白，四条中后两条是重点，是要林退出军队。”刘哭了，说对不起主席、中央、林彪同志，但又说不要告诉罗瑞卿同志，他有势力，军队、公安系统都在他手里。

叶群的指责性质是十分严重的。然而这全部是凭空捏造。因为，稍稍动一点脑筋便会想到，既然罗瑞卿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为什么叶群不在刘亚楼生前让刘写个材料？如果刘因病重，不能亲手写，也可以请人代笔，写好材料请刘签个名嘛！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随后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感到叶群讲的最要害的问题是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亚楼已死，是“死无对证”。对林彪向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表示不满意。朱德在会上实事求是地表示同意罗瑞卿反对“顶峰”的提法。

他也认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不能讲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会后，朱德心情十分沉重。康克清回忆道：1966年1月下旬春节期间，朱老总参加上海会议后辗转到杭州。见面后，我发现他常常独自一人叹气，我关心地问：“你有什么不好过？”

“没有什么。”他说得有气无力。

“不会没有什么吧！”

几十年的相处，我对他已十分了解，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使他不舒心的事，经我再三询问，他也不说。后来他烦了，喊了一声：“不要问了！”

过了一会儿，老总的秘书悄悄对我说，这次上海会议批判罗瑞卿，说罗有篡军反党的野心，撤了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公安部长等职务。以后我问老总是否为上海会议事心情不畅，他叹了一口气说：

“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的那些事全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泽东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

他在屋里低头沉思，来回踱步。过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显然还需要听听被告说一些什么。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

就在叶群鼓其如簧之舌，对罗瑞卿进行造谣之时，罗瑞卿正风尘仆仆地奔波于边防线上。12月初，罗瑞卿经广西百色进入云南，接到邓小平从昆明打来的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都在昆明，问罗能否提前到昆明和他们碰头。罗瑞卿对他说，还要去看河口、老街，可能还要有几天才能到达昆明。邓小平打算在昆明等罗瑞卿，然后一起去看三线的工厂。直到此时为止，邓小平、李富春等还不知道要召开上海会议。

又过了一两天，罗瑞卿便听到中央要在上海开会的消息。他打电话问在北京的彭真。彭也不知会议的内容，只听说是庐山会议性质的会，批判对象是谁还不知道。罗瑞卿听后仍然没有想到会是自己。随后，周恩来给罗瑞卿打电话，要他在11号赶到上海开会，内容电话上不好讲。

12月9日，上海会议已经开了一天，罗瑞卿来到昆明。准备去西双版纳看一看的郝治平在此之前也由空军安排，身不由己地被放在成都，并于罗瑞卿到达前几小时乘飞机到达昆明。此时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等已去上海开会。12月10日，罗瑞卿由昆明军区和云南省负责人周兴和阎红彦陪同接见了军区的干部并作了报告。

12月11日，罗瑞卿夫妇乘飞机赴上海。在飞机上，罗瑞卿一如既往，摊开文件就看，他打开的文件是这次考察得到的几份边境情况的材料。以往，他每次去看地形回来，都要给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写出详细报告，供决策时参考。这一次考察没有完，云南西部还没有看。但他还是准备写一个报告，滇西部分只能在以后看了再补写……罗瑞卿直到此时还不知道，已经不需要他写什么报告了。罗瑞卿忙了一路，直到飞机盘旋下降，才让秘书收起文件。

在机场上，陈丕显和吴法宪在等候。

吴法宪由于对林彪、叶群百依百顺，得到林彪的赏识。刘亚楼逝世后，林便推荐他出任了空军司令员。

吴法宪以往对罗瑞卿也是毕恭毕敬的。对罗瑞卿，诸凡开关车门、穿脱

大衣等警卫员的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回回如此，毫不懈怠。他还对郝治平说过：“我们空军大院只听三个人的话，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林总，一个就是总长。”可是这次在机场却另换了一付面孔，板着个脸，大声呵斥着催罗瑞卿等人上车。

罗瑞卿夫妇由陈丕显陪同乘一辆车。上车后，罗即问陈开什么会。陈已奉命不得同罗谈开会的事，便顾左右而言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气，谈收成，谈工业生产，显得颇不自然。途中，陈又告诉罗，锦江饭店已住满了人，这次安排另住一处。直到此时，罗瑞卿夫妇才发现情况不正常，但他们仍然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而这一点问陈也不会得到答案。于是，车内一片沉默。汽车很快开进建国西路618号院内两层的主楼前。陈丕显告诉罗瑞卿，总理和小平同志正在等着。下车后只见楼房周围、门厅内、楼梯上，都有了警卫。罗瑞卿被引入楼下会客室，由周恩来、邓小平同他谈话。郝治平被引到楼上休息。

周恩来讲了此次会议的内容，随后便转述了叶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作的指责。周恩来也传达了毛泽东所说，“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的话。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即：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听了周恩来、邓小平所传达的内容，对毫无精神准备的罗瑞卿来说，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林彪的指责犹如狂风骤雨无情地抽打着。他立即起而争辩。由于事情来得突然，而林所说的那些材料不是已被歪曲得与事实面目全非，就是彻头彻尾的捏造。罗瑞卿感到在每一个问题上都要解释、争辩。然而“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他急于全部说清，但那么多问题，又岂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他迅速在思想中把问题作了归纳，然后撮其大要，激动他说：“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罗瑞卿要求面见林彪或同林彪通电话当面说清林对他的指责。周恩来立即对罗瑞卿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听周恩来这样讲，罗瑞卿冷静了下来。他开始明白，林彪既然已经提出如此严重的指责，这已经不是可以当面对质能解决的问题了。

周恩来看到罗瑞卿不说话了，便劝罗冷静，不要激动。他要求罗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那里去。他说：“要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他还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这种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谈话结束，周恩来、邓小平离去。罗瑞卿送他们上车，等车走远才回屋。罗瑞卿要上楼，守候在楼梯附近的上海公安局副局长王鉴去扶他，罗摆摆手，拒绝了。但他自己却怎么也没有力气上楼。此时赶到楼下的郝治平走上一步，搀扶着罗瑞卿进入二楼的房间。郝治平已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两人坐下，停了好一会儿，郝治平问罗瑞卿：

“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罗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罗瑞卿越说越激动，止不住流了泪。郝治平看到罗瑞卿那痛苦的样子，

回想起这几天已感到有些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碰到一连串莫明其妙的事情，也不禁痛哭起来。

后来，罗瑞卿在狱中痛定思痛时写道：当时，“实在感到对我很异样。不让我见主席，不让我见林副主席，不让我参加会，不让我外出……我想，对彭黄，当时在庐山，也没有这样呀！所以怎样也控制不住自己。”

在这一连串的“不让”之中，罗瑞卿感到最伤感的莫过于不让见毛泽东。

罗瑞卿自从参加革命以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而此时“文革”的风暴尚在酝酿之中，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罗瑞卿首当其冲，是头一个挨整者，他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对于失去毛泽东的信任，对于挨整明显地缺乏承受能力。

在上海会议开始“背靠背”揭发罗瑞卿以来，发言的内容大量的是一种会议必不可少的表态。也有些人揭发了罗瑞卿工作作风中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揽事太多，锋芒太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这些意见，罗瑞卿都接受了下来。尽管揽事多来源于兼职多，而这并不取决于他。至于锋芒太露，毋庸讳言，罗瑞卿确有此现象。而这是会遭忌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明哲保身的中国人在这方面总结的处事箴言。说到得罪人，在工作千头万绪的情况下，也是难免的，这里面既有因坚持原则而不得不得罪的，也有不该得罪的。

但是，无论是揽事多、露锋芒还是得罪人，都不能置罗瑞卿于死地。因此，叶群抛出了所谓刘亚楼的四条和所谓逼林彪让贤这两枚重磅炸弹。然而，前者是死无对证，后者是无可对证，现在罗瑞卿又不承认。于是，毛泽东决定休会。16日会议结束时，邓小平讲话，连罗瑞卿的名字也未提，说了一句“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即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他们向罗瑞卿传达了在会议上大家就人际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罗瑞卿提出的意见，传达了毛泽东的话：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12月17日，罗瑞卿夫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同机抵达北京。罗瑞卿的原缎库胡同住处正在修房子，乃暂住于西郊新六所。

上海会议开过之后，在军队总部机关和军以上干部中发动了一次对罗瑞卿的集中揭发。吴法宪制造伪证说罗瑞卿要夺林彪的权，是这次揭发高潮中的重点和核心。此外，揭发材料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一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为了说明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林彪、叶群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林彪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在“三稿对照”前面有一个说明：

一、“第一次稿”是林彪同志指示的第一次稿，其中楷体字加曲线处是被罗瑞卿同志删掉的。

二、“一月四日稿”是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以军委名义发到军以上党委，后来罗瑞卿同志又收回来那个文件。

三、“最后定稿”是一月十二日发到连队的最后定稿。“最后定稿”和“一月四日稿”中的黑体字是罗瑞卿同志加上去的。在“说明”后面，便是“三稿对照”的正文。

林彪、叶群授意搞“三稿对照”，目的在于说明罗瑞卿篡改了林彪的指示。

罗瑞卿看到这份“三稿对照”，立即作了两点申诉。

第一点是，在修改时，在组织上我是合法的，不仅是有关人一起修改的，也是请示了林副主席，根据他的指示，并最后经他审查批准的。

第二点是，这个“第一次稿”已非原稿。他说：“这个原文我没有看到过。现在同三稿对照稿对比来看，有些段落是一稿（可能更多一些），有些段落是四日稿，还有一两个段落是最后定稿，如游泳、文娱两段。”

“三稿对照”所以不把林彪原来的指示原封不动地作为“第一次稿”，是因为这个指示原文逻辑混乱，语病很多。一点不动，拿不

出手。因此对于罗瑞卿提出的修改意见，也仍然保留若干，享受原稿待遇。但是这么一来，“第一次稿”便不成其为原稿，对照云云也成了一篇糊涂帐。

不过，“三稿对照”。有一点是对的，罗瑞卿确实对林彪指示作了修改，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的有两处。一处是在林彪所说“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补充了一句：“当然，这里指的是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另一处是在估价1964年成绩、提出1965年任务时，加了一句“气可鼓，不可泄”。

《罗瑞卿同志的三次讲话摘录》摘的是罗瑞卿于1965年1月9日上午在军委办公会议第8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月3日在解放军某部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在前面，我们已经叙述了这三次讲话的内容。罗瑞卿这三次讲话的共同的主题是对林彪的指示“要有全面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将林彪的指示往正确的方面解释，以力图减轻其在部队贯彻时会产生消极作用。罗瑞卿这样做完全是从工作出发，也是为了维护林彪的形象。但摘录的整理者却认为罗瑞卿这三次讲话歪曲了林彪的指示。

“三稿对照”旨在说罗瑞卿“篡改”，“三次讲话摘录”旨在说罗瑞卿“歪曲”。一个“篡改”，一个“歪曲”，总的帽子就是反对突出政治。

当时，罗瑞卿认为尽管他同林彪在一些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可是自己不反林彪个人，也不反对突出政治。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确实对林彪的“突出政治”做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其中包括修改（“对照”整理者称之为篡改）林彪的指示和解释（摘录整理者称之为歪曲）林彪的指示。

在上海会议之后揭发罗瑞卿的高潮中，对罗瑞卿提出的更严厉的指责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由于毛泽东有言在先，罗瑞卿“还没有反对我”，因此，会议没有给罗瑞卿扣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帽子。上海会议之后，为了给罗瑞卿扣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揭发材料提供的罗瑞卿这方面的“罪证”，主要是：

一、反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二、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三、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这三条中，第三条是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第一、第二两条是对林彪的提法提出原则性的不同意见。这些都是无可非议的，但在那荒诞的年代都成

了反对毛主席的“罪证”。朱德在上海会议上说了几句公道话，在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也被林彪攻击为“反毛主席”，被康生攻击为“想超过毛主席”。这些在当时都是弥天大罪。

在这一揭发高潮中，也有个别人的揭发别具一格，颇耐人寻味，现摘录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陈播的揭发材料如下：

一、1962年8月1日，是建军三十五周年纪念日，也是我厂建厂十周年纪念日。我们请他来参加我厂八月一日文艺晚会。他当即答应。嘱咐我们要请陈毅副总理、习仲勋副总理。8月2日晚，他们都来了，萧主任也来了。罗瑞卿同志一下汽车，就告诉我们，他钓了一条二十余斤的大鱼，送给八一厂作礼物，我们把这条鱼给大家烧汤吃

二、1964年1月4日、7日，罗瑞卿同志在三座门会议厅召集驻京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说：“八一厂今后工作方针是两条腿走路，以一半精力抓纪录片、军教片，以一半精力抓故事片，各占50%。八一厂在这一方针下拍了《向毛主席汇报》、《步兵比武》、《各军种比武》、《山东民兵比武》、《海军演习》、《空军演习》等军事训练影片。10月14日，罗瑞卿同志审查《向毛主席汇报》完成影片之后，又指示：“要拍就都拍上一点，都要照顾到，把那些精彩的都拍下来！”“像这样的片子多搞一些，划得来。”

（下略）

这与其说是揭发，不如说是评功摆好。可惜的是这种“揭发材料”太少了一点。

为了置罗瑞卿于死地，叶群等人还在罗瑞卿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动员揭发。但是，在秘书、警卫人员中无甚收获。于是他们又把目光转向曾在罗瑞卿身边工作而已调开的人，他们终于在部队某农场物色到了一个。此人曾在罗瑞卿身边当过公务员，因调戏保姆而受过批评。1963年，支部同意本人请求，让其回乡安置。不久，他又回到北京，要求继续回罗住地工作。罗因已有公务员，乃嘱咐将其调往农场，不久被任命为干部。

叶群发现此人后，以为奇货可居，于是派人引诱他诬告罗瑞卿。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份揭发罗瑞卿夫妇的材料很快炮制了出来。这份材料胡说罗瑞卿每天早晨要这个公务员“请安”，晚上要他向罗报告时间。材料还说罗瑞卿一天要用几十条手巾。罗全家大小的衣服都要这个公务员洗，以致把他的手都搓烂了，如此等等。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个揭发材料漏洞百出。罗瑞卿住地工作人员有好几个，断无只要求该公务员请安之理。至于洗衣服，且不说大一点的孩子衣服都是自己洗，罗瑞卿家还有保姆，也断无将全家的衣服都让这个公务员洗之理。

这个公务员“揭发”的都是些子虚乌有的生活琐事，本身并无什么意义。然而它可以使人产生罗不仅政治上要夺林彪的权，生活上也是老爷作风的印象。它起了在罗瑞卿伤口上撒一把盐的作用。一把盐虽不能致罗瑞卿于死地，却可以加重罗瑞卿的痛苦。而这正是林彪、叶群要利用这个公务员的一番苦心。

林彪、叶群认为材料凑得差不多了，决定向罗瑞卿再一次发起总攻。1965年12月28日至1966年1月18日，全军政工会议在北京召开。在会上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林彪、叶群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的会的要求。

这一期间，罗瑞卿则在家闭门思过，他强迫自己把想不通的问题想通。对自己工作作风、人际关系上的缺点作严格的检查，他把同林彪关系紧张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同时，重申自己不反林彪、不反对突出政治，没有伸手。他也对“三稿对照”作了必要的解释。他相信总有一天毛泽东会出来说话的，他同林彪之间的误会总有一天会冰释。即或不能，他准备告老还乡。他在少有的心境较好的时刻曾对家人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回四川老家，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他以为，极而言之，将来的处理，无非是退休吧。对于这一段罗瑞卿的生活，郝治平回忆道：

快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中央一些负责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关系问题啊，和老师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送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月份的会议突然来了……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告诉他，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考虑也要开个会。会议将于明天开始，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罗瑞卿作好充分思想准备。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显然，前面是他代表组织讲的，最后一句则是他作为老战友给予的嘱咐。邓小平此处所说“挨斗争”是指在中央苏区他因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挨整。后来的事实证明邓小平是正确的。邓小平讲这句话，实际上也是对罗瑞卿的鼓励。

3月4日上午，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七人小组主持会议。

3月4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召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宾馆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后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上提出：发言时要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要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他说：“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现在愤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失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彭真这些话可谓语重心长。在“文革”的浩劫过去之后，确实有些人很失悔。但是，当时彭真的话却被视为“清规戒律”，基本上不起作用。他不久也因为说了这些恳切的话而被说成是支持罗瑞卿向党进攻，犯了包庇罗瑞卿的错误。

京西宾馆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此前，罗瑞卿尽管感到委屈、冤

枉，但是他所得到的信息是间接传达给他的，问题提得虽然很严重，可氛围还是冷静的。在上海会议之后，有不少高级干部同罗瑞卿个别谈话，大家还是同志式的。一到京西宾馆会场上，气氛全然变了。与会者数月不见都成为路人乃至仇人。他们中可能有些人是因为不明真相，对林彪、叶群的诽谤信以为真；极少数人则想通过批斗罗瑞卿以表示对林彪的紧跟，捞取一些好处；多数人则是迫于形势，不得不表示同罗瑞卿划清界限，他们即使对罗同情，也只能保持沉默。总之，不管各人情况和想法如何不同，从表面现象看，大家都程度不同地同罗瑞卿撕破了脸皮，划清了界限。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我实在忍受不了，头脑快要爆炸似的，比受什么罪都苦呵！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

折磨罗瑞卿的不仅是与会者对他的敌视的态度，更厉害的是一篇一篇如万箭刺心的发言。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农奴主”、“定时炸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如此等等大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帽子一顶顶往罗瑞卿头上扣……，它对罗瑞卿的灵魂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有时更甚于皮肉受苦。一个人肉体受蹂躏，尚可用其精神力量来支持其人格；但若精神被摧残，却足可以使其痛不欲生。

在批斗罗瑞卿的积极分子中，吴法宪占有一个突出的位置。“九一三”事件以后，他交代说：

一九六六年三月在小型批判会上批判罗瑞卿同志时，林彪、叶群写给我恶毒地诬蔑罗瑞卿同志的四条，我记得的大意是：罗瑞卿到上海看刘亚楼的病，罗要刘亚楼去劝林彪：“身体不好，应该退休让别人干，林彪可以养病，把军委的日常工作交给其他军委副主席。”其余我实在回忆不起来，要我和×××两人在会上发言。我还诬蔑罗瑞卿同志说：跑遍全国到处看地形，为了自己将来指挥队伍，等等，这些都写在发言稿上。我和×××发言后，有人认为我们放了一个“原子弹”。

吴法宪这颗“原子弹”一放，罗瑞卿再严酷地责备自己搞比武，反对突出政治，不尊重一些老师，骄傲自满，爱揽事，如此等等，都无济于事了。他3月12日就上述问题作了长篇检讨后，会议上的几个积极分子说，这些都是“小鬼”。他们要求罗瑞卿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

罗瑞卿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以后又听了两天发言，发言稿都是当场发，牵涉的问题，所举的材料不少，但我手中又无材料，实在听不下去，但又无法申辩。要我作第二次检讨，我感到检讨实在写不出来。我写一个正式报告给七人小组，请求会议发言结束后，停开若干天，给我写检讨的时间。很快就给我一个书面答复，说不行。并说会议一定要在两个礼拜左右结束，要我一边听会，一边准备检讨提纲。晚上在家里还可准备等等。可是，这我哪能办到？真是忧心如焚，不知如何是好。

3月的北京，经常刮大风，一刮起来，风沙漫天，天昏地暗，从外面往室内看，连日光灯的灯光都变蓝了。

3月18日，虽然没有刮风，但天是阴沉沉的。上午刚吃完早饭，会议打电话通知罗瑞卿说：今天会不开了。难道会有什么转机？罗瑞卿苦笑着摇摇

头。战时，打完一仗就要进行休整。休整完了，还要再打仗。会议停开，无非是一种休整。下一次开会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羞辱会降临他的身上。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了，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

此时，郝治平正在室内陪伴他。她手边有一本小说，她想让罗转移转移注意力，松松心，便对罗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罗便说：“你觉得好，你就去看吧，我要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他托词要郝治平拿着书到另一个房间去以后，在一张纸条上写道：

治平：

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此时，罗瑞卿尽管受到林彪致命的精神折磨，但对党、对毛泽东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

罗瑞卿写完字条，便到公务员房中取安眠药，尚未将药片从药瓶中倒出，公务员回来看到了，他又把药瓶放回原处。他想，公务员要是反映上去，更不得了。于是又回去。此时郝治平还在看书，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说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便走进卧室，脱去外衣，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然后轻轻地走上了通往这座三层楼的顶层的楼梯。顶楼是储藏室，很少有人来，到处都积满了灰尘，有一扇窗户通往顶楼的平台，他推开小窗，高大的身躯费力地钻了过去……

罗瑞卿从三楼纵身跳下，然而，他没有死。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三次大难不死。这要归因于他健壮的体魄。但是，他的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其中左脚更加严重，不幸致残。

失去了左腿的罗瑞卿终于度过了八年漫长的狱中岁月，1977年复出，重任中央军委常委和军委秘书长。虽然历经坎坷，但他依然故我，无私无畏。他协助邓小平同志领导了军队的整顿和拨乱反正工作，积极支持和参加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为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全身心投入工作，一直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迸发出的光辉就象那照亮长空的夕阳，喷吐出满天绚烂的晚霞，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勇征善战的王树声副总指挥

张光本

王树声（1905～197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王宏信。湖北省麻城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1927年11月，参与领导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11军分队长，红1军第1师支队长、团长，红25军师长、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参加了长征。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任西路军副总指挥、军政委员会委员，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鄂西北军区司令员，鄂豫军区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第二政治委员。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届中央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王树声大将，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他关于人民军队建设、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以及现代化武器装备、国防现代化、军事科学研

究等问题的理性认识，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他以游击战、运动战、攻坚战、防御战、山地战、突围战、夜战、近战、歼灭战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丰富并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这里记叙的仅是他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以后，参与指挥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土门战役和南下转战川康边界辉煌战绩的片断。

巴山战将勇

靶场上，骄阳似火。一位身体魁伟、英姿勃发的指挥员，骑在一匹飞腾奔驰的大白马上，越发显得威武雄壮。只听他大喊一声：“看我的！”右手高举的驳克枪，红绸飘扬，像山鹰嚼食一样，“叭！叭！叭！”三枪，枪响靶落，三发三中。赢得了在场指战员们的热烈喝彩，拍手叫好。他，就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31军军长王树声同志，正在为参加群众大练兵的干部战士作射击示范表演。

1933年6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总部在取得粉碎四川军阀田颂尧三路围攻的重大胜利后，于南江县的木门场（今属旺苍县）召开军事会议。全军团以上干部和部分营、连干部代表共10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充分发扬民主，讨论了入川半年来的全面工作情况，认真总结了反三路围攻作战的经验。会议依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大发展的需要，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同时还作出了加强红军思想政治工作、大力开展军事训练、恢复彭（湃）杨（殷）干部学校及停止在红军“肃反”的决定。原第73师师长王树声被晋升为方面军副总指挥，并兼任红31军军长。年仅28岁的王树声，喜悦而激动。他决心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时刻准备打大仗、打胜仗！

大巴山区的夏季，酷热难当，正是苦练精兵的黄金季节。王树声副总指挥带领红31军指战员，认真贯彻木门会议关于大力开展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决定，掀起了群众大练兵的热潮。红军指战员上自军长、政委，下到

炊事员、饲养员，人人都参加训练，苦练杀敌本领。王树声副总指挥挥马扬鞭，深入连队，深入训练场，一手抓思想政治教育，一手抓军事训练。突出技术训练，以射击、投弹、劈刺和土工作业为重点。射击训练，由三点瞄准练习，提高为对隐显目标和活动目标的练习。步枪射击，要求3秒钟打活动靶，200米距离，发射3发子弹，必须达到20环。投弹训练，要在持枪、背枪和冲锋条件下投掷，投远、投准30米为及格。在战术上，主要是依据川北大巴山地区的地形特点，加强山地战、隘路战、河川战和夜战的训练。从连队到机关，从操场到课堂、食堂、俱乐部，到处都贴有“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红四方面军军训训词，以及“苦练出精兵”、“消灭军阀，赤化全川”等标语口号。设有练射击、练投弹的靶子，利用饭前、饭后、课前、课后的点滴时间，自觉练习射击瞄准和投掷手榴弹。各级干部还利用开会时间，组织射击和投弹比赛。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任务、纪律和光荣传统，以及瓦解敌军、严格遵守俘虏政策等。在干部训练方面，除带领战士完成技术、战术训练的共同科目外，还通过“军事研究会”、“战后总结会”、“民主评议会”等形式，提倡练为战、学为战，培养提高各级干部的领导水平和指挥艺术。

夜深了，王树声窗前的煤油灯还亮着。夏夜星空，连星星都眨巴着疲倦的眼睛。经过一天训练的王树声，回到住处，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又坐在灯下抓紧夜读兵书。他常读的书有：《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红四方面军出版印发的《干部必读》、《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军事知识研究》、《步兵基本动作》、《追击要点》等书和教材。学习中，王树声注重理论联系实际，遇到难点，他就当面向徐向前总指挥、向学过并精通兵法的战友、甚至包括他的下级干部请教。他说：“我最遗憾的是没有上过军校。过去部队人少，打游击战，领导带头冲。就能打胜仗，打不赢还可往山沟树林里钻。现在要指挥千军万马打大兵团运动战，再不努力学习，就不得了啊！”

硬功不负有心人。王树声带领红31军指战员，经过两个多月的群众大练兵，军政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在仪（陇）南（部）战役、反六路围攻战役中，越战越勇，威震敌胆。

仪南战役，是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后的第一个进攻战役，也是王树声第一次指挥一个军作战，他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发扬冲锋在前、顽强拚杀的战斗作风，更要在深谋远虑上下功夫。王树声受领率红31军向广元方向进击的任务后，即根据敌情、地形，作了周密部署。

8月12日，王树声指挥红31军主力，兵分三路向红土关、大石板、南山方向进击。8月15日，他率部继续向广元的千佛岩、莲花河、尹家沟发起进攻，与敌刘汉雄、王志远部激战后，攻占了千佛岩、亮垭子、红土关、元坝子等地，毙伤敌团长李清涵、刘鸿秀以下官兵120多人，将敌逼至严家沟、九花岩一线退守。8月18日，又与敌激战，攻克了广元城下东南险要阵地柳林子，歼敌两个多营，形成对广元县城的三面包围。并以一部兵力，向陕南宁羌（今宁强）发展，牵制、阻击敌人援兵。与此同时，红31军一部，向苍溪方向进击，也发展顺利，进至苍溪城郊，威胁敌人不能出援，有力地配合了红9军作战。

仪南战役，历时半个月，共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南部县大片盐井产区，

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粉碎了敌军对红军的经济封锁。

10月，秋风送爽，新谷飘香。川陕革命根据地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年。正当根据地军民喜庆丰收、欢呼胜利的时刻，四川军阀刘湘发动了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六路围攻。蒋介石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在江西，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在四川，拨出200万元军费、1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支持刘湘的六路围攻。10月4日，刘湘于成都就任四川“剿匪”总司令。10月6日，刘湘下达六路围攻动员会，以其所属第21军为主力，纠集四川各路军阀部队共110个团、20余万人，分兵六路，从西北起自广元、东迄城口一千数百里的弧形线上，相继发动进攻。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刘湘声势浩大的围攻部署，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作战。根据敌情、地形，红军作出了相应部署：东线为主要方向，由总指挥徐向前亲自指挥，集中红4军第10、第11、第12师，红9军第25、第26师，红30军第88师，红31军第92师，红33军，共22个团，配置于万源以东之宣汉、达县地区，主要对付敌军主力第五路和第六路；在西线，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以红9军第27师，红30军第89、第90师，红31军第91、第93师，共15个团，配置于西北起自广元、南沿嘉陵江左岸至营山、渠县地区，分别钳制敌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路；以红31军第93师第278团和第92师第276团，共2个团，配置于旺苍以北之三道河和通江以北之碑坝地区，监视并警戒陕南敌军行动。王树声指挥部队，千里西线摆战场，在“提高本领，消灭刘湘！”的战斗口号下，掀起了火线练兵的热潮。

11月6日，刘湘指挥六路敌军发起总攻。敌第二路军指挥田颂尧率其第29军，从苍溪、阆中出发，向根据地推进。敌第四路军指挥杨森率其第三、第五、第六混成旅，从蓬安向北进逼，占领营山县城后，续行北进。11月26日，王树声指挥红9军第27师，集中主力反击，一举袭占营山城北10余里的凤凰寨，将敌第3混成旅全部击溃，并乘胜追击至营山城下，歼敌2个团。12月上旬，敌第一路军指挥邓锡侯率其第28军，向广元县的元坝子、王家坝、快活岭和苍溪县的三川寺等红军阵地进犯。王树声沉着应战，果断指挥，以红31军主力多次阻击歼敌，仅快活岭一战，即歼敌1000余人。指挥红30军第90师于阆中县的鸡山梁，将敌第二路军3个旅击退。指挥红9军第27师，在仪陇县城至佛楼寺一线，钳制敌第三路、第四路军的进攻。1934年1月1日，王树声指挥预备队红31军第91师第271团和红9军第27师部队，夜袭仪陇城南的五里墩，反击敌第三路军进攻的4个团，激战一昼夜，将敌击溃。红军乘胜猛追10公里，毙伤敌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枪200余支。1月11日，王树声率部退出仪陇县城。第一期“收紧阵地”北起旺苍坝，南沿东河至千佛岩、尹家铺、鼎山场一线，消耗了敌军的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围攻。

2月，春节刚过，刘湘在成都召集六路军的指挥开会，策划了六路围攻第二期总攻的作战计划。3月4日，西线敌军首先发起进攻。敌第一路军攻旺苍坝，第二路军攻恩阳河，第三路军攻玉山场，第四路军攻鼎山场。王树声深谋远虑，指挥西线红军节节抗击，使敌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特别指挥红9军第27师和红31军第270、第271团，集中兵力、兵器，对敌第三路军实施重点反击，击溃敌8个团。又指挥在木门地区的红

31军第91师，奋勇反击，击溃敌3个团。仅此两战，共歼敌2000余人。予敌以大量消耗之后，红军先后主动退出玉山场、鼎山场、旺苍坝、恩阳河、巴中县城和木门场。在“收紧阵地”过程中，红军特别加强了火线政治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和军、师宣传队，都深入连队和前沿阵地，通过讲话、谈心、演节目等方式，及时传播胜利消息，提出战斗口号，进行思想教育和鼓动。同时，还重视瓦解敌军工作，每撤出一个阵地，都放置大量宣传品，还进行战场喊话，收到明显效果。

4月3日，敌军发起六路围攻的第三期总攻。王树声指挥西线红军，第二期“收紧阵地”至贵民关、观光山、得胜山一线。灵活机动，待机歼敌。在杀牛坪、梁炮台、甑子垭等地，红军依据有利地形，对进击之敌适时阻击和反击，给敌军以重大杀伤。

刘湘的六路围攻，经过三期总攻，损兵折将3.5万余人，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为缓和各路军的矛盾和部署新的总攻，刘湘于成都再次召开有各路军指挥参加的军事会议。会上确定发动第四期总攻。刘湘还请出他的高级顾问、江湖术士、外号称“神仙”的刘从云，出任“剿匪”总司令、前方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其统一指挥。刘湘又增调暂编第2师、教导师第2旅、模范师1个旅，组成总预备军，由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任总指挥。至此，敌军参加六路围攻的总兵力，已达140个团，共10万余人。为进一步迷惑敌人，创造战机，王树声指挥西线红军，于6月中旬后，相继撤出得胜山和通江县城。

6月26日，敌第一路军开始第四期总攻。善者不来，来者不善。敌军猛攻分水岭红军阵地。王树声审时度势，立即指挥红31军给来犯之敌以迎头痛击，并迅速转入反击。6月27日拂晓，红31军兵分三路冲入敌阵。右路将敌军2个团围歼于官田坝，歼敌500余人；中路和左路，激战一昼夜，连续突破敌军10余道阵地，直逼敌主阵地马鹿寨，歼敌1000余人。后因暴雨如注，小通江河涨水，影响粮弹供应，王树声才决定停止反击，将红军主动撤至小通江河左岸，与敌军隔河对峙。

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王树声抓紧与敌军对峙的有利时机，组织红军投入夜战训练。要求部队普遍学会搭人梯，用铁勾、绳索攀登悬崖的技术。训练中，干部战士紧密结合实战经验，创造了许多夜间联络方法和简易器材。如夜间行军，用竹筒装香火，筒口朝后，使后续部队跟随香火前进；用竹子做成“联络哨”，声高音尖传得远，即使炮火连天，也能听辨出来。他还指挥西线部队广泛开展夜摸、夜袭、夜战活动，每到漆黑的夜晚，红军小部队和游击队，就3人一组、5人一班的出发了。他们像一支支利剑，神速地飞向敌阵；如一把把尖刀，悄悄地插入敌后。突然袭击，快速撤离，打得敌人心惊胆颤，日夜不宁。一天，月黑星暗，王树声派红31军第91师第271团团团长王友钩，带领手枪队30多人，从平溪坝渡过小通江河，一直摸到敌军团部驻地牛角嵌，将正在“吞云吐雾”（抽鸦片烟）的敌团长砍死，抓了俘虏缴了枪。红军没放一枪，没伤一人，安全返回驻地。王友钩成为全军知名的“夜摸将军”。

8月上旬，在万源保卫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宣告：

“乘胜反攻的时机业已成熟了！”

徐向前总指挥率先指挥红31军第92师第274团，以青龙观为突破口，发起东线反攻。红军指战员奋勇冲杀，势如破竹，敌第五路、第六路军节节

败退。与此同时，王树声指挥西线部队，也开始反攻。红 31 军第 91、第 93 师在通江县以北，向敌第一路军反击，先后于分水岭、官田坝等地，给敌以沉重打击，9 月 17 日收复南江县城。紧接着，又在南江城西的三江坝、旺苍坝等地，歼敌第 2 师第 4 旅、第 5 旅和第 3 师第 7 旅，前锋直逼广元城郊。红 9 军第 27 师追击敌第三路军，9 月 16 日收复仪陇县城。此后，又收复了阆中县嘉陵江左岸的广大地区，歼敌 2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敌第一、第二、第三路军，纷纷逃至嘉陵江右岸。敌第四路军逃至营山、渠县地区。徐向前总指挥在取得东线反攻的胜利之后，又挥师西进，在巴中顶住了张国焘的瞎指挥，对向西线长池、木门方向逃窜之敌，实施大纵深的迂回包抄，李先念带领红 30 军主力，于黄猫垭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全歼敌 8 个团、1 万余人。接着又乘胜追击，于 9 月 22 日克复苍溪县城。至此，历时 10 个月的反六路围攻战役，取得大胜、全胜，共毙、伤敌副司令郝耀庭以下官兵 6 万余人，俘敌 2 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支、炮 100 余门，击落敌机 1 架。

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在红军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时间最长、战线最长、交战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歼敌人数最多、缴获枪支弹药最多。

反六路围攻战役的胜利，极大地坚定了根据地军民“消灭刘湘，赤化全川！”的斗争信念，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更加巩固、发展。

反六路围攻战役胜利了，王树声仍跃马扬鞭，日夜奔忙。他深入连队、课堂、操场，组织干部战士评指挥、论战法、谈体会、找差距、学先进，切实做到：吃一堑，长一智；打一仗，进一步。

反六路围攻战役后，王树声副总指挥已不再兼任红 31 军军长，他就一门心思地扑在协助徐向前总指挥领导红四方面军的训练和作战上。

蜀水战旗红

黄昏，夕阳的余辉染红了满天云霞。嘉陵江穿云破雾，绕山过峡，流到苍溪县塔子山下，兜了一个弯子，江面渐渐开阔平缓。放眼望去，远山岗影，流光溢彩，好一幅巴蜀山水画卷！

暮霭里，嘉陵江左岸的灌木丛里，张开了一双双神奇的眼睛。王树声副总指挥正带领指挥员勘察江岸地形，他双手举着高倍望远镜，看啊，看啊！一边看，一边在地图上标记，一边向指挥员讲解……

春夜，寒风料峭。王树声又坐在煤油灯下，查阅水文资料，研究河川战斗的战略战术……

1935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和军委电示红四方面军：“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间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于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于 2 月下旬接电后，即在广元县旺苍坝（今旺苍县）召开紧急会议，认真研究、贯彻中央电报指示精神，一致认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集中主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

嘉陵江是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四大支流之一（余为岷江、沱江和乌江）。上游多高山峡谷，水深流急，敌军沿江设防，是阻止红军强渡的天险和屏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领导分工，由王树声全权负责渡江前线指挥部队的工作。他指挥红 31 军和方面军工兵营，迅速征集材料，隐蔽造船；他带领渡江突击队，在老艄公的指导下，抓紧学习划船、泅渡技术，演练水上战斗、抢占滩头阵地的技术和战术；他组织各级指挥员，周密侦察和勘察，了解并熟

悉敌情、地形和气候情况；他深入走访当地人民群众，掌握嘉陵江水文地质资料。为了确保渡江成功，做到万无一失，王树声还偕同徐向前总指挥，沿嘉陵江左岸跋涉 100 余公里，选定了三个渡河点，苍溪县塔子山下的石家坝为主渡点。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经过多方侦察，查明了当面敌情，为四川军阀田颂尧、邓锡侯集中 53 个团的主力，布于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境的嘉陵江右岸，构筑有坚固的江防工事。敌军以重兵依险据守，严防红军渡江西进。但是，由于敌人迷信江防天险和防御工事，把重兵几乎全部放在江防第一线，使其后方十分空虚。即使江防一线，亦因战线过长，绵延百里，也有不少薄弱环节。而且，田颂尧和邓锡侯又都是红军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的手下败将。

根据敌情、地形和红军的备战情况，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以强击弱，以强制强”的战略战术，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其具体作战部署是：集中红 30 军主力从苍溪县城内塔子山下的石家坝，实施重点突破，歼灭江防守敌后，向剑阁、剑门关方向进攻，协同红 31 军歼灭剑门关守敌，并迅速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进攻；红 31 军以苍溪以北鸳溪口渡江，尔后消灭剑门关守敌，并向广元、昭化方向发展，阻击位于甘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南下，保障红军右翼安全；红 9 军在阆中以北的润溪口渡江，尔后以一部协同红 30 军向北发展，以另一部歼灭阆中、南部之敌，保障红军左翼安全；红 4 军为方面军第 2 梯队，于红 30 军渡江成功后，在苍溪渡江，以一部向南发展，协同红 9 军歼灭南部之敌，主力向梓潼方向发展；方面军炮兵营配置在苍溪塔子山上，掩护红 30 军实施重点强渡；方面军总指挥部随红 30 军渡江，视战斗发展移驻剑阁。

在那紧张备战的日子里，人们看到，王树声副总指挥马不停蹄，日夜奔忙，从造船场到训练场，从机关到连队，从后方到前方，一面抓紧水上练兵，一面加强政治动员，增强干部战士打大仗、打水战、打胜仗的坚定信念。

3 月 28 日晚 9 点正，渡江前线指挥部一声令下，强渡嘉陵江战役拉开了战幕。隐蔽在主渡点苍溪县塔子山下石家坝的红 30 军第 88 师第 263 团和总指挥部教导营的勇士们，驾着写有“奋勇杀敌，争取革命早日成功”大红字标语的 70 多只木战船，犹如万箭齐发，快速、勇猛地划向嘉陵江右岸。每只战船载乘一个班，勇士们手握步枪，腰挂手榴弹，身背大刀，一个个似铁塔般威武雄壮。船头架着机关枪。与此同时，红 9 军在左翼，红 31 军在右翼，百里嘉陵江上，千船竞渡……

夜幕沉沉，江水涛涛。红军突击船队，一直驶到距敌重兵防守的右岸几十米的地方，才被敌哨兵察觉，红军勇士们遇敌不慌，更加拚命划船，以便快速接敌，直到离敌滩头阵地二、三十米远的江边，才开始射击。这时，部署在左岸塔子山上的百余门大炮、重机关枪，一齐向右岸怒射，支援突击队抢占滩头阵地。勇士们猛打猛冲，勇往直前，歼敌 3 个连，攻占了敌军江防阵地，击退了南北翼侧敌军的反扑，巩固了杜里坝、老君堂、胡家场一线滩头阵地。

3 月 29 日拂晓，红 30 军第 88 师第 265、第 268 团相继渡江投入战斗，迅速攻占了嘉陵江右岸的飞虎山、高城山和万年山等制高点，并击溃敌江防总预备队前来增援的一个旅。红 31 军部队从鸳溪口强渡成功，攻占险要阵地火烧寺，击溃敌军刘汉雄部一个旅。红 9 军在阆中以北渡江，一部配合红 30 军攻占剑阁，一部向南部发展。第 2 梯队红 4 军部队，紧随红 30 军渡江，投

入战斗，向梓潼发展。

4月2日，王树声率部来到剑门关下。这时，已攻占剑阁县城的红30军第88师前来增援，王树声更加坚定了攻克剑门关的胜利信心。

剑门关，位于剑阁、昭化之间的剑门山上，扼川、陕南北大道。剑门山北高南低，72座山峰，陡峭险峻，犹如72头雄师面北而卧。“剑门天下雄”。那高耸云天的万仞峭壁，如刀劈斧砍一般，是插翅难飞的天然屏障。关上只有一个狭道隘口，悬在高山悬崖之中，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以来，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蜀将姜维从汉中退守剑门关，使魏将钟会统率10万精兵，屡攻不克，望关兴叹。如今，四川军阀邓锡侯派其得力干将、第28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4个团凭险据守。刁文俊曾夸下海口：“红军纵能渡过天堑嘉陵江，插翅也难飞过剑门关。”

红军好男儿，专啃“硬骨头”。王树声指挥红31军第91师、第93师和红30军第88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剑门关。各部队争分夺秒迅速扫清敌军外围据点，将敌人一步一步逼上了主峰阵地。为了不给敌军以喘息之机，当天中午11点多，王树声指挥突击队、“夜袭常胜军”第92师第274团第2营的勇士们，向剑门关敌军主峰阵地发起强攻。王树声的指挥位置，紧随突击队之后，靠前，靠前，再靠前。

红军一改往日善于夜战、偷袭的战法，变为烈日炎炎攻山崖，这是敌军所始料不及的。尽管如此，当时的天时、地利，都有利于敌人防守，不利于红军攀险攻关。所以，红军发起强攻后，敌军凭借剑门关天险和坚固的堡垒工事，组织密集火力，压制红军前进，情况十分紧急。王树声遇险不惊，成竹在胸。他立即把炮兵连长找到身边，一边观察，一边下达命令：

“看前方，敌阵集团工事，火力最猛，威胁最大，我命令你们炮兵连：每发射3发炮弹，必有1发击中集团工事的暗火力点！”“看清没有？”

“看清了。”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炮兵连长没有提炮弹少的困难，坚决表示：“刚才炮打得不够准，我有责任。这一次我要亲自去打炮，保证完成任务！”

炮兵连长火速赶回炮兵阵地。只听“咣！咣！咣！”一阵排炮，果然命中敌集团工事，敌暗火力点变成一片火海。王树声命令第274团号长，吹响了冲锋号，第2营打旗兵哗啦啦展开了鲜艳的军旗。“冲啊！”“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勇士们向敌阵主峰冲了上去。硝烟弥漫，杀声震天。经半天激战，红旗插上了剑门关，守敌3个团全部被歼。4月3日，王树声指挥红31军和红30军各一部，乘胜追击，攻克昭化，又歼敌1个团。

战后，徐向前总指挥亲临剑门关向王树声祝捷。山上山下，松柏长青。那一棵棵粗壮的“汉柏”，传说是张飞命令蜀军栽植的。王树声向徐总指挥汇报说：“这里山上的树太多，我们的马尾手榴弹甩出去，大都挂在了树枝上，多亏迫击炮弹炸响，又把挂在树上的手榴弹震落，在敌人阵地上四处爆炸，敌人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被迫缴枪。”徐总指挥幽默风趣地说：“打得好，打得好，你们这种战术叫‘天女散花’吧！”

攻克剑门关，红军控制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县约400余里的嘉陵江西岸地区，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一阶段遂告结束。

这时，被红军击败之敌田颂尧第29军江防部队，纷纷逃向射洪、盐亭、

三台地区集结。田颂尧为减轻其战败之责，电请蒋介石“削职示惩”。蒋介石亲自回电田颂尧：“着即撤职查办”，“其副军长孙震，辅助不力，记大过一次。着令孙震督率第29军，戴罪立功”；邓锡侯第28军主力，退缩于广元及其以北地区，另有三个旅和军部所率之部分机动兵力，布防于梓潼、魏城、江油、中坝、绵阳地区；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仍在碧口至松潘一线。

敌退我进。为取得战役全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集中主力歼灭梓潼、江油地区之敌邓锡侯部，并伺机向川甘边发展攻势。王树声协助徐向前总指挥继续指挥强渡嘉陵江战役第二阶段的战斗。令红31军主力推进至羊模坝、三磊坝地区，并围困广元县城；令红30军第89师北上摩天岭，出青川、平武，分割广元、江油敌军，并阻击胡宗南部援兵南下；令红9军、红30军和红4军主力，分别对江油、梓潼地区实施进攻。红军奋勇追击，愈战愈勇。4月10日，红9军部队渡过涪江，包围了江油守敌杨晒轩旅，前锋直迫中坝；红30军第89师攻克青川，14日克平武，4月15日，红30军第88师攻占敌塔子山主阵地；红9军第25师迂回包抄，将敌击溃，4月18日，红9军攻克中坝；红4军部队攻占梓潼，19日克彰明，21日克北川。至此，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24天，共歼敌12个团、1万余人，先后攻克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至梓潼、北抵川甘边界，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成为红军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一个模范战例。王树声发动群众认真总结了这次战役获取大胜、全胜的经验。首先是战役指导思想正确；其次，是在思想动员、敌情侦察、地形勘察、组织计划、技术战术训练和渡江器材等方面，进行了周密而充分的准备；三是渡江地段和主要突击方向，选点正确，兵力集中；四是采取了偷渡和强渡相结合、重点突破和宽大正面多路突破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五是在取得渡江作战第一阶段胜利后，乘胜追击，连续战斗，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这次战役得到当地党组织、苏维埃政府的紧密配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是取得战役胜利的又一重要经验。在渡江作战准备阶段，最大的困难是造船。许多老船工、木匠、铁匠背着干粮，带着工具，从四面八方赶到造船场；年轻力壮的，肩抬背驮，运来了木材；老人、小孩、妇女拣拾破铜废铁送来，供打船钉用……。红军渡江之前，中共南（部）阆（中）中心县委，曾领导升钟寺、保成寺地区的农民游击小组，积极打击敌占区的区、乡政权，破坏交通联络，配合红军作战。渡江后，方面军也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在地方党、政领导配合下，领导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在南部县的升钟寺、保成寺和江油县的界石坝等地区，先后建立了区、乡基层革命政权，并建立了阆南县苏维埃政府。同时组成了升钟寺独立师，下辖七个大队共1500余人。在红军攻占梓潼、彰明、中坝后，当地青年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使红军及时得到补充与扩大。

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拦阻红四方面军西进的计划，为红军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创造了新的经验。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王树声充满战斗胜利的喜悦和激情，更加豪情满怀。他威风凛凛，跃马扬鞭，奔赴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漫漫征程。

土门战绩大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是从强渡嘉陵江开始的。

红军主力部队突破敌军重兵防守的嘉陵江天险，进抵剑阁、梓潼之后，

陆续向江油、中坝地区转进。

这时，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领导下，以惊人的毅力和神速的行动，长征进到了云南省北部的金沙江南岸，准备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

蒋介石为阻止红军在嘉陵江与涪江之间建立根据地和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又重新调兵遣将，积极组织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新的围攻，企图对红四方面军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各个击破。1935年4月下旬，敌军开始出动：以刘湘主力王缙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左岸向漳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28军和孙震第29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右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由碧口、文县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路纵队的夹击；以刘湘主力控制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步步向西逼进；以邓锡侯一部由广元以北地区南下，向剑阁推进；以邓锡侯另一部封锁上门及北川河谷，堵截红军西进；以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阻止红军东返；以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防堵红军南下。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红军休养生息。但是，红军重任在肩，要打破蒋介石的围攻，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不能在这里久留。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在江油附近的任家坝召开高级干部会议，研究行动方针。会议决定：西进岷江地区，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要西进，必需首先突破邓锡侯在土门、北川河谷设置的防线，迅速占领岷江流域的松潘、茂县、理县、汶川等地。岷江右岸的松、茂、理、汶地区，是邓锡侯守备的地盘。境内山高林密，水深路狭，地形十分险要。邓锡侯为阻止红军西进，已在西进岷江地区的咽喉要地土门险关，设置了三道防线，陈兵3万余人，凭险筑碉，封锁土门，全力守备北川河谷。

北川河谷，是红四方面军长征西进的唯一通道。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东西绵延百余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为打破敌军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玉树声副总指挥受徐向前总指挥的委托，自始至终指挥了这次战役。为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仗立下了汗马功劳。

土门战役分三步实施：第一步，由北川向南打，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等制高点，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军攻打成都和川西平原的态势，以吸引和调动川敌主力；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岷江地区；第三步，坚守防御岷江左岸地区，牵制川敌西犯，掩护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共同北上。

4月底，红军开始出击。红30军第88师于漩坪突破，歼敌一部。5月1日，红30军第89师击溃敌陶凯部，占领墩上。5月2日，红9军、红30军主力，从蔡家咀、乱石窰抢渡前江，击溃敌第28军杨宗礼第15旅，攻占大堰口。5月4日，红30军第88师主力第265团和第268团包围了敌军层层设防、重兵把守的伏泉山。伏泉山，山连山，峰连峰，易守难攻。第268团与第265团采取夜摸、迂回包抄，从最险要而敌守备最薄弱的峡谷，夜摸偷袭上山，一举攻占伏泉山主峰，又从主峰往山下夹击，终于全歼守敌，占领了伏泉山阵地。

敌邓锡侯、孙震等，看到其精心设防的漩坪、伏泉山阵地被红军占领，

十分惊恐，急调纵队司令王铭章率8个团，从安县出发，日夜兼程，赶到伏泉山南侧的擂鼓坪集结。同时，派特科司令游广居率7个团，赶到草鞋街一线策应，妄图夺回伏泉山。5月5日，王铭章所部在飞机和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军发起反击。红军指战员严阵据守，浴血苦战，打退了敌军一次又一次的反扑。5月6日至7日，红军集中兵力乘胜追歼逃敌，先后攻占了东大垭口、白家林等阵地。5月10日，红30军第88师和红9军第25师各一部，从千佛山两侧夹击敌军。千佛山主峰海拔2900米，是北川河谷最南侧的制高点，山势险要，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红军攻占千佛山主峰佛祖庙后，追歼逃敌至西大垭口。5月13日，红31军一部攻占桃坪。

5月14日拂晓，红9军、红30军和红31军一部，分左、中、右三路向土门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土门防线被突破。5月15日，红军占领茂县。5月18日，红军又在大垭口重创敌王缙绪部第3旅，击毙其第9团团团长王三友，敌攻击受挫。

这时，徐向前总指挥率红四方面军主力，通过北川河谷，西进岷江流域。王树声指挥红4军、红31军各一部和红33军，继续坚守伏泉山、千佛山、土门一线，完成掩护主力、牵制和阻击岷江左岸之敌的任务，于7月中旬才由东往西逐次撤离战地。

土门战役，是红四方面军长征第一仗，历时两个半月，共歼敌1万余人。在战役中，王树声为保障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共同北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下战功殊

1935年10月，川西高原迎来了凉风阵阵、寒气袭人的初冬季节。经过忍饥受冻、长途跋涉，第二次穿越草地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分别在马塘、松冈、党坝地区集结，准备继续南下。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调集6个旅零2个团兵力，沿大、小金川布防，阻止红军南下。

位于大、小金川流域的绥靖、崇化、丹巴、懋功等战略要地，地形十分复杂，到处是高山密林，峡谷激流，周围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大雪山，易守难攻。

红军不怕远征难。绥崇丹懋战役，是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英勇转战的第一仗。王树声副总指挥决心协助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和徐向前总指挥，打好这关乎全局的一仗，以打胜仗、多歼敌的实际行动，来反对和抵制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严重错误。

10月8日，绥崇丹懋战役按预定计划拉开战幕。王树声指挥由红9军第25师、红31军第93师及红9军组成的右纵队，沿大金川右岸前进，强占绥靖、丹巴；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由红4军、红30军、红32军及红9军第27师组成的左纵队，于大金川以东地区，攻取崇化、懋功；以红33军及红9军第27师的1个团，驻守马塘、梦笔山，屏障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卓木碉；以红31军第91师师部及第277团、红军大学留驻阿坝，组成阿坝警备区，警戒掩护后方。

红军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迅速果敢的行动投入战斗，充分运用夜摸、奇袭和小部队大胆迂回穿插的战术，出敌不意的通过峡谷，强渡激流，攻夺要隘，抢占桥梁，创造了7天5战、追杀500里的突出战例。经10余日连续战斗，首战告捷，取得击溃敌军6个旅，毙、伤、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先后攻占了绥靖、崇化、抚边、懋功、达维、日隆关等战略重镇，狠狠打击

了敌军堵击红军的嚣张气焰。

敌军不甘心失败，再次调整部署：以刘文辉部防守金汤及泸定至汉源、雅安一线；以杨森部防守宝兴至大碛碛一线；以邓锡侯部防守宝兴以东大川场至水磨沟一线；以刘湘主力模范师之9个团，集中防守天全；另从绵竹等地抽调18个团向西增援。

面对强敌设防，红军奋起迎战。10月24日，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中，王树声指挥由红30军、红31军第93师及红9军第25师组成的中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穿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雪山、夹金山，率先向宝兴、天全和芦山发起进攻。11月1日，王树声率领中纵队，一举攻占宝兴县城，击溃敌杨森部3个旅，乘胜进占灵关镇。紧接着，又连续击败敌刘湘部教导师1个旅零1个团，中纵队直逼芦山城下。敌军节节败退，红军一路追杀，沿途俘敌1000余人。11月7日，由红33军组成的左纵队，攻占大川场，歼敌邓锡侯部第7旅一部，前锋进抵邛崃县境。由红4军、红32军组成的右纵队，先克西康金汤镇，后攻天全城西之紫石关、大岗山，击溃刘湘主力模范师1个旅。11月10日，攻克天全县城。随后，右纵队协同中纵队包围芦山县城。刘湘为解芦山之围，急令其独立旅由名山地区出发增援。王树声指挥红30军、红9军各一部，兵分两路对敌钳击，将敌全歼。此后，克复名山西北之五家口镇，又全歼守敌1个团。11月12日，芦山县城守敌，在红军猛烈攻击下，畏战弃城而逃，红军占领芦山。经18个昼夜的连续战斗，红军占领了邛崃山以西、大渡河以东、青衣江以北、懋功以南的广大地区，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击落敌机1架。这时，红四方面军接到党中央来电，明确指示行动方针。电报指出：“关于方针你们目前应坚决向天全、芦山、邛崃、大邑、雅安发展，消灭刘(湘)、邓(锡侯)、杨(森)部队，求得四方面军的壮大，牵制川敌主力残部，(以利)川、陕、甘、晋、绥、宁西北五省局面的大发展。”于是，红四方面军决定，继续向名山、邛崃方向进击，乘胜东下川西平原。

川敌刘湘为阻止红军东进，屏障成都平原，急调其主力王缙绪、唐式遵、李家钰等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东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石碑岗一线，筑碉设防，连同原驻当地敌军共80余个团。11月13日，王树声指挥中纵队红30军、红31军第93师、红9军第25师及右纵队的红4军，共15个团的兵力，从五家口镇向朱家场、太和场守敌发起猛烈攻击。经昼夜激战，于11月14日攻占敌军阵地，击溃敌暂编第2师2个团。红军越战越勇。11月16日，乘胜攻占名山东北战略重镇百丈。

百丈位于名山至邛崃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是进入川西平原和成都的门户，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徐向前总指挥亲临百丈指挥战斗。红军在连续击退敌军6个旅的多次反扑后，即沿百丈大道向邛崃方向攻击前进。先后攻占了黑竹关、治安场、王店子等村庄。红军的猛烈攻势，不断遭到敌军的拼死顽抗，攻势曾一度受挫。红军即退守百丈。

常言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11月19日拂晓，天刚蒙蒙亮，敌军集中10余个旅，在飞机、大炮强大火力掩护下，由北、东、南三面向红军突出于百丈10余里长的阵地，轮番攻击。王树声带领广大指战员，忍受着疲劳与寒冷，与敌军展开了浴血苦战。战斗打得激烈、悲壮。有的战士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进行白刃搏斗；有的战士手臂打断了，就用牙齿咬着导火索拉响手榴弹；有的同志冲到敌人跟前，抱住敌人同归于尽……经过连续7个昼夜的

激烈血战，共毙伤俘敌 1.5 万余人，红军亦受到重大消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至此，天芦名雅邓大战役遂告结束。这次战役，打出了军威，威震敌胆。

会宁大会师

1936 年 7 月，骄阳似火。王树声副总指挥率部走在茫茫草地上，他举目四望，依然是那熟悉的山影，熟悉的沼泽，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是啊，这已经是他第三次通过同一个草地了，许多战友在战场上与敌人搏斗没有战死，却在这没有人烟、没有飞鸟的草地上，被饥饿、疲劳和伤病夺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深深地怀念在草地牺牲的战友们。他永远不会忘记：

1935 年 8 月，第一次过松潘草地。那是红四方面军与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后，共同北上。环境虽然艰苦，但心情舒畅，斗志昂扬。

同年 9 月，第二次过松潘草地。天气恶劣，环境更加艰苦。当时是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擅自率军南下。王树声和广大指战员的心情一样，十分沉重。

这一次，是第三次过松潘草地。尽管路途遥远，风云变幻，给养奇缺，指战员们却分外喜悦。这是在甘孜地区迎接红二方面军后，第二次北上，大家一心向往北上抗日，个个精神振奋。

王树声身为副总指挥兼红 31 军军长，他时刻把战士的冷暖记心上。在草地行军中，能够充饥的东西都吃光了，生病掉队的人日益增多。遇到这种情况，他总是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坚持跋涉在沼泽地上，一边行军，一边做思想鼓动工作：“同志们呀，坚持走啊，穿过草地就是包座！”就这样，干部战士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克服了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走出草地。

10 月，金秋送爽，迎来了丰收的季节、喜庆的日子。红一方面军在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下，于 10 月 2 日攻占甘肃会宁县城。王树声怀着早日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的喜悦心情，参与指挥红 4 方面军，分为 5 个纵队，先后从甘南的岷州、漳县地区，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等地开进。10 月 8 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红 4 军第 10 师在会宁县的青江驿、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第 1 军团第 1 师胜利会师。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县城，受到红一方面军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

10 月 10 日，会宁城内红旗招展，鼓乐喧天，万众欢腾，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师军民联欢大会。红一方面军和当地人民群众，将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毛手套、鞋子、鞋垫、鸡蛋、肉、菜、果品等纷纷送来。

这时，红二方面军经天水地区渡过渭河，经秦安、通渭，进入会宁地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胜利实现了。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署名，发出了庆祝会宁大会师的贺电，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和热烈祝贺。

会宁大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红四方面军转战 19 个月，历尽艰难险阻、曲折复杂的长征。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王树声未及休整喘一口气，又踏上了充满血与火的西征之路。

一代儒将许光达

曾正魁 许雪青

许光达（1908～196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许德华。湖南省长沙县人。1921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任见习排长，同年在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排长、代理连长。1929年进入上海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任红6军参谋长，第17师政治委员、师长，红3军第8师第22团团长，第8师师长，红3军第25团团长。1931年在瓦油集战斗中负重伤，被党组织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举办的军事训练班学习。1934年，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命，协助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工作，前往新疆调解盛世才与马仲英的冲突。1938年由苏联归国，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长、教育长、第3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防空、交通司令员，情报部第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2旅旅长，雁门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3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学校校长，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时任第一野战军第2兵团司令员的许光达在兰州迎接了这一辉煌的时刻。他站在庆祝大会的主席台上，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不禁热泪盈眶：从浏阳河畔到黄埔军校，从洪湖苏区到陕北鏖战，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兵团司令员，今天的胜利，是经过了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又是多少革命战友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呵！历史铭刻着他们的丰功伟绩，人民永远不会把他们忘记。

中央领导同志在一次商讨建国大事时，时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要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在当时，发展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主要方向，许光达是从苏联学成回国的，是适合的入选。但是，老总们有自己的想法：军队要现代化、正规化，更需要有专长的军事人才。周恩来问许光达：“你的意见呢？”许光达朝着总理立正回答说：“报告总理，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谈论间，毛泽东走了进来，问起他们正在谈论的事，笑着说：“你们都在争许光达啊！我倒是同意老总们的意见，还是留在军队里好。”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把许光达从兰州召来北京，亲自委派他开始筹建我军历史上的现代化新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主席签署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直接威胁到我国的安全，这就为装甲兵的组建提出了更迫切的要求，要迅速地建立起机械化部队，适应形势，准备打

仗。彭总对许光达交代完任务后，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过去用的土枪土炮，该进博物馆了！我们现在要搞飞机、搞军舰、搞坦克、搞原子弹，要实现国防现代化。你先带个头，把装甲兵搞起来，为军队现代化闯一闯路子。”许光达说：“党把装甲兵部队交给我来组建，请老总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党的信任，我这后半生就交给装甲兵了。”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许光达从第一野战军的第2兵团调来了22人，组成了装甲兵筹备小组，住进了北京前门外的一个小旅店——香村饭店，紧张地干了起来。

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我军的一个崭新的技术兵种——装甲兵诞生了。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一切从零开始。许多事情都要身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许光达亲自筹划，从他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坦克，就连回到家里说话也离不开坦克。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身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经过短短的4个月时间，在全国各地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又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使装甲兵形成了一个网络系统。

随着朝鲜战争的日益升级，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课题：大敌当前，我们怎么办？整个装甲兵部队从上到下，请战书像雪片般飞到装甲兵机关，飞到许光达手中，要求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许光达又何尝不想把装甲兵部队拉到朝鲜去，狠狠打击美国侵略者？但是，部队刚刚组建，装备简陋、技术薄弱，苏联援助的一批坦克，请苏联专家帮助训练指战员要一年的时间。为此召开了两次教育训练会议，专题研究部队的训练问题，经过具体分析，制订办法，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3个月内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要在3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谈何容易，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订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装甲兵成立后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派出1个团去了朝鲜。

许光达不仅政治上成熟，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他站得高，看得远，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早在1938年，他在延安发表的《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就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则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季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马列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而在《军队的组织问题》一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为此，这两篇文章，1948年被林彪作为重要参考著作编入东北军区印发的《军事参考资料选集》。1939年，二战爆发，德军以闪击战术横扫西欧14国，并突然进攻苏联占领大片领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击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然而就在德国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后的第39天，即1939年7月31日，许光达就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击战的历史命运》一文，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力量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闪击战不是什么最新的作战方法，而是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发展的高峰，“德国的闪击战如果遇到了另一种最新型的、代表人类正义进行战争的、有同等装备和技术，甚至超过它的军队，闪击战就会遭受悲惨的破产，在那里

进入坟墓。”“……闪击战为什么在苏德战争中这样不行呢？原因就是上面所说的，它不能对付新型的军队，不能对付正义的战争。这种军事思想，比起新型军队的军事思想要落后的太多了。因此，结论只有一个，希特勒的闪击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果不出许光达所料，5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的进展，证明了许光达的远见卓识。

许光达从他接手组建装甲兵的那一刻起，对装甲兵的建军方向就非常明确，他常讲：“我们大家都来自步兵，是步兵的优秀指战员，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战术技能，而缺的是文化和技术，缺少这两条，就不能使手中的武器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不能称之为中国的装甲部队了。”“装甲兵在现代陆军中，除了它的专业技术外，按发展趋势来看，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的特种兵种了，它本身就是诸兵种合成的军队，更不用说今后整个陆军都将要实现装甲坦克化、机械化、摩托化了。”1951年11月15日，许光达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战车部队是技术兵种，不能掌握技术就没有战车部队。”“……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这个问题，开始建军时我们就提出：‘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两年多来的实践完全证明了这个提法是正确的。”

为了督促检查部队的学习情况，许光达和苏联顾问专程来到了徐州的坦克部队。有一天，他和苏联顾问亲临训练场，考核团以上干部的想定作业。来自淮海战场上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现任坦克团团长赵明奎，在想定作业时，由于文化低，众多的符号记不清楚，而他又童心未泯，把坦克行军的符号画成一些小王八。当苏联顾问走到赵明奎跟前时，怎么也看不懂这些符号，问翻译：“这是什么符号？”

俄语翻译也搞不清这是些什么符号，说：“这象一群爬行动物。”

周围的人哄堂大笑起来。

许光达又好气又好笑，他太了解赵明奎了，这个在淮海战场上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的功臣，在一只眼睛被打瞎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国的特级战斗英雄。这个连死都不怕的汉子，却在文化低的困难面前受到难堪。许司令员严肃地批评了他，同时又送他去学习文化，迎头赶上。

为了培养和造就更多更好的装甲部队需要的人材，经中央决定，许光达开始筹建坦克学院、学校。他亲自担任院长、校长，经常深入课堂和教练场，参与制订和修改教学大纲，一有时间还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年过半百的装甲兵司令员，再次登上战车参加训练，掀起了坦克部队官兵学习技术的热潮，为全军大比武的训练高潮拉开了序幕。

许光达重视技术工作，但他对政治工作同样是重视的，他不偏激，更不会让政治和技术对立。他一向主张政治工作是部队的生命线，“只有政治觉悟加技术才能无敌于天下。”

1965年7月，许光达接到一份事故通报：坦克第2师工兵营第1连班长王杰奉命在江苏邱县张楼乡执行训练民兵任务，在炸药意外爆炸的紧急时刻，他毅然扑向炸点，用身体掩护了在场的12名民兵和人武干部。通报认为这是一起由于技术原因造成的重大事故。

许光达看完事故通报，提出了质疑：如果说单是技术原因，那么在炸药意外爆炸时，王杰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扑向炸点掩护别人呢？这固然是一起事故，但在事故的后面是否有更积极的因素在起作用呢？即人的思想觉

悟和献身精神。接着他又收到好几封由王杰掩护过的民兵、人武干部和张楼乡党委写来的信，称赞王杰的举动是舍己救人，要求表彰王杰。这就越发使许光达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事故搞清楚。为此，他向总政治部萧华主任作了报告，组织专人进行调查。不久，《解放军报》发表了王杰的英雄事迹，号召全军向王杰同志学习。周恩来、朱德、许光达先后为王杰题了词，国防部授予王杰生前所在班为“王杰班”的荣誉称号，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毛泽东主席根据王杰的英雄事迹，对“两不怕”精神给予充分肯定：“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就这样，许光达慧眼识英雄，为一个险些被责任事故埋没的英雄，恢复了他本来的面貌。王杰精神曾经激励过一代人、而且必定会激励下一代人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搞现代化的装甲兵，首先要有装备。他那“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观点中，当然包含了坦克的设计和制造技术，如果不能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了，国家的各个领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恰恰在此时，我国第一台五九式主战坦克却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做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子里送给了许光达，被许光达放在书房里。凡是进过许光达书房的人都知道，这位将军的书房里，没有什么古玩、古画之类的装饰物，在对着他办公桌的一排书架上，除了整齐码放的各种书籍外，就数这台坦克模型最为显眼，它伴随将军走完人生的旅途，它寄托了将军后半生的理想，更凝结着将军为装甲兵事业披肝沥胆的耿耿忠心。

80年代中期，当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权威人士在审定许光达的有关条目时，非常赞赏他提出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在我国首先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就是许光达，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正确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科学地表述了政治与技术、精神与物质、人与武器装备之间的关系，是有远见卓识的，不愧为一代儒将。高风亮节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它标志着我军的现代化建设跨入了新的里程。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知道了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他对家人说道：“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多少和我并肩战斗过的战友——柳克明（直苟）、段德昌、周逸群、孙一中、李剑如……以及那更多叫不出姓名的年轻的战士，把他们满腔的热血洒在了神圣的国土上，我这顶‘乌纱帽’，是建立在我的多少战友、下级流血牺牲基础之上的，他们长眠在我们一起战斗过的地方，我这个幸存者今天得到了很高的荣誉，‘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几经思考，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军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地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

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军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高扬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声音宏亮地对他面前的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说。这里是中央军委会议室。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一推，两扇窗户洞开，说道：“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最后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1963年夏天，许光达住进解放军总医院查体，医生拟为他的砂眼进行手术治疗。这对一般人来说是一个很简单的小手术，但要对大将的眼睛动手术，就非同一般了。医院经过研究决定由该院眼科主任、一级教授张福星亲自动手。

张福星教授当时已经60多岁，解放前在上海开过眼科诊所，有不少亲属家居国外，解放后受聘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职，后来被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工作。

在给许光达眼睛做手术时，尽管他很小心，但还是碰伤了角膜，眼睛顿时红肿起来。

这事惊动了中央保健局，在那时事事都被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紧紧的时期，这事非同小可，为此有三条指示：一、追查责任；二、许光达立即转到北京医院治疗；三、写出事故报告。

许光达回答中央保健局也提出三条意见：一、不转院，仍住解放军总医院；二、请张福星教授继续治疗；三、不要追查责任。

出了事故，张教授的思想压力很重。许光达请张教授在其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家里，细心体贴地安慰一番，还叫大师傅专门加两个菜，留张教授父女二人在家便餐，当晚仍回到解放军总医院，请张教授继续治疗。

许光达眼睛红肿，疼痛厉害，睡不着觉，可他又不愿深更半夜打搅医生和护士，忍着痛在室内来回踱步。当值班护士半夜查房，推开房门看到许光达手捂着痛眼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的情景时，哽咽着叫道：“首长，您怎么……”

在张教授的精心医治下，许光达的眼睛终于治好了。他对有关人员说：“你们这些人就喜欢大惊小怪，没有必要嘛！医院的专家们为我们治病是尽了他们的全力的，政治上要对他们绝对信任才行，有这样或那样的疏忽是难

免的，何况专家们年纪又那么大了，怎么能怪他们呢？如果你们保卫部门一插手，问题就复杂了，以后人家还怎么工作？”

1960年冬季，北京出现了历年来少有的严寒，共和国主席、总理的饭桌上已经见不到肉食，连年的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粮荒。这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个年头。

实在捱不过饥饿，装甲兵机关好多干部的亲属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北京，在装甲兵司令部大院里长吃长住起来。当时，军队的条件稍好一点，虽说官兵们也需要时时勒紧自己的裤带，但毕竟每天多少总有一份口粮供应。于是，平日里严肃静谧的机关大院陡然变得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不穿军装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陌生面孔。为了不使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造成不好的政治影响，在许光达的主持下，装甲兵党委作出决定：困难时期，机关于部应尽力做好工作，不要让亲属来京长吃长住；已经来了的，要动员其尽快回去。以后，凡来队探亲的干部亲属，只允许在大院住三天。

听起来这决议有点严肃得不近人情。但值此困难之际，如果所有的军属们都涌到军营来长吃长住，且不说给军队带来多少负担，光是在人民大众的心目中，就会给军队的形象带来多么巨大的损失呵！

决议公布后不久，好像是故意要将许光达一军似的，他的四哥许德富和六弟许德强到了北京。面对饿得皮包骨头的兄弟，特别是当年不远千里，从湖南长沙跑到河北清河报信，使自己逃脱国民党追捕的四哥，许光达只是倾其所有——让炊事员把作为特殊营养品配给自己的3斤黄豆全部拿出，让兄弟们吃了几顿“饱饭”，留住了3天，便让二人带上家里仅存的50斤全国通用粮票，买了两张到长沙的硬座火车票，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两天后，保卫部门向许光达报告，接安阳公安局电话，许德强在安阳车站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许德强被接回北京，从北京站一下车，就被直接送到解放军总医院进行抢救。许光达夫妇到医院来看许德强，他艰难地睁开双眼，已经不能说话，在当晚就死去了。医院征得许光达的同意，对许德强进行了尸体解剖，发现许德强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只是胃已完全萎缩，医生说这是长期挨饿造成的。许德强是饿死的。

大将之死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震荡，全国上下全都卷进了这场政治漩涡之中。

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论点，被当作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1964年春天，林彪在空军召开打扫卫生现场会，要司令员亲自带队参加。许光达悖逆其意，厌烦地说：“我们部队准备大比武，训练这么紧张，要我动员大家一天到晚去抠暖气片缝，我不干。”这话很快就传到了林彪的耳朵里。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叶群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作，作风不正。自然就借口逃会，贯彻不力，当然，这就又成了许光达的一个罪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许光达是林彪处心积虑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拉不过来就打倒，这是林彪惯用的手法，于是就有了贺龙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许光达被非法关押，受尽摧残折磨，直至悲惨地死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造反派”要给装甲兵党委的一位领导干

部戴高帽子，说他生活作风有问题，要开批斗会。作为党委书记的许光达，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快就与群众达成共识：会可以开，有意见也可以提，但要注意大的方面，我们是军队，有组织原则，有保密规定，不要戴高帽子，不要挂牌子。

当会议开到一半时，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个手拿纸糊高帽子的“造反派”，朝着那位领导干部走去。许光达当即制止。“造反派”推开他：“这不关你的事，你别管！”

台下的群众也都激动起来，两派之间的矛盾一触即发。

许光达站起来，气愤地说：“你们不守信用！你们都是军人，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先给我这个党委书记戴。”

许光达发现纸糊的高帽子里面装满了铁蒺藜，一旦戴到头上，后果不堪设想。他上去抢高帽子，心脏病突发，倒在台上，当即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抢救。

1967年1月16日下午，许光达从医院回到装甲兵司令部，主持党委一个重要会议。会后回家吃晚饭。那天是星期日，儿子和儿子的未婚妻都在家，按照他的老习惯，经常要在吃饭时和孩子们进行思想上的交流。一个时期以来，作为中央委员的他，很难看到中央文件了，中央的重要指示往往是通过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的讲话透露出来，而这些讲话，又首先会出现在首都红卫兵的大字报上。作为一个军队的高级指挥员，要从孩子们抄录的大字报上去找寻最新动态，做为参考来领导工作，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可悲又可笑的事呵。

饭后，许光达站在门口等车准备回医院去。突然，跑来几十个“造反派”，把住房团团围住，连推带搽地带走了许光达，紧接着在生活秘书的带领下抄了家，他们翻箱倒柜，说是要找什么“二月兵变”的黑名单，结果一无所获。这伙人并不甘心，临走时他们拿走了许光达在20多年前从侵华日军手中缴获的一面日本国旗，作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证”；还把不久前他作为军事代表团团长访问阿

尔巴尼亚时同恩维尔·霍查的合影照片，作为他充当“苏修特务”的“罪证”带去了。

在办公楼里，几个小时前作为党委书记、司令员的徐光达大将还在主持会议，转眼间却变成了“造反派”的阶下囚，被迫交待“问题”。

“老实交待你企图搞二月兵变、篡军反党的罪行！”

“老实交待你搞政变准备当总参谋长的阴谋！”

许光达扫视一下会场，平静地说：“你们说盼‘二月兵变’，我不清楚。”

许光达出口的第一句话使“造反派”大失所望，会场上立即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倒许光达！”“许光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主持会议的人示意大家静一静，让许光达继续回答问题。

“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

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大叫大嚷起来，又乱成了一团。主持人无法平息会场的混乱，更无法使许光达就范，反而被徐克达的反讥“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批斗以后，身为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中共中央委员、大将的许光达，就被“造反派”非法关押了起来。

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找来两名 1.8 米以上的打手，专司拳打脚踢、坐“喷气式”之职，在严刑拷打和连续不断的批斗下，许光达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专案组不但不给治疗，反而提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专案人员都曼林、党志壁打在许光达的脸上、腰上，打得许光达口流鲜血。

关押期间，降低伙食，室内空气污浊，夜里开大灯泡睡觉。

1968 年 11 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咳嗽严重，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从 11 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当牢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第一次住院七十八天，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摘自 1978 年 7 月 6 日装甲兵党委向中央军委并总政治部写的《关于许光达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报告》

1969 年 6 月 3 日晚，许光达惨死在医院厕所的马桶上，没有任何医生、护士在场，更没有亲属在身边，死亡原因，至今不明。6 月 4 日，专案组不准家属参加，强行将遗体火化。

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政治屠刀下。家属在清理他的遗物中，发现在《毛泽东选集》的扉页上，他用刚劲的笔法写道：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千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这是他在被连续审讯三天三夜，心脏病发作被抢救过来后，挥笔写下的，不幸成为绝笔。它不仅是许光达一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的写照，也是他同林彪、“四人帮”坚决斗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气节的绝唱。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一代名将发自肺腑的声音，感人之深，惊天地、泣鬼神。

中华五千年历史，出现过三个黄金时代：春秋战国、唐贞观之治和康（熙）乾（隆）盛世。历史的车轮滚到 20 世纪 20 年代，自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炎黄子孙进入了第四个鼎盛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血雨腥风，从 500 万的人民军队中筛选出十位元帅、十位大将，许光达做为这二十位将帅之一，既不同于岳飞、洪秀全，也不同于黄兴、蔡锷，他是在中国共产党哺育下成长起来叱咤风云的新一代将领。他的 43 年革命历程，波澜壮阔，有声有色。他的政治胸怀，他的军事理论建树，他的指挥才能，他的

高尚情操，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名垂千古！

